HISTORY Stud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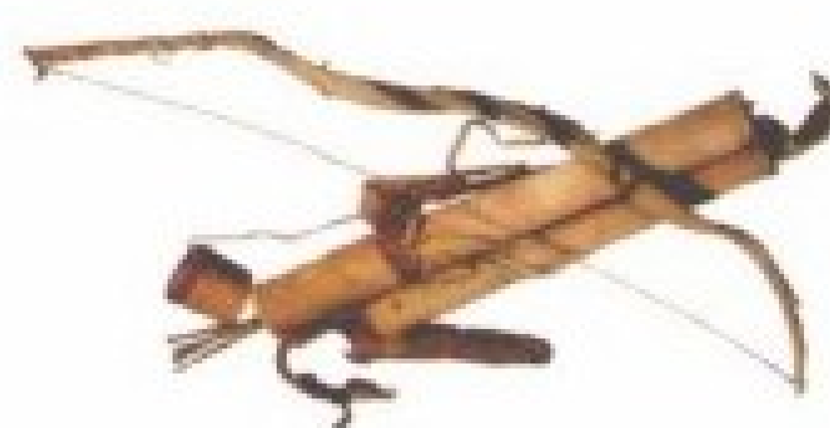
中国读本



两晋南北朝史话

刘精诚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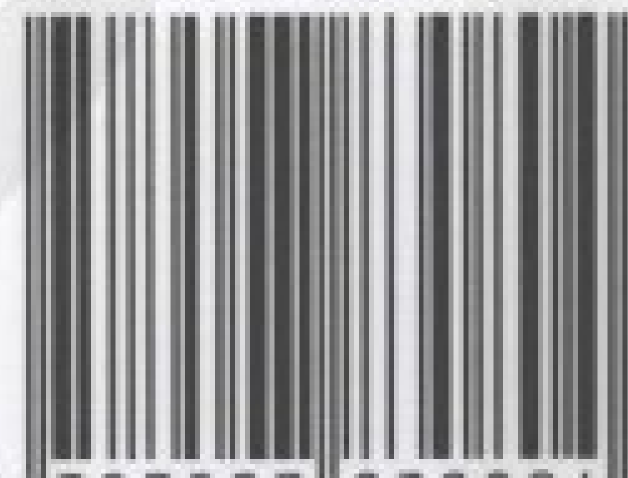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80-4



9 787507 830804 >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南北朝史话／刘精诚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0-4

Ⅰ．两…　Ⅱ．刘…　Ⅲ．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通俗读物　Ⅳ.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31号

两晋南北朝史话

著　　者	刘精诚
责任编辑	凭　林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17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80-4／G・1278
定　　价	25.00元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两晋南北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但也出现过分裂时代。两晋南北朝就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的一个动荡和分裂时代。

两晋是指西晋和东晋。继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后，公元265年，司马氏从曹魏手中取得政权，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在公元280年灭吴，统一了中国。但西晋的统一极为短暂，到公元316年就在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进攻下灭亡了。西晋灭亡后，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大乱时期，南方则建立了东晋。北方十六国最后被北魏统一；北魏以后又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对峙，称为北朝。南方继东晋之后，又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称为南朝。南北朝长期对峙，战争频繁。最后北周灭北齐，北周又为隋所取代。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又重归统一。两晋南北朝历时324年（265—589）。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动乱的时代。汉族和各少数族先后建立过大小约30多个政权，较大的战争发生500次以上。对于这样一个长期陷于分裂、朝代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人们把它看作“乱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时代漆黑一团、停滞倒退，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恩格斯曾经批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把欧洲中世纪看作漆黑一团、“历史的中断”，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他说：“中世

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 14 和 15 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①。恩格斯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分析欧洲中世纪，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指导。

两晋南北朝虽然战乱纷繁，但是无论在经济、民族融合、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有发展进步。

从经济来说，南方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大批人口南下，带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江南荒地大量开发，南方经济得到长足进步。农业上兴修水利，精耕细作，扩大耕地面积，大量种植北方农作物；手工业方面冶炼、纺织、制瓷、造纸、造船等发展很快；商业兴盛，城市繁荣。从而不仅使长江流域，而且闽江、珠江流域都得到了开发。北方在孝文帝改革后经济也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这反映在北魏末年出现了两部著作：记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齐民要术》和反映洛阳城盛况的《洛阳伽蓝记》。到北魏熙平（516—518）年间，北方人口总数已达到3 200 余万人。总之，经过两晋南北朝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隋唐时每年从江淮漕运粮米一二百万石供应京师，江南已成为经济中心。隋唐时代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除了拥有北方黄河流域外，又增加了长江流域，扩大了一倍。

在统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往往是服从于统一王朝各方面的需要，所以都城以及中央控制的重要区域有较大的发展。分裂时期情况则不同，由于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政权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重视本地区经济的开发，注意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所以社会经济有可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当时中国主要有三个经济文化区

---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5 页。

域：一是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文化区；二是以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为中心的中原经济文化区；三是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江南经济文化区（《隋书·地理志》上中下三卷即按此区分）。人口流动，少数民族经济与汉族的交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这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我国古代经历了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一次是宋辽夏金元。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融合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认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必然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同化，这是“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向往更高更美好的物质文化生活。当时周边各少数族进入中原，在汉族先进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步封建化了。各族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国历史上许多古老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巴以及其他各种胡人，大体上都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进程，融合到汉族中了（羌、匈奴主要指内迁部分）。他们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隋唐的统一强盛局面是与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分不开的。

再次，这时期思想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大变动，没有产生统一的、相对稳定的、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上专制主义有所放松。由于儒家经学本身的僵化，先秦诸子学说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兴”，名、法、道、儒、墨、兵、纵横等诸子百家前后相继而起，形成了先秦以后学术界再度活跃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先秦以后又一个“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一是人的自觉精神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不再受儒家名教束缚。“木兰诗”、梁祝故事等的出现，是人们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等个性解放和独立人格的表现。二是思想比较开放，从而使各种文化融合。儒、道、佛的合流，佛教的玄学化，中西文化频繁交流，各民族互相学习、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使文化上能包罗宏富，达到开放融合。三是宗教得到广泛的传

播。佛教有很大发展，北朝末年共有僧尼300余万，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民间信奉鬼神之俗盛行，道教已被改造成为统治者的宗教，为统治者所提倡。此外，科学技术、文学、史学、地理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

由此可见，两晋南北朝时代既有动荡、战乱的一面，又有经济、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的重大发展。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可以说，隋唐时代的繁荣昌盛，乃是这个时期为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目　　录

第三章　世家大族扶持下的东晋

第四章　南朝政权的更替

第五章　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

第七章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

第八章　思想和宗教

第九章　文学、史学和艺术

第十章　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第一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

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炎用"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取得的。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呢？这是因为从他的祖父司马懿起，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家庭。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汉代都做过大官。他才能出众，富有谋略。曹魏时，司马懿东抗孙吴，西拒蜀汉，北平辽东公孙氏，在战争中树立了威望，掌握了军权。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叡死，他和皇帝本家曹爽同受遗诏辅佐8岁的齐王曹芳。曹爽妒忌和排挤司马懿，把他从掌管军权的太尉调任为尊贵却无实权的太傅。对此，司马懿并不甘心。他装病在家，暗中窥测方向，密谋策划。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和他儿子司马师趁曹芳和曹爽到洛阳城南高平陵祭祀魏明帝陵墓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占据武库，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兵权，然后杀死曹爽及其党羽。从此，魏国政权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掌大权。他废曹芳，另立14岁的曹髦为帝。

255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掌握政权。司马昭飞扬跋扈，朝廷里的事都要他点头才能办。魏帝曹髦一年比一年长大，对此很不甘心。他对左右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受废辱。"

于是在魏甘露五年（260）五月七日夜里，命令殿中宿卫军士及侍从官僮拿起武器，出讨司马昭；自己也举剑站在车上指挥。军士们冲出宫殿，直向相府杀去，行到半路，遇到了一队士兵，带队的是司马昭亲信、掌握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双方战斗起来，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看到皇上亲自来了，问贾充："怎么办？"贾充大声喝道："司马公养着你们，正为今日。有何可问！"成济听罢，挥起长戈，直向曹髦刺去，只听"呀"的一声，已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并于景元四年（263），调集了 18 万大军，三路攻蜀，邓艾军攻至成都，刘禅投降，蜀亡。司马昭自以为功高，让魏帝给他加"九锡"[①]，准备篡位当皇帝。正在这时，他突然得病，一命呜呼了。

司马昭一死，篡位的事就落到他儿子司马炎头上。咸熙二年（265）司马炎让魏元帝曹奂下诏"禅让"，自己则装腔作势推让一番，最后在他的亲信大臣们一再"劝进"下，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司马



唐人阎立本绘司马炎像

那时候，南方长江下游地区还有一个吴国。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发兵大举攻吴。由司马伷、王浑、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分别统率。六路大军二十多万人马，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吴国连忙下令封锁江中险要，用粗铁链横在江上，又做了长达一丈的铁锥暗置江中，想以此阻挡晋军。王浚针锋相对地造了几十只大木筏，在上面缚上草人，披甲执杖，

① "九锡"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予的九件宝物，如车马、衣服、乐器等，这是一种最高荣誉，往往是"禅让"的前奏。

故布疑阵。又挑选懂水性的士兵放筏先行，顺流而下，江中的铁锥尽扎在木筏上被带走了。王浚又扎了又长又粗的大火把，在上面浇上油，遇到铁链就点火燃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铁链烧断了。王浚就此攻破吴军封锁，攻占许多城池。不久，晋军攻克江陵，长江以东许多州郡相继投降。为了加速最后胜利，部署新的进军，杜预召开了军事会议。贾充等保守派出来阻挠，说是存在百年的强敌不可能一下消灭，目前春天水涨，疾病将生，不如等来年冬天再继续攻伐。杜预反驳说："当今战士士气高涨，如同刀劈竹筒，劈开头上几节，以下自会迎刃而解，再无碍手之处，还要等待什么?"杜预说的正是成语中"势如破竹"的意思，将领们听了这样的比喻，无不信心十足，决心乘胜前进。

杜预所言果然不错，这一年的二月，王浚就攻下夏口、武昌，破浪东下。三月，到达建业城下，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吴主见大势已去，只得反缚双手带了棺材来到王浚军门投降。王浚亲自为他解缚，下令烧掉棺材，以礼相待，代表西晋政权接收了吴国图籍。当时在籍的共有 4 州、43 郡、52.3 万户，23 万士兵和男女人口 230 万。于是，西晋统一了全国。

二、占田制和"太康之治"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西晋建立以后，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因此，在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

占田制与课田制是在曹魏屯田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曹操掌权时，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把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屯田制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推行开来。当时由于战乱，空荒地很多，流民也很多，曹操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让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去种国家所有

的空荒地，规定收到粮食后，用私牛的与国家对半分，用官牛的自己得四成，国家得六成。屯田上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实际上是政府的佃农，这是民屯。在军事频繁地区，还实行士兵屯田，称为军屯。屯田制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曹魏后期，由于统治者贪得无厌和日益腐化，屯田客和屯田兵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他们不仅被迫扩大耕种面积，而且常常被征发去服各种徭役。屯田上的劳动者不断逃亡，产量越来越低，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另一方面，官僚贵族往往互相分割侵占屯田土地，又把屯田客变成他们私家的佃客。司马氏掌握曹魏的实权以后，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世家大族的支持，干脆把租官牛的屯田户赏赐给他们，自公卿以下按照官品给以不等的数量。由于屯田户过去免除政府徭役，这些人成为私家佃客后仍保留了这个权利。许多害怕徭役的自耕农也纷纷投到贵族门下，成为佃客。咸熙元年（264），司马氏下令罢屯田官，把屯田制下的典农官改为郡太守或县令长，取消了民屯制。晋武帝即位以后，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从此以后，屯田客大都成了政府的编户，少部分成为豪强大族的佃客。

西晋王朝一方面要照顾、保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但世家大族过分侵占土地和劳动力，与中央政权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服役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会影响国家赋役收入；土地集中也会造成阶级矛盾尖锐，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促使西晋实行占田制与课田制的主要原因。

所谓占田，就是名义上准许人民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即一个男子（16—60岁），可以占田70亩，女子可以占田30亩。至于占到占不到，政府并不保证，也不过问。课田是督课种田的意思，是为了保证政府的租税收入，规定每个丁男不论自己是否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25亩，次丁女免课，这是带有强制性的，有"驱民归农"的意义。占田规定的70亩，政府并不要求全部耕种，但至少

要有50亩不被荒废。因为当时还有不少荒田，也有的人占田不耕，去从事投机贩卖，因此政府要加以督课。地方官必须负责本郡本县课田人数所应垦的土地亩数，以向中央交纳租赋。

课田的田租是多少呢？大抵是每亩8升；50亩共收租4斛。边远地区的少数族居民不课田，每户交米3斛，再远的交5斗，叫作义米；极远的每人交钱28文，叫作算钱。除田租以外，政府还颁布了户调制，即按户收赋的制度。规定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3匹，绵3斤，妇女及次丁男作户主的减半交纳，边远地区交2/3或1/3。上述数额是一个通扯数，实际征收时，先把各户按资产多少分为9等，富家多收，贫家少收，这叫“九品相通”。但实际上往往是富家用各种手段降低户等，把它转嫁到穷人头上。

占田、课田制使政府从豪强大族手中争取到一部分民户，政府掌握的劳动力有了显著的增加。太康三年（282）的民户，比颁布占田、课田制的太康元年（280）增加了130多万户。课田和户调的负担虽然比曹魏时候重些[①]，但由于农民有了一部分土地，有了生产积极性，所以占田制、课田制还是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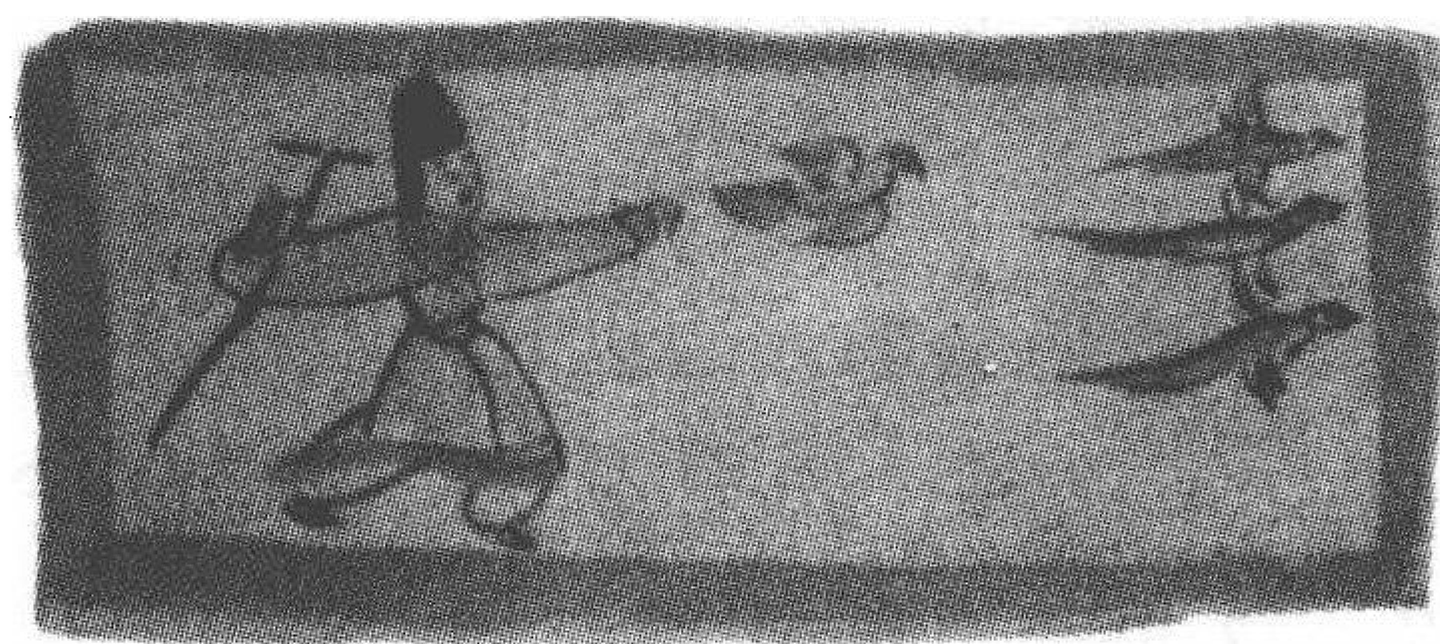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西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时候，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劳动力缺乏，西晋政府招募蜀、吴境内的人口迁居北方，宣布给以免除20年徭役的优待；兴修水利，防止涝灾；把3.5万头种牛赊给颍川、襄城一带将吏士兵，作为春耕之用；为增加农业人口，下令姑娘17岁以上不出嫁的由官府代找配偶；多次下诏书奖励农耕，汲郡（今属河南）太守王宏抓农业较好，赏给1 000斛谷子，提拔为大司农；平吴以后，下诏州郡减免军役，以减轻农民负担，等等。

总之，由于平吴后全国统一，战争减少，社会趋于安定。所以在太康年间（280—290），社会经济繁荣，出现一派兴旺景象。史书

---

① 曹魏田租每亩4升，户调平均每户绢2匹、绵2斤。

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①]。"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全国统一），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②]。意思是，统一以后，人们安居乐业，赋税平均，粮食有了剩余，牛马布满田野，不必关门防盗。这些记载虽然不免有点夸张，但这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繁荣当是事实。1972 年在甘肃嘉峪关发掘清理了 8 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内有壁画 600 多幅，内容有农桑畜牧、屯垦、出猎、宴乐等，反映出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经济发展，人口也有显著增加。公元 265 年，晋代魏时，魏、蜀共有 94 万户，537 万余口，加上吴亡时的户口，三国合计，共有 146 万余户，767 万余口。太康元年（280）平吴后，全国户口共有 245 万余户，1 600 余万口。到太康三年（282）共有 377 万户。户口增加是比较快的。当然这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其中有一部分是豪强荫庇下的户口被检括出来的。



放猎（魏晋墓壁砖画）

可惜，西晋的"太康之治"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是因为西晋王朝是世家大族政权，这一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腐朽贪婪，因此西晋建立不久，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门阀制度与门阀士族的特权

西晋政权是世家大族的政权。这一时期，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

---

① 《晋书》卷 6，《食货志》。

② 《全晋文》卷 127，干宝《晋纪》总论。

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起来了。

所谓门阀，就是阀阅门第。我国古代贵族官僚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常常用来张贴本户的功状。阀阅成为达官贵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后来那些世代做官的人家，又称为门阀。门阀制度就是按门户等级严格区别士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

门阀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西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儒家经籍如《尚书》、《春秋》等成为世代研讨的家学。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士族”是指他们掌握儒学及文化知识，“世族”是指他们世代做官。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①，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连续四代都有人担任“三公”的大官。魏晋以后，地主阶级中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的等级区别进一步确立。那时的政治，通常称为“门阀政治”。

在门阀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曹丕建立魏国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用；“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门第的高卑）、官资（父祖的政治地位）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 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除了政治上世代为官这一主要特权外，还有二种特权：一是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

---

① 仲长统：《昌言》。

② 《晋书》卷92，《王沉传》。

除赋役的特权，二是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①]，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或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②]

门阀制度形成以后，高门士族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特殊等级，他们被称为“著姓”、“名族”（因历世著名）、“望族”（负有名望）、“冠族”、“衣冠族”（家世衣冠）、“高门”、“盛门”、“士流”（先世有官位）、“郡望”、“郡姓”（世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右姓”（古代以右为上），等等。另外一些没有特权的人便被称为“庶族”、“次门”、“役门”、“后门”等。士、庶之间社会地位和身份完全不同，有不同户籍，不能通婚，不同席而坐。

咸宁四年（278）一次上朝时，晋武帝当着百官把一件极为珍贵的“雉头裘”烧毁了。这是太医院医官程据献上来的。这件全部用野雉头毛制成的衣服，是稀世珍宝，百官们看了既赞叹，又感到可惜。

晋武帝是一个十分荒淫、奢侈的君主。他很好色，曾两次下诏选天下美女到后宫。泰始九年（273）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的女儿入宫。次年，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女儿入宫。经他挑选后，不合格的才可出嫁，隐瞒者要以“大不敬”罪名杀头。

西晋的贵族官僚中还有一种斗富的风气。最有名的就算石崇与王恺斗富。石崇是开国元老、司徒石苞的小儿子、为人聪明，多计谋，有生财之道，官至散骑常侍、侍中，封为安阳乡侯。他在当荆州刺史时曾派亲信官兵化装成强盗抢劫富商财物，甚至还抢劫外国使者送给晋朝朝廷的宝物。后来石崇入朝为太仆，在洛阳是有名豪富。王恺是晋武帝的亲舅舅，也是京城里的豪富。王恺和石崇互不服气，决心要比一比。

---

① 《周礼》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勋、议宾。

② 《资治通鉴》卷90，大兴元年（318）。

王恺用米浆或麦糖水来洗锅，表示豪华，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出门，用紫丝布做40里的步障（步障是道路两旁遮风寒、挡尘土的行幕）；石崇用织锦花缎做50里步障。王恺用赤石脂代替泥土涂墙，赤石脂是一种贵重的药材，它涂了墙，红红的，像蜡一样细腻、光泽；石崇用花椒和泥巴涂墙，花椒是一种香料，用来涂墙保暖性好，有香味，原来只有皇后住的房用，称为“椒房”。晋武帝为了支持王恺斗富，送给他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王恺拿到石崇面前炫耀，石崇表示不屑一顾，随手拿起铁如意把它打得粉碎。王恺十分痛惜，正要发作，石崇冷笑道：“你不用急，我马上赔你。”他让奴婢取出六七株珊瑚，都高达三四尺，重叠的枝条一层一层数不清，色彩鲜艳如玉，说：“这没有什么稀奇，随你自己挑选。”王恺看了，目瞪口呆，经过这次较量，才自愧不如。

这两个人不仅挥金如土，而且轻视人命如儿戏。两家都有大批奴婢被随意杀戮。王恺有一次宴请，命一个美女在旁吹笛助兴，一时失调，王恺就命人拉到台阶前打死。石崇每次摆酒宴，总有许多美女歌舞和劝酒。如果哪个客人饮酒不干杯，那个劝酒的美女就要被杀。有一次，王敦故意不饮酒，石崇就一连杀了三个美女。其凶狠残忍，已到了何等程度！



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局部）

放荡奢侈的生活，必须花费大量的钱财。世家大族们个个不择手段地弄钱，从皇帝开始，就卖官鬻爵。有一天，晋武帝问大臣刘毅：“卿看我可以比得上汉朝的什么皇帝？”刘毅是个敢说敢讲的直臣，答道：“可比桓、灵。”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有名的昏庸皇帝。

晋武帝很不高兴，说："不至于这样吧。我平定东吴，统一全国，勤恳治理国家，怎么去同桓帝、灵帝相比？"刘毅并不让步，说："桓帝、灵帝卖官，钱入公库，陛下卖官，钱入私库，这样看来，你恐怕还不如桓、灵。"晋武帝虽然听了不痛快，但刘毅讲的确是事实，没法抵赖。他还是够聪明的，随即哈哈大笑说："桓、灵在世，没有人敢这么说话，我的朝廷里有你这样的直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这话一讲，就体面地下了台。在一旁被刘毅的话吓得一身冷汗的大臣们，赶紧齐声颂扬，又把晋武帝捧得晕头转向。

对于门阀贵族们的爱钱如命，有一个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讽刺诗《钱神论》，其中说道：

>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铜钱中有一方孔）。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皇帝的宫廷），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打官司），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升迁）；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贵人），当涂之士（朝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门阀贵族对金钱的崇拜和亲热，被描绘得何等惟妙惟肖！这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也有类似的一段：

>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莎士比亚和鲁褒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古今剥削阶级爱钱如命的本性却是一样的。

正当西晋的门阀贵族们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时候，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大臣傅咸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疏中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①]。是的，天灾是有限度的，奢侈风气造成的危害却是无止境的。权贵们无限制地压榨人民的血汗，终究要遭到人民的反抗。

四、"八王之乱"

——分封制和皇族内讧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吸取了曹魏时诸侯王没有实权、政权很容易落入他人之手的教训，实行了分封制。泰始元年（265）分封宗室 27 个王；几年以后，又陆续增封，前后共有 57 个王。同时大封功臣和异姓世家大族为公侯，一次就封了 500 多人。这些人形成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阶层。他们法定的封邑就有 100 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 2/7，国家的赋税租调，1/3 成了王公贵族的收入。

与分封宗室相辅相成的另一项制度为都督制。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西晋建立后，广泛推行都督制。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有将军之号，也只掌民政。

西晋泰始元年分封时，宗室诸王均留在洛阳，并未到封国，咸宁三年（277）晋武帝遣宗室诸王归国。为了使封国所在地与都督辖区相一致，或将都督区转到封国，或使封国转到都督辖区内，名为"转封"。诸王封国在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咸宁五年（279），全国 10 个都督，由宗王出任的几乎占一半。宗王在地方上拥有权力和军队，另一方面，西晋平吴后又取消了州郡武备，这是酿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

---

① 《晋书》卷 47，《傅咸传》。

“八王之乱”首先是从“贾后之乱”开始的。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因荒淫过度病死，年55岁。太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惠帝是一个庸劣的下材。宫人们背后都说他“蠢钝如猪”。有一天他在御花园中玩，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从：“此鸣者是为官，还是为私?”左右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当时天下荒乱，百姓多饿死，他又问左右：“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白痴，自然无法掌管朝政。当晋武帝死前，指定由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四子，武帝叔父）和杨太后的父亲杨骏共同辅政。诡计多端的杨骏从中书监华廙（yì）手中借来诏书，趁武帝昏迷时让杨皇后问道：“杨骏一个人辅政吧。”武帝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这样，遗诏就变成了杨骏单独辅政。杨骏一人兼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独揽了朝权。司马亮遭到排斥，心有冤屈却不敢入宫，只在大司马府门外哭了一通，当夜就出发去了河南许昌。

杨骏掌权，使惠帝的皇后贾后十分恼怒。贾后名南风，是一个权欲熏心而又荒淫、凶狠的女人。他的父亲就是帮司马昭杀曹髦的贾充，母亲叫郭槐。贾后的年龄不仅比惠帝大，比杨太后还大。贾后34岁，杨太后只有32岁。惠帝是杨太后的从姐元后杨艳（早死）所生。贾后决心利用皇族来搞掉杨骏和太后。元康元年（291），她与亲信经过一番策划，密召21岁的楚王司马玮（惠帝异母兄弟，司马炎五子）带兵进京，一天夜里，突然包围杨骏的相府，借口杨骏谋反，把他抓起来杀了，并灭了三族，杨氏亲属徒党死者几千人。

杨骏一死，贾后请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为录尚书事，同辅朝政。司马亮为了收买人心，以诛杨骏事论功行赏，大封官将，封督将侯的就达1 811人。御史中丞傅咸对司马亮说：“这样封赏，自古从未有过。没有功劳的人也受封赏，岂不让人人希望国家有祸乱吗?”

司马亮不愿做贾后的傀儡，同时楚王玮也想抓权，与司马亮也

有矛盾。贾后认为亮、玮都妨碍自己专权，就施展一箭双雕的阴谋：她唆使楚王玮杀司马亮，楚王玮是拿了惠帝的诏书，借口是司马亮要废惠帝去杀亮的。楚王玮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后，歧盛献计说："现在应该趁北兵威势，杀贾后、郭槐，以安定天下。"楚王玮一时犹豫不决。第二天早上，太子少傅张华对贾后说："楚王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天下的威势都在他那里，皇上如何自安？应以'专杀'的罪名除去楚王。"贾后本来就想借此除去楚王，对此十分赞同。于是她又诬陷楚王玮假传圣旨，擅杀大臣，处死了楚王玮。楚王被处死前，从怀中掏出晋惠帝命他逮捕汝南王的青纸诏书，表白他不是假传圣旨，但已经没有用了，终于成了刀下之鬼。

楚王玮死后，贾后掌握大权，她让庶族出身又有才能的张华主持朝政。张华办事稳重干练，在他执政的九年中，朝廷内部还比较安定。

惠帝在与贾后结婚前，与侍候他的才人（嫔妃称号）谢玖生了一个儿子，叫司马遹（yù），后立为皇太子。太子天资聪颖，贾后怕将来太子得政，对自己不利，就一方面假装怀孕，把妹夫韩寿刚出世的儿子抱来冒充顶替，另一方面用计把太子灌醉，让他手抄一份劝惠帝退位的信，后借口太子谋反，废为庶人。

朝廷大臣对贾后此举议论纷纷，很多人愤愤不平。在京师掌握禁军的赵王伦（司马懿九子）与亲信孙秀商量除掉贾后。孙秀说："如废了贾后，把太子迎回来，太子聪明刚猛，不肯受制于人，如果当了皇上，怕还会对我们不客气。不如让贾后把太子害死，然后我们名正言顺废掉贾后，就可把大权拿过来。"赵王伦认为此计很好，于是散布谣言，说宫中人要迎回太子，废掉贾后。贾后果然中计，赶忙派人毒死了太子。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伦邀同齐王司马冏（司马炎弟司马攸之子）、梁王司马肜（róng）占领内宫，抓了贾后，五天后逼她喝了一杯金屑酒（加了黄金粉屑，金屑量重，沉坠胃肠必死）而死。贾后亲党及有威望的大臣张华，裴颜也都被杀。次年正月赵王伦废掉惠帝，自己称帝。

各地诸侯主听说赵王伦称帝，很不服气。被赵王赶出洛阳去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首先发难。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十六子）、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yóng）（司马懿弟司马孚孙子）起来响应。成都王颖即刻发兵向洛阳进军，开到朝歌（今河南淇县）时，各地来讨伐的队伍达到20多万。这次“三王起兵”，自兴兵后65天里，死了近10万人。最后司马伦兵败自杀，孙秀也被杀。

晋惠帝复位。永宁元年（301）六月齐王司马冏入京，任大司马，成都王颖虽被任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但他听从卢志的建议，功大不居，推说母病，回到邺城。到邺后，又出谷15万斛赈济灾民，更得到大家的好评。司马冏掌握了朝政大权后，大造王府，与皇宫相仿，整天沉湎于酒色，也不去上朝只坐在家中选派百官。部下孙惠劝他不应留恋大名、大权、大威，应功成身退，他也听不进去。太安元年（302）河间王司马颙派兵2万进攻齐王冏，在洛阳的长沙王乂（yì）响应。双方在京城展开激战，连战三日，齐王冏兵败被杀。其党羽死者达二三千人。

河间王颙本希望齐王冏与长沙王乂两败俱丧，他便可废惠帝立颖，自为宰相。现在乂杀冏，其计落空，于是派大将张方、联合成都王颖进攻洛阳，长沙王乂牢牢控制惠帝，顽强抵抗。双方连战数日，乂斩获颖军六七万，后张方决洛阳西郊大堰千金堨，使洛阳水碓干涸。城中乏粮，米每石值万钱。在洛阳的东海王越利用皇城的禁卫军，于永兴元年（304）在夜间捉住长沙王乂，活活用火烤死。这次战争，河间王颙有军队7万，成都王颖有军队20万，长沙王乂在洛阳也有军队数万，是八王之乱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成都王颖进了洛阳，做了丞相，但他仍回到根据地邺城，遥控朝政。过起荒淫生活的东海王越认为自己杀乂有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借惠帝名义，讨伐成都王颖，结果在汤阴失败，逃回自己封国东海，惠帝被俘至邺城。

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联合幽州刺史王浚攻入长安，又

施出离间计，使河间王杀了大将张方，最后把惠帝引还洛阳。司马颖、司马颙如丧家之犬，到处流窜，结果也被抓回到洛阳。不久，司马越杀颖、颙，毒死了惠帝，另立惠帝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晋怀帝改年号为永嘉。至此，除东海王越以外，八个王在互相残杀中死了七个，一场混战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16年（291—306），在动乱中军民死亡达30万，许多城市遭到洗劫，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这是一场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门阀贵族势力膨胀的产物。战争标志着用分封制和宗王出镇来巩固皇权方针的失败，大大削弱了西晋统治集团本身的力量，加剧了社会矛盾，给内迁各族的统治者造成了割据称雄的机会。在这场大乱后十年，西晋王朝终于走向灭亡。

五、大成国和张昌暴动

——西晋末年流民起义

“八王之乱”在北方造成了各少数族上层统治者的聚众起兵，在南方则发生了流民起义。

“八王之乱”不仅使几十万人死于战火，而且可怕的天灾又接踵而来。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发生蝗灾，草木皆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①。人们为了求生，纷纷离乡背井，逃亡他方。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出现了流民浪潮，扶老携幼，不绝于路。规模较大的有：陕西、甘肃流入四川、河南约10万户；山西流入河南约30万人；河北流入山东、河南约5万余人；四川流入湖南、湖北约10余万户。还有向辽东、河西、云南等边远地区流动的。总共迁徙的约有30万户，占西晋全国总户数（377万）的1/12强。

① 《晋书》卷26，《食货志》。

流民是封建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大量流民的出现，直接破坏了社会简单再生产，是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流民到新的地区，受到当地地主豪强的压迫剥削，与当地人民也会发生主客矛盾，往往造成起义。

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中主要有：安陆（湖北云梦）张昌领导的起义；宛（河南南阳市）王如领导的起义；湘州（长沙）杜弢领导的起义；定陵（河南偃城西北）李洪领导的起义；四川李特领导的起义等等；以李特、张昌的起义规模较大。

李特是賨（cóng）人，也称巴氏，其祖先曾居汉中，后移居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一带），是地方大姓。他为人沉着、坚毅、善于骑射。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关中发生瘟疫饥荒，天水、略阳等六郡流民10多万人，成群结队地向梁州（今陕西省南部）、益州（今四川省境内）等地找活路。沿路许多饥民，纷纷加入，队伍越来越大，李特及其兄弟李骧、李庠、李流和流民们一起，常照料老弱病残，受到大家拥护，成为流民的领袖。

李特、李流等把部属撤到流民最多的绵竹地区（今四川德阳县北），集合了7 000多人，然后向成都进攻，赵廞的将吏们都吓跑了，赵廞偷偷带了家眷从小河逃命，途中被部下所杀。

赵廞死后，西晋朝廷命罗尚为益州刺史。他限令流民在七月以前归还本乡。流民们当时分散在各地帮人打短工，种庄稼，听说官府逼遣，人人忧愁，再加七月正是雨季，道路泥泞，行进困难；庄稼又未收，没有路费。李特代表流民向罗尚要求等秋收以后再走。罗尚不肯。流民们只好聚集到李特身边。李特在绵竹设立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多日，聚众至2万多人，其弟李流也聚众数千。李特乃分为二营，自己居北营，李流居东营。

永宁元年（301）十月，罗尚身边掌兵权的广汉太守辛冉派了3万步兵、骑兵偷袭李特大营。由于流民早作了准备。当其军队进入营地，埋伏着的几万流民手执大刀长矛，高喊着冲杀出来，把晋军杀得尸横遍野。

李特首战告捷，乘胜包围了成都，罗尚闭城固守。

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少子李雄为前将军，他“约法三章”，即开仓赈贷贫民，整肃吏治，礼贤下士等，深得流民拥护。

一连串的胜利让李特放松了警惕，他把义军主力分散到地主坞堡去就食。李流劝他最好把大姓的子弟带来作人质，李雄也劝他不要大意，但李特没有听他们忠告。太安二年（303）二月，罗尚从成都发兵，突然袭击李特大营，各地坞堡主也纷纷响应晋军，李特奋战二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李特惨遭杀害。

李特在四川起义后，西晋政府征发荆州地区百姓前往益州镇压。诏书是太安二年（303）三月九日发出的，这一天按古代天干地支记日，是壬午，所以称为“壬午诏书”，征发的兵就叫“壬午兵”。荆州人民本来就不愿意长途跋涉到四川去打仗，诏书催逼又急，规定经过地界停留只要五天，州郡长官就要免职。因此郡守县令都亲自出来驱赶壬午兵，引起极大不满。这一年江夏丰收，江夏即今湖北安陆，许多流民到这里来。这样，逃避远征的壬午兵和流民就结合起来，成为后来张昌起义的基本队伍。

张昌本是蛮族人，年轻时做过平氏县（今河南桐柏县西北）的县吏，武艺高超。他曾经为自己占卜，说将来会富贵；又常常对同伙们讲述打仗的战术，同伙们都笑他自不量力。李特起义后，张昌在安陆县的石岩山聚集了数千人，不久，壬午兵和流民也纷纷参加进来。张昌认为时机成熟，便发动起义。江夏太守弓钦派兵去镇压，被打得大败。张昌攻克江夏郡，获得了许多武器物资。长江、沔水一带的百姓纷纷竖起义旗响应张昌，不到一个月，队伍已发展到三万余人。这些人都用红布裹头，两鬓上贴了毛，手握大刀长戟，见到官军就砍，锐不可当。

张昌派大将黄林率二万部众攻豫州，又派人攻破武昌，杀了太守。后来亲自率领队伍进攻宛城，击败了西晋前将军赵骧，杀了西晋平南将军羊伊。接着，攻下襄阳杀了新野王司马歆，另派石冰打

败扬州刺史陈徽，占领扬州各郡；更派陈员等人攻下长沙、武陵、零陵各郡。于是义军控制了荆、江、扬、徐、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张昌任命了一批贫苦的百姓做郡县官吏，这些人没有政治经验，又不能控制部下的违纪行为，义军内部开始涣散。这时西晋朝廷派刘弘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他令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进据襄阳，打败了张昌，大肆屠杀义军，被迫投降的也有万余人，张昌只得退出荆州。

在晋军的追赶下，张昌逃到下隽山。此山在今湖南岳阳以东，陶侃包围了山林，反复搜寻，到永兴元年（304）秋天，张昌终于被捕牺牲。

流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西晋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西晋的军事力量。

六、各族内迁与刘渊称汉

——永嘉之乱与西晋的灭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北和东北部边境的各少数民族，由于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受汉族农业社会的影响，不断内迁。这种迁移到魏晋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内迁各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

匈奴世居蒙古草原。东汉时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不断内移。西晋初主要分布于山西、陕西中部和甘肃西北部。

羯是匈奴别部，高鼻深目多须。羯内迁后散布在太行山以西的并州诸郡，主要聚居地是上党郡武乡县（今山西榆社）。

氐族是个古老民族，夏商时已存在。西晋时分布于今甘肃、陕西、四川邻接地带。集中在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等地。

羌族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曾发生羌人起义，向中原移动。西晋

时羌人分布于今陕西、甘肃一带，主要聚居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地。

鲜卑为东胡一支，分为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拓跋部、乞伏部等。在魏晋时主要分布于今辽东、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及青海等地。


西魏泥塑女童

内迁各族人口是不少的。在关中地区（函谷关以西）百余万人口中，就有一半是少数族。这些少数族中有的还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有的已解散了部落。

魏晋时期各族内迁，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迁各族遭到汉族地主官僚的掠夺、压迫，使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①，从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泰始六年（270）河西鲜卑树机能起兵，这次反抗前后坚持了10年。次年，匈奴族刘猛起兵。元康四年（294）匈奴郝散带着匈奴族一万多人在谷远（今山西沁源县）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氐人齐万年的起义。

元康七年（297）关中氐、羌各族人民共推氐人齐万年为首，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军数十万，前去镇压的晋军相继覆败。战火愈烧愈旺，朝廷很焦急，派周处带兵去镇压。

周处（？—297），吴兴郡阳羡县（今江苏宜兴）人。他自小喜欢打架，村里人把他和南山上的猛虎、长桥下的巨蛟（古时传说的一种凶鱼，形似大鳄，有鳞甲），比作“三害”。后来周处觉悟，打死了猛虎和巨蛟，自己改正错误，这就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率兵5 000进攻屯聚在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的齐

① 《晋书》卷56，《江统传》。

万年军。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最后全军覆没，周处自己也战死了。

周处死后，西晋朝廷又派强弩将军孟观统率数万精兵来打齐万年。孟观统率的是宫城的禁卫军，个个矫捷勇悍，经过大小数十仗，齐万年终于失败被俘。

在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中，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认为这是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也纷纷扯起反晋的旗帜，扩大自己的势力。

首先起兵反对西晋统治的是匈奴贵族刘渊。晋武帝将五部帅改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 3 万余户。五部中左部最大，有 1 万多户，都尉是刘豹。刘渊是刘豹的儿子，当时以“任子”（人质）身份住在洛阳，交游汉族官僚士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幼时读过《诗》、《书》等经书，也读过《史记》、《汉书》、《孙吴兵法》。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我每看《汉书》，常常感到随何、陆贾两个名士没有武略和将才，周勃（绛侯）和灌婴（颍阴侯），这两个武将没有治国的文才”，因此立志要文武双全。他一边读书，一边学武。刘豹死后，晋武帝放刘渊回去继承为左部帅，后又拜为北部都尉。由于刘渊轻财好施，待人诚恳，赏罚分明，匈奴五部中的豪杰都投奔他，幽州冀州一些儒生名士也不远千里到他那里交游访问。

八王之乱以后，刘渊的堂祖父，曾当过匈奴左贤王的刘宣与部众们商议：“过去我们祖先与汉朝约为兄弟，患难与共，汉亡以后，魏晋交替，我单于虽有虚号，但没有一尺封土，连王侯也和普通编户一样。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英姿绝人，才能超世，若不是为了让他来兴邦立国，上天决不会虚生此人。”五部首领们都很赞成他的看法，于是派呼延攸到邺城，悄悄告诉刘渊，刘渊很高兴。便向成都王司马颖请假回去，说家里有丧事，但成都王没有答应。后来王浚进攻邺城，刘渊又劝说成都王让他回去发动匈奴五部来援助，成都

王这才答应。这一下真是“放虎归山”了。

永兴元年（304），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随即在离石起兵。北方各族人民长期受西晋的压迫，听到刘渊起兵，纷纷响应，一二十天内，部众聚集了5万。一部分西晋失意的将吏和名士，也前来投靠。

不久，成都王司马颖被王浚率领的鲜卑兵打败，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本来准备派兵去救援。刘宣坚决反对，他说：“晋室无道，把我们当作奴隶，因而左贤王不胜其忿。现在司马氏父子骨肉相残，这正是我们匈奴恢复呼韩邪（匈奴单于名）王业的大好机会。鲜卑和乌桓可以作为援助我们的力量，怎么能把朋友当敌人?”刘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起兵反晋，立国号为汉，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表示他既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又是刘汉封建正统的继承者。他说：“灭掉晋朝，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恐未必心向我们；汉朝立国长久，恩德结于人心，我们祖先与汉和亲，约为兄弟，兄亡弟继，不是很正常的吗?”

刘渊改年号为元熙，以刘宣为丞相，刘宏为太尉。他又录用了一些汉族地主官僚，如范隆、朱纪等人。刘渊的军队很快攻下了太原（今属山西）等地，赶走了并州刺史司马腾。在东方各地起兵失败的羯人石勒等人也率众前来投靠。刘渊攻降了许多地主武装壁垒，屡败晋军，势力很快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永嘉二年（308），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积极准备灭晋。永嘉三年（309）刘渊又派他的第四子刘聪和王弥两次进攻洛阳，遇到晋军抵抗，都没有攻下。

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四子刘聪杀太子刘和继位。永嘉五年（311）刘聪派石勒歼灭晋军10余万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同年，刘聪又派刘曜率兵攻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又抢掠宫中珍宝、宫女；焚烧洛阳宫室，发掘晋朝陵墓，前后屠杀晋朝王公百姓6万余人。这一历史事件因发生

于晋怀帝永嘉（307—313）年间，历史上被称为“永嘉之乱”。

晋怀帝被俘后，刘曜又攻入关中，同样大肆烧杀。后因缺乏粮食，掳走了8万多人，退出长安。西晋安定太守贾疋等人拥立西晋宗室司马邺为帝，即晋愍帝，回到长安。建兴四年（316），刘曜再度攻下长安，晋愍帝坐着羊车，光着膀子，口里衔了传国玉玺，向刘曜投降。维持了52年的西晋王朝灭亡了。

第二章　十六国的割据纷争

一、荒淫的刘聪

——汉和前赵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北方各少数族统治者展开了争夺战，这是一个严重分裂的时代，历时达 136 年（304—439），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即指匈奴、鲜卑、

五胡十六国分布示意图

羯、氐、羌；十六国是指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夏。

也就是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和夏。当然，“五胡十六国”只是大体上的说法。十六国时期政权兴亡起落，甚为频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汉、前赵与后赵的对立；第二阶段主要是前燕和前秦的对立；第三阶段是淝水之战以后的更大分裂。

十六国中除了成汉是李特领导流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外，其余多为少数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最先建立割据政权的是匈奴贵族刘氏所建立的汉国和前赵。

公元310年刘渊死后，刘聪继立，成为汉国的统治者。刘聪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他设立了两套统治机构，对境内少数民族采用本族制，而对汉族采用汉制。实行胡汉分治的目的，在于保持依部落组织的胡族军队，用它来对其他被统治的各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这是一种制造民族对立而不利于民族融合的政策。

刘聪不仅是个荒淫无道的人，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刘聪重用宦官王沈，百官奏事都要通过王沈。王沈按自己爱憎决定是否上报，权势显赫，盖过所有大臣。他家的住房、车马、服饰比诸侯王还要豪华，亲戚、弟子都从平民一步登天，担任了重要官职。在他的一手操纵下，正派有功的人得不到奖赏，拍马钻营、结党营私的小人飞黄腾达。太宰刘易、御史大夫陈元达等上表说：“周文王因任用贤才而奠定周朝国基，后汉桓、灵二帝因任用宦官而遭致灭亡。国之兴亡，无不由于用人。现今王沈等人身居高位，掌握大权，势倾海内，爱憎任己，矫诏弄旨，欺诬日月。以致选举失实，政以贿成，国家混乱。请皇上免去王沈等人官位，交付有司定罪。”昏庸的刘聪居然把这份奏章拿给王沈看，王沈边叩头边流泪说：“王公朝士不但痛恨臣下，也仇视陛下。”刘聪问儿子刘粲，刘粲说：“王沈忠心耿耿，没有二心。”刘聪于是大悦，进一步封王沈等为列侯。刘易、陈元达无奈，只好自杀。

刘聪为了享乐，建造了40多座宫殿。整日酗酒，有时三日不

醒，外出打猎，常常晨出暮归，在汾河观鱼，天黑了竟命人点烛不分昼夜地观赏。他又残忍贪婪成性，在战争中杀人如麻不说，战后也没有常规的租赋制度，数不清的徭役，无止境的搜括，弄得汉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逃向冀州的有20多万户，逃向豫州的也有3万多人。

刘聪所作所为，其统治集团内部自然不会稳定，一些掌握军权的上层分子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在西方，刘聪的堂弟刘曜盘踞关中；在东方，石勒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根据地，割据河北一带。刘聪能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限于山西西部山居和汾河河谷一带而已。

麟嘉三年（318）七月，刘聪卒，刘粲终于如愿以偿地继位。他任命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军国大事都委托给他，自己则整天在后宫饮宴作乐。

靳准是个野心家，早就觊觎汉国的皇位，暗地策划了一个消灭刘氏的计谋。八月，靳准发动了政变。

刘曜听到靳准叛乱的消息，立即从长安发兵进攻平阳，石勒也率领精兵五万讨伐靳准。在刘曜和石勒联合攻击下，靳准为部下所杀。刘曜掌握了汉国的大权。

十月，刘曜在赤壁（今山西河津西北）即皇帝位，改元光初，次年移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统治区域有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宁夏各一部分。刘曜建立前赵后，继续实行胡汉分治制度。他自己以皇帝身份统治汉人，让儿子刘胤任大单于，统治本族。他治汉注意任用汉人为官，恢复租赋制度，社会秩序比刘聪时安定。他还在长安设立太学，挑选13岁至25岁的青年入学，亲临太学挑选成绩优秀的人授给郎中官。他原想建造酆明观、西宫、陵霄台等大型宫殿，同时营建豪华的寿陵，经侍中乔豫、和苞上疏劝谏便作罢了。为此，他还嘉奖了二人，升了他们的官。

前赵共存在了11年，于光初十二年（329）被后赵所灭。

二、从奴隶到皇帝

——石勒与后赵

后赵（319—350）是石勒建立的。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属山西）羯族人。

石勒出身游牧民族，会相马。他结识了牧帅汲桑，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永兴二年（305）成都王司马颖的部将公师藩举兵反晋，汲桑、石勒率领几百牧人与群众前去参加，骨干王阳等号称“十八骑”，都是石勒的好友。后来公师藩兵败被杀，汲桑、石勒回到茌平牧苑。永嘉元年（307），他们再度起兵，攻打官府，释放囚徒，附近被压迫人民纷纷参加，队伍迅速扩大。汲桑自称大将军，石勒为前锋，一举攻下了邺城，杀死了所有逃到邺城的世家大族。后来起义军被西晋政府军镇压，汲桑牺牲，石勒收集余部投奔刘渊。

太兴二年（319）石勒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称赵王元年，建立后赵。咸和四年（329），灭前赵，进一步据有关陇，于是后赵控制了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咸和五年（330），石勒称帝。

石勒在建立后赵、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实行胡汉分治。这是继承汉和前赵的政策。石勒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把羯人称为“国人”，不许汉人触犯他们，甚至不许提到“胡”、“羯”，违犯者要受处罚。有一次一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乘马冲入宫门，石勒大怒，问宫门官冯翥（zhù）：“刚才驰马入宫门的是什么人！”冯翥一时惊慌，脱口而出：“刚才一个醉胡乘马驰入，呵责他不听！”说后自知失言。石勒笑道：“胡人是难与讲话。”恕而不罪。这件事只是个例外。

石勒在国内置34郡，由内史统治，这是管理汉人系统。又设

大单于，统率羯人和六夷。大单于下有单于元辅，统领禁卫军。石勒自任大单于，以石虎为单于元辅。当时军队主要由羯人和六夷担任，大单于有指挥六夷之权。

第二，征收租赋，重视农耕。石勒占据襄国为根据地以后，就停止以前掠夺的做法，沿袭魏晋户调制，征收赋税徭役。建兴二年(314)，命州郡查明户口，规定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斛。石勒十分重视农耕，称赵王后，派使者巡视州郡，“劝课农桑”。石勒还奖励生殖、释放囚徒，实行军队屯垦。后赵的剥削虽然还比较重，但比幽州的王浚、关中的刘曜、并州刘聪的统治都要好些。在石勒的统治下，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第三，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合作。石勒初起时，对那些汉族坞堡主和士大夫曾进行杀戮。如破东海王越军时把俘虏的汉族王公卿士一起杀死。像王衍这样的高门名士本可以利用一下，结果也被杀。但在攻陷幽州以后，他感到要巩固政权必须争取汉族士大夫，态度就转变了。在攻下冀州郡县壁垒后，他把一些“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称赵王后，又颁布了“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的法令。又恢复了九品中正制，让士族有免役和做官的特权。

石勒重用汉人失意官僚张宾为谋主。张宾，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西）人。博涉经史，足智多谋。“机不虚发，算无遗策”，自比汉朝的张良。石勒任张宾为右长史、大执法，称他为“右侯”。张宾对后赵政权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提倡儒学和佛教。随着国力的强盛，儒学和佛教也兴盛起来。石勒在襄国立太学，在地方立郡国学，学生是将佐、豪族的子弟。又下令公卿百僚每年推荐品德好、有才能的士人，这种人称为“贤良方正”、“直言”、“秀才”、“至孝”、“廉清”等，为地方大族子弟入仕做官开辟了道路。石勒虽然不识字，但很重视读书学习。他常叫人为他读《左传》、《史记》、《汉书》，听懂了大意后常常提出自己的见解，评论古代帝王的善恶，使大臣们大受启发。有一次，他让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立

六国贵族后代为封国国君，他就大惊说："这个办法不行，怎么能安定天下！"接着听到张良劝谏，刘邦没有这样做，他才舒了口气说："幸亏有这个人。"他还提倡佛教，特别尊敬西域名僧佛图澄。在后赵境内，寺庙到处建立起来。

在石勒统治时期，由于实行了以上一些政策，社会比较安定，使后赵成为十六国时期治理得比较好的一个政权。石勒是少数族中一个较有作为的统治者。

咸和八年（333）石勒死，子石弘继位。不久，石勒从子石虎废石弘，自称天王，迁都于邺。石虎是一个有名的暴君。

永和五年（349），石虎死，诸子争夺皇位，互相残杀。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与大司农李农联合，乘机夺取了政权。次年，冉闵称帝，国号大魏。

冉闵的民族仇杀，是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但他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非但没有巩固他的统治，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石虎的儿子石祗在襄国称帝，起兵反冉闵，各地少数族拥兵者纷纷响应。这时鲜卑慕容儁已建立前燕政权，从辽东进入河北。永和八年（352），前燕慕容恪打败冉闵，冉闵被俘后被送到龙城处死。

三、西北汉文化的中心

——张轨建立前凉

十六国时代的北方，大多数是各少数族建立的民族政权，但也有一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即前凉。这个政权存在76年（301—376），是十六国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它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中心，全盛时占有今甘肃、新疆大部分，青海、宁夏一部分。在中原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这里却相对安定，保存着汉族的传统文化。

前凉的建立者张轨，字士彦，雍州安定郡乌氏（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人。他家是世代儒学的官宦门第。父亲张温任太官令时，全家搬到洛阳附近。张轨从小爱读书，有志气，曾就读于博学的皇甫谧门下。晋惠帝时，国内政治动乱，张轨当过“征西军司”，熟悉凉州情况，他就提出要当凉州刺史。凉州地处边境，鲜卑、氐、羌等少数族常常造反，一般人都不愿去，张轨提出后，朝廷大臣都巴不得他去，齐口赞扬他才能卓绝，定能胜任。永宁元年（301），张轨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郡治姑臧。姑臧城不算大，南北7里、东西3里，形似卧龙，原为匈奴所建，张轨把它扩大，修筑起牢固的城防工事。

张轨是雍州人，他知道要在凉州扎下根来，一定要使本地世家大族和中原地主结合起来。他重用当地大族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人。宋配个子矮小，原为西平郡（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太守，文武双全，声望很高，张轨调为自己的司马，成为心腹谋主。张轨又重用中原士人陈留人江琼等。这种政治联盟，成为前凉政权的统治基础。

凉州屡遭战祸，荒凉不堪，自魏晋以来，这里就不用货币，而以布匹代替。交易时被撕成一段一段，计算起来困难，又很浪费，也不耐久，民间深感不便。张轨接受参军索辅的建议，恢复使用五铢钱，人民得到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张轨还在姑臧设立学校，提倡儒学。他把各郡的地主子弟500多人招到学校里学习，请了很多鸿学硕儒讲授经学，设置崇文祭酒一官来管理学校。在当时战乱的年代，这里成为西北汉文化的中心。著名学者有宗纤、郭荷、郭瑀、刘昞、索袭、祁嘉等。博士郭瑀的弟子有500多人，其中通经业者



十六国墓顶壁画·升天图

80余人。他的弟子兼女婿刘昞，经历了前凉、前秦、西凉、北凉，后到了北魏，被孝文帝称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①]，著有《方言》等著作。佛教也有很大发展，敦煌“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②]。北魏拓跋焘平凉州，沙门佛像大多东徙到平城。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前凉在保存中原汉族文化方面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他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③]

公元308年张轨得了风病，不能讲话，建兴二年（314），60岁的张轨病逝，张轨统辖凉州13年，他在遗令上说：“文武将佐都应当尽忠皇帝，安定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这是给以后的统治者提出的立国方针。

这时前秦王朝强盛起来。太元元年（376），苻坚派步骑30万进攻前凉，前凉主张天锡投降，前凉亡。

四、从辽东到中原

——前燕的崛起与内迁

在中原地区，继前赵与后赵对立，又出现了前燕与前秦的对立。

前燕（337—370）是鲜卑族慕容部慕容廆（guī）父子所创立的政权。慕容氏原来分布于辽东与辽西，曹魏时期发展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西晋时已成为塞外的一支强大的部族。元康四年（294），慕容廆将都城迁到大棘（今辽宁义县），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不久，他打败北边的宇文部、出击西方的段部，

---

① 《魏书》卷52，《刘昞》。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41页。

势力强大起来。

慕容廆是一个有远见的少数族统治者。他很注意拉拢汉族地主分子。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许多大族率领其宗族、乡里流亡辽东。慕容廆礼贤下士，被其任用的北方著名大族有河东裴嶷、右北平阳裕、渤海封裕、平原刘瓒、广平游邃等人。这些汉族士人也出谋献策，帮助慕容氏按汉族统治方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裴嶷是一个重要谋士，被"委以军国之谋"。他曾作为使者被派到建康，东晋朝廷本来以为慕容廆地处荒远，一定落后，经裴嶷介绍，说"四海英贤并为其用"，大家都改变了看法。东晋想把裴嶷留下来，裴嶷说："如果留臣，慕容廆一定会认为朝廷轻视他，从而影响其对朝廷的向义之心。"于是东晋让他回去。慕容廆对裴嶷十分信任，他认为"裴长史名重当朝，而肯屈降于此，是天授孤也。"

慕容廆还大力招徕汉族流民。在辽水流域设立侨郡以统之，如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对流民给以免役权利。结果中原地区投奔到他那里的流民数达到旧有人口的10倍。这些人对辽东地区经济开发和慕容部的汉化起了重要作用。

慕容廆还提出了慎刑、选贤、重农、戒酒色的治国方针。他说："狱者，人命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1] 这些措施使慕容氏的统治进一步稳定巩固，为以后进据中原创造了条件。

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子慕容皝（huàng）继立。咸康三年（337），他接受汉士族封弈的建议，称燕王，这是前燕的开始。不久，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县）。

慕容皝不遗余力地掠夺人口，他打败段部、灭宇文部、袭破夫余，每次都掠到三五万人户，使统治地区扩大，户口不断增多。为了使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既安定民生又增加国家收入，慕容皝下令把皇宫花园和打猎场地都分给无田的贫民；没有资产的贫民贷

---

① 《晋书》卷108，《慕容廆》。

给牛一头；田租原来较重，用官牛的官得八成，耕者得二成，用私牛的官得七成，耕者得三成。后采纳封裕的建议，采用曹魏屯田的办法：用官牛者官得六成民得四成，用私牛者对分。这些措施使农业经济有了发展，扩大了慕容氏的实力。

慕容皝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让大臣子弟到学校读书，称为高门生，自己常到学校亲自授课，听者达千余人，他还每月考核学生，成绩优异者充当他近侍。他自编《太上章》作为教材，又著《典诫》15 篇，这些措施加速了慕容氏的汉化，也为以后入居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永和四年（348），慕容皝死，子慕容儁（jùn）继位。

慕容儁积极向中原扩展，打败塞北丁零，获马 30 万匹，牛羊无数，攻下东晋黄河以南汝、颍、谯、沛地区。这时前燕已占有东至山东，南至汝、颍，西至崤关，北至云中的广大地区，与关中前秦对峙，成为中原两大割据势力。



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骑士俑

慕容儁死后，太子慕容暐继位，年仅 11 岁。由叔父慕容恪辅政。慕容恪严格遵守制度礼节，小心谨慎，有事都要和其他大臣商议，从不独自决定。他虚心对待百官，向他们询问政治之道，并量才授任。对于有过错的官吏，也不公开他们的错误，只是调动一下职务，作为处罚。人们把这看作羞愧的事，所以没有人敢犯错误。慕容恪一共辅政七年，前燕政治还比较稳定。

关中的前秦已强大起来。太和五年（370），王猛率领步骑 6 万进攻前燕，慕容评集中 30 万大军抵抗，他认为王猛大军深入要

求速战，就采用持久战略。但王猛偷偷派人烧了他的后勤装备，火势凶猛，邺城都能见到火光。慕容评不敢出战，慕容儁责备他说："王是高祖之子，应以宗庙社稷为重，为何不抚劳将士对敌作战，而专心聚集财富？敌军打来，钱还能放在何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慕容评无话可说，只得率军出战，结果大败，损失五万多人，王猛军乘胜追击，投降的又有10多万人。至此，燕军主力已被基本消灭。前秦苻坚又亲率10万大军会同王猛攻邺，终于攻下邺城。慕容暐被俘至长安。前燕亡。

五、苻坚和王猛

——前秦的建立和统一北方

前秦（351—394）是氐族苻氏所建立的政权，永和六年（350）冉闵屠杀胡羯时，氐、羌各族纷纷逃还本土，氐族贵族苻洪乘机收罗，聚众至10多万人，自称三秦王，后被石虎降将麻秋毒死。临死对子苻健说："中原非你们兄弟所能居，关中形势之地，吾死后可鼓行而西。"苻健尊父遗言，领众进入长安，据有关陇。永和七年（351），称天王、大单于，后改称皇帝，国号秦，史称前秦，都于长安。公元354年东晋桓温率军北上，被苻健打败。苻健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发展贸易、崇尚儒学等政策，巩固了关中的根据地。

永和十一年（355）苻健死，子苻生继位，这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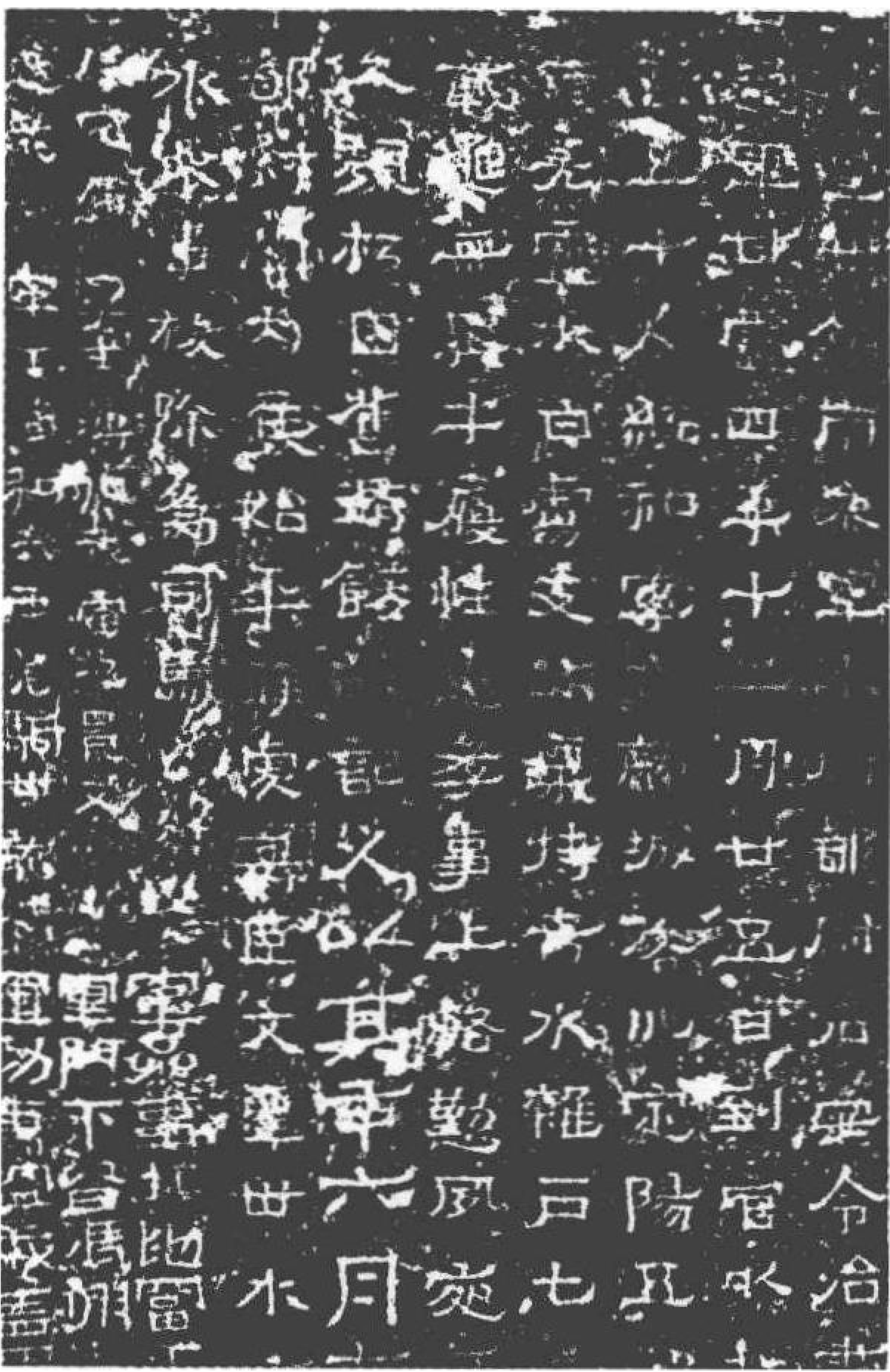
苻生整天沉湎于酒色。大臣参奏的事，就在酒醉时轻率决定，以致左右乘机作奸，赏罚失去标准。臣下称颂他"圣明宰世"，他说"媚于我也"，斩之；臣下说他"刑罚不当"，他说"谤于我也"，亦斩之，以至人情危骇，众叛亲离。升平元年（357），苻健侄东海王苻坚起兵杀死苻生，自称大秦天王。苻坚是一个汉化较深的氐族贵族，也是十六国时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想建立一个团结各族、天下一家的国家。他重用鲜卑、羌、羯等各民族领袖人物，

也极力拉拢汉族地主分子。寒人出身的汉族政治家王猛深受他的器重。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南）人，少时家境贫寒，曾以贩卖畚箕为业。他身材高大，博览群书，特别喜读兵书，平时从不与浮夸浅薄的人交朋友，也不把琐碎小事放在心上，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桓温北伐到关中时，他穿着破衣去拜访，一边摸着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十分器重他，请他一起回东晋，他知道桓温不能成大事，没有答应。不久，苻坚请他为谋主，他应允了。两人相见，畅谈天下大势，十分投机，苻坚说："我得到王猛，如同刘备得到了诸葛亮。"

前秦当时面临着经过长期战争后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尖锐的严峻局面，人民渴望安定生活。苻坚在王猛的协助下，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

一是抑制氐族豪强，加强集权。氐人的贵族国戚，横行不法，与以苻坚为代表的皇权是有矛盾的，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苻坚派王猛为始平（今陕西兴平、武功一带）令。王猛一上任，就处决了一个奸吏。本地一些贵族豪绅上书攻击王猛，王猛被抓进了监狱。苻坚亲自审问王猛："为什么一上任就杀人?"王猛答道："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要我治乱，我仅仅杀一个人，余下的尚很多。我要为国家剪除奸猾，如不清除这些人，才有负陛下重托!"苻坚听了，称赞王猛是管仲、子产一类人物，赶快把他释放了。


前秦邓太尉祠碑

王猛治理京城有功，升为吏

部尚书。不久，又升为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在升平三年（359）一年中升了5次官，“权倾内外”，那年，他才36岁。

王猛被信任亲近，使氐族贵族十分嫉妒仇恨。辅佐苻健有大功的樊世攻击王猛，说：“不把你的头挂在长安城门上，我不再做人!”苻坚知道了，说：“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肃!”后来，樊世竟然在朝堂之上，当众要打王猛，苻坚大怒，果然杀了樊世。

二是奖励农桑，发展生产。苻坚灭燕后，迁关东豪杰及杂夷15万户于关中，又大力召还流民，增加农业劳动力。他亲耕籍田，作出表率，妻苟氏亲自养蚕。又多次派官吏循行郡国，劝课农桑，表彰生产搞得好的官吏。他针对关中少雨易旱，下令推行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关中自秦汉以来有兴修水利传统，但由于战乱，遭到破坏。苻坚疏浚秦汉郑国渠、白渠，征发富家的僮隶3万人，兴修水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十六国时代关中水利建设的一个突出成就。

三是注意缓和民族矛盾，实行“夷狄应和”的民族政策。苻坚废除了前赵与后赵胡汉分治的民族政策。这意味着氐族王公贵族如犯了罪也要受到惩处，说明他已从狭隘的氐族贵族集团的利益中摆脱出来。灭前燕后，苻融劝苻坚诛杀慕容暐及其子弟，苻坚反对，说：“现在我要统一天下，应该安抚黎民百姓，实行各族人民和睦（夷狄应和）如同一家的政策。”表明了苻坚要实行民族融合、建立统一国家的气魄和抱负。苻坚曾严惩袭扰匈奴部民的大将。他也注意各族经济的发展，派使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劝课农桑。

四是提倡儒学，兴立学校。苻坚以汉族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大力提倡儒学。他下令恢复了太学和地方学校，让公卿子弟入学受业。他亲自去太学主持考试，成绩优异者，予以旌表授官。他规定，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经，就要罢遣。他让宿卫将士与后宫宫女们都学习经书。苻坚认为“人主劳于求才而逸于得士”。他下令各级地方官要选拔推荐各类有才能的人，推荐得好的给予奖赏，推荐得不好的给以处罚。所以前秦时期“请托不行，士皆

自励”，“号称多士”。

苻坚和王猛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关陇地区“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史书描写前秦境内的情况是：“关陇地区社会安定，百姓丰乐。从长安到各州的大路两旁，都种着一行行杨树、柳树和槐树，枝叶繁茂。每 20 里有一亭，40 里有一驿站，旅行者可以沿路取得供给，贸易车辆安然往来。百姓的歌谣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这种和平安乐的“小康”景象，出现在长期战乱的十六国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它为前秦统一北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前秦“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

在前秦不断强大的同时，周围的其他政权正日趋衰弱。秦建元六年（370），王猛以少胜多，灭前燕。建元七年（371），灭仇池的氐族杨氏。建元九年（373），占领东晋梁、益二州。建元十二年（376），先灭前凉，后灭鲜卑拓跋氏的代国。至此，前秦实现了西晋灭亡以来北方最大的统一。它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大漠。当时，东北的肃慎与新罗，西方的于阗、大宛和康居、天竺等 62 国，都派遣使臣贡献方物，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时，只有东晋王朝同它南北相峙；不久，爆发了秦晋淝水之战。

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淝水之战

苻坚统一北方后，就想进攻东晋，统一中国。建元十八年（382）十月，苻坚召开御前会议，共商出师伐晋大计。他说：“自我即位，已

有三十年。现在四方已定，只有东南一隅，未霑王化。秦兵有九十七万，文武如林，朕想亲征，不知列位卿相以为如何?”

要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在前秦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苻坚的有鲜卑贵族慕容垂和羌族贵族姚苌。他们认为“小不敌大，弱不御强。现在前秦有众百万，资杖如山，王师所到，必然有征无战。晋主不是衔璧军门，就是走死江海。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是大多数人反对发动这场战争。主要有苻坚弟苻融，他是公元375年王猛死后主要掌握大权的；还有尚书仆射权左仆射权翼、太子左卫率石越、苻坚夫人张氏、儿子苻宏、苻诜、名僧道安等。他们的理由是：（1）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连年用兵，兵疲将倦，不宜再进行大规模战争；（2）前秦虽然统一，但内部有鲜卑、羌族贵族这些“心腹之患”，对外用兵必然会引起“风尘之变”；（3）东晋虽弱，但君臣和睦，内外同心，晋又是正朔所在，为民心所向，又有长江天险可恃。苻融还把王猛临死所说的话搬出来：“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说：“王景略之言不可忘!”但是苻坚对这一切都听不进去。他说：“天道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且不去管他。从前吴国也有长江天险，不也是灭亡了吗，现在我有这么多军队，只要把马鞭子投入江心，江水也要为之断流，晋有何天险可凭!”他迷信自己的武力，决心发动这场战争。



淝水之战

太元八年（383）八月，苻坚下令大举伐晋。以苻融、慕容暐、慕容垂率步骑25万为前锋，自率大军从长安出发。总计调发戍卒60万及骑兵27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九月，苻坚到达项城（今属河南）时，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方顺流而下，河北幽冀的军队刚到彭城（今江苏徐州）。苻融先锋部队迅速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俘虏了东晋守将徐元喜。

面对强敌压境，东晋朝廷尽管有人惊恐不安，但宰相谢安却十分镇静。他精心策划，作了全面部署安排：命其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负责指挥全军；其侄谢玄为前锋都督；其子辅国将军谢琰也从军出征。

晋军当时不过8万，但士气旺盛。其中又有一支劲旅，叫北府兵。这是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时招募徐、兖二州人民组成的一支精锐军队。因为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招募而得，而京口又称“北府”，故称“北府兵”。北府兵由彭城人刘牢之率领，为晋军前锋。

在强敌压境、生死存亡的关头，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缓和了。在桓温死后，由其弟桓冲和谢安共同执政。桓冲把扬州让给谢安，自己专任荆州，积极筹划防守，东晋朝廷出现“将相和”局面。东晋军民也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晋军派龙骧将军胡彬西进迎敌，走到半路，得知寿阳失守，退保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苻融派梁成率军5万进至洛涧（今安徽怀远县以南之洛水），在淮河上设栅，以防晋军沿淮援助胡彬。胡彬军粮用尽，派人送信给谢石说：“现在贼盛粮尽，恐怕再见不到大军了！”胡彬的信被苻融军截获，苻融马上派人报告苻坚，说：“敌军兵少，容易擒获，但怕逃去，宜速进攻！”苻坚闻讯，把大军留在项城，自己带领轻骑八千，兼程赶到寿春，企图一举打垮晋军。苻坚自恃兵多，骄傲轻敌，派尚书朱序到谢石营劝降。朱序原是襄阳守将，襄阳失守时被俘，心怀故国。他到晋军营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透露了秦军军情。他建议晋军趁前秦大军

尚未集中抵达，主动进攻，击败其前锋，以挫败秦军的锐气。谢石犹豫不决，谢琰在旁竭力劝说，于是谢石派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5 000进攻洛涧。刘牢之的北府兵个个勇猛非凡，强渡洛涧，大败梁成军，阵斩梁成；又分兵阻断秦军归路，秦军5万争先恐后渡过淮河逃走，掉在水里被淹死的有15 000人，取得洛涧大捷。

苻坚听到洛涧失守，大吃一惊，又听说晋军已集结在淝水东岸，赶紧与苻融一起登城瞭望。他见到晋军阵容严整，又远望八公山上黑压压的一片，以为都是晋兵，脸上有了惧色。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



清代苏六朋绘《东山报捷图》（局部）

秦军在淝水西岸逼水而阵，晋军不得渡，两军处相恃状态。谢玄派使者到秦军中下战表说：“你们悬军深入，现在逼水而阵，这是持久之计，不是速决之策。你军如果移阵少退，让出一片空地，晋军渡过淝水，双方即可决一胜负。”秦将多数反对，说：“我众故寡，不如阻遏晋军，使不得渡，这是万全之计。”苻坚说：“可以稍退。等晋军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派兵攻击，一定能把他们消灭。”苻融也赞同。

接着，苻坚下令秦军后退。谁料到，秦军一退，便如潮水般的不可遏止，那些离乡背井被迫来作战的士兵，不愿无故送死，只顾向后奔跑。晋军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进攻。苻融见势不妙，急忙驰马赶到后面整顿部队，结果马倒人落，被晋兵杀死。秦军失了大将，全线崩溃。谢玄等乘胜追击，朱序也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顿时大乱，自相践踏而死者蔽塞川野。

向后逃跑的人，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来。于是昼夜不停地逃跑，一路上饥寒交加，死了十分之七八。苻坚也中箭负伤，单骑逃到淮北。后回到洛阳，收集残兵，仅剩 10 多万人。

消息传到东晋。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看了战报后就放在床边，不露半点喜色。后客人问及，谢安才慢慢地回答："小儿辈已经破贼。"其实，谢安心中怎么会不高兴和激动呢?

淝水之战，东晋政权取得了辉煌胜利。此后东起淮、泗，西至荆、襄的晋军陆续出击，攻占谯城（今安徽亳县）、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成都等地，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重被东晋收复。

淝水之战是南北分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南北决战。这次战争苻秦失败固然有很多原因，如战线太长，误用朱序，骄傲轻敌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的性质，在前秦方面是不正义的民族征服战争，不得人心；在东晋方面是反对民族征服的自卫战争，上下同心，团结抗敌。

七、北方的再分裂

——淝水之战后的北方

淝水之战后，公元 385 年苻坚为羌人姚苌所杀，前秦帝国瓦解。原来在苻坚统治下的五胡贵族，相继摆脱前秦控制，建立起独立政权。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这些政权共有 12 个。在关东（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以西为关中）地区主要有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关中有后秦、西秦和夏；河西有后凉、西凉、北凉和南凉；代北有北魏的前身代国。

关东诸燕：

后燕（384—407）鲜卑慕容垂所建立。淝水之战中慕容垂保存了实力，3 万人一无所损。晋太元九年（384）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打起复国的旗号。鲜卑、丁零、乌桓各族人民

纷起响应，部众发展到20多万。386年正月，慕容垂又自称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元十九年（394），后燕灭西燕，后又攻取东晋青、兖等地，占领整个河北地区，与关中后秦对峙，成为淝水之战后北方两个主要政权。


高昌古城遗迹

慕容垂注意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慕容温经营中山，招抚新旧流民，奖励农耕，各地人民纷纷来投奔他，一些坞壁主也送来粮食，使他“仓库充溢”。慕容垂把他比作关中的萧何。慕容农治理幽州，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劝课农桑，各地流民来投奔的达数万人。

西燕（384—394）晋太元九年（384）慕容泓（慕容暐弟）起兵攻前秦，自称济北王，后为部下所杀。次年，慕容冲立，在阿房（今陕西西安市西）自称皇帝。西燕与后燕都以复兴燕国相标榜，慕容垂在太元十九年（394）灭西燕。

南燕（398—410）慕容德所建立。北魏攻下后燕中山、邺城后，将后燕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退还龙城，一部分南下。南燕所处青州、兖州地区，封建依附关系比较发展，世家大族荫冒户口严重，“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①，严重影响国家赋役收入。后在韩谆提议下，搜括户口。仅青州，搜出荫户五万八千户，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晋义熙六年（410），东晋大将刘裕北伐，灭南燕。

北燕（409—436）汉人冯跋所建。409年冯跋称燕王，都龙城，史称北燕。冯跋废除前朝苛政，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省徭薄

①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赋，整顿吏治，兴建太学，使辽西地区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1965年在辽宁北票县出土的北燕宰相冯跋弟冯素弗夫妇墓葬[1]，这是第一次发现的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殉葬品非常丰富，有金器、玻璃器皿、水晶、琥珀等，多种类的铁器，文物中所表现的官制、葬制、舆服制度，都与中原一致，说明其水平与中原相仿，反映出北燕的封建汉化程度。



大夏统万城遗址

关中后秦、西秦和夏：

后秦（384—417）羌族姚苌所建。姚苌杀苻坚后，取长安，称帝。苌死后，子姚兴立，消灭苻秦残余势力，击败西秦，灭后凉，领有关中全部土地，成为淝水之战后北方最强之国。姚兴善于用人和纳谏。他信任汉人尹纬，用为顾命大臣。在他的帮助下，姚兴刷新内政，奖励清勤官吏，诛罚贪官，加强法制，发展农业生产，提倡节俭，把百姓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都放免为良人。姚兴还兴儒学和佛教，尊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为“国师”，让他主持翻译佛经。在后秦，自公卿到老百姓绝大部分都信佛。

东晋刘裕在义熙十三年（417）攻破长安，后秦亡。

西秦（385—431）鲜卑乞伏国仁所建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后都金城（今兰州西北）、枹罕（今甘肃临夏），其统治区在今甘肃西南部。最后为夏所灭。1963年在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内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造像墨书题记和大量造像、壁画。

夏（407—431）匈奴赫连勃勃所建立。赫连勃勃是匈奴左贤王去卑之后，本为后秦姚兴的骁骑将军，后脱离后秦，在公元407

---

① 《文物》1973年第3期。

年自称大夏天王。他趁刘裕灭后秦后回到江南，袭取了长安，都城是在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赫连勃勃是有名的残暴统治者，他不仅仍实行胡汉分治，而且为政暴虐，视人命为草芥。群臣中有斜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舌后斩首。他与南凉战，杀伤万计，把死人头堆在一起，叫做“京观”。他征发民夫10万筑统万城，城墙用土皆经过蒸煮，筑成后，用锥刺入一寸，即杀工匠。他监造弓箭和铠甲，弓箭射不穿铠甲，杀造弓箭者，如射穿，杀造铠甲者，共杀工匠数千人。因此，夏所造器物皆特别精丽坚固。

北魏强大后，攻下统万城，夏后为魏属国吐谷浑所灭。

河西的诸凉：

后凉（386—403）为略阳（甘肃天水东北）氐族吕光所建立。382年九月，苻坚派吕光统兵七万，铁骑五千，出征西域。次年一月从长安出发，十月发生淝水之战，吕光到了高昌，后出玉门关，进至流沙，三百余里无水，将士失色，吕光要大家学习汉代李广利精神，不久下大雨，渡过难关。吕光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用骆驼二万头装着西域珍宝、马匹、文物、珍禽怪兽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还从龟兹带回了由西域乐工组成的乐队，使龟兹乐从河西走廊向凉州地区传播开来。386年九月，吕光得知苻坚死亡，令全军穿素戴孝，同年十二月，他自称侍中、中外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历史上称为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吕光死后，诸子互相争夺，后为后秦所灭，吕氏宗族及民众万余户被徙于长安。

南凉（397—414）后凉后期分裂为南凉、北凉和西凉。南凉为河西鲜卑秃发（拓跋的同音异译）乌孤所建立，都于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后改称武威王，迁都于乐都（今属青海）。因立国于湟水，在河西走廊东南，后来又以凉为国，故称南凉，其统治区为今甘肃西部、青海一带。

北凉（397—439）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国家。都城姑臧，有20多万人口，文化发达。北魏灭北凉，



北凉 交脚趾弥勒菩萨

许多著名学者被迁到平城，著书讲学，对北魏文化影响很大。北凉佛教也颇发达。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有许多佛像，千姿百态，十分壮观。1975 年在新疆吐鲁番古墓群中，曾发现不少北凉文书，反映出北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

西凉（400—421）为凉州大姓汉人李暠所建。庚子元年（400），李暠据敦煌，自称凉公，后迁都酒泉，想号召汉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结果为北凉所灭。

十六国后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但是在这种混乱中已经孕育着统一。公元439 年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战乱时代。

八、坞壁和坞壁经济

——战乱中的生产军事组织

在十六国时期，所有的少数族贵族酋长，为了满足其贪欲，不但以武力劫掠财富，而且经常掠夺人口。往往是攻下一个地区，先来一个洗劫，然后就把大批劳动力迁到他们容易控制的地区，要他们在指定的土地上劳动，提供粮食、物资，也要提供徭役、兵役。流离转徙、残酷的赋役、经常的战争，使许多人陷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人民纷纷远离家乡向外逃亡，除了向西投奔前凉和向东北投奔前燕外，有不少人逃向南方。一些没有逃亡留在中原的

人，为了自救，为了抵御少数族的掠夺侵犯，大多占据山中一些形势险要地区，周围修筑城墙等防御工事，据险自守，称为坞壁，在史书上的名称有堡、壁、垒、营、固等等，或连称为坞堡、坞壁、壁垒等。永嘉之乱以后，东起山东，西至关中，南迄淮北的广大区域，到处都有这种坞壁武装。后来，这些坞壁的故址，便以坞壁堡垒为名，如侯坞、赵氏坞、柏谷坞、铜壁、柴坞、成贰壁、乞活堡、裴氏堡、苏康垒、徐嵩垒等。南宋爱国史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对于这一时期的坞壁一一为之注。《通鉴》永嘉四年郭默自为坞主条，胡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其注裴氏堡曰：永嘉之乱，裴氏举宗据险筑堡以自守，后人因而置戍，故堡就有裴氏之名。近年在嘉峪关发现的魏晋墓葬中有一幅砖画，画上有一个建有望楼的小城堡，堡墙上还筑有雉堞，旁边有榜题"坞"字（见《文物》1972 年 12 期），这应是当时坞壁的一般外观。



坞　壁

坞壁早在东汉末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瓦解以后，就已经产生。如汉末有一个叫田畴的，为避胡汉战乱，率领宗族佃客数百人入居交通闭塞的徐无山，组织大家在平敞的土地上耕种，几年之中各地来投奔他的达 5 千余家。田畴制定了 20 多条法规，又兴办学校，"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①]。这个坞壁存在长达 17 年。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有一些地主也筑坞自保。如庾衮的家乡阳翟（今河南禹县）横遭兵乱，他为了防乱自卫，率领宗族及其他一些人在禹山筑起坞壁。庾衮对大家说："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应该怎么办?"大家答曰："今日之主，非君而谁?"庾衮于是与大家制定一些规则："不能侵害邻居，不能采别

① 《三国志·魏志·田畴传》。

人种的东西，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同心同德……”大家都赞同，于是齐心协力，修筑城壁工事，丈量土地，计口受田，修缮器物农具，推选出里长，建立起统治秩序。他们还训练部曲①，几次打退来犯之敌。当然，这时坞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产生的。

永嘉之乱以后，在少数族统治者入侵，战乱遍及北方时，汉族居民又普遍修筑坞堡来反对落后族的侵扰和掠夺。当时著名的坞壁有山东的郗鉴、苏峻，司州的李矩、郭默，冀州的邵续，河济之间的刘遐等。凡是胡骑践踏之处，都有坞壁存在。张平割据的晋中地区有“垒壁”300余处，冀州郡县有“堡壁”百余个，前秦时关中有“堡壁”3千余所。如郗鉴率千余家聚保于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这是一个什么样地方呢？史书描写：

> 峄山在邹县北。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壤土。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如数间居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②

可见，这是一个形势险要宜于防守的地方。一般的坞壁也大多选择类似的地区而修筑。

坞壁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些坞壁有哪些特点呢？

其一，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坞壁主要是为抵抗落后族的武装侵扰，所以一定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坞堡主对各少数族统治者也不是都抗争到底的，有的为武力所迫，又受到拉拢，就向少数族首领屈服，或送“质子”，或输军粮。

其二，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经济生活。当北方的战乱使得生产萎缩或中断时，坞壁却是维护生产的社会组织。——如邵续结集流

---

① 地主的私人武装，多为佃客担任。

② 《太平御览》卷42，引《地理志》。转引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1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民进行“屯田”，李矩也一面防御，一面屯田。有的坞壁主降附后赵、前秦、后秦后，就向他们输送军粮。

其三，宗法关系极强。坞壁是封建割据的一种形式。其基础是两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部曲、佃客占有制度；其上层建筑是血缘和地域混合起来的宗党关系。坞壁主往往是宗主或族长，坞壁中人大多为同宗同姓，当然也有一些别姓人。即有很强依附关系的宗族、乡党、姻亲、故旧、门生、故吏、宾客、部曲等。当时的阶级关系往往被掩盖在宗法关系之中。

其四，闪现出公社残余气息。在社会大变动中，由于生产资料极度缺乏，相对平等互助的公社气息会加重。如在新占荒地上出现某种程度的土地平均分配，计口受田（庾衮的坞壁中有“均劳逸、通有无”）。又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比较平等，“邑推其长，里推其贤”，基层官吏可以推选。当然，这种状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持久。随着时间推移，生产发展，它就会逐渐消失，封建关系会得到加强。

总之，在十六国混战时期，坞壁成为北方百姓生存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在组织和保护生产、抵抗落后民族的武装掳掠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十六国时代虽然动乱破坏严重，但由于坞壁的存在，社会总还是存在并曲折地发展着，为以后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准备着物质和精神条件。

第三章　世家大族扶持下的东晋

一、“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建立

晋建兴四年（316），长安陷落，晋愍帝衔璧出降，西晋灭亡。第二年，司马睿称帝，建立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定都建邺（今南京市）。愍帝名邺，为避讳，把建邺改成了建康。司马睿即晋元帝。因建康在洛阳以东，故称东晋。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15岁时袭父爵为琅玡王。其祖父司马伷、父司马觐都不曾建树功业，又是远支，故在皇室中的地位并不显要。西晋“八王之乱”时，最后掌握实权的东海王越看到北方局势恶化，策划在江南留下退路，在永嘉元年（307）七月，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渡江进驻建邺。不久，又署为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成为江南地区最高统治者。

北方刘渊起兵后，战乱频繁，“中原萧条，白骨涂地”。处在战乱中的北方大族和流民，大量南下。其中大族的著姓有百家，所以后来江南家谱中有《百家谱》；这百家大族就是东晋政权的支柱。北方大族中最有名的是琅玡王氏，其代表人物王导，字茂弘，琅玡临沂（今山东费县东）人，识量清远，司马睿镇守下邳时，为其安东司马，军国之事，无不咨访。司马睿到南方后，即以王导为谋主。

司马睿初到建邺时，南方的世家大族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江南大族自孙吴以来，势力强大，盘根错节。吴郡的朱、张、顾、

陆，会稽的虞、魏、孔、贺是著名的大姓。西晋灭吴，他们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西晋末年，义兴大族周玘镇压平定石冰起义、陈敏和钱绘起兵的所谓“三定江南”，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江南大族看不起北方迁来的人，称他们为“伧夫”，意即粗鄙的人。司马睿到江南后一个多月，南方大族中头面人物没有一个去拜见。王导感到问题的严重，就与他的堂兄王敦策划怎样提高司马睿的威望，拉拢南方世家大族。

每年三月初三是江南人民传统的禊（xì）节，百姓们都要到水滨河畔去祭祀，求福除灾。公元307年禊节这一天，司马睿也乘坐着华丽的轿子出来了。仪仗队威武庄严，引人注目。簇拥在轿后面的队伍，为首的是北方世家名士王导和王敦。这长长的皇帝出巡的队伍，立刻惊动了许多人。南方大族都来会聚，他们看到这种局面极为震动，感到司马睿就是北方大族要拥戴的皇帝，不能不刮目相待。于是，南方世家中的头面人物顾荣、纪瞻相继出来，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王导像

王导这一招，使司马睿的威望大大提高。接着，王导又劝司马睿道：“古代的圣君，都要招纳俊贤，何况当今天下纷乱、大业草创。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中有名望的人，请他们出来，其他人也都会跟着来报效。”司马睿觉得很有道理，就派王导登门拜访二人，请他们出来做官。江南大族在西晋灭亡后，北方有胡人政权的强大压力，南方有流民暴动，他们感到要稳定江南的统治，必须与北方大族联合，建立一个能代表南北士族共同利益的新政权，因而顾荣、贺循及江南大族也靠拢了司马睿，应命出仕。东晋政权有了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由于王导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司马睿称王导

为“仲父”，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东晋开国大典那天，司马睿称皇帝，百官陪列，这时，司马睿硬要拉王导一起坐在御床上接受百官朝拜。这是史无前例的，王导坚辞，说：“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相同，那么老百姓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晋元帝很高兴，封他为侍中、司空、录尚书、领中书监，掌握朝廷大权。又以王敦为江州刺史，控制上游武装。王氏家族子弟大多在朝廷上居官。当时民间谚语说：“王与马，共天下”。马即司马氏的简称。“共”字说明东晋政权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出现的第一个正统的政权。它的建立，有利于抵御北方少数族政权的南侵，对北方人民的抗战也起了一种鼓舞作用；有利于组织和发展南方经济；有利于汉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解放以后在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曾发现一晋墓，其砖铭上有一首民谣：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馀）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馀）广州，平且康。①

这说明永嘉之乱以后，南方社会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因此，东晋王朝的建立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王导笼络江南大族，统一内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二、祖逖中流击楫

——东晋初年的北伐

东晋初年，北方匈奴等少数族贵族指挥军队，到处烧杀掳掠，

① 转引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广大汉族人民迫切盼望东晋朝廷出兵北伐，消灭异族割据势力。

但是东晋以司马睿为首的统治集团只图苟安江左，司马睿“素无北伐之志”[①]，建兴元年（313）愍帝派人诏司马睿出兵攻洛阳，司马睿借口要平定江南，“未暇北伐”[②]，加以拒绝。他们只求维持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一些南方大族更是不想北伐。

在东晋统治集团中也有一些深明民族大义、充满爱国精神、坚决主张北伐的人，祖逖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祖逖（266—321），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大族出身，他幼年读书并不用功，长大后，开始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他与刘琨是好朋友，两人同睡一张床，每天清早听到鸡叫，两人就起床，在庭中舞剑练功，这就是“闻鸡起舞”成语的来历。洛阳失守后，他率领宗族乡里南渡到江南。途中他常把衣粮车马让给老弱病残，深得大家爱戴。祖逖到江南后，被任命为军谘祭酒，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他看到国破家亡，上书司马睿说：“晋室之乱，不是因为上无道而下怨叛，而是由于宗室争权，自相鱼肉，才使戎狄乘机入侵中原。今北方遗民遭受蹂躏，人自思奋，大王如能命将出师，让我当统帅去北伐，北方人民与郡国豪杰必然会望风响应！”但是司马睿不想北伐，又不好推托，就给祖逖一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空头头衔，另给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匹布，让他自己招募士兵去北伐。祖逖虽然既无兵卒，又无武器，但他怀着收复中原的爱国之心，在建兴元年（313）率领自己南渡时带来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船行至长江中流，祖逖击楫发誓说：“祖逖如不能扫清中原的敌人，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辞色壮烈，大家深深感动，追随祖逖奔赴北伐的最前线。

祖逖渡江以后，驻屯在淮阴（今江苏清江市南）。先在那里修

① 《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

筑起冶铁炉，铸造兵器，同时招募到二千名战士，编成营伍。祖逖开始有了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

祖逖从淮阴向北进发，首先遇到的是黄河南岸的许多坞壁主。这些坞壁主在石勒军事力量威慑下，正观望徘徊。坞主张平、樊雅占据谯城（今安徽亳县），与祖逖相持一年。祖逖争取张平部将杀了张平，又使樊雅出降，进据了谯城。不久，又打退了石虎的进攻，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大兴二年（319），陈留地方的坞主陈川投降了石勒，祖逖进攻陈川占据的蓬陂（今河南开封市南）。石勒派兵五万援救。祖逖兵败，退到淮南郡（治寿春），石勒派桃豹守蓬陂。次年，祖逖派大将韩潜击败桃豹兵，夺得了蓬陂的东台，桃豹死守着西台，双方各占领了半个城，战斗了 40 天，相持不下。大家粮食都发生了困难，祖逖为了战胜敌人，与韩潜商量了一条计策。

祖逖叫部下用许多麻袋装上土，假装是粮食，派千余士兵运上了东台，又派几个士兵搬运几袋真米，故意装得疲劳的样子，走到与桃豹交界的路上休息。桃豹的士兵见了米争着来夺，祖逖士兵赶快逃走。桃豹的士兵抢到了米，很高兴，立刻埋锅做饭。他们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米饭，一边谈论着祖逖军队粮食充足；而自己营里早已断了粮，因而军心发生了动摇。

石勒知道了情况，为了稳定军心，赶快派了一千多头驴子组成运粮队，运送粮食接济桃豹。祖逖知道这消息，立即派人去袭击，夺得了全部粮食。桃豹听说粮食被劫，吓得连夜逃跑了。

就这样，祖逖军在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三年多的战斗，依靠了北方人民和部分坞壁主的支持，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

祖逖获得人民的拥护。在一次酒会上，父老乡亲们感激涕零，作了一首歌来称颂祖逖。歌词是：

幸哉遗黎免俘虏，
（幸运呀我们黎民免做俘虏，）

三辰既朗遇慈父。

(日月星辰重放光芒遇到了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hù)脯,

(让我们用葫芦盛着美酒再献上一束干肉,)

何以咏恩歌且舞。

(怎样来歌颂你的恩德,让我们且歌且舞吧。)

祖逖北伐,有效地抵御了北方少数族的南侵,扩大了东晋的疆域,巩固了东晋的边防,对东晋政权的稳固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祖逖的历史功勋。可是正当祖逖练兵积谷,准备继续向北进军的时候,东晋朝廷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大兴四年(321)晋元帝派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防备王敦,祖逖也要受其节制。祖逖感到夙愿难以实现,忧愤成疾;但他仍继续经营虎牢,修筑城垒,坚持不懈,最后终于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时年56岁。他死后,河南地区又重新被石勒占领,北伐的成果被断送。

后来,豫州人民为纪念祖逖,在不少地方为他立了祠。

三、东晋统治者的内部矛盾

——世家大族与东晋政权

依靠南北士族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各种矛盾。除了阶级矛盾以外,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多种矛盾。

(一)南北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

王导调和南北士族矛盾,使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但南北士族地主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在政治上,北方士族占据了高官显位,南方士族所任的官往往只有虚名,并无实权。即使像顾荣、贺循这样的名士,也只是担任一些清闲的官职。南方士族对于过江的"亡官

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①]，让他们来"驾驭"自己，是不能忍受的。在经济上，江南的膏壤沃土，早已为南方士族所占据，北方士族南下，在"无田何由得食"思想指导下，也必然会与南方士族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引起矛盾。

义兴大族周勰的起兵是南北士族矛盾的集中表现。

在东晋建立以前，义兴大族周玘[②]的"三定江南"，稳定了江南政局，为东晋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周玘没有受到重用，只得了一个吴兴太守的职位，因此怀恨在心，密谋起兵，结果事情败露，忧愤而死。临死对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也，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建兴二年（314），周勰果然联合了一些南方豪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反晋。东晋政府很快把这一叛乱镇压下去。但晋元帝考虑到周氏是江南的强宗大族，在吴人中有很大势力和声望，不敢深究。

王导为了缓和南北士族矛盾，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郡县，安置北方流亡士族。使冲突有一定缓和。

（二）皇权与大族的矛盾

东晋与西晋虽然都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但西晋司马氏王室力量还比较强大，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东晋则不同，司马睿"匹马济江"，他立国所依靠的是南北大族；东晋政权是参与和支持建立这个政权的几个大族的联合专政。支持东晋的南北大族中，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导）、庾（亮）、谢（安）、桓（温、玄）四大家族，皇帝的权限很小。"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③]，就是东晋政治的特点。这样，皇权与大族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东晋初年，王导为丞相，执政于朝内，王敦为大将军、江州、

---

① 《晋书》卷58，《周勰传》。

② 今江苏宜兴有周处及其家族墓群，1953年至1976年发掘了其中六座，另有周处父周鲂、其子周玘等墓，出土有各种青瓷器及生活器物。

③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荆州牧、握有重兵，驻守荆州。扬州是京畿所在，为立国的根本，三吴（即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合称）地区又是重要经济区，国家赋役主要依靠这里；荆州（治江陵，据湖北、湖南等地）位居上游，驻有重兵，防卫北方少数族南下，也构成对下游的威胁。王氏兄弟的专权，引起了晋元帝的不满。为了加强和维护皇权，司马睿一下子十分推崇申不害和韩非子的学说[1]，又重用寒门出身的亲信刁协、刘隗、周顗、戴渊等人。这些人都主张"崇上抑下"，维护皇权。大兴四年（321），晋元帝采纳刁协、刘隗建议，征调扬州诸郡的僮客为兵，名义上为了讨伐石勒，实际上是企图建立一支对付王敦的军事力量。晋元帝疏远、抑制王氏兄弟势力，引起王敦不满。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王导的思想与王敦不同。他深知在当时南北对峙局势下，只有维护司马氏帝室才能稳定局面。他主张"镇之以静"，就是在皇权与大族之间搞平衡，对于任何一方要打破这一平衡，他都反对。刘隗、刁协要加强皇权，他反对；王敦企图代晋，他也反对。王敦起兵诛刁、刘，他赞成，但王敦要推翻司马氏，他就要反对。他认为王敦要代晋是"非人臣之事也"。其他一些与王导有类似思想的大族也反对王敦。由于王导和朝官们的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其篡权野心，退回武昌。太宁二年（324），王敦病重，新即位的晋明帝发兵讨王敦，并假传王敦已死，以振奋人心。

（三）士族与庶族的矛盾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东晋政权竭力维护和满足门阀士族的利益。士族有侨姓、吴姓之分，侨姓指北方流亡大族，吴姓是土著大族，侨姓地位高于吴姓。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操纵选举，垄断中央和地方各种要职。官职有清、浊之分；一些悠闲而不负实际责任的官，如秘书省官属、东宫（即太子）的官属，

---

① 申不害讲"术"（权术），韩非子强调"法"和集权，是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

都由士族担任；他们由秘书郎、著作郎作为进身官，升迁很快，可以直升到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中书监、中书令等。而办理实际事务的官，即低级的浊官，照例由庶族寒门担任。在经济方面，大族可免除赋役，按官品广占土地，并将荫庇人口的数字比西晋更为放宽，一、二品官由以前的荫佃客 15 户增加到 40 户，三品官由以前的 10 户增加为 35 户，其他各品也相应增加，九品官由 1 户增加为 5 户。在法律上，公开宣布大族不受法律约束。例如大族抢劫石头（今江苏南京西）仓米 100 万斛，却只处死管仓的小吏来塞责。士族高门与庶族寒门之间不能通婚，车服器物都有严格区别。总之，士族有种种特权，而庶族寒门没有，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1] 士族与庶族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

东晋统治者内部的种种矛盾，引起东晋政局的不稳，也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加深了阶级矛盾，最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四、“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桓温其人

苏峻之乱被平定以后，东晋朝廷暂时转危为安。这时，王导再度执政，庾氏势力转移到了上游荆州，咸和九年（334）庾亮以帝舅身份镇守武昌。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咸康六年（340）庾亮死，弟庾翼继续镇守荆州，庾翼从武昌移驻襄阳准备大举进攻后赵，他征发长江中游各州地主的奴隶当兵，征调车牛驴马，引起了各地地主的猛烈反对。在内外矛盾的牵制下，庾翼只好停止北伐。

永和元年（345）庾翼死，晋以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出身于世

---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 8，《九品中正》。

家地主家庭。其父桓彝为宣城内史，与王导、庾亮等深受明帝亲待。灭王敦有功，后死于苏峻之难。桓温娶晋明帝女儿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他是东晋中期一个有作为又有野心的将领。他一生经历了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五帝，对东晋中期近三十年的历史有较大的影响。

桓温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发动了三次颇具规模和成效的北伐。桓温到荆州后，围绕北伐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他在荆州劝课农桑，发展生产，为北伐准备军粮；永和三年（347）攻蜀，灭成汉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得到了蜀地人力、物力。桓温见到当时北方动乱，多次上疏请求北伐，但东晋朝廷怕他势力强大，让徒有虚名的殷浩北伐。永和十年（354）殷浩北伐失败后被废，东晋朝廷再也无法阻止他的北伐要求了。

桓温共进行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伐前秦苻健。永和十年（354），桓温率水陆两军进攻前秦。水军从江陵出发，经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东南），至南乡（今河南南阳西南）；步兵自淅川（今属河南）入武关；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由汉中出子午道攻前秦。在北方人民的支援下，桓温军在蓝田大败秦兵，转战至灞上，离长安已很近。苻健与老弱六千固守长安小城，发三万精兵拒温。桓温缺乏坚决收复失地的决心，又想等到麦熟，就地取粮，迟迟不渡灞水进攻长安；后来前秦割了所有的麦子，坚壁清野，桓温军粮食不继，只好徙关中三千余户退兵。

第二次伐羌人姚襄。永和十二年（356）桓温自江陵北伐，进据鲁阳（今河南罗山县），溯伊水而上，击溃姚氏。姚襄西走关中，公元357年为苻坚所杀。桓温进入洛阳。升平五年（361）又派兵破前燕军，取许昌。次年，上疏东晋朝廷，建议还都洛阳，疏中说："现在北方人民都盼望晋军北上，如果迁都旧京，正好顺应人民的心愿，朝廷也可以名正言顺发号施令，这可使少数族统治者不诛自灭。"但是东晋在江南统治已经近50年，地主大族们子孙繁衍，丘垅成行，不愿离开家园回到动乱的北方。不久，桓温回到南

方，洛阳被前燕慕容氏所占。

第三次伐前燕慕容氏。兴宁元年（363）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但豫州、徐州还未控制到自己手中。为解决徐、豫问题，他又进行了第三次北伐。太和四年（369），桓温率步骑五万，自姑孰（今安徽当涂县）北上进攻前燕，到达枋头（今河南濬县西），慕容暐准备弃邺而走，可是桓温未能及时进攻。后来燕军求救于前秦，许划虎牢以西，得到秦军帮助，又派慕容垂率军阻击，切断了桓温的粮道。桓温终因几面受敌，粮尽，闻秦兵将至，被迫退兵，中途遭到燕军骑兵截击，死亡三万多人，大败而归。东晋收复的淮河以北，又重新丧失。

桓温除发动北伐外，在其当政时，还力图改革东晋弊政，中兴东晋王朝。兴宁元年（363），他向哀帝上疏，提出七条建议：

第一，杜绝浮夸与结党营私；

第二，精简官吏和机构；

第三，行公文限以时日；

第四，奖励一心为公忠于朝廷的人；

第五，赏罚分明；

第六，鼓励学习，加强教化；

第七，编写《晋书》。



东晋王洵《伯远帖》

这些建议针对当时时弊，如果能实行，是能改善东晋政治统治的；可惜未被采纳。但是第二年在桓温主持下实行的有名的“庚戌土断”，却取得了积极成果，检括出不少隐户。

桓温在第三次北伐前后，由于他在世族地主内部斗争中的胜利，权力越来越大，也急切地想篡权称帝。他对同僚说：“做人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参军郗超献计说：“要提高

威信，得学西汉霍光的办法，把现在的皇帝废了，另立一个皇帝。”桓温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在太和六年（371）把在位的司马弈废为海西公，另立简文帝司马昱。简文帝常怕自己被废，在位二年，忧愤而死。桓温本来希望简文帝把皇位禅让给他，但又怕王、谢等大族势力而不敢行动，最终只是依照诸葛亮、王导故事辅政。宁康元年（373），桓温病死了。桓温最终没有篡位，说明他还是明智的。

五、侨置郡县与土断

——东晋的户籍整顿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各少数族统治者肆意烧杀掠夺，那里的汉族人民纷纷越淮渡江，南下避乱。南移的人口往往由大族地主率领，成员大多为其宗族、宾客、部曲、佃客、奴婢，以及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东晋初年几十年中，南移的人口连续不断。大体上说，北方东部的人民迁移到南方的东部，西部的人民迁移到南方的西部。据统计，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数为90余万，大约北方每8个人中有一个南迁；南方人口有1/6为北来侨民。

如何处置好这一大批南来侨民，关系到东晋政权的稳定与巩固；也关系到进一步吸引北方人民。东晋政府对这部分人采取了侨置郡县的办法，即在南方地广人稀之处设立侨州、侨郡、侨县，让北方人民集中居住，仍沿用北方原籍地名。如北方琅玡人民南下，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侨立琅玡郡，称南琅玡郡；兖州逃到南方的，就在京口界内成立南兖州等等。侨州郡县的官吏仍由北方士人担任。侨人不入当地户籍，当时通行于郡国的户籍，用黄纸书写，故名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为官府征税的依据。而侨人的

临时户籍用白纸书写，故名白籍。它有免除赋役的优待。东晋设置的侨州有：南徐州（寄治京口）、南兖州（寄治京口，后迁广陵），南豫州（寄治芜湖），南青州（寄治广陵），雍州（寄治襄阳），秦州（寄治襄阳）等。幽、冀等州不设侨州，只设侨郡、侨县。侨州郡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地区的丹阳、晋陵、广陵一带，还比较集中在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

北方大量人口的南移，对南方的开发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带来一些矛盾。首先，侨人不负担政府的赋税和徭役，严重影响封建国家的收入；其次，世家豪族占夺人口在不断发展。过江世家大族在南方发展庄园，竭力吸收部曲、佃客，增加自己剥削对象，民户大量流入私门，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剥削收入；再次，侨置郡县的建立，给南方行政区划和户籍制度带来了混乱。

为了整顿户籍，把侨户、流民编成为编户，束缚于国家土地上，以增加政府领户，扩大国家的租税徭役收入，也为了和世家豪族争夺劳动力，东晋南朝政府一再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土为断”，即把侨州郡县的居民变成土著居民，按其居住地区认定新的籍贯，把白籍并入黄籍。

东晋时期土断主要有四次，即：

东晋成帝咸和（326—334）中期；

东晋成帝咸康七年（341）；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

东晋安帝义熙八、九年（412—413）。

这几次土断中最著名的是第三次。即兴宁二年（364）“庚戌”那天颁布的，“庚戌”即三月初一，因而也称为“庚戌土断”。这次土断是桓温主持下实行的，在全国大查户口，令西北士民侨寓东南者，以所在土著为断，把户口编入所在郡县。严禁挟藏户口，犯者严惩不贷。对于那些隐匿户口的世家大族，给以沉重打击。如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为藏匿五户，被桓温送付廷尉严惩；王彪之任会稽内史，执行土断，检括出逃亡户三万余口。由于这次土断执行

得比较彻底，使东晋政府增加不少编户，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出现了“财阜国丰”的局面。为桓温在公元369年大举北伐，为以后组织北府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东晋以后，南朝也屡次实行土断。主要有六次：

宋文帝元嘉八年（431）；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

宋后废帝苍梧王元徽元年（473）；

齐高帝建元三年（481）；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

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次土断，是因为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改变大族挟藏户口的积弊；每次土断皆出现或窃注黄籍，或却而复注，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土断是朝廷与世家豪族争夺民户的一场斗争，它反映出皇权和世家豪族之间既勾结又矛盾的关系。实行土断对经济发展，加强皇权有利，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

六、孙恩、卢循起义

——江南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在王恭起兵和桓玄称帝之间，江南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后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士族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号称“京口之蠹”的大族刁逵兄弟家有田产万顷，谢安、谢琰田产遍布会稽（今浙江绍兴）、吴兴（今属浙江）、琅玡（今南京市东北）各地，到宋初谢混时，扩展为10多处。这些大族不仅广占耕地，还霸占国家的山林川泽。劳动人民无地可耕，连捕鱼、割苇、打柴都要罚款，被迫沦为世家大族庄园里的佃客。由于大族对土地和人口的占夺，使自耕农的赋税徭役更为加重。东晋初，沿用西晋

户调法。咸和五年（330）改为每亩收田赋米三升[①]，称为“度田收租制”。咸康三年（337）改为每口收田赋米三斛，不久又增加为每口收五石。徭役更为繁重，当时人范宁说：“古时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忧，无三日休停。以至有人自残身体来逃避徭役，生儿不愿抚育，鳏寡不敢重新娶嫁。”庾和为丹阳尹，一次就请求废除杂役60余种，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统治阶级中某些人感到忧虑。范宁向皇帝指出：“今天的形势，就好比到处布满了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

王恭联络殷仲堪、桓玄举兵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长江上游为桓玄所控制，下游的京口及江北地区为刘牢之所控制。东晋王朝政令所能达到的只有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东晋政府的赋役负担大部分落在三吴人民头上；在军事上，调兵也不出三吴。于是这个地区出现了“谷贱人饥，流殣不绝”[②] 的情景，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隆安三年（399），司马元显为了对付桓玄荆州军的威胁，决定建立一支新军。他征发三吴地区“免奴为客”的人当兵，这些人父祖或本人曾为奴，后放免为佃客，身份有所提高，现在重新沦为兵，等于又失去了自由身份。所以命令一出，引起广大农民强烈反抗，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一家世世代代信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是五斗米道道首。

孙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教，教徒很多。王恭起兵时，他以为东晋就要完蛋，也聚徒千余人，以讨王恭为名，起兵叛乱，结果被东晋政府镇压；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都被杀。侄孙恩侥幸逃入海岛，他暗中聚集道徒，决心报仇。

正当孙恩在海岛上发展势力的时候，东晋统治集团也正激烈地

---

① 《晋书·食货志》所说税米三升，有人认为是三斗之误。

② 《晋书》卷64，《会稽文孝王道子》。

互相攻杀。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乘机从海上登陆，向上虞、会稽发动进攻。江南八郡即会稽、临海（郡治今浙江黄岩东北）、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市）、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新安（郡治今浙江淳安西北）、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吴兴、义兴（今浙江宜兴、长兴一带）的被压迫人民纷起响应。十多天里，队伍由百余人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占领了八郡，他们焚烧官府，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官僚，扫荡田园别墅，没收地主的财物珍宝。三吴地区是王、谢两大士族集中之地，他们的家庭都遭到沉重打击。会稽太守王凝之一家、吴兴太守谢邈、会稽士族孔道民等都被义军镇压。

孙恩占领会稽以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政府派北府兵名将谢琰、刘牢之去镇压。孙恩避免和他们决战，带领20万人马，向海岛撤退。义军怕官军追来，走不脱，一路上扔掉了许多财物。官军一看遍地都是财物，互相抢夺起来，顾不上去追起义军了。

没过多久，孙恩又组织义军登陆，从水路打到京口（今镇江），义军出海北上，刘裕紧紧追击，后在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为刘裕打败，又南撤入海。元兴元年（402），孙恩再度发动攻势，从临海（今属浙江）登陆，却为临海太守辛景打败，孙恩和他的部下数百人投海而死。

孙恩死后，义军余众几千人在卢循（孙恩妹夫）和徐道覆领导下继续战斗。卢循接受了东晋封他的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的官号；徐道覆和广大义军战士是主张北伐的。卢循迫于徐道覆和广大义军的压力，被迫同意北伐。义熙六年（410），卢循与徐道覆分兵两路，浩浩荡荡，长驱北进。西路军由卢循统率，沿湘水攻湘中诸郡；东路军由徐道覆统率，沿赣水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两路军连旗而下，共有战船千余艘，其中八艚舰九艘，皆四层，高十二丈。起义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大败北府兵重要将领刘毅，歼敌大部；刘毅仅带数百人逃走。

起义军攻打建康，屡遭挫折，师劳兵疲，被迫向南回师，还保

广州。刘裕紧紧尾追起义军，同时派人袭击占领了广州，使起义军丧失了最后基地。卢循军到了广州城下，攻城20余日不下，转移到交州（辖境在今广西地区）。最后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战败，卢循投水自杀。徐道覆退到始兴后，也战败牺牲。

孙恩卢循起义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群众达数十万，历时12年，地区遍及南方各地。起义军利用了五斗米道作为宣传、组织群众的工具；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利用江湖、海域、海岛建立了庞大船队，发展了农民军的战略战术。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使腐朽的东晋王朝走向覆亡；也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的门阀士族势力，使它一蹶不振。因而从南朝以后，地主阶级中的寒门庶族逐渐兴起。

第四章　南朝政权的更替

一、刘裕建立宋朝与“元嘉之治”

——刘裕、刘义隆的改革

东晋末年，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桓玄中强大起来的刘裕掌握了实际政权。到东晋元熙二年（420），他废掉了东晋皇帝恭宗司马德宗，自立为帝，建立了宋王朝，仍都建康。这是南朝的开始。



刘裕像

刘裕（363—422），小名寄奴，祖籍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他年轻时，由于父亲早亡，种过地，捕过鱼，卖过草鞋，曾因赌博，欠京口大族刁逵钱三万，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后在北府兵刘牢之部下任小军官。刘牢之被杀后，刘裕成为权臣桓玄的部下。不久，他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在京口起兵，进军建康，推翻了桓玄，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

刘裕自知出身低微，难以当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以利于取代东晋政权，他发动了北伐。

刘裕在北伐的同时，在内政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

刘裕出身寒门地主。他看到东晋政权积弊积弱，主要是由于世家大族势力太大，所以掌权后一方面对大族仍然表示尊重，让他们保持富贵；另一方面却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武力，让皇子皇族出任扬州、荆州及南徐州等政治经济中心与军事重镇，也重用一些原来北府兵的将领。

为了限制大族控制劳动人手和增加朝廷收入，刘裕在义熙九年（413）推行了土断。使流亡到南方的侨人就地设籍。这是按照桓温“庚戌土断”进行的，是继桓温之后又一次执行得坚决和取得成效的土断。会稽大族虞亮隐匿千余人，被刘裕处死；包庇他的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被罢官。刘裕又大规模地裁并州、郡、县，大大精简了重复机构。这些措施使政府控制了较多人口，增加收入，农民的负担相对得到减轻。

继土断之后，刘裕又下令豁免个别地区的户调。改东晋的计口收税为计资产收税，这对资产少的贫民有利。他又减轻市税，豁免一些杂税，如禁止向民间征发车牛，政府需要则向人民购买。义熙九年（413），刘裕让晋安帝下令把皇后的脂泽田 40 顷赐给贫民。又禁止世族豪强封山占水，禁止豪强向打柴捕鱼的农民收税。

刘裕下令免除兵户为平民，并释放部分罪犯归农。

刘裕自己生活很俭朴。他升太尉后，宁州有人贡献琥珀枕，造型别致，光色美丽，价值连城。刘裕听说琥珀枕治疗创伤有效，就命人捣碎，分给各将领。他居住的床头有土鄣，壁上挂有葛灯笼、麻绳拂。以至后来孝武帝看到了，称他为“田舍公”。

刘裕做皇帝不到三年就病死了。他的长子刘义符即位，不理政事，为大臣司空徐羡之所杀。徐羡之勾结另一大臣中书令傅亮，拥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407—453），即宋文帝。

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政策。他多次下《力田诏》奖励农业生产，要全国官吏好好带领农民耕种；农民缺少种子的，政府要借给他们；生产搞得不好的地方，要处分官吏。他还亲自带领文武大

臣去京郊锄几下地，给大家做出榜样。有一年，江南闹旱灾，水稻种不上，宋文帝下令改种麦子。他重视兴修水利。修复了很多堤、堰、陂等，如芍陂、六门堰、马人陂等。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吴兴一带大水，他一次就拨出数百万斛大米，赐给五郡灾民。

他继续清查户口，把大地主侵吞隐藏的户口清出来，登记在政府的户籍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户籍，成为后来齐、梁王朝的依据。

宋文帝重视官吏的选拔。对于有才能的人加以重用，对于贪官污吏则严加惩处。南梁郡太守（管理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刘遵考，是宋文帝堂叔，贪财好利，侵吞朝廷拨来救灾粮，被罢去了官职。他也重视文化，先后设立了儒、玄、史、文诸学馆。

由于刘裕父子实行了上述一系列政策，使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宋文帝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424—452）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史书描写这时的情景：

> 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1]
>
> 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2]。

大意是说，这时期战争少，百姓不用负担繁重徭役，租税也轻，粮食丰收，穷人不再死于沟壑；也娶得上老婆，有了孩子，人口也多了；人们因天下太平，到处唱歌跳舞，这是宋朝的极盛时期。

这些记载，难免有溢美的成分，但元嘉时期的确是南朝的盛

---

① 《宋书》卷54，《孔季恭传》。

② 《宋书》卷92，《良吏传》。

世。这一经济繁盛局面的出现，以及刘裕父子上列政策所以能够推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东晋末年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统治势力，扫除了社会前进最大障碍的缘故。

二、宋魏大战

——宋初大规模的南北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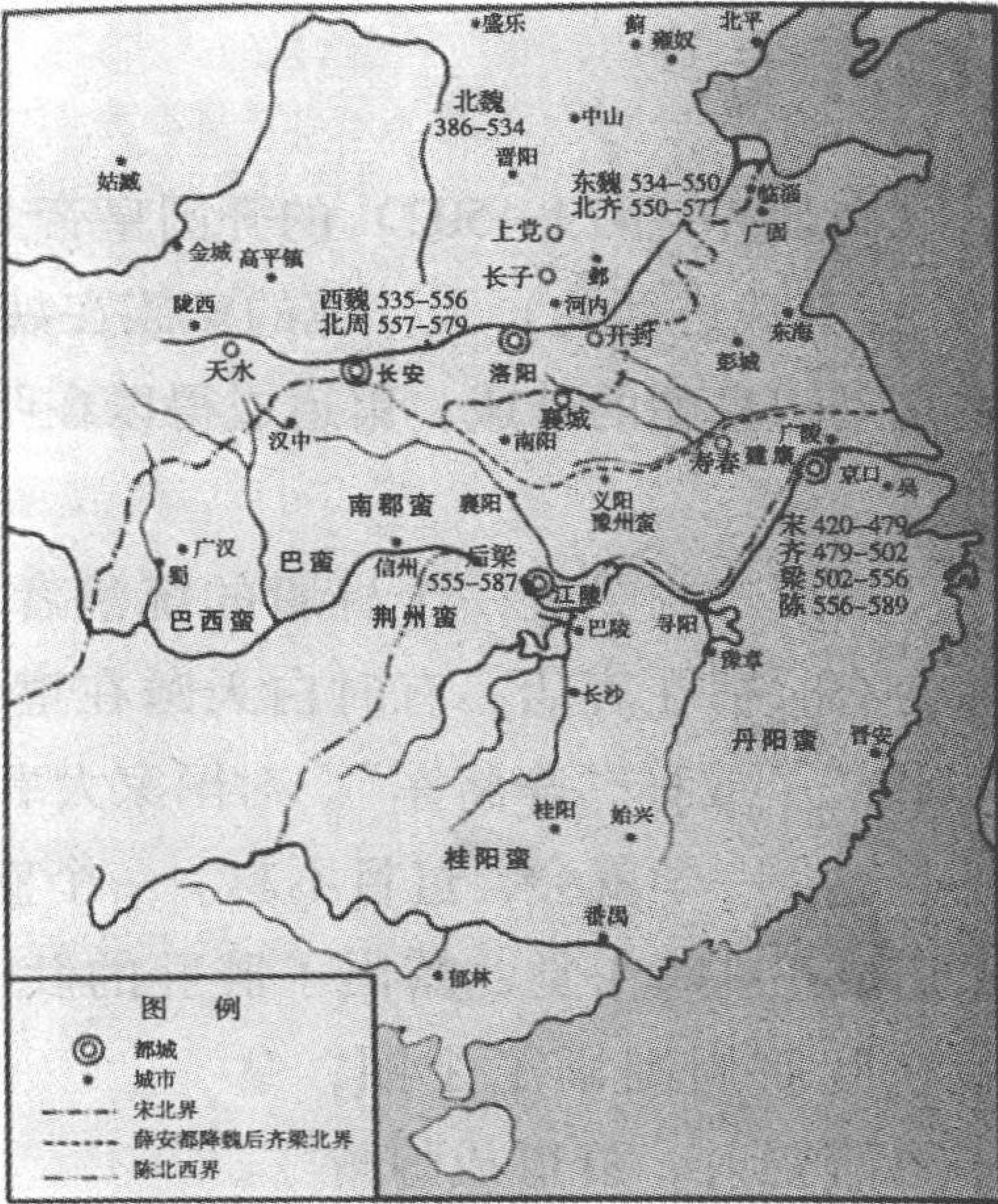
当宋朝初年国力逐渐发展的时候，北方的北魏在拓跋嗣、拓跋焘统治下也正是兴盛时期。永初三年（422），北魏乘刘裕死去的机会，占领了刘宋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刘宋失去了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台东）、洛阳和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四个重镇，边境退到了淮北。拓跋焘统一了北方，以后又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大量人畜；特别是大破柔然后，解除了北方的威胁，更要把注意力转到南方。南朝宋文帝即位后，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国力的强大，也一心想收复被北魏夺去的大片土地。因此，双方在公元422年以后的30年中，兵连祸结，战争不断，终于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发生了一场大战。

这一年春天，魏太武帝拓跋焘统率10万步兵骑兵，攻打刘宋的悬瓠（hù）（今河南汝南县）城。由于宋军坚守，魏军攻城42天，死伤1万多人，被迫退兵。

魏军撤走以后，宋文帝调兵遣将准备北伐。他下令青、冀、徐、豫、兖等州家有三丁征发一人，有五丁征发二人，又减百官俸1/3以充军用。魏太武帝得知刘宋要北伐的消息，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宋文帝，信中挖苦讽刺说："你们自己送上门来，这太好了。听说你快50岁了，还没有出过远门，像3岁小娃娃一样。怎么能和我们马背上长大的鲜卑人相比呢？现在我特地派人送你12匹马和毡子、药品等东西。你们远道而来，可用我的马，水土不服，得了病，可服我的药。"

宋文帝看了信，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发兵，对北魏发动总攻。军分两路，东路军由王玄谟统率，兵精器利，是主力。西路军由柳元景统率。东路军向北渡河攻碻磝、滑台，西路军西攻关中。

宋军攻打滑台，几个月打不下来，为此魏军赢得了时间。魏太武帝率魏军主力，号称百万，渡过黄河，到了滑台城处。王玄谟听说魏军主力到来，吓得惊惶失措，一溜烟似的逃跑了。军用物资都丢弃了，魏军收缴这些战利品，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南北朝形势图

宋军主力虽然失败，但由柳元景率领的西路军却打得很顺利。他们由河南卢氏县北进，在人民的支持下，攻下了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陕城，进逼潼关。但终因东路军失败，失去策应，也不得不撤兵。

魏太武帝乘胜南下，包围了宋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的宋军拼死抵抗，他绕过彭城，继续南下攻盱眙，仍然打不下来。他又率军绕过盱眙，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准备进攻建康。

魏太武帝一连几天不能渡江。他想前有长江天险，后有宋军坚守的城池，这样孤军深入，太危险了。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不得不撤退了。

这场战争是淝水之战后南北之间又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刘宋军民的英勇战斗，使宋朝没有被北魏灭掉。但是战争中也暴露了宋王朝的腐败。这次战争使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南朝的损失更重。经过这场战争，南朝的“元嘉之治”也就结束了，从此，开始了北强南弱的局面。

三、"愿后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齐的建立

南朝齐（479—502）的开国皇帝萧道成（427—482），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的家族在魏晋时并非名族，因其父萧承之是刘宋皇朝的外戚，萧道成得以在明帝时任为南兖州刺史，防御北魏。

后废帝刘昱是一个昏庸的统治者。他常常便服出行，穿街过巷，有时宿在客店，有时白天睡在道旁。人家问他姓名，他或称"刘统"，或称"李将军"。对国家大事一点不顾，对裁衣制帽却很感兴趣，一学就会，过目不忘。一个盛暑的下午，他到领军府，看萧道成正在睡午觉，露出了胖胖的肚子，笑说"好一个箭靶子！"就在肚脐周围画了个圈，拿了弓箭要射。萧道成惊醒了，说："老臣无罪"，左右也忙劝说："领军腹大，虽是好靶子，但一箭便死，再射就没了。不如去掉箭头，可多射几次。"刘昱乃去掉箭头，一箭正中脐。笑道："箭法如何?"从此以后，萧道成便开始密谋策划杀刘昱。



齐高帝萧道成

昇明三年（479），萧道成逼顺帝退位，自己称帝，建立齐王朝，年号建元。当王敬则引兵入殿，从桌子底下找出小皇帝时，顺帝哭着说："今天是否要杀我?"王敬则说："没有的事，不过是让你迁居别宫。官家先世取司马氏也是如此。"顺帝哭着说："愿后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萧道成总结刘宋后期骨肉相残和奢侈腐化从而亡国的教训，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他禁止宗室诸王封占山水，减免一些赋役，安抚流民还乡生产，整顿户籍，修建学校，禁止将帅招募部曲等等。他特别提倡节俭。过去皇帝礼服上佩带一种叫“玉介导”的装饰品，据说是避邪的，萧道成认为玉制品会产生奢侈，叫人把它打碎。又下令后宫原用金或铜制的栏杆，改用铁制。把内殿的绣花绫罗帐改作黄纱帐。皇帝銮驾上华盖的镶金装饰品也去掉了。他说：“让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鉴于宋王朝的骨肉相残，他特别注意教育子孙互相团结。建元四年（482）他临死留下遗言说：“刘氏若非自相残杀，他人何得乘乱得位！”萧道成虽然想有点作为，可惜他做皇帝不过4年就病死了[①]。

齐高帝萧道成死后，太子萧赜（zé）（440—493）继立，即齐武帝。齐武帝继续萧道成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减免赋役，奖励农业生产，重视发展学校，恢复百官禄田俸秩，与北魏通好等等。在齐武帝统治的永明（483—493）年间，社会比较安定繁荣，历史上称为“永明之治”。据说当时“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②] 但是，在这期间，齐皇室仍然过着腐化生活。齐武帝后宫万余人，豫章王萧嶷后房亦千余人。这些人全靠人民来养活。因而“永明之治”没有像“元嘉之治”延续时间长。

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齐武帝设校籍官大规模检查户口，称为“检籍”或“校籍”。被清查出伪冒的户籍，要吊销他的户籍本，叫做“却籍”。这种人要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劳役。

在检籍过程中，政府规定校籍官要校出一定的巧伪数，以至行贿舞弊，层出不穷。有钱的人向官吏行贿，应该“却籍”的不“却籍”了；没有钱行贿的人，硬说他们应“却籍”。一派乌烟瘴气，使人无法忍受。

---

① 萧道成墓泰安陵在今江苏丹阳市城东北胡桥镇，1968年发掘。墓壁面上有砖画多幅，墓前有石雕天禄、辟邪等。

② 《南齐书》卷53，《良政传序》。

唐寓之，富阳（今属浙江）人，侨居桐庐（今浙江桐庐西）上代是为人家看墓地风水的阴阳先生。永明三年（485），他自称他家的墓地有王气，子孙能做王；又说他在山中得到金印，能当皇帝，借却籍户对政府的不满，聚集了400人，在新城（今浙江新登）起义。起义的人有自耕农和被压迫农民，也有在检籍中受到损害的庶族地主。反对检籍、反对罚充远役的要求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唐寓之起兵后，封锁了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攻克新城、桐庐，向富阳进发。三吴地区的却籍户和不堪重压的广大人民，纷纷响应，很快聚众至三万。次年正月，唐寓之攻克钱塘（今浙江杭州），自称皇帝，立太子，置百官，国号吴，年号兴平。钱塘富人柯隆献出一些武器，唐寓之用他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加领尚方令。义军分兵进攻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死东阳太守萧崇之（萧道成堂弟）。义军在进攻山阴（今浙江绍兴）后，一直向东打到浦阳江。齐武帝闻讯以后，赶快派中央禁军前来镇压。起义军由于缺乏骑兵，战斗失败，钱塘被攻陷，唐寓之被俘后遭到杀害。南齐官军乘机大肆烧杀抢掠，齐武帝不得不处死宠将陈天福以平民愤。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南齐政府的检籍也被迫停止下来。齐武帝怕再度引起叛乱，正式宣布撤销检籍，恢复检籍前的状态，实际上是承认了冒籍的既成事实。这反映了庶族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得到提高。

四、“作事不可在人后”

——齐王朝在内讧中急速衰亡

齐武帝萧赜死后，皇太孙萧昭业（473—494）继立，即郁林王，年号隆昌。由武帝堂弟西昌侯萧鸾辅政。萧昭业十分荒淫，任意挥霍钱财。萧鸾当时总管尚书事，掌握实权，早有野心，乃于隆昌元年（494）杀萧昭业，另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又废杀萧昭文，自己称帝，即齐明帝（452—498）。

齐明帝因为自己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亲子皆幼小，而高帝、武帝子孙日渐长大，乃蓄意大杀兄弟侄子。明帝在杀人前，常和始安王萧遥光商量，二人屏人密语后，萧鸾就点起香火，呜咽流涕一番，第二天就必要杀人。每杀诸王，总在黑夜派兵包围住宅，叫噪而入，逮而杀之。在外地诸王，多由典签[①]执行。

萧鸾残酷杀人，但自己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妄想鬼神能赐给他福气，因而相信、重用那些与鬼神打交道的人。他感到人间处处是陷阱，每出幸，总要先占卜利害，南出则称西去，东游则说北行。病重也秘而不宣，直到宫中传出求白鱼治病，外面才知道。临死前对儿子萧宝卷说："要记住隆昌（萧昭业的年号）的教训，作事不可在人后"。但是后来明帝子孙，除早死者外，亦皆被杀。

萧宝卷在位时，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同辅政，称为"六贵"。萧宝卷重用身边亲信侍从，其应敕（传达旨意）捉刀之徒并掌国政，称为"刀敕"。他任意诛戮大臣，"六贵"相继被杀。逼得老臣宿将不断起兵。永元元年（499），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在寻阳起兵，后至建康败死。次年，豫州刺史裴叔业起兵，以寿阳降北魏。平西将军崔慧景奉命讨寿阳，到广陵举兵还攻建康，后被豫州刺史萧懿所败，逃亡被杀。萧懿为尚书令，不久也被萧宝卷毒死。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加速了齐王朝的灭亡。


始建于南齐年间的武汉八咏楼

永元二年（500）十二月，萧懿弟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包围建康。城中内变，东昏侯被杀，齐政权终于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为梁所取代。

---

① 南朝诸王出镇，由朝廷派典签辅佐，名为典领文书，实则监视诸王，权力极大。参阅第五章"寒人掌机要"。

五、菩萨皇帝

——梁武帝的四十八年统治

南朝宋齐梁陈4个王朝，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都是开国皇帝。但刘裕称帝仅3年，萧道成4年，陈霸先3年，只有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时间最长，整个梁朝几乎就是他一人在位。

梁武帝时代是南朝一个粗安的时代。这是因为北方北魏后期动乱，发生各族人民起义，又分裂为东西魏，无暇南顾；梁武帝本人在初期也还是想有所作为，励精图治。所以梁朝的经济文化比较兴盛。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本是齐皇室的同宗。萧氏由勋门逐渐提高到一流大族，与琅琊王、陈郡谢、陈郡袁氏，并称为侨姓四族。但萧衍本人，仍靠军功起家。他利用齐武帝父子互相残杀，扩大自己势力，终于夺取政权，从襄阳起兵到梁朝的建立，表现出他确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才能。

梁朝建立后，梁武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一些积极措施。他“勤于政务，孜孜无怠”。他注意人才的选拔，派使者到各地“访贤举滞”，又下诏在各州郡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对于庶族寒门，也要让他们参加政权，“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他注意听取民间意见，在公车府肺石旁设置一箱子，叫“肺石函”，老百姓有冤枉，或受到豪门欺凌，可投书肺石函。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自己亲耕籍田，允许流移他乡的农民回乡，恢复原有田宅，又屡次下诏减免“三调”①。三调又称三课，即是按户征收的调粟、调帛和杂调（劳役）。他在天监元年（502）对南徐州各侨郡县实行“土断”，增加了财政收入。

梁武帝统治时期，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发展，连北方的高欢也颇为佩服，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

---

① 如天监十六年（517）、大同五年（539）都有诏。

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 梁武帝自幼酷爱读书，至老手不释卷，对经史、文学、书法、音乐、天文都有研究。他曾撰《群经讲疏》200余卷，内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等，在儒学衰落的南北朝，梁时儒家经学又有一点转机[2]。他制定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 000余卷，8 000余条。他又撰《通史》600卷（一说480卷），起自三皇，止于梁，



梁武帝

本文可能是别人执笔，但赞序是萧衍所作，今天"通史"的名称最早是从这里来的。他的诗也作得很好，写过一些七言乐府诗，对七言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洛阳女儿名莫愁"就是他的名句。

梁武帝对宗室诸王采取纵容的态度，而对百姓则实行严刑峻法，纵容贵族官僚为非作歹。南朝注籍户口才500多万人，可是梁时每年判处二年以上徒刑的达5 000多人，监狱里关满了囚犯。罪犯一人逃亡，全家要罚做苦工，全家逃亡，邻里要连坐，结果往往是一人犯罪，全村皆空。官吏贪污成风。鱼弘对人说："我当郡太守，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官吏搜括到的财物，要向皇帝贡献，贡献多的，就算称职；少的，就说懒惰。有一个正直的大臣贺琛看不过去，上了一个奏章，提出四条意见：一是搜括太重，民不堪命，百姓纷纷逃到贵族门下来逃税；二是官吏贪残，穷奢极欲，浪费严重；三是皇帝左右权臣作威作福，陷害好人；四是朝廷大兴土木，没完没了，百姓服役不停。贺琛讲的都是实话。梁武帝看了大怒，要他一一举出事实，指出姓名，否则便是诬蔑；又举出自己生活的俭朴来加以反驳。这样，贺琛不敢

---

① 《北齐书》卷24，《杜弼传》。

② 南朝儒学的特点之一是义疏的盛行。义疏或讲疏是为讲学而预备的讲义或讲稿，这是受玄学家谈辩和佛教讲经的影响，后来十三经注疏据此而发展起来。

再说。这是梁武帝晚年的事，这时他已经昏庸得听不进不同意见了。

梁武帝维持统治的另一个杠杆，就是用佛教作为思想统治工具。他对佛、道、儒兼收并蓄，创三教同源说。但佛教是最高的；其次才是儒、道，佛是月亮，儒、道只是周围的星星，“犹月映众星”。由于他的提倡鼓励，佛教风靡一时。建康内外寺院500余所，有名的如同泰、大爱敬、大智度、法王等寺院一座连着一座，崇楼峻阁，高台宝塔，耸入云天。仅建康城内的僧尼就有10余万人，全国更是不计其数。苏州枫桥镇的寒山寺，也是建于梁朝，那时名叫妙明普利塔院，后因唐人寒山居此改名寒山寺。他下诏：宗庙祭祀用牲，用面为之，以免杀生；宗庙以饼代脯，余用蔬果。公元527年他在建康建立一座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①，早晚都去拜佛念经。后来，他在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四次舍身同泰寺，就是把身体舍给佛爷为奴。但国家不能没有皇帝，于是大臣就平均每次花1亿钱，共花了4亿钱把他赎回来。在他赎身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同泰寺突然遭雷火击，佛塔烧毁了。梁武帝认为这是魔鬼干的坏事，应该做法事来镇压。他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会有障碍，应该重建佛塔，把新塔修得更高，来镇住魔鬼。他动员成千上万人，再造高12层的塔，比原来高出一倍，塔还没有完工，侯景之乱发生了，同泰寺遂毁于兵火。

梁武帝统治的48年中，总的讲是南方一个粗安时期，他本人能文能武，梁朝经济、文化是有所发展的，但剥削和压迫也是重的。他晚年迷信佛教，昏庸腐朽，招致了侯景之乱，终于使梁朝灭亡。

六、“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梁末侯景之乱

侯景（503—552）是被鲜卑人同化了的羯族人，本是北方怀

---

① 明洪武二十年（1387）在同泰寺故址上建鸡鸣寺。

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的镇兵，后成为东魏将领，深得高欢信任。高欢让他带兵 10 万镇守河南。高欢死，子高澄继立，高澄与侯景不和，要夺他兵权，侯景向西魏投降，西魏不相信他，而东魏又派兵追捕他，侯景只好派人到梁，愿以豫、广等十三州降梁。

梁武帝接见了侯景的使者后，忙召集大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说："梁与东魏多年通和，边境安宁，今接纳其叛臣，会引起纠纷，这事不宜做。"梁武帝说："机会难得，岂能错过！"中书舍人朱异说："侯景以东魏一半土地来降，这是天意。如拒不接纳，将来谁也不肯来降。请陛下勿多疑。"梁武帝决定接受侯景投降；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管理黄河南北的军政事务。

梁武帝派侄儿萧渊明带兵 5 万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牵制东魏，接应侯景。梁军纪律很差，必须套上枷锁才能驱迫他们前进，萧渊明无作战经验，战前还在饮酒，又不接受老将羊侃的正确意见，结果与东魏在寒山堰（江苏徐州市东南）一战大败，主力被消灭，萧渊明也成了俘虏。寒山堰失败的消息传到建康，梁武帝几乎从床上滚下来。

东魏在寒山大捷后，又进击侯景。太清二年（548）正月侯景战败，4 万人的队伍只剩下步骑 800 人投奔南朝，占据了梁的寿春城（今安徽寿县）。

八月，侯景以诛中领军朱异等为名，反于寿阳。他组织了寿阳附近的百姓共 8 000 人马，向南进军，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历阳（今安徽和县），直到长江北岸横江（今安徽和县的横江浦）。梁武帝一面派六皇子萧纶率兵北讨侯景，一面命皇侄萧正德（梁武帝六弟萧宏第三子）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负责江防和保卫首都。

梁武帝本来以为长江天堑，侯景不能渡江，不料萧正德暗中派了数十艘空船用了三天功夫就把侯景接到秦淮河南岸。侯景包围进攻皇帝所居的建康城中的台城，台城里的军民在名将羊侃和太子萧纲领导下坚决抵抗。

这时台城中粮食、柴、盐已十分缺乏，人们把尚书省房子拆下来当柴烧，又捕鼠雀，杀马而食。侯景军在勤王军的围困下也断了粮。侯景在王伟建议下，放出和谈烟幕，说是只要割给他四州之

地，以宣城王萧大器为质，他就不再反梁，率兵回江北。梁武帝开始坚决反对，认为“和不如死!”大臣们也认为侯景在围城的优势下提出和谈，肯定是阴谋。但太子萧纲认为可以和，结果梁武帝说：“汝自图之，勿令取笑千载。”同意了和谈。于是梁封侯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4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派人与侯景杀牲歃血为盟。但侯景根本无撤兵打算，并借口勤王军妨碍他渡江，要梁武帝下诏退勤王兵；等荆州军一退，侯景就撕毁了和约，上表“陈帝十失”。梁武帝看表后，既惭愧又愤怒，再次宣布与侯景作战。但这时侯景已从东府城（建康东，宰相公卿所居地）弄到了粮食。而城中却十分困难，人多身肿气急，十多万人死了十分之八九，只剩下三四千人，满路尸体，臭不可闻。侯景昼夜不息攻城，太清三年（549）三月终于在围城一百多天后，攻下了台城。梁武帝叹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① 侯景逼梁武帝下令让城外勤王军队都听他指挥。勤王军一部分投降了侯景，一部分退回原地。梁武帝被软禁在台城，五月活活饿死，年八十六。②

梁武帝死后，侯景立萧纲为帝，即简文帝，自为相国，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后又废杀萧纲，立萧栋。不久又迫萧栋禅位，自己称帝，国号汉。



梁元帝《职贡图》

① 《资治通鉴》卷162。

② 梁武帝修陵位于今江苏丹阳市荆林三城巷。陵东向，陵前石刻存一天禄，公兽，双角，长3.1米，高2.8米，雄武有神韵。

侯景攻下建康后，又派兵攻下吴郡、吴兴、会稽，大肆烧杀抢掠，富庶的三吴地区遭到极大破坏。

侯景攻下三吴后，又向江陵进军，沿长江西上，众号二十万，旌旗千里。当时在江陵的是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508—554）。他在荆州握有重兵，承圣元年（552）二月乃派大将王僧辩与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太守陈霸先联合，与侯景作战。侯景兵退到姑孰（今安徽当涂），遭到一次歼灭性打击。后王僧辩军进入建康。侯景战败东奔，四月，与心腹数十人乘船由扈渎入海。侯景在船上睡熟，船工转舵返航，向京口驶去。船近京口，侯景醒来发觉，欲投水自杀，结果被船上人杀死。尸体送到建康，曝尸于市。江南人民争食其肉，焚骨扬灰，以解心恨。

侯景之乱给江南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8 万多户人口的建康，毁于一旦，扬州地区变成了“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①]。南方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越来越薄弱，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造成了条件。

七、陈霸先和王僧辩

——陈的建立和灭亡

在平定侯景之乱中，陈霸先（503—559）的势力强大起来。陈霸先，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人，家世寒微，初为乡里司，后任建康油库吏。他随萧映到广州，任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太守。侯景之乱发生后，他起兵沿赣江而下，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与萧绎大将王僧辩会合，结盟讨景。王僧辩的荆州军缺粮，陈霸先以米 30 万石接济他，荆州军因此大振。平定侯景后，梁元帝以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以王僧辩为太尉，镇石头。王、陈两家过从甚密，并作了儿女亲家。

---

① 《南史》卷 80，《侯景传》。

江陵陷落，梁元帝被杀后，绍泰元年（555）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之子萧方智为梁王。这时，北齐派兵南犯，并送回早先寒山战败被俘的萧渊明，要立他为梁朝皇帝。王僧辩屈服于北齐，迎萧渊明入建康，即帝位；立萧方智为太子。陈霸先坚决反对，说："武帝子孙甚多，只有元帝能复仇雪耻，其子何罪，而突然废之；我和你都处于托孤的地位，现在你忽然改变主意，外依北齐戎狄，迎立萧渊明，这是想干什么呢?"于是发兵攻杀了王僧辩，废萧渊明，重新拥立萧方智，是为敬帝。陈霸先这一行动使梁避免成为北齐的附庸，深得江南人民的拥护。



陈霸先

王僧辩死后，他的党羽任约等起兵讨陈霸先，北齐也出兵南下，两方势力联合起来进攻建康。江南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坚决支持陈霸先。陈霸先军粮食不足，江南人民用荷叶裹饭，里面夹鸭肉，慰劳军队。陈霸先平定任约等，大败北齐军，以功为丞相、录尚书事，太平二年（557）十月，经过一番禅让，当了皇帝，建立了陈朝。陈霸先即陈武帝。

陈王朝与宋、齐、梁王朝不同，以前做皇帝都是北方人，陈霸先是南方吴兴人。他所用的人如徐陵、周弘正、江总也都是南方人。

永定三年（559），陈霸先做皇帝不到3年就死了。他为政宽简，非军旅急需，不轻易向人民征发。他生活也很俭朴，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常膳不过数菜。他建立的陈王朝，使遭到大破坏的南朝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陈霸先是南朝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陈霸先死后，其侄陈蒨（？—566）即位，即陈文帝。他在位七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再行土断；平定地方割据势力，如盘踞湘州、郢州的王琳，江西的熊昙朗、周迪，福建的陈宝应，浙江的留异、程灵洗等。侯景之乱以后，江南地方豪族势力兴起。这些豪族往往在离建康、三吴较远的地区，筑坞自保，与中央政权相对

立。陈霸先因要对付北齐，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妥协政策。陈文帝平定了这些地方势力，使江南总算得到了统一。

陈文帝儿子陈伯宗软弱无能。文帝死前对其弟陈顼说："吾欲遵太伯之事。"意思是把皇位让给他。陈顼再三推辞，表示一定像周公旦一样，尽力辅佐伯宗。天康元年（566）陈文帝死，当时受遗诏辅政的除陈顼外，还有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刘师知早就看出陈顼有野心，与尚书左丞王暹等人商量，想把陈顼逐出中央。于是让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前往宰相府，宣称传达皇帝指令，对陈顼说："现在天下太平，大王不必留在宫内，可以返回东府，处理京畿公务。"他说的京畿即指扬州。

陈顼打算出宫，中记室毛喜急忙对他说："殷不佞传达的并非皇太后之意，你该奏报，澄清真伪。一旦出宫，定如当年曹爽一样被人控制。"于是，陈顼一面宣称有病，一面派毛喜入宫面见皇太后，皇太后说："伯崇年幼，重任需委任二郎，免除二郎职务，非我主意。"毛喜报告陈顼，陈顼立即逮捕刘师知，进宫晋见太后、皇帝，指控刘师知罪状，当夜就逼刘自杀。王暹也同时被杀，到仲举贬为金紫光禄大夫，从此，政权全归陈顼。

光大二年（568）十一月，陈顼用皇太后的名义下诏说："文帝原知儿子不堪承担重任，曾决定传位与弟，现应实现文帝心愿，另选贤君。"

569年正月，陈顼登极称帝，改年号太建，他就是陈宣帝。陈宣帝在位14年，是陈朝在位较久的一个皇帝。陈文帝在位时，国家初步安定，但战争创伤还未恢复，淮南土地入于北齐。陈宣帝派大将吴明彻北伐，在寿阳取得胜利，活捉王琳，收复淮南，使陈的国力有所增强。

太建十四年（582），陈宣帝死，陈朝宫廷内又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斗争。

陈宣帝共有42个儿子，除长子陈叔宝（553—604）立为太子，是法定的皇权继承人外，其他有实力的要算二子陈叔陵和四子陈叔坚了。

陈宣帝晚年多病，叔陵和叔坚常来探望，装出很孝顺的样子，

心中却各自打算怎样夺取帝位。陈宣帝去世第三天，遗体入殓，太子叔宝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叔陵见机会来到，突然抽刀向叔宝后颈砍过去，叔宝挨了一刀，昏死过去。叔宝乳娘吴氏从后面紧紧拉住叔陵的胳膊，叔陵无法再举刀。叔宝苏醒过来就向外逃，叔坚见状，冲上前去夺去叔陵手中的刀，反剪其双手，用自己的长袖将其双手缚在柱上。不料叔陵挣脱双手，逃出宫去。

叔陵逃到东府城，命人赦免囚犯充当战士，聚集士兵约千人，想据城自守。

叔陵自知末日来临，就把妃张氏和宠妾七人杀死投入井内，自己率数百士兵想逃奔北方投隋，半路遭到萧摩诃士兵阻击，叔陵的部下纷纷脱下盔甲四处逃散，叔陵逃走不及，被萧摩诃的士兵杀死。陈叔宝（553—604）登上帝位，即陈后主。

陈后主是有名的荒淫无道的君主。他喜爱女色，后宫有张贵妃、孔贵嫔、龚贵嫔等人。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姿色超群。发长7尺，其光可鉴，聪明伶俐，又善奉迎，对陈叔宝百般献媚，深受宠爱。陈叔宝不视朝政。所有百官奏折，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奏请。叔宝坐在细软的“隐囊”中，把张丽华抱在膝上，共同决定可否。李、蔡记不起的事，张贵妃都能一一回答，由此擅权，援引宗戚，横行不法。

南朝统治集团日益沉溺腐败。费用不足，就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不问士庶都开关市之征，赋税繁重，比过去多数十倍。这时北方隋已代周，开皇八年（588），隋发兵51万，大举伐陈，次年，灭了陈王朝。南北重归统一。

第五章　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南朝的农业

东晋南朝是我国南方社会经济得到开发的重要时期。江南的开发，从春秋战国以来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西汉时期这里还比较荒凉，在司马迁的笔下，这里是"地广人稀"，"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 由于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展，贫富悬殊的情况尚不多见。

在东晋南朝时期，劳动人民将荒凉贫困的江南改造成为繁荣富饶的地区。这主要原因，一是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较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有的地区南迁的侨民还超过了土著人口。如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共有人口 42 万，其中 22 万为南迁人口；二是少数民族出山。山越、蛮、僚、俚等人民从山区大量进入平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三是南方战乱比较少。南朝和北朝的战争大多集中在长江以北，只有梁末侯景之乱给南方造成了破坏；四是一些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生产的政策，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如东晋王导、谢安实行"镇之以静"的与民休息政策，宋初的刘裕父子统治时期的"元嘉之治"等等。

---

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南方经济的发展，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的兴修、荒地的开辟等。



南朝 陶牛车

南方在西汉时还处于火耕水耨阶段。《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前115）九月诏书中说："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用火烧去地面上草木，然后放水漫灌，把草木烂在水里，作为肥料，不需犁耕，甚至不需锄耙，撒了种子，秋天后就来收。经过东汉三国以来的开发，到南朝时，南方农业已经实行精耕细作。牛耕的推广，不但使耕田的速度加快，而且能深耕，使地力得到充分利用，产量也大为提高。北方的区种法也传到了南方；区种法是西汉氾胜之推行的一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耕作方法，集中用肥，产量较高。晋时有个郭文，在三吴地区"区种菽麦"，达到了"食有余谷"①。水稻栽培技术也有了提高，出现了一年三熟。麦的种植得到了推广。此外，还有胡麻、大豆、小豆、粟等许多农作物品种。粪肥也开始使用，刘裕功臣到彦之早先即以挑粪为业。

南方雨水多、河流多，劳动人民十分注意兴修水利。

南方的水利工程主要有：

---

① 《晋书》卷94，《郭文传》。

时 代	名 称	地 点	灌溉面积
西晋	练塘	曲阿（今江苏丹阳）西北	100多平方里
西晋	吴塘	今丹阳金坛	周围40里
东晋	新丰塘	曲阿（今江苏丹阳）	8万多亩
东晋	荻塘	乌程（今浙江吴兴）	10万亩
东晋	汉时旧堰	句章（今浙江慈溪西）	2万多亩
宋	六门堰	今河南邓县西	数十万亩
宋末	吴兴塘	乌程（今浙江吴兴）	20万亩
齐	赤山塘	今江苏句容西南	
梁	苍陵堰	今安徽寿县西	10万多亩
宋齐梁	芍陂	今安徽寿县南	100万亩

除了以上较大的水利工程外，各庄园中也修筑了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所谓“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①。这些水利工程，能扩大灌溉面积，防止水旱灾害，使农作物得到更好地生长。

土地的开垦。一是开发山区。往往在两山之间的开阔地首先得到开垦，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称为山垄田。如会稽、永嘉、临海、东阳等郡都有这类山地。二是围湖造田，称为圩田。在湖泊沼泽的低洼之地，周围筑起长堤，把水引向河渠，使湖泊沼泽干涸，然后开辟种上庄稼。这种田遍布于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流域以及会稽一带。湖田有腐烂的有机物，十分肥沃，又便于灌溉，特别适宜于种植水稻。谢灵运在会稽的回踵湖、始宁的�湖，都有湖田。

由于垦地面积的扩大，这时期增设了许多地方机构建制。扬州的会稽，由汉时的一郡扩大为东晋时会稽、吴、吴兴等七郡。荆州的长沙，也从一郡增加为四郡。

正是由于南北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江南地区改变了落后面貌。南方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有：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以寿春为中心的淮海地区；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交广地区；闽江流域等等。《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论》中对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

---

① 《宋书》卷91，《徐耕传》。

状况有一段描述：

>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一岁或稔（庄稼成熟），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田地）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hù）杜（长安附近户县等地）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这段话主要描写了长江下游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郡丰收，使周围数郡的粮食得到供应；粮食产量的提高，从而土地价格也提高；不仅粮食发展，鱼盐、丝棉的生产也有很大发展。总之，江南经济的发展，已从过去寥若星辰的“点”，扩展为遍地开花的“面”。从而使长期落后的江南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区。



宁波西晋古墓出土青瓷双系罐

二、二万斛大船

——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

东晋南朝时期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原来南方就有较好的基础，东汉末北方又有大量手工业工人南下，因为东晋南朝南方手工业更加发展。代表性部门有冶炼、纺织、制瓷、造纸、造船等行业。

冶炼业：早在春秋时南方已经发展了冶铁。三国以后冶炼业无论官营或私营都很发达。东晋南朝冶铁业主要由政府官营。江南有名的冶铸作坊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冶塘冶（今湖北武昌东

南）和中央设置的东西二冶，规模都很大，产量也高。南北朝时冶铁技术的新成就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这种炼钢方法就是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冶炼，效率高、品质好、成本低、工艺简便。

纺织业：纺织业的发展表现为：（1）用麻织成的布品种增加和质量提高。品种上有越布、香葛、细葛、南布等。其中高级织品极为精巧，以至刘裕因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由于技术改进，到南朝末年出现了晚上浣纱而第二天早晨就织成了布，叫“鸡鸣布”。（2）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刘裕灭后秦，曾把关中锦工迁往江南，成立锦署，此后南方高级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如丝织品罗縠要花一个月织成，制成幔后，内外相观，飘飘然如烟雾。南方还培养出优良桑种，豫章、永嘉、闽中等地，出现了一年四熟、五熟、八熟的蚕。

制瓷业：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早在商代，已有原始瓷器。汉朝已开始盛行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的低温色釉，釉色大体上有黄、绿、褐三种，其中尤以绿釉最为突出。当时带有光泽青釉的瓷器，称为青瓷。青瓷是中国瓷的鼻祖。东晋南朝是青瓷发展的成熟阶段，青瓷烧造成为专业。当时的瓷业以越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越窑的主要产地在浙江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原为古代越人的居地，这里是我国最先形成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这里烧的青瓷使用的原料土黏度高，质地细，耐火力强，含有铁质，釉色灰青，透明而润泽，洁莹如玉，在当时已能够大量生产，为南朝上流社会广泛使用。近年来江苏、浙江六朝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宜兴西晋大将周处墓出土物中青瓷类达 42 件之多。其中神兽尊工艺复杂，是青瓷中的精品；熏炉极为精巧，表现了高超的烧制技术。还有仿生活用品的青瓷杵臼、米筛、畚箕、水桶、猪圈等出土，说明青瓷用途已在生活中十分普及。它已逐渐代替漆、木、竹、陶、金属制品，显示出胜过其他材料的优越性质。

造船业：南方水道纵横，舟船成为重要交通工具。中国造船业有悠久的历史。1974 年在广州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大，

技术先进，有三个造船台。三国孙吴曾派万人船队到夷洲（台湾）和辽东半岛。东晋南朝造船业更有新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番禺（今广州市）都是造船业中心。湘州也是制造大船的据点之一。《荆州土地记》："湘州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万斛"。东晋末年，桓玄曾率船舰200艘与刘毅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长江中）。卢循、徐道覆北伐，有八槽舰9艘，皆四层，高10余丈。东晋末建康一次风灾，据说损失的船只达1万艘。梁时大船的载重量已达2万斛（约合今100吨）。有人认为，南齐时有个慧深和尚到达了美洲，这美洲就是《梁书·东夷列传》中的扶桑国。如果这一说确实，那么中国人到美洲要比哥伦布早1000年。

造纸业：造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汉代发明造纸术后，经过500多年，到南朝造纸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在产量、质量、加工等方面都有新的提高。在原料方面，90%仍为麻，此外，又发展到桑皮、藤皮、稻草、麦秸。南方的"藤角纸"是上品，质地优良，常用作文书。藤是野生植物，角是量词，古公文一封为一角，一张纸亦称一角，故叫"藤角纸"。在品种上，除白纸外，还能制造青、赤、绿、桃花等色纸。白纸比汉纸更平滑、细薄、洁白。南梁萧绎《咏纸》诗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纸的产量也有很大提高。梁简文帝萧纲做太子时，把四色纸3万张送人。大书法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一次赠送谢安纸9万张。东晋南朝纸已不再是贵重难得之物。东晋末桓玄曾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①]。南朝时，纸已完全代替了竹简和绢帛，这对学术文化、科学乃至书法艺术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建康（今南京市）是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江南第一大都会，台城居中，东为东府城，西为石头城。"市廛列肆，埒（liè）于二京（长安、洛阳）"。梁时有户28万，约100多万人口。城里有4

---

① 《太平御览·文部》。

个市。这里是长江南北上下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现南京玄武湖南岸尚留有100多米都城遗址。此外，南京的周围尚留有陵墓石刻31处，其中帝王陵13处，陵前有石兽、石碑、神道石柱。石兽一般称为麒麟、天禄（天鹿）或辟邪，这是雕琢精湛的艺术珍品。京口（今镇江）是建康门户，既是商业都会，也是军事要塞。山阴（今浙江绍兴）为会稽郡的治所，也是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大都会，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两浙绢米多在此交易。寿春（今属安徽）是淮河流域重镇，在淮、泗、汝、颍诸水交错的区域。是南北贸易中心。襄阳（今湖北襄樊）是淮河流域另一重镇，人物荟萃，是南北物资交换枢纽。江陵是荆州首府，“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①]，是长江中游政治、军事中心，也是货物集散和转输之地。成都是益州首府，永嘉之乱，四川未受直接波及，其后李氏据蜀，又采取保境安民政策，故这里未失去固有的繁荣。番禺（今广州市）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②]。说明当时贪得无厌的官吏都把广州看作肥缺。此外，还有广陵（今扬州）、吴（今苏州）、毗陵（今常州）、义兴（今宜兴）、成都等都是商业发达的城市。



东晋“大夏马”

在东晋南朝，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商的也很多。“人竞商贩，不为田业”[③]。交易的大宗是粮食、布帛、鱼、盐、纸等日用生活品；其次是明珠、翠羽等奢侈品。商税是政府的重要收入。除商人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市税外，还有交易时的估税：凡买卖奴

① 《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
②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③ 《隋书》卷24，《食货志》。

婢、牛马、田宅等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这叫“输估”。凡无文券的小买卖，也值百抽四，叫“散估”。此外，在水陆交通要道上有关津，过往货物要收1/10的关津税。

随着商品交换的活跃，货币需要量也在增加。宋元嘉七年（430）立钱署铸钱。以后齐、梁、陈也陆续增铸。但由于货币低劣，民间交易往往是货币与谷帛并行。

总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江南地方已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经过这个阶段，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其标志就是隋朝为了使南方财富流入北方，开凿了南北大运河。唐代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十分之九）”[①]。可见，唐代的赋税主要出自江南。从此，南北经济联为一体，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进入了更繁荣的时期。

三、从《山居赋》看士族田庄

——南朝大土地所有制

> 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chéng，田间土埂）埒（liè，等同）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杏坛、㮈园、桔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

这是谢灵运的《山居赋》中的一段。这里田埂纵横交错，渠中流水潺潺；水田中有大片绿油油的水稻，湖中盛产各种鱼禽和水生植物；南北二座山岭上果树成林，有杏、㮈、桔、栗、梨、枣、

① 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枇杷、梅、柿、桃、李等多种果木。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南朝时期士族田庄的一个概貌。

《山居赋》还讲到，庄园中畜养鸡鸭、酿酒作醋，缫丝织布，种桑植麻，还有药圃、作坊。总之，凡是生产上生活上用得着的东西，田庄里应有尽有。谢灵运自称“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这样，田庄主人就可以“谢工商与衡牧”了。庄园是一个实行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无所不包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是谢玄的孙子。宋初出为永嘉太守，不久辞官，隐居会稽。他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家。他的诗笔法细腻，观察入微，词藻富丽，对后世影响很大。谢灵运祖上曾在今余姚附近建立庄园，谢灵运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后，“修营别业（即庄园），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①]《山居赋》正是根据会稽始宁的山墅而作的。

东晋南朝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墅”、“田墅”、“别墅”、“园”、“园宅”、“园舍”、“舍宅”、“宅”等等。在现今苏南地区常有带墅的地名，当是东晋南朝的遗留。这时的庄园除了自然经济以外，还有两个特点：

一是土地比较分散。庄园往往跨州越县，幅员数十里乃至二三百里。如谢琨的土地分布于会稽、琅琊、吴兴三郡。士族地主往往居住在一处构有精舍的墅、宅或园里，偶尔去巡视其他庄园的情况。在广大庄园里让“典计”一类的监工管理生产。

二是占领山林湖泊。北方大族南下后，南方的土地比较紧张，于是大族就竞相占领山林川泽。士族往往通过凿山浚湖，把一些荒山野岭开辟为庄园。南齐时的贵族竟陵王萧子良在宣城（今属安徽）、临城（今安徽青阳）、定陵三县立“屯”，封占山林达数百里。

---

①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屯”是庄园主开发山林的组织。庄园主招集逃亡农民和贫苦农民在山上划定地界，砍伐竹木，造作器物，种植果园等。然后建立起囤积物资的场所“邸”。这样，农民就不能再在山上砍柴、打猎了。

中国古代的山林川泽，一向归国家所有。秦汉时山泽属于皇室总务官少府管理。汉初禁令放宽，盐铁商人因此致富，但并没有允许他们占领山泽。东晋咸康二年（336）发布“壬辰诏书”，禁止封山占水，违者以“强盗律论”，然并无效果。晋末刘裕当国，义熙九年（413）实行土断，重申禁止豪强占据山湖川泽。457年实行“占山法”。这个“占山法”是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私家占有山泽的合法性，反映了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说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已从平地扩展到山林川泽。从此，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对劳动人民来说，也失去了在山林中打柴，在湖中捕鱼的自由，只有投靠世家大族，成为他们的依附劳动者。

士族庄园中直接劳动者有佃客、部曲、吏、奴婢等。

佃客是从破产自耕农或流民转变而来的。他们对主人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主人的私属。其户口在主人名下，没有独立户籍，只有经过自赎或政府“放免”，才能离开庄园。他们耕种地主土地，一般交纳一半左右的实物地租，同时要为主人服各种劳役。

部曲即家兵。部和曲本来是汉代军队中两级编制的名称。魏晋以后，一些佃客既要种田，又要作战，就称为部曲。部曲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了佃客，还有兵士，也有从奴婢转化来的。部曲和佃客一样，对主人有极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必须对主人“效忠”。他们父死子继，世代承袭。

吏本是官府、军府中耕种官田、禄田和从事各种杂役或手工业作坊中劳动的人员，身份是世袭的。后来，国家把吏赏赐给贵族官僚，于是就成了地主门下依附劳动者。

奴婢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的人身完全为主人所占有，被当作主人的“私产”。奴婢除担负家内杂役外，还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当时谚语为“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奴婢的全部劳动为主

人支配，主人对他们有打骂甚至处死之权。

庄园中的管事、工头称为“典计”。他们掌管土地、文簿，监督佃客、奴婢进行生产，是地主大族的代理人。

还有一类叫义故，又称义归、义附、义从、门义的人。他们与主人有乡里故旧关系，被召募服役。这也是一种依附人户，略同于部曲。他们有的充随从，有的当武士。他们的身份地位并不一样，有的较低，有的则是帮闲和打手。

东晋南朝的士族庄园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自给自作的经济单位。这种庄园渊源于东汉。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就反映出庄园的情景。三国时，孙吴的豪族地主“田池布千里”，庄园经济继续发展。东晋南朝庄园有进一步发展。庄园虽然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基础上的，但它在组织生产、开发南方经济上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四、“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门阀士族的衰落

两晋南北朝盛行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际形成，东晋达到鼎盛，东晋末开始衰落，南朝以后士族地位继续下降。

门阀士族衰落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给了门阀大族以沉重的打击，梁末侯景之乱中，许多门阀士族在战乱中死亡。二是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促使寒门势力的兴起。三是门阀士族自身越来越腐朽。门阀士族凭借他们的高贵出身，就可以独享优越的政治地位，而不必有真才实学，这就必然造成他们腐朽无能。

南朝的门阀士族不学无术，对社会实际完全无知，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有巨大的经济收入，而当时社会条件又不能扩大再生产；商品中的奢侈品又主要以他们为对象，这就必然造成他

们生活上追求奢侈和享乐。

首先，门阀士族非常重视修订家谱、族谱，即把祖先的世系源流，上代都做过哪些大官，明确记载下来，这是他们高贵身份的凭据。有了谱牒，可防假冒。宋齐以后政府专门设立谱局，找一些精通家谱、族谱的人任职。谱牒学一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称为“谱学”①。

其次，门阀士族严格选择通婚对象。南北朝评定门第的标准是婚与宦。在封建社会，通婚联姻是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士族总是在士族圈子中通婚，以防士庶混淆。



男宾观看童舞（魏晋画像砖）

再次，士族要严格区别官职中清浊。区别门第标准中的“宦”，不仅是指其祖先和本人官职的高低。而且更重要的是官职的清、浊，特别是出身官的清、浊。九品中正制中一条界线是上品和下品，官职上的分别则是清官和浊官。所谓清官就是“职闲廪重”即待遇好、事情少的官位，这是专为门阀士族保留的职位，如士族入门的阶梯秘书郎、著作郎②，以及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宰辅中的文职等等。高门子弟，向来只当清官，不当浊官。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士族子弟只要到坐在车上掉不下来的年龄，就可当著作郎，只要会写几句“身体如何”的客套话，就可当秘书郎。有的浊官虽然品级

① 谱学包括家谱（或族谱）和统谱，前者是一家一族的历史，后者是综括各地各世家大族的家谱。统谱始于西晋挚虞作的《族姓昭穆记》。

② 秘书郎和著作郎是秘书省的属官。秘书省是管理皇帝图书和写作文史的机构。

比清官高，士族也决不愿当，因为这要失去他们的士族身份。士族把清官当作自己的禁脔，决不让庶族寒门插进来。

最后，士族在生活方式上也处处强调士庶的区别。不仅车服异制，甚至不能同坐交往。宋士族张敷为正员中书郎，庶族出身的中书舍人秋当、周纠与他是同僚，二人商量去拜访一次。周纠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两人决定去看张敷。进了张家，两人正要入座，张敷见了，忙呼左右说："快把我的座移开。"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纠感到很窘，只得退出。宋孝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有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王故意奚落他，问道："过去我家里有个养马的仆役路庆之，是你家的什么人?"后又叫左右把路琼之坐过的床烧掉。后来路琼之把这件事告诉孝武帝，孝武帝说："琼之年少不懂事，没有事何必到王家去，自讨没趣。"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庶族势力渐渐发展起来，士族地位已经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正是"旧时王谢堂上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士族高门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五、"寒人掌机要"
——寒门庶族的兴起

南朝门阀士族衰落的过程，也就是寒人兴起的过程。

寒人，又称寒族、寒门、寒士，庶族、素族，都是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份、特权的一部分。南朝寒人的兴起是有其经济原因的。这时由于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自耕农中也有一部分人上升为新的地主，再加上原来的地方豪强，所有这些人就构成了寒人地主的主要成分。

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出身寒门的。刘裕"起自布衣"，他的孙

子刘骏称他为“田舍公”。萧道成临死前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梁武帝与萧道成同出兰陵萧氏。陈霸先“其本甚微”。这些皇帝都需要加强皇权。但是皇帝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那么多日常政务，就要有人帮助办理。世家大族都鄙薄实际事务，也根本没有能力办理，于是皇帝就委任给寒人地主。寒人地位低，便于使唤，“皆可鞭仗肃督”；又做官心切，竭力卖命干事。所以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皇权与寒门相结合，来巩固统治。

南朝寒人的兴起参与政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寒人担任中书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掌握机要。东汉以来，尚书台权重。魏晋南北朝，尚书台是行政执行机关，而比它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专管机密，成为实际的宰相。到南朝宋孝武帝时，中书监令的大权又旁落到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手中。中书舍人本是中书省下属官吏，地位并不高，晋时位居九品，但由于它能递入奏文，出宣诏命，参与决策，因而权力越来越大，成为重要职务。宋文帝初年，寒人出身的秋当、周纠为中书通事舍人，并管要务，地位开始重要。孝武帝时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手里。

二是寒人掌握军事。北府兵一直为世家大族掌握，孙恩起义杀了谢琰后，北府兵大权落到寒人手中。刘裕就是从北府兵出身而后飞黄腾达的。南朝的一些将帅功臣，大多出自寒人。如宋之檀道济、到彦之、沈庆之；齐之陈显达、崔慧景；梁之吕僧珍、冯道根；陈之侯安都、吴明彻等都是。

南朝建康城中有一支不小的禁卫军，由制局监控制，权力相当大。在谋杀前废帝的宫廷政变中，制监朱幼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制局监往往由寒人掌握，齐吕文度控制制局监，掌握殿内及外镇的发兵权，权势极重；本来掌管禁卫军的领军将军成了虚位。

边镇是武力集中之处，由于世家大族都不愿去，梁陈时，在外边做镇守、领大军的都是寒人，如陈伯之、邓元超等。

三是用寒人为“典签”，监督地方军权。宋、齐都普遍设立“典签”，监督出任各镇的宗室和各州刺史。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类似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孝武帝后，这个职务突然重要起来，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实际上成为君主控制诸王的工具，“威行州部，权重蕃君”①。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了一部《二十二史札记》，他从南朝政治历史中，得出了两条：“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齐制典签之权太重”。这两条反映出南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变化。虽然南朝寒人兴起，但是门阀士族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士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则是到了唐宋以后。

六、蛮、僚、俚等少数族
——南朝的民族关系

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南方各少数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及其与汉族不断融合的过程。

南朝境内各少数族有蛮、僚、俚、巴、蜀、越、溪等，而以蛮、僚、俚为主。这三族人口共约有300万左右，蛮有百万以上，僚有百万左右，俚有数十万。

蛮族原来住在今湖南湖北境，西晋瓦解以后，蛮族乘机向长江以北迁移，洛阳以南的山谷都成了他们的聚居区。在南朝蛮族遍及荆、湘、雍、郢、司、豫、南豫、江等州。他们的种落繁多，言语不一，分为两大支：一支是“廪（lǐn）君蛮”之后，分布在长江以北至淮河、汝水一带；另一支是“盘瓠（hù）蛮”之后，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湖南一带。蛮人与汉人融合较深，但仍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风俗。他们以农业为主，穿布衣，赤足，头上是形状像椎

① 《南史》卷44，《巴陵王子伦》。

的发髻，或者剪发。勇敢善射，兵器以金银装饰。蛮民部落已逐渐解体，大多以户为单位。刘宋政府规定，蛮民每户输谷数斛，没有其他杂调。当时汉族人民赋役繁重，贫民不堪负担，多逃入蛮人居住地区。蛮族首领不纳官税，多拥有大批部曲。这些部曲既生产又作战。

南朝统治者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士兵，往往对蛮族进行讨伐，掠夺财物，俘虏“生口”。如沈庆之前后伐蛮 18 年，共俘虏蛮人“生口”20 余万，这些蛮人被移到京师，充当营户。营户即兵户，世代为兵，终身服役，除打仗外，还要为封建统治者戍守、种田（政府公田）。沈约在评论刘宋王朝征讨蛮人时说：“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①

南朝政府对蛮族的征服和掠夺，激起了他们不断反抗。这种反抗从不服役不纳贡赋，直到武装起义。南朝蛮人的起义，共达四五十次。

南朝和北朝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江北蛮族地区的统治权，都要竭力拉拢蛮族首领，封以官爵；对于不顺从者，则用武力征讨。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斗争始终不断。

“僚”是南北朝时期才见诸于记载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地区是益州和梁州西北部，即今四川和陕西南部。僚人无名字，生下儿女都按长幼次序称呼。丈夫叫“阿謈（mù）”、“阿段”，妻子叫“阿夷”、“阿等”。他们的住房是干栏式的，即房屋建立在木桩上，以防水和野兽。僚人以农业为主，善于捕鱼，能在水底用刀刺鱼。手工业方面能织鲜洁的细布。人死后以竖棺埋葬。其俗怕鬼神，尚祭祀。买卖奴隶之风很盛，大狗一头，可买一生口。僚人散居在山谷，无氏族的区别，也无统一的政权，往往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僚族尚处于奴隶制阶段。

---

① 《宋书》卷 97，《夷蛮传》。

梁武帝时，在梁、益二州，“岁岁伐獠”，“公私颇藉为利”[①]。

俚族，汉前称“里”，百越的一支。是我国黎族先民之一，主要聚居在岭南的广州、越州，即今广东和湖南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他们主要住在山区，其居处为干栏式，贵铜鼓，常与刘宋政府为敌。梁陈两代，统治者常征讨俚人。肖劢为广州刺史，讨伐俚人所获生口宝物，除作军赏外，都向朝廷贡献。梁武帝感慨地说：“朝廷便是更有（重新有）广州”。

南朝政府对少数族的统治方式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把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编入州郡县，由地方政权直接统辖，少数族人向政府交纳赋税。第二，设置“左郡”、“左县”集中治理归降的少数族，既保持着少数民族聚居和文化习俗特点，又逐步使它变为郡县编户齐民。左郡县官吏有的用汉人，有的委派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宋时有左郡 11 个，左县 25 个，齐末有左郡 51 个，左县 145 个。第三，“以夷制夷”，封少数族首领为王、侯、将军、刺史、太守等，以统治少数族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南朝各少数族人民与汉族人不断融合。蛮、僚、俚等少数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在南朝 160 多年的历史中，蛮、僚、俚等少数族已逐渐与汉族融合了，这是历史的进步现象。

七、“交聘”与“互市”

——南北朝之间的和平交往

在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中，战争是主要的，但也有和平时期。这种和平时期出现了政治上的“交聘”和经济上的互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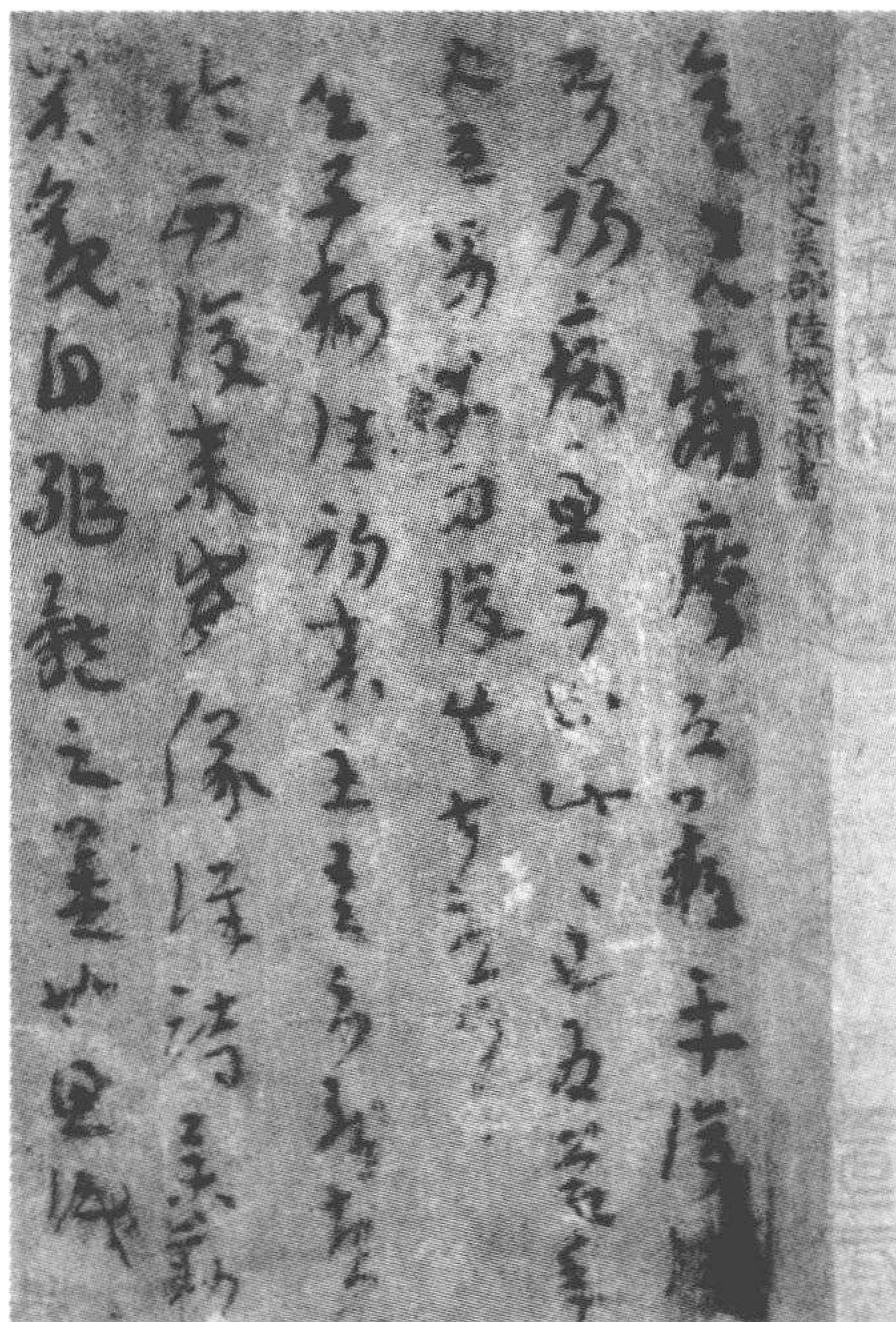
“交聘”即南北双方互相派遣使臣。据粗略统计，南北朝时期

---

① 《魏书》卷 101，《獠传》。

南朝派遣使臣 94 次，北朝派遣使臣 73 次。比较集中的是在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2）、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陈文帝和陈宣帝时期（560—582）。

派遣使臣的目的是求得和平友好和边界上的安定，但也是彼此夸耀自己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一个机会。这是和平时期的一种外交斗争。正因为如此，双方都很重视使臣的人选，必须选择出身高门、有才学、有风度、有口才的人出使，如南齐的裴昭明、北魏的游明根、李彪等，都是有学问才识的人选。负责接待使臣的官员叫主客令或典客令，也很重人选。北魏的李安世任主客令，是因为他出身高门大族赵郡李氏，而且“美容貌，善举止”[①]。南齐的王融虽然年仅 25 岁，但因为有才辩，也被任命为主客。



西晋陆机《平复帖》

由于使臣都是有名望的人物，所以接待的一方也十分重视。使臣入境，往往在边境就受到东道国官吏的迎接。如果双方中断往来很久又重新通好，客使到京则受到倾城的欢迎。齐梁时，南北中断较久，梁使臣到北齐首都邺城，“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②]。北齐使臣到梁也是如此。

客使到后，东道国的国君往往亲自接见谈话。齐永明二年（484）冬，北魏李道固等聘齐，当时齐武帝正在玄武湖

① 《魏书》卷 53，《李安世传》。
② 《北史》卷 43，《李谐传》。

观看水军演习，便在龙舟上接见了他们。南齐的使者至北魏，魏孝文帝也亲自接见，并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

永明八年（490），北魏文明太后死了。第二年，南齐派散骑常侍裴昭明到洛阳吊丧。裴昭明想穿着朝服去见孝文帝，魏主客说："吊有常礼，怎么能穿朝服来吊丧！"裴昭明说："受命本朝，不敢轻易更换。"双方争执了许久，裴昭明坚持不换。后北魏派著作郎成淹与他辩论，双方引经据典，最后裴昭明被成淹说服，脱下了朝服。北魏统治者认为这是一次胜利。成淹因有功升为侍郎，受到100匹绢的赏赐。

不久，北魏李彪回访南齐。齐派刘绘设宴奏乐接待。李彪谢绝奏乐。说："冯太后新死，皇上悲伤，不敢听乐。"李绘说："魏主这样有孝心，为何不循古礼，行三年之丧？"李彪答："皇帝日理万机，不能久离。"刘绘说："百官都听从宰相，皇帝暂离有何关系？"李彪答："五帝时，臣不如君，三王时，君臣智等，春秋五霸时，君不如臣。我朝皇帝和五帝一样圣明，宰相怎么能代替他呢？"这样就批驳了百官要听于宰相的旧说，而且抬高了魏主的地位。李彪回国时，齐武帝亲自送到琅玡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送别。李彪前后六次出使南齐，齐人十分夸奖他的才能。

吟诗唱和也成为双方才智的竞赛。陈名臣傅縡有一次出使北齐。北齐以薛道衡为主客郎负责接待。傅縡赠诗50韵，薛道衡和之，大家都称赞和得好。如果和得不好，就会有伤国誉。

南北使者出使一般都带着"国书"和礼品。礼品都是双方的特产，南方有驯象、孔雀、甘蔗、柑橘、锦、名酒等。北方有名马、骆驼、貂裘、毛毡等。使者在邻国还参加礼仪、考察、讲经等活动。

南北"交聘"，缓和了双方的对立，对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北经济上的交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朝廷主持的"互市"，一是走私。

在南北分立时期，为了防止敌方的间谍活动，边境上盘查很严；南北往来孔道主要在淮上，故禁止南北往来的办法称为“淮禁”。虽然如此，南北政府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仍在进行。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大战以后，第二年，北魏向宋王朝提出互市的请求，朝廷让大臣们讨论。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建平王刘宏、何尚之、何偃赞同；柳元景、王玄谟、颜峻、谢庄、檀和之等反对。颜峻认为“虏虽说互市，实为窥测动情，答应了他们，必生边患。”但是互市是有实际经济利益的，最后实力派江夏王义恭终于战胜书生们的空论，朝廷同意了互市。

南北商业交通的线路主要有以下几条：（1）从邺到广陵；（2）从洛阳到寿春；（3）从洛阳到江陵；（4）从汉中到巴郡。这也是流民移动和北军南下路线。互市的商品，北方需要的是甘蔗、橘柚以及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南方则急需马匹、骆驼、皮裘等。南北互派使臣，除了求婚纳聘、吊丧等事情外，有时便是为了“互市”。“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①。有时还不免弄虚作假。太和七年（483）南齐使者刘缵到北魏首都洛阳，北魏故意把宫廷里的金玉珠宝投放市场，价格很低，刘缵看到了，说：“北方金玉便宜，想必是本地所出”。接待的主客令李安世回答：“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皇上圣明，无论哪条河都出金，哪座山都出玉”。刘缵本来想多买些金玉，听了李安世话，十分惭愧。

除了政府派遣的官吏进行互市外，也有委任所在地方官就近经理互市。北魏文成帝时，崔宽为陕城镇将，把弘农出产的漆、蜡、竹、木运到南境交易，发了大财。魏宣武帝时，袁翻指出，边界的将领，“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贩贸往还，相望道路”②。

官府的贸易关系建立之后，民间商贾亦必跟踪而至。梁时，郁

---

① 《北齐书》卷30，《崔暹传》。

② 《魏书》卷69，《袁翻传》。

州（江苏连云港市）地接边境，“民俗多与魏人交市”[1]。

除了互市之外，边境上还有频繁的走私。有的是商人进行，也有地方官进行，这种走私活动往往带来很大利益。

南北通好带来的结果是积极的，这是南北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

---

① 《梁书》卷16，《张稷传》。

第六章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

一、嘎仙洞的历史遗迹

——鲜卑拓跋部的早期历史

当刘裕在南方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北方五胡十六国也已接近尾声。这场长期纷争中的最后胜利者是鲜卑族拓跋部。拓跋部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439年统一了北方。北魏王朝存在长达一个半世纪（386—534），对我国古代历史起过重要作用；是中国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族建立的重要朝代。

拓跋部的祖先原先在大鲜卑山射猎游牧，“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①。

甘露三年（258），力微在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建立了统治中心。

北魏建立后，拓跋贵族依靠着“人相传授”的口碑史料，约略知道自己的祖先发源于大鲜卑山，但是大鲜卑山究竟在何处呢？

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乌洛侯部向北魏朝贡，“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②。北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李敞完成使命，于石室壁上刻上祝辞而归。在《魏书·礼志》中虽然留下

① 《魏书》卷1，《序纪》。
② 《魏书》卷100，《乌洛侯国传》。

了祝辞全文，但对石室地理位置却无详细记录，只笼统地说“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因此，随着北魏灭亡与年代变迁，石室所在的大鲜卑山，又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疑难史案。千百年来，许多史学家考证了石室和大鲜卑山的地理方位，但始终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



北朝 陶马俑

1980年7月30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的同志终于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发现了鲜卑远祖旧墟石室。

石室遗址，坐落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鄂伦春人称之为嘎仙洞。这个洞在林海苍茫、山峦重叠、高达百米的花岗岩峭壁上。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朝南偏西，离地面25米左右。人们站在峭壁脚下，仰望洞口，会感到一种神秘威严的力量。爬上峭壁，进入洞内，却豁然开朗。主洞南北长92米，东西宽27米左右，穹高20多米，总面积约2千多平方米，俨然一个宏伟大厅。洞内可容千人。大厅中央，放着一块不规则的天然石板，3米见方，类似石桌。在离洞口15米的西侧洞壁上，刻有201字的祭文，这就是拓跋焘派李敞来此祭祖时刻下的。汉字魏书，古朴苍劲，风格与其他北魏早期石刻相仿。刊文处显然经过再修琢与磨平，过去被苔藓覆盖，未易被人发现。祝辞共19行，通高70厘米，宽120厘米，基本上与《魏书·礼志》相同，而略有差异。洞中灰土层堆积达1.3米，包括打制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文化层，出土有陶片、骨镞，石镞等遗物，证明这里是拓跋先世居住了很久的遗址，那时仍过着狩猎为生的生活①。这样鲜

---

① 参阅纪游《一个千古求索的重要史迹》，《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鲜卑石室为呼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同志发现。

卑族拓跋部祖先发源地大鲜卑山的确实地理位置终于找到了。

从力微经猗卢（？—316）到什翼犍（318—376），拓跋部经历了14个首领，这是拓跋部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拓跋部中交换也发展起来了。汉族商人长期往来于拓跋部与汉人之间，拓跋部用牲畜交换汉人的金帛缯絮。另一方面，从力微以后，拓跋部不断发动对邻近部落的战争，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牲畜和生口，加速了奴隶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

什翼犍继位（338）后，国家机构更加完备。他设左右近侍，宣传诏命，为国君的心腹；又设内侍长4人，备顾问，参与政务。汉人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许多官号多同于晋朝。法律方面制定了"犯大逆"、"男女不以礼交"、"盗官物"、"盗私物"等罪。犯大逆男女老少皆斩，盗私物一赔十。军队也在扩充，"控弦百万，号令若一。"[①] 部落酋长已成了军事长官。

但是，这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很快被前秦征服了。公元376年，在前秦苻坚进攻下，什翼犍逃到阴山之北，拓跋部发生内乱；什翼犍被儿子寔君所杀。拓跋部所建立的"代"国瓦解了。前秦把它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归独孤部刘库仁统率，黄河以西归铁弗部刘卫辰统率。

二、北魏前期的杰出人物——拓跋珪

——北魏王朝的建立

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什翼犍长孙拓跋珪（371—409）被诸部大人推为主，于是在386年正月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

① 《魏书》卷24，《燕凤传》。

大会诸部，拓跋珪即代王位，称登国元年。不久，迁居盛乐，重建代国，后又改国号为魏。这是北魏的开始。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向四周各部落如高车、柔然、库莫奚、独孤部等不断发动战争，获得大量马牛羊和生口，扩占了领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塞外的强国。

当时，中原地区存在着强大的后燕。后燕主慕容垂感到拓跋珪的强大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在公元395年派太子慕容宝率8万大军向拓跋珪进攻。拓跋珪自知力量不足以对抗，就率领部落畜产渡过黄河西徙，同时，派兵在燕军后路截执燕使者，使慕容宝不知其父的消息。当时慕容垂年老有病，拓跋珪又命燕使者在河边大叫："你父已死，赶快回去吧！"慕容宝几个月得不到消息，忧恐异常，军心动摇。这时，已是隆冬十月，塞外严寒，燕军兵疲马困，慕容宝决定撤兵。由于黄河还未结冰，慕容宝以为北魏骑兵不能渡河，没有设警戒，可是11月的一个夜里，突然狂风大起，一夜之间河上结起了冰。拓跋珪引兵渡过了河，选精骑二万余急追，追至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燕军宿营地。这时燕军还不知道。次日清晨，太阳刚出，魏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对燕营发动突然袭击，燕军仓猝应战，顿时大乱，争相渡河逃跑，人马互相践踏，压死、溺死数万。拓跋珪又在前面设下埋伏，燕军四五万人无路可走，都当了俘虏。慕容宝单骑逃亡。拓跋珪把四五万燕军全部坑杀。这次战役消灭了后燕的主力，是拓跋珪进据中原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第二年，慕容垂决心报仇，率领燕国仅有的部队进攻北魏。慕容垂在平城10日，病重，只好退兵。死于途中。

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即位，这一年，拓跋珪也称帝，改元皇始元年（396）。拓跋珪率领大军40万，向中原进军，夺取了后燕幽州、并州等地，第二年（397）又夺取了后燕的最后三城：中山（今河北定县）、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信都（今河北冀县），灭了后燕。拓跋珪进据中原，占有了山西、河北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为结束十六国以来北方长期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北部奠定了基础。

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

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北魏王朝影响深远。

在经济上，拓跋珪促使拓跋部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在拓跋珪以前，拓跋部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他们不断地迁徙，就证明了这一点。什翼犍曾对苻坚说："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①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开始重视农业。登国元年（386），在都城盛乐附近，"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命东平公元仪在河北五原到稒阳塞一带（今内蒙古北套一带）屯田，"分农稼，大得人心"②，这是大规模务农的开端。次年，后燕军到五原，收谷物百余万斛，说明屯田成绩不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攻下邺城以后，把后燕境内的汉族、徒何族等共10余万口迁到代北，这些人因为是"新附之民"，故称为"新民"。拓跋珪对新民实行"计口授田"，在新民四周设置八部帅统率的拓跋部士兵进行监督，以收成多少决定其劝课农桑的成绩。

大量新民迁入代京地区，加速了拓跋部向农业封建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拓跋珪又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③。使原来游牧的拓跋部和其他少数族离散部落，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组织；使入居中原的拓跋族和其他各游牧族迅速走上农业化和封建化的道路。

在政治上，拓跋珪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封建政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拓跋珪占领中原广大地区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接受封建制度。在进军中原过程中，对于前来军门投靠的汉族士大夫，无论老少，都亲自接见，量才录用。张衮、崔玄伯是他的得力谋士，邓渊、李先、贾闰、崔逞、晁崇等都成为重要的文臣。

---

①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② 《魏书》卷15，《元仪传》。

③ 《北史》卷80，《贺讷传》。

天兴元年（398），在平定后燕后，拓跋珪正式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平城建宫室、宗庙。在天文殿上，拓跋珪穿着皇帝服饰，接受百官朝拜，群臣皆呼“万岁”。

与此同时，拓跋珪命邓渊制定官爵、董谧制定朝拜、祭祀仪式，王德制定法律，晁崇主管考察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为总负责。北魏的官制一方面继承魏晋以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组成中央政府核心，另一方面也沿用鲜卑官制，如设八部大人，内侍官。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北魏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逐步完备。

拓跋珪还加强了思想统治。他接受和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加生员达3 000人；又祭先师先圣孔子。他对儒家宣扬的天命论和封建道德说教十分推崇，在天兴三年（400）的诏书中说：“汉高祖由平民做皇帝，这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妄图非分，就会遭到刀锯之诛。”又说：“今人都以台辅为荣贵，企图慕而求之。但是，应该懂得，道义是本，名爵是末。昧利的人，结果总是身败名裂。”



北魏壁画·降魔变

拓跋珪也重视利用佛教来维护其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在进攻后燕的过程中，所经郡国佛寺，见到和尚，皆致以敬礼，禁止军兵对佛寺的侵犯。皇始年间（396—397），他又诏赵郡沙门法果到平城，任道人统，专管僧徒。法果对拓跋珪也极力奉承。他说拓跋珪是“当今如来”。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建立者。他16岁即位，在位24年，是一位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杰出人物，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最后，永兴元年（409）拓跋珪被其儿子拓跋绍所杀。

三、宗主督护制下的北方社会

——北魏前期的阶级结构

北魏自拓跋珪以后，社会经济形态虽然主要是封建制，但也存在着大量奴隶制残余。北魏前期的阶级结构大体如下：

一是大地主、大牧主、寺院地主　北魏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是最大的地主。皇帝圈占的苑囿山泽很多，并经常以田地赐给功臣贵族。这些拓跋贵族因而成为大地主和大牧主。

寺院地主占有土地也不少。北魏初年，昙摩蜜多在敦煌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①]。北魏后期佛寺地产更有很大发展。这些土地有的是皇帝、贵族赏赐；有的是捐赐、投献；有的是兼并得来。北魏后期，在洛阳“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②]。

二是自耕农和自由牧民　在中原地区，始终存在着自耕农。文成帝诏书中说：“编户之家，困于冻馁”[③]，指的就是自耕农经济。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后，这些少数族人也变成有一部分土地的自耕农。

自耕农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由于天灾人祸及各种原因，他们不断地在分化。除了个别人上升为富户外，大部分人会沦落为受人剥削的依附户或奴隶。

北魏前期征收租调的办法叫“九品混通”。即把本地户口按贫富分为九品，再把租赋按品级分摊；品级高的户摊得多，品级低的户摊得少。国家规定的平均定额很高，是每户帛2匹、絮2斤，丝1斤，粟20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1匹2丈。但大地主往往凭借势力降低自己的户等，把沉重的租调转嫁给自耕农，造成了

---

① 《高僧传》卷3，《昙摩蜜多传》。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5，《高宗纪》。

自耕农的破产。

平城附近的拓跋族人民即“畿内民”，开始时“分土定居”都成为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但不久也贫富分化。太延五年（439）太武帝西征凉州时，由太子拓跋晃主持朝廷工作。他下令“畿内民”有牛家与无牛家互相换工：有牛家为无牛家用牛耕田22亩，无牛家以人力偿还耘锄功7亩。对于老幼贫弱之家，用牛助耕7亩，偿还锄功2亩。说明拓跋族部民已经分化。

个体牧民即在自己牧地上放牧的自由牧民。拓跋嗣规定他们羊满百口要输纳马1匹。

三是各种依附户　北魏统治者把战俘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充作封建国家的依附户，让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役。这些人统称为杂户或隶户。分别地说，在国有土地上屯田的叫屯户或屯田户；在国有牧场上放牧的是牧户；国家控制的手工业户叫伎作户，其中官府的机织工匠又有各种名称，如绫罗户、细茧户、罗縠户等等。此外，还有太常寺的乐户、屠户，并州的盐户，汉中的金户等。在军镇世代当兵服役的称为军户、营户、府户。北魏前期的战俘也有被赏赐给贵族将领做“杂户”或“隶户”的。

杂户或隶户的身份大体低于自耕农，高于奴隶。他们世代相袭，不能改业、迁徙，不能与庶民通婚，不能读书做官。

国家依附户中还有一类叫新民。他们有一点土地和私有经济，是属于国家的依附农。

中原汉族大地主控制的劳动者统称为荫户、隐户，也称“苞荫户”、“堡户”。他们过去可能是自耕农，为了避役，投靠宗主作佃客，对主人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也要服各种劳役。虽然没有官役，但“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剥削也是比较重的。北魏大地主荫附的人口是很多的。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租调收入，一再检括隐户。献文帝时，韩均一次就在青、冀等五州检括出10余万户。大地主又驱使佃客当兵，这种既生产又作战的佃客即是部曲。

---

① 《魏书》卷110，《食货志》。

北魏寺院中有一种叫僧祇户，他们是寺院的依附农民。每年向僧曹交纳60斛的定额地租，称僧祇粟。僧祇粟原来用来赈济僧俗饥民，后来变成寺院的高利贷资本。

四是奴隶　北魏社会中奴隶的数量相当多，奴隶劳动很普遍。奴隶大多数是由战俘转化而来。拓跋族统治者在对各族的征服战争中，掠夺到许多生口，赏赐给将领贵族，这些生口就成为将领贵族的奴隶。奴婢并非单纯家庭服役，也从事生产劳动。拓跋珪、拓跋嗣时皇宫里上千的奴婢织绫绵、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酤酒。当时谚语说："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①

北魏寺院中还有一种佛图户，由重罪犯及官奴充当，为寺院种田、扫洒庭院，这是寺院的奴隶。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魏前期社会阶级结构是比较复杂的；社会性质已是封建制，但还带有奴隶制残余。社会上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是尖锐的。

四、崔浩"国史"事件

——鲜卑贵族与汉士族的矛盾

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后，拓跋绍又为其兄拓跋嗣所杀。不久，拓跋嗣（392—423）即位，即明元帝。在明元帝统治下，北魏力量进一步增长。

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代的强盛，与北方汉士族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汉士族中的代表是崔玄伯、崔浩父子。

崔浩（？—450）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

崔浩在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博览经史，懂天文阴阳历法。拓跋珪时，为著作郎，拓跋嗣时，拜博士祭酒。拓跋嗣好阴阳术数，

---

①《魏书》卷65，《邢峦传》。

常命崔浩占卜。崔浩参与军国大谋。朝廷的礼仪制度和诏书等文多出自其手。神瑞二年（415）平城饥荒，许多大臣主张迁都于邺。崔浩反对。说："中原人民，总以为拓跋族人居广漠之地，民畜无数，号称牛毛之众。如果现在一部分人南迁，恐怕不满诸州之地，再加水土不服，就会让中原人民看出破绽；北方柔然也会乘虚进攻，这样就会声实俱损。现在居北方，中原有变，轻骑南出，百姓不知多少，就望尘震服。"拓跋嗣听从了这个建议，没有迁都，果然渡过了难关。始光三年（426），谋攻大夏，许多大臣反对，只有崔浩支持，拓跋焘听从崔浩，果然击溃大夏赫连昌，大获而还。神䴥二年（429）谋出击柔然，保太后、尚书令刘洁等许多人反对，崔浩赞成出击，后果然又获大胜，俘得牲口数百万。不仅打击了柔然的势力，而且大大增强了北魏国力。事后拓跋焘指着崔浩对高车渠帅说："你们不要看他身体纤弱，手不能弯弓，他胸中所藏比甲兵厉害多了。我能够打胜仗，都是靠他出谋划策。"又下令诸尚书："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先请示崔浩，然后施行。"以后在伐北凉问题上，弘农王奚斤等30多人都反对，只有崔浩怂恿拓跋焘进军，结果又平定了凉州。崔浩参与了北魏许多重大政治军事决策，对于巩固和加强北魏政权，促进北方统一，发展北魏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因此，他官至侍中、司徒，为北朝汉士族中位至三公的第一人。

但是，这样一个对北魏政权起过重大作用的三朝元老却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被太武帝杀掉了。

崔浩为什么被杀呢？据说是因为写北朝历史暴露了北魏祖先的丑事。北魏早在拓跋珪时，就命邓渊修史，称为《国纪》，但太简略，只有年月起居，不成体例。神䴥二年（429）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与其弟崔览继续修国书，成30卷，为编年体。太延五年（439）平北凉后，又命崔浩继续修史，由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协助。史书修好后，崔浩把它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观看，以示"直书"。对北魏祖先一些丑事，如苻秦灭代，什翼犍逃到阴

山，被其子寔君所害等都直言不讳。这样叙述北魏祖先国破家亡的耻辱，自然触怒了鲜卑贵族。他们纷纷向拓跋焘告发，拓跋焘很气愤，就兴起了这一场文字狱。

但是仅仅写史被杀，恐怕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同样参加修史的高允，并没有因此遭祸。再说，他的亲戚也并未参加修史。看来，“国史”事件只不过是导火线。

那么，崔浩究竟为何被杀呢？

据南朝的史书《宋书》记载，说是拓跋焘元嘉二十七年（450）南侵时，崔浩图谋反叛北魏，“密有异图……谋泄被诛”[①]。这也并不可靠。因为崔浩虽然具有汉民族意识，但他对鲜卑统治者出谋划策，是忠心耿耿的。再说，当时这些世家大族，他们的阶级意识高于民族意识。刘裕出身寒门，是崔浩这些高门大族所看不起的。如果确因反叛被诛，北魏史书无需为之隐讳。南朝人的这种讲法，实际上不过是虚张声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崔浩与其主要政敌拓跋焘之子恭宗拓跋晃有矛盾。晃信佛，浩奉道。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引起儒学的反对，崔浩联合大族出身的道士寇谦之反佛，佛教徒与鲜卑贵族就联合害他。这种讲法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也不是主要原因。

崔浩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鲜卑贵族与汉士族的矛盾。鲜卑贵族与汉士族之间的关系是又联合又矛盾，虽然总的趋势是以联合为主，但也始终存在着矛盾，有些时候矛盾也很尖锐。这种矛盾，除了民族的偏见、文化的差异外，在经济上，主要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在政治上，是权力上的冲突。汉士族希望分享更多的权力，而鲜卑贵族则害怕他们权力过大于己不利，要限制、压抑他们。

以长孙嵩为代表的鲜卑贵族与以崔浩为代表的汉士族的矛盾在发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感到必须限制一下汉士族，于是就以“国史”为借口，发动了这场北魏一代的大狱。

---

① 《宋书》卷77，《柳元景传》。

五、冯太后与北魏改革

——孝文帝改革之一

崔浩事件发生后二年，正平二年（452）拓跋焘死。他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君主；南征北战，亲冒矢石，统一了北方，可称赫赫武功，但国内消耗也很大。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440—465）即位。这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开始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役。拓跋焘时曾发动一次废佛运动；这时佛教又恢复了。文成帝在位14年，和平六年（465）病死。

文成帝的皇后冯氏（442—490），因死后谥为文明太皇太后，又称文明太后，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女政治家。从文成帝死后，她实际掌握政权达20年，对北魏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始建于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

天安二年（467），献文帝生子拓跋宏（467—499），即后来的孝文帝。二年后立为太子。北魏制度，子被立为太子，生母即赐死。所以，这一年孝文帝生母李夫人即依旧制赐死。拓跋宏改由冯太后抚养。这时，她不再临朝称制，让献文帝当政。

献文帝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虽然年轻，但勤于政事，刚毅果断。他与冯太后在权力上是有矛盾的。献文帝并非冯太后所生，其母是李贵人。这种矛盾越来越发展。凡冯太后信任的人，他多厌恶疏远。凡冯太后不喜欢的人，他却常加以重用。但是献文帝毕竟斗不过冯太后，皇兴五年（471），孝文帝刚满4周岁，在冯太后压力下，献文帝被迫禅位于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5年后，终于被冯太后鸩死。献文帝死后，冯太后重新临朝称制，被尊为太皇太后。这次便不再还政，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她病死。长达20年之久。

北魏前期社会阶级矛盾很尖锐。据统计，道武帝24年中有起义8次，明元帝15年中有起义14次，太武帝29年中有起义15次，文成帝14年中有起义7次，献文帝6年中有起义5次，孝文帝29年中有起义34次。这些起义中最大的一次是太平真君六年（445）爆发的关中卢水胡人盖吴起义。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达10余万。迫使太武帝御驾亲征，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盖吴牺牲时才29岁，是个农民起义英雄。除了阶级矛盾外，鲜卑贵族内部有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民族矛盾，特别是鲜卑族与汉族人民的矛盾也很尖锐。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北魏统治，冯太后和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颁行俸禄和实行均田制。

北魏前期中央和地方官吏没有俸禄，因而许多官吏靠搜括和剥削、经商自肥。他们往往是"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1]。个别清廉的官吏则"妻子衣食不给"[2]、"使诸子樵采自给"[3]。吏治的败坏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引起人民不断反抗，也使国家赋税收入不足。太和八年（484），北魏正式颁行俸禄制度。官吏按季受禄；以后贪赃绢一匹处以死刑。这规定执行得是比较认真的。献文帝舅舅李洪之，当时任秦益二州刺史，因贪污被送至平城。孝文帝集合群官，当面斥责，然后命他在家自尽。实行均田制后，又规定按官位高低授给俸田，多者15顷，少者6顷，不许买卖，离职时交给下任官吏。俸禄制的实行，使官场风气有所好转，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其他各项改革的推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除了颁禄以外，冯太后还实行过其他一些改革。如延兴四年（474）下诏"罢门房之诛"。即除了谋反、大逆等罪外，只处罚罪犯本人，不连及家族。太和七年（483）下诏"禁止同姓相婚"，这是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的先声。

冯太后对孝文帝影响很大。一方面，冯太后的改革为孝文帝亲

---

① 《魏书》卷33，《公孙轨传》。

② 《魏书》卷33，《张蒲传》。

③ 《魏书》卷48，《高允传》。

政后的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孝文帝从小受到冯太后的汉化教育。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是严格的，曾作《劝诫歌》300余章、《皇诰》18篇教育孝文帝，内容都是儒家知书达理的一套。这些汉化教育成为以后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思想基础。冯太后在孝文帝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孝文帝在位时即为冯太后造陵，历时九年（481—490）。现冯太后的永固陵在山西大同市西北寺儿梁山（古称方山）南部。结构坚实，墓前有大量建筑遗址。为南北朝最大墓葬之一。1976年发掘清理，有石俑、铁矛等遗物。

六、均田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孝文帝改革之二

北魏前期承十六国大乱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出现了一些无主荒地，因而使国家有可能实行计口受田。在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稳定后，过去出外逃难的人重返旧居，由于年代久远，庐井荒废，土地所有权混乱，有人就冒认土地。特别是一些强宗豪强，依靠其势力，“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说土地是他们的，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土地兼并和争夺。“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①，一部分土地由于争讼不决，无法耕种。土地问题给国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由于豪强大族广占劳动人口，或土地荒废，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劳动力脱离土地，浮游在外，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北魏前期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其深刻的根源是土地问题的严重。

这时，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提出了建议。他说：“现在虽然井田

① 《魏书》卷53，《李安世传》。

制难以恢复，但也应该略为平均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相适应。这样，穷百姓有了谋生之路，豪强大族也不会因土地多而荒废。”这个建议为孝文帝所采纳。他考虑到曹魏曾实行过屯田制、西晋曾实行过占田制，都是使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又北魏初年实行过计口受田；在他即位之初，太和元年（477）也实行过每个男劳动力分田40亩的办法，所以就在太和九年（485）下诏实行均田制。诏书中说：“朕在位已有十五年，我历观古代帝王，都是让百姓有了土地，才安居乐业。近世以来，情况不同了，豪强兼并土地，老百姓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造成田地荒废，百姓穷困。有人为争夺土地而死，有人因饥馑而亡。这怎么能使天下太平呢？当今，我要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郡牧守一起均给天下土地。还受以生死为断。使百姓都能很好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均田令。均田令虽然是孝文帝颁布的，但当时文明太后尚掌大权，所以均田制实际上是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共同制定和推行的。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露田。露田即无主荒地。丁男15岁以上授给露田40亩，妇女20亩。因为要休耕，露田要加倍或两倍授给，叫倍田。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70岁时就归还政府。

第二，关于桑田、麻田。丁男每人授给桑田20亩，规定在3年内要种桑树50株，枣树5株，榆树3株。桑田作为世业田，不交还给国家。凡是原来私有土地超过桑田授田数的，不再授给，多余部分也不还给国家；凡不足的，可按制度授足。桑田可以买卖，但有限制，即超过20亩的可以出卖，不足20亩的可以买进。桑田计算在倍田的数额中，超过倍田的部分，仍为桑田，不能算作露田。不宜种桑的地方，丁男每人授给麻田10亩，丁女5亩。麻田要交还国家。

第三，关于奴婢、耕牛受田。奴婢受田的办法与普通农民一样，人数不限。耕牛每头受露田30亩，限4牛。

第四，关于宅田。新定居者，每3口给宅田1亩。奴婢5口给

宅田1亩。

第五，关于宽乡、狭乡的授田。土地不足的狭乡允许向土地宽裕的宽乡迁移，但不许借此逃避赋役。宽乡的人不能随便迁移。

第六，关于收回土地。人死绝户或犯罪流徙他处，土地收归国家，重新分配。

第七，关于俸禄田。地方官吏给公田作为俸禄。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6顷。不准买卖。离任时交给下任官吏。

均田制颁布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冯太后和孝文帝接受李冲的建议，推行三长制。在三长制以前，北魏的地方基层组织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宗主”多为大地主30家、50家为一户，被荫附的人虽然没有官役，但“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三长制规定5家立1邻长，5邻立1里长，5里立1党长。这是汉族传统的乡亭闾里组织的重建。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推行均田制、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是和均田制相辅而行的。

与均田制、三长制同时，北魏改变了过去“九品混通”的赋税办法，实行了新的租调制。旧制定额高，平均每户帛2匹、絮2斤、丝1斤、粟20石。新制规定：一夫一妇交帛1匹、粟2石；年15以上未娶妻者4人、或奴婢8口，或牛20头，都交这一份额。所交帛中，10匹中5匹为公调，2匹为调外运输费，3匹为百官俸。

均田制、三长制、新的租调制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这是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着重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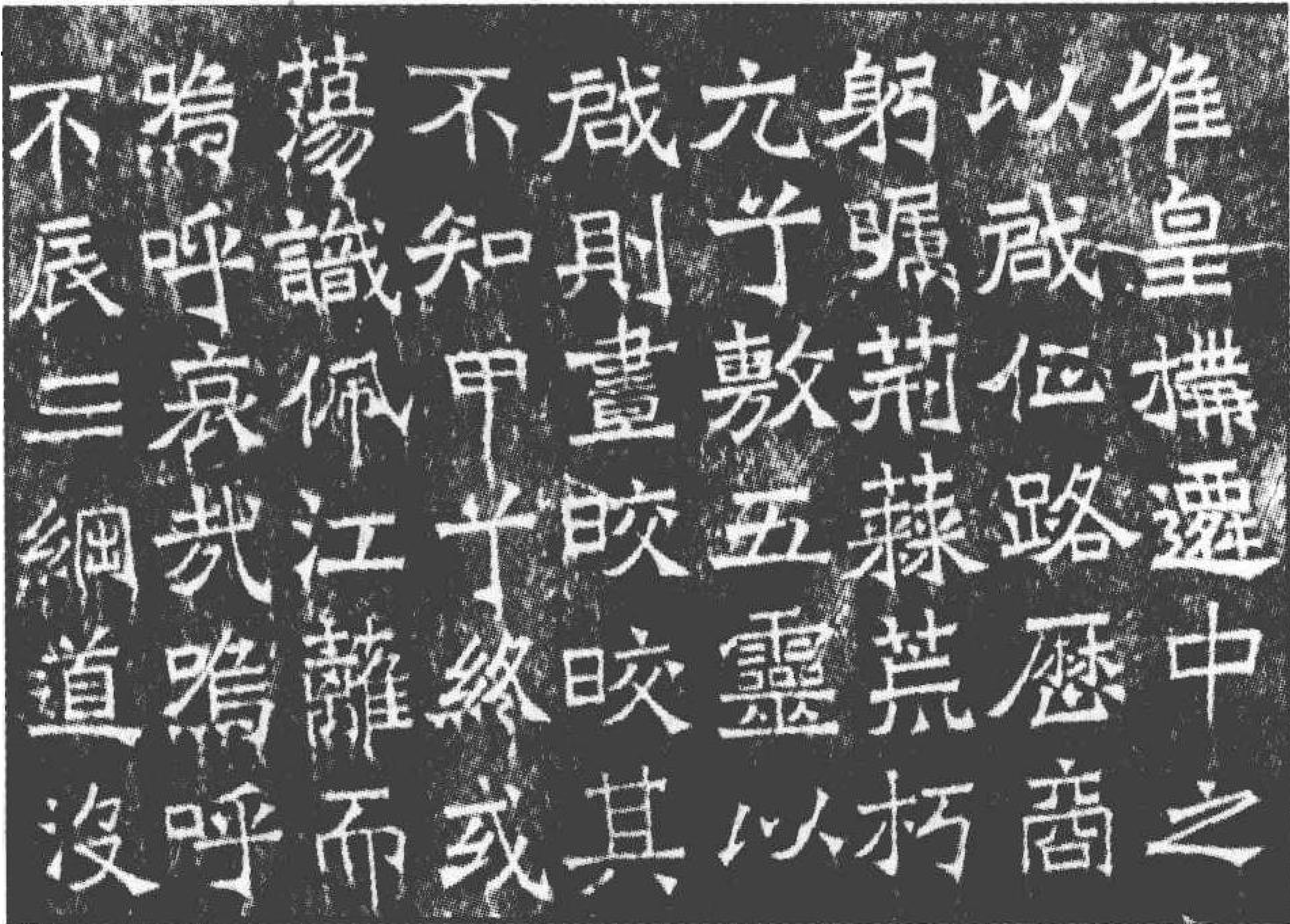
首先，它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土地不致荒废，使流民、依附农有一定土地，处境有所改善，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由于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① 《魏书》卷110，《食货志》。

其次，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争取了大量劳动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从而抑制了豪强大族势力，增加了国家赋役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

再次，均田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的比重增加了，鲜卑族人和其他各少数族人都成为均田户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劳动，增加了互相了解，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孝文帝吊比干碑文

实行均田制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一是人口增加。西晋太康元年（280），全国合计 1 600 余万口，到北魏正光（520—524）年间，全国约有 3 000 余万，增加了一倍。具体来看，从公元 464—549 年这 80 余年中，以下几个县人口皆有增长①：

县　名	鲁郡六县	东阳平郡五县	渤海郡三县	济南郡六县	北济阴郡三县	颍川郡三县
增长百分比	167.20	160.54	112.65	180.28	557.11	800.31

二是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种类比过去大为增多。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都有多种工具。十六国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水碾、水硙、水碓也恢复起来。农业技术也有提高。人们特别重视精耕细作，做好保墒工作。此外，积肥、施肥、选种、育种、掌

① 周一良：《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4 期。

握气候、区分土壤的方法，都受到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集中反映在北魏末年出现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上。

三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自孝文帝放松对伎作户的控制，允许手工工人流入民间，民间的手工业有很大发展，绢布产量大为增加，府库绢帛很多。“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① 孝明帝时，胡太后曾让公卿百官进库取绢，谁背得动多少就赏赐多少。尚书令李崇、章武王无融皆因背得过重，跌倒受伤，被人嗤笑。只有侍中崔光只取两匹，受到称赞。

由于经济发展，商品交换也日趋活跃。孝文帝以前，货币几乎废弃，交换都用绢帛。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铸造太和五铢钱。以后的皇帝也多铸钱，由此货币流通起来，使商业有很大的发展。洛阳是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城内出现许多大市。邺和长安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国外方面，与朝鲜、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国家，都有商业往来。

中国历史上的均田制，从北魏开始推行，影响深远，不仅北齐、北周、隋、唐都继续实行均田制，而且影响到日本、朝鲜。

七、迁都洛阳与汉化政策

——孝文帝改革之三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死，24岁的孝文帝亲自掌握了朝政大权。为了进一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现他统一中国的理想，孝文帝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以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

在实行汉化改革前，孝文帝把都城迁到了洛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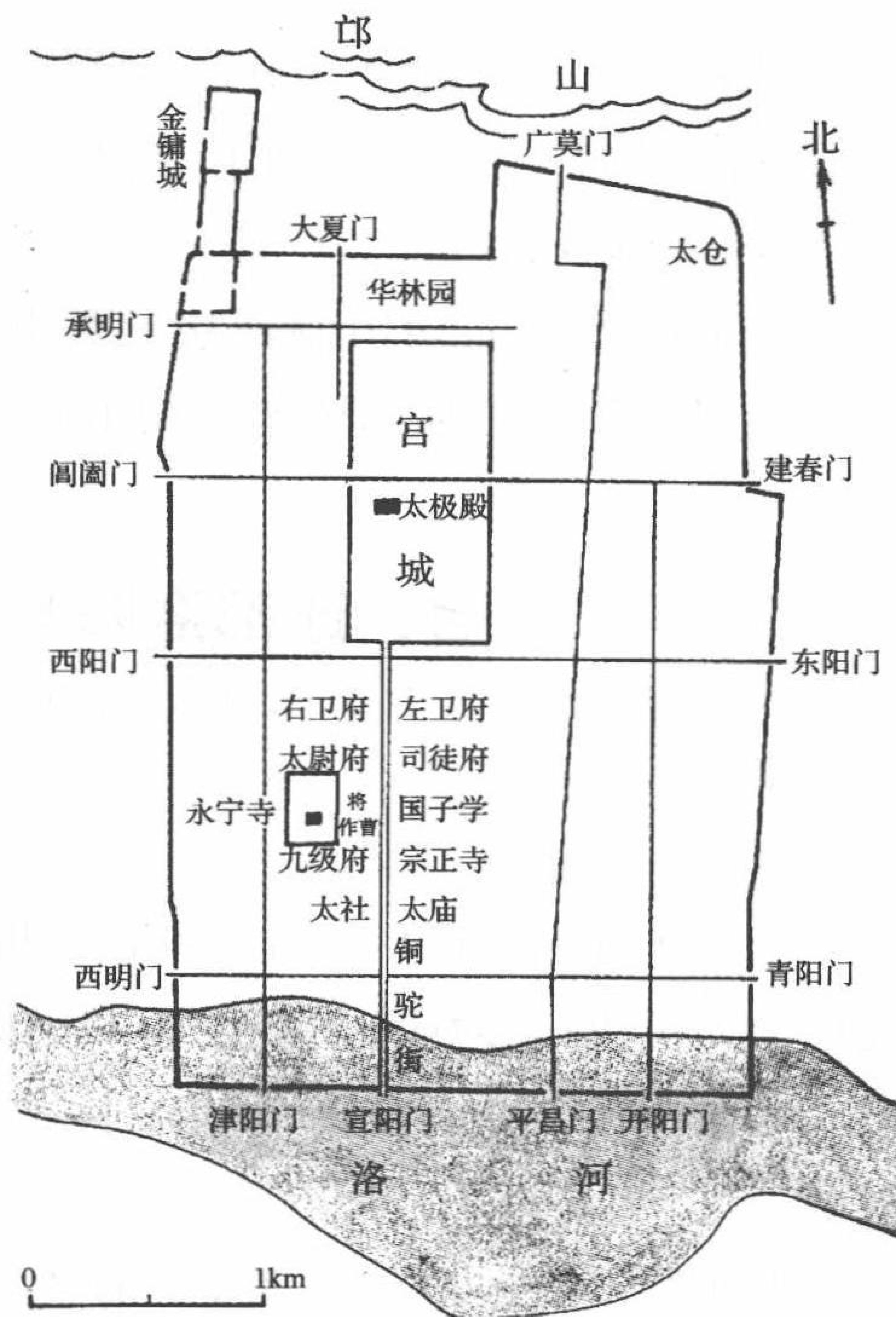
北魏前期的都城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当时它在抵御、进击

---

① 《洛阳伽蓝记》卷4。

柔然、高车，进据中原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到孝文帝时代，在这里作为都城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了。从政治上说，它不是全国中心地区，不便于统治中原广大地区；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中原人民起义，它显得鞭长莫及。从经济上说，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无漕运之路，经常发生灾荒。有一首诗描写平城的情况，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① 说明平城的荒凉。从军事上说，北魏统一北方后，北方柔然、高车等威胁已不严重，北魏的战略方针是向南方发展，要进攻南方，要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这里作为都城也不合适。此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孝文帝要放开手脚实行汉化政策，也必须离开平城这个鲜卑贵族守旧派集中的地方。

但是，迁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会触动在平城有田地财产的鲜卑贵族的切身利益，必然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孝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为迁都费了一番心计。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在朝廷宣布要南伐萧齐。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不知孝文帝意图，出来反对，孝文帝大怒，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我大计吗?"退朝后，孝文帝向元澄交了底，说："刚才我发火，是怕你阻碍我的

① 《魏书》卷82，《祖莹传》。

大事。我实话对你说吧，平城从来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十分困难。现在全国不统一，我想迁都洛阳后，进攻南朝，统一中国，你看如何?”元澄恍然大悟，表示积极支持。

这一年秋天，孝文帝亲率步兵、骑兵30万南征。队伍到了洛阳，正碰上连绵不断的秋雨。长途跋涉的鲜卑贵族和士兵困乏不堪，都不愿再前进，跪在孝文帝马前，请求停止南伐。孝文帝乘机对大家说：“这件事在朝堂上早已决定。现在兴师动众。动而无成，何以示后。如果你们不愿南伐，就迁都洛阳。欲迁都左，不欲迁者右。”鲜卑贵族大臣们虽不愿迁都，但怕南伐，相继站到了左边。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孝文帝派元澄回平城对鲜卑贵族做些说服工作，又命卫尉卿于烈留守平城，命尚书李冲负责洛阳都城的营建工作，自己则到邺城暂住。太和十八年（494），他又亲自回到平城，对群臣做说服工作。孝文帝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平城在恒山之北，不宜做帝王之都。我们祖先也常迁都，什翼犍营建盛乐，拓跋珪迁都平城。我们迁都也无不可。”又说：“我迁都洛阳，是为了让子孙渐渐学会汉人美俗，见识广博，如果永居住在代北，就会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这样，到下一年（495）平城的文武百官和六宫后妃都迁到了洛阳。为了缓和鲜卑贵族的情绪，孝文帝允许他们一些人冬天居洛阳，夏天回到平城。

迁都以后，孝文帝着手改革鲜卑旧风俗，从各方面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太和十九年（495），在太子恂行冠礼的仪式后，孝文帝引见大臣，问道：“你们认为变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答曰：“愿圣政日新。”再问：“你们想圣政的好处仅本身享受，还是要传之后代?”答曰：“愿传之百世。”孝文帝说：“既然这样，我们必须实行改革，你等不得违背。”

接着，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

第一，改服装。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鲜卑人皆穿夹领短衣窄袖，这是适应骑射的游牧生活，现在改穿汉人褒衣博带服装。在朝

廷上，官吏的服装也仿照南朝的官服。有一次，孝文帝回到洛阳，见街上鲜卑妇女还穿着旧服饰，就责问元澄和公卿大臣。元澄说："穿旧服的鲜卑人是少数。"孝文帝说："真可怪呀！难道要都穿胡服吗?"

第二，改语言。太和十九年（495）下诏，不得在朝廷上讲鲜卑语。30岁以上的习性已久，不易改变，讲鲜卑语不算犯禁。30岁以下要降爵黜官。

第三，改籍贯。迁都后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葬于洛阳北邙山。

第四，改姓氏。改鲜卑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鲜卑的复音姓氏为单音汉姓。如皇族拓跋改为元。因为鲜卑人以"土"为"拓"，土是万物之元，因而改"元"。又如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等等。《魏书·官氏志》中记载了100多个胡姓改为汉姓。

第五，胡汉通婚。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五个皇弟把前娶的王妃降为姬妾，另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女大约也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

第六，改官制。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大定官品。二年后制定成文的规定《职员令》二十一卷。太和十九年（495）正式公布宣示品令。当时南朝王肃投降到北朝来，帮助孝文帝改革官制。所以新的官制大多与汉魏南朝官制相似。北魏的官制重门下省官，多以门下省的侍中辅政。中书省的中书监令，出纳王言，也很重要，尚书省不过是听命受事而已。

第七，建立门阀制度。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下诏制定门阀制度。鲜卑族除帝室元氏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最高，汉族也有四姓。这是最高等级，不授卑官。姓以下称族。不入姓族的就被排斥在门阀之外。孝文帝制定门阀制度依据的是先世官爵和当代官爵，而以当代官爵为主。门阀制度贯彻了

"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①] 的原则，使鲜卑贵族和汉族统治者进一步结合起来。

孝文帝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积极地推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民族有四个特征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孝文帝迁都洛阳，使大批鲜卑人入居中原，民族地域进一步打破。改语言，使民族的这个重要特征逐步消失。服饰、风俗、籍贯等改变，有利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消失，通婚更是造成民族在血统上的混合。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

孝文帝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晋以来各民族的融合、鲜卑族入居中原后的不断封建化和汉化，就是它的基础。但孝文帝也有他的功绩。他能抛弃民族偏见，走历史必由之路，主动实行汉化，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少数族统治者中少见的。孝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有抱负、有魄力，坚持改革和进步，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的杰出人物。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死，年仅33岁。孝文帝的陵墓在洛阳孟津县官庄村南邙山之巅。有大小冢各一，大冢为孝文帝陵墓；小冢为文昭皇太后墓，1946年其墓志在冢内出土，称"祔葬于高祖长陵之右"。知孝文帝的陵墓称为长陵。

八、"饥鹰侍中"与"饿虎将军"

——北魏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北魏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吏治败坏，均田制破坏，人民赋役繁重，佛教兴盛，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

① 《魏书》卷60，《韩显宗传》。

北魏后期，吏部公开卖官。官位拍卖的价格是：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 500 匹。吏部被人称为“市曹”，即卖官的市场。

北魏后期世家大族肆意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步遭到破坏。鲜卑和汉族的大地主霸占着大量肥沃土地，奴役着成千上万的佃客、奴婢和部曲等依附者。咸阳王元禧有奴婢数千，从京城到各州郡都有他的土地，还有许多盐铁业。司徒杨椿“横夺”华州穷民史底的土地。在他任太仆卿时，“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①。李冲受孝文帝赐地，在郑州管城县（今郑州市）东南，称李氏陂或仆射陂，周围有 18 里②。一些大官僚还经商、放高利贷。刘腾每年收入的利息达到“巨万”③。清河大族崔光伯靠放高利贷得利，家里的箱柜都装满了钱和绫绢。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让僧祇户、佛图户即寺院的依附农和奴隶耕种。寺院也放高利贷，在荒年出贷，收回时利息大大超过了本钱。不少穷苦百姓如僧祇户被寺院的高利贷债逼得自杀。

人民的租赋、徭役和兵役负担越来越沉重。政府本来规定户调绢每匹长 4 丈，阔 2 尺 2 寸。后来就不依尺度，任意加大。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征收调布时，每匹长七八丈，几乎增加了一倍。孝文帝时曾废除的大斗、长尺、重秤，又逐渐恢复。劳役和兵役更是人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世家大族用劳苦大众的血汗填满了自己的腰包，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他们争修楼阁亭台、花园别墅，互相竞夸。高阳王元雍有女伎五百，僮仆六千，每一食要花数万钱。咸阳王元禧有妻妾数十，犹感不足。河间王元琛最富，有三百女侍，尽是国色。他养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有次他大会宗室，把宝货都摆出来炫耀。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等等，都是西域来的。他对章武王元

---

① 《魏书》卷 58，《杨播附弟椿传》。

② 《太平寰宇记》卷 9，郑州管城县条。

③ 《魏书》卷 94，《刘腾传》。

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意即他比西晋以斗富出名的石崇还富。

北魏统治者还极力崇奉佛教。从宣武帝以后，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宣武帝在洛阳造瑶光寺、景明寺、永明寺。瑶光、永明寺各有僧房1 000多间。他又在洛阳南伊阙（龙门）开石窟，用工80余万。胡太后佞佛更甚。熙平元年（516）她在洛阳造永宁寺，塔高40余丈，共9层，全部用木结构，共有僧房1 000多间，都用珠玉锦绣装饰。塔上悬有金铎120枚，秋夜人静，铃声传闻10里。可惜在永熙三年（534）被火烧毁。近年考古发掘出永宁寺遗址，在洛阳东18里。遗址南北305米，东西215米，中心有一方形塔基，高出地面5米。塔北有殿堂残迹。出土有石雕、瓦当、陶俑、珍珠等。有三百余从壁上剥落的小型影塑，十分精致。类似的佛寺各州郡都有。夜行人迷路，就看着佛塔而行。宣武帝时全国有寺13 700余所，孝明帝时，达3万余所。统治者佞佛，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阶级压迫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来反抗。

其中法庆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它成为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

这一年，沙门法庆在冀州利用大乘教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渤海人李归伯全家参加了起义队伍。法庆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佛、魔相对是佛教历来的观念。佛经中的"魔"是指与佛对立的"魔民"、"恶魔"。法庆把北魏统治者和僧侣地主都视为"魔"，提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10人称10住菩萨。起义军到处"杀害吏人"，"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① 给北魏统治者和地主官僚以沉重的打击。

起义军发展很快，占领了阜城（今属河北），杀死县令。不到

---

① 《魏书》卷19，《京兆王子推附遥传》。

二三个月，有众5万多人。北魏派冀州刺史肖宝夤和长史崔伯麟前去镇压。起义军在煮枣城（今属河北）打败官军，击毙了崔伯麟。此后，北魏政府又派都督元遥率领10万大军前去镇压。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被镇压下去。

九、六镇起义与"河阴之变"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魏初年，为了防御柔然族南下，保卫平城，在北部边境设立了许多军镇，主要有6个，即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镇（今属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古武川东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北）等。北魏末年，六镇地区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一是阶级矛盾。二是民族矛盾。北边的柔然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民和牲口。边境地区还居住着一些敕勒等被北魏所征服的少数族，他们受北魏政府和镇将们的奴役，一直潜伏着反抗的火种。三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即六镇镇将官吏与洛阳鲜卑门阀贵族的矛盾。

正光四年（523）四月，沃野镇的高阙戍爆发了破六韩拔陵领导的起义。破六韩拔陵是匈奴人，是从破六韩孔雀部落中征调出来的戍兵。破六韩拔陵起义后，杀了沃野镇将，"攻城掠地"，改年号为"真王"。

六镇各族人民受尽北魏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具有强烈的反抗要求。沃野镇义旗一举，"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①]。首先响应起义的是东西两部敕勒族（即高车）人民。其次有六镇及六镇以外的山胡族人民。此外，还有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南秦州（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南）的氐、羌族人民，领袖是羌人莫折大

① 《资治通鉴》卷149。

提和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还有高平镇胡琛领导的敕勒族人民；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西南）的胡人；南秀容（今山西忻县西北）、并州、河西官府牧场上的牧子，等等。各族人民互相联合，互相支持，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

破六韩拔陵领导的起义军发展迅速。正光五年（524）五月，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大败临淮王元彧。接着，又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打败安北将军李叔仁。北魏王朝罢免临淮王元彧官爵，另派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前去镇压。七月，起义军又在白道打得李崇部下抚军将军崔暹全军覆没。北魏王朝再罢李崇官，改由广阳王元渊统率。

元渊龟缩在五原城里，不敢和破六韩拔陵交战。这时，他的参军于谨献计说："现在寇盗蜂起，不能专靠武力取胜，让我奉大王之威命，去离间他们首领，讲清祸福，也许能招降一些人。"于谨懂各少数族语言，他混进起义军后，果然使西部敕勒酋长率领3万户向北魏投降。同时，北魏统治者又勾结柔然，共同镇压起义军；阿那瓌率众10万向起义军进攻。在这种局面下，破六韩拔陵不得不向南转移，在折敷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中元渊军的埋伏，粮食断绝，最后陷于失败，破六韩拔陵英勇牺牲。

孝昌元年（525）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领导六镇兵民在上谷（今河北怀来县）起义，很快发展到10多万人。杜洛周继续用"真王"做年号，表示是六镇起义的继续。孝昌二年（526）一月，怀朔镇兵丁零族的鲜于修礼在定州起义。这支起义军也有10多万人。两支起义军互相声援，很快占领了河北的许多州县。

正当起义形势向前发展时，参加鲜于修礼起义军的原怀朔镇将葛荣杀害了鲜于修礼，掌握了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葛荣拉拢和任用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对他们封王拜将，如封大族潘乐为京兆王、卢勇为燕王等。对人民却加以屠杀。攻下沧州（今河北盐山西南），居民被杀十分之七八，攻下信都，驱逐居民，使冻死十分之六七。武泰元年（528）二月，葛荣向杜洛周进攻，杀杜洛周，

并其部。在对待各族人民的关系上，葛荣挑拨鲜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关系，出现了鲜卑族“欺汉儿”现象。葛荣的错误给起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也遭到广大起义军战士的抵制和反对。

孝昌二年（526）九月，葛荣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国号齐。不久，又俘斩了广阳王元渊。孝昌三年（527），占领了殷州、冀州。并杜洛周部后，葛荣军号称百万。

尔朱荣掌握了北魏政权后，立即挥戈北上，去镇压葛荣起义。葛荣虽然号称百万，但已经内部分裂，人心不齐；葛荣又自恃兵多，骄傲轻敌，在战术上“箕张而进”，分散了兵力，最后竟被尔朱荣的 7 000 骑兵所打败。葛荣被捕，送到洛阳后被杀。

这次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虽然失败，但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次起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起义，历时达 8 年之久（523—531），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贵族，促使北方门阀势力的衰落，起义还打击和动摇了腐朽的北魏王朝，促使它走向崩溃，这些都为新建立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实行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仅有广大汉族、鲜卑族人民，而且有山胡、敕勒、氐、羌、蛮、匈奴等各族人民，他们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并肩战斗，加深了互相了解，这种联合大起义，大大加速了各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七章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

一、高欢建立东魏

——高欢起家与代北豪族的兴起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被镇压后，北魏政权也在内乱中趋于瓦解；实权落到六镇豪强出身的两员大将高欢、宇文泰手中，这意味着代北豪族酋帅的兴起。

高欢本是汉族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因祖先犯罪，全家被徙配到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北）。

六镇起义后，怀朔镇豪强一部分人与起义军对抗；起义军占领怀朔镇后，这些人先后投靠了尔朱荣；高欢则潜入了上谷的杜洛周起义军。他与蔡俊等人策划暗杀杜洛周，夺取义军领导权。但阴谋败露，乃仓皇出逃，投奔葛荣。不久，又背叛葛荣，投奔尔朱荣。尔朱荣以高欢为亲信都督（卫队长）；高欢劝尔朱荣起兵夺取北魏政权，尔朱荣大喜，带兵进入洛阳，发动“河阴之变”。在尔朱荣与葛荣决战时，高欢在阵前招降了葛荣军中七个王和一万多人，后又与元天穆一起镇压了山东邢杲起义，因功被封为第三领民酋长，成为尔朱荣手下的一员干将。

尔朱荣掌握北魏政权后，立孝庄帝元子攸（507—530）为傀儡。孝庄帝不满，利用尔朱荣朝见机会，于永安三年（530）九月杀死尔朱荣。十二月，尔朱荣侄子尔朱兆起兵，反孝庄帝。于建明元年（530）十二月攻入洛阳，放任士兵大肆抢杀，洛阳成为一片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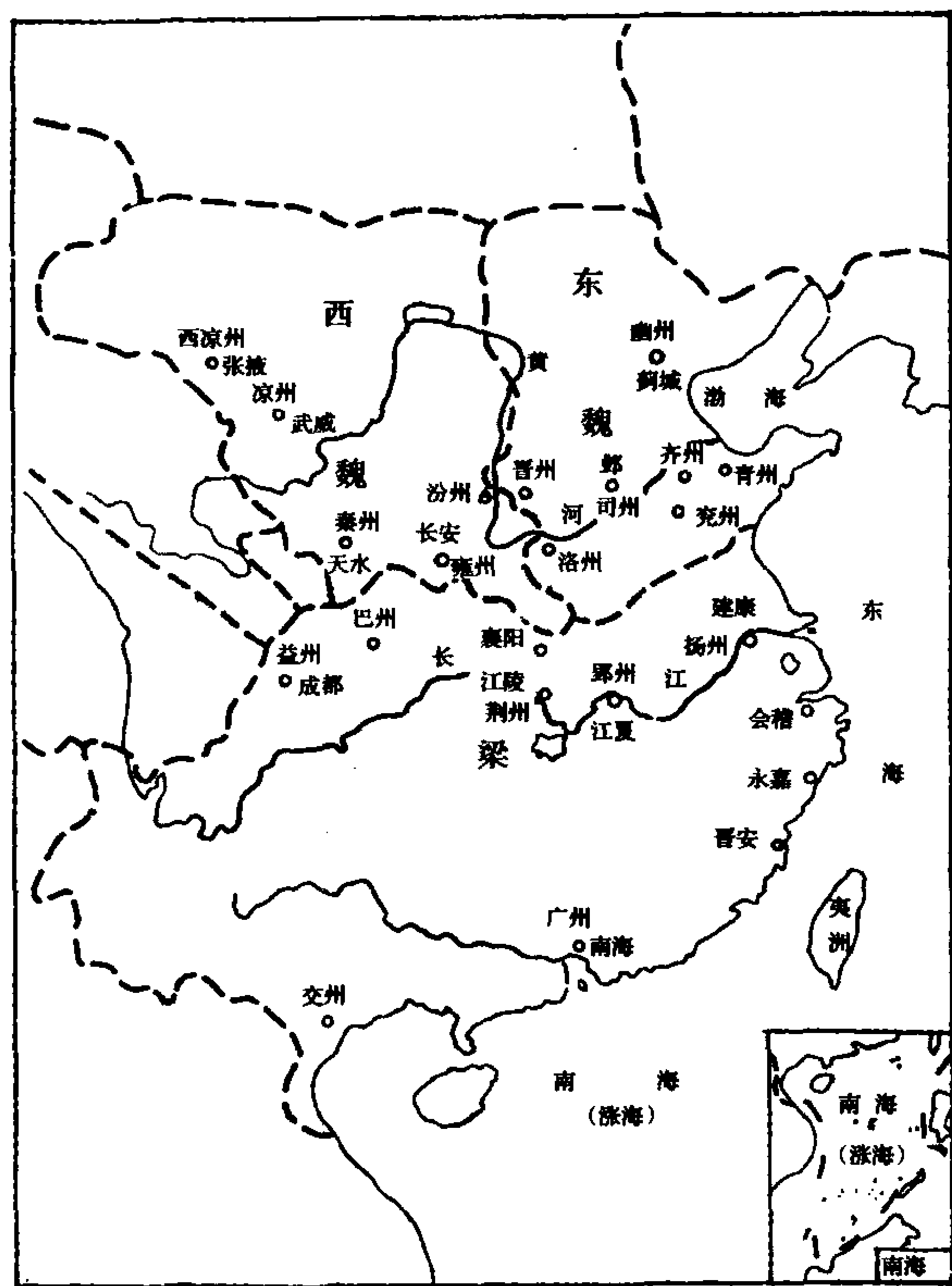
不久，尔朱兆把孝庄帝迁之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把他缢死，另立广陵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尔朱氏势力继续控制了北魏政权，对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引起各地人民和河北豪强大族的不满。

葛荣起义被镇压后，尔朱兆让高欢统领起义军余众。高欢受命后即请求去山东，实为避开尔朱兆以期造反。高欢到了山东，为了反尔朱氏，伪造了一封尔朱兆信。内称要征发六镇兵去攻打稽胡和配六镇兵民成为契胡贵族部曲。六镇兵民十分忧愁，出征那天，哭声震动山谷。高欢对大家说："我和诸位都是失乡客，是一家人，想不到上级强令征发。现在出征要死，延误军期也要死，当部曲更要死。怎么办?"大家说："只有造反一条路。"高欢说："造反要推举一人为头。"众曰："那当然是将军了。"高欢说："推我为头可以，但要听我指挥、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大家说："生死都跟着将军。"于是高欢就在普泰元年（531）六月率领六镇余众在信都（今河北冀县）起兵，打出反尔朱氏旗号。高欢严肃军纪，得到山东老百姓拥护；又得到河北汉族大地主高乾、李元忠的支持。十月，高欢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即后废帝。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

高欢起兵后，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大破尔朱兆军，引兵攻邺。太昌元年（532）初，高欢攻下了邺城（今河北临漳）。在洛阳尔朱世隆的策划下，晋阳尔朱兆、长安尔朱天光、东郡尔朱仲远会集邺城，众号二十万，向高欢进攻。高欢这时仅步兵三万、战马二千，但士气旺盛。双方在邺城西南的韩陵山（今河南安阳市东北）会战。高欢设一圆阵，用牛驴连系起来，阻塞了归路，使将士皆有必死之心。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高欢击败了尔朱氏势力。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奔回东郡。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摧毁了尔朱集团主力，为高欢建立东魏奠定了根基。

在关中地区，与尔朱天光一起入关镇压万俟丑奴起义的雍州刺史贺拔岳，联合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消灭了留守长安的尔朱氏势力。后来，高欢用离间手法，唆使侯莫陈悦杀贺拔岳。贺拔岳部下

宇文泰又杀侯莫陈悦，控制了关中地区。天平元年（534）孝武帝因不愿当高欢傀儡，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建立了东魏。高欢把洛阳40万户居民迁到了邺。邺成为东魏都城。次年，宇文泰在长安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即文帝，建立了西魏。从此，北方出现了东魏和西魏对峙的局面。



东魏、西魏和梁对立图

二、农民战争与社会进步
——东魏北齐初年的改革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促使了腐朽的北魏王朝的瓦解，打击

了河北地区门阀士族贵族势力，局部调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就使新王朝东魏北齐实行一系列改革有了可能。

高欢建立东魏后，于武定五年（547）病死。长子高澄继为大丞相，二年后被膳奴兰京所杀。兰京为梁将兰钦之子，被东魏所俘后成为奴隶，他不满自己身份，请求赎身，不许，乃在进食时，藏刀于盘下，杀了高澄。高澄死后，弟高洋（529—559）代之。天保元年（550），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即文宣帝，建立了齐，史称北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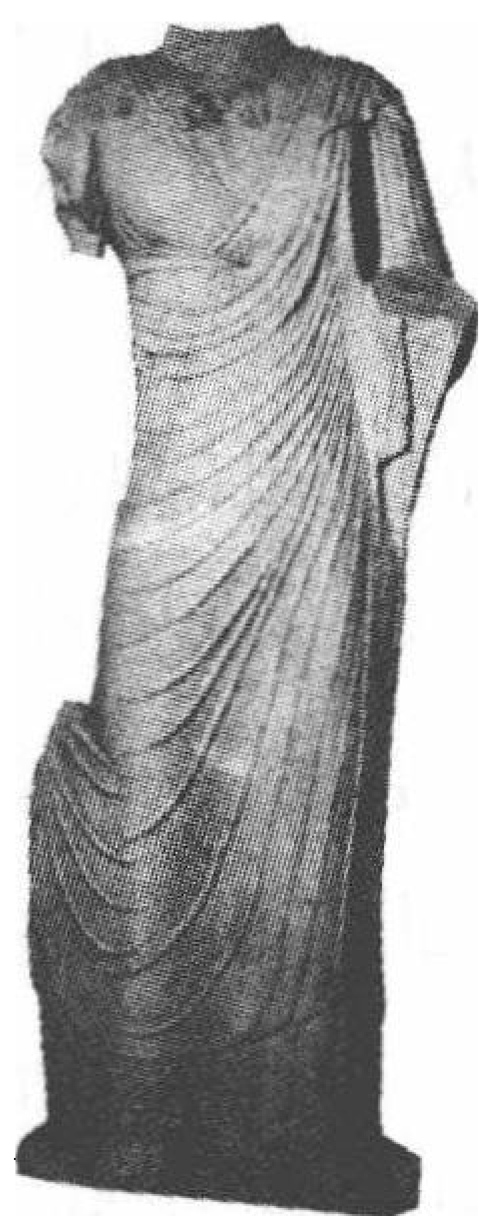
东魏、北齐初年，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改革，使社会有了一些进步。

首先，推行均田制，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北魏末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造成了社会的极大震荡，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为重新推行均田制创造了社会前提。

东魏建立后，天平年间（534—537）即进行了均田工作。开始实行时，贵族豪强都占良田，把贫瘠的土地分给穷苦百姓。后来高欢作了纠正，比较平均了一些。天保八年（557）又把冀、定、瀛三州无田户迁到幽州范阳空荒地较多的“宽乡”。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再次颁布均田令。规定京城附近30里的公田，赐给鲜卑贵族官僚直到宫廷卫士；30里以外百里以内的土地分给汉人官僚一品官以下至羽林虎贲（宫廷卫士）；百里以外及各州土地分给普通百姓。均田令规定男夫受露田80亩，妇女40亩；又每丁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或给麻田）。北齐均田制与北魏不同的地方，一是取消了倍田，二是奴婢受田有限制，即按官品限制在60人至300人。在三长制方面也有不同，改为10家为一比邻，50家为一闾里，百家为一族党。北魏三长制中一党共有邻、里、党三长38人，现在一族党中共有三长20人，减少了18人。因三长皆免除赋役，从而增加了国家赋役收入。赋役方面以一夫一妇即一床为征收单位。每床征调绢1匹，

绵8两，垦租2石，义租5斗；奴婢减半。

在推行均田制同时，东魏北齐还推行了其他一些经济措施：(1) 检括户口。武定二年(544)，高欢派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到各州检括被豪强隐蔽的无籍户口，共得60余万，大大增加了政府赋役收入。(2) 实行屯田。乾明元年(560)，在石鳖实行屯田，每年收粮数万石，使淮南地区军粮充足。又在北方长城一带实行屯田，年收粮数十万石。(3) 发展盐业生产。在沧、瀛、幽、青四州沿海地区设盐官煮盐，每年收钱不少，补充了军费开支。(4) 兴修水利。如在南荆州(今河南信阳县西北)开陂渠，能灌溉稻田千余顷。高睿为北朔州刺史，组织人民挖井，灌溉农田。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5) 统一度量衡。天平三年(536)高欢划一斗尺，公布天下。规定绢长每匹40尺，不许额外勒索。(6) 武定五年(547)高澄建议禁止豪强封山占水。


北齐菩萨雕像残部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使国家赋役收入有所增加，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仓廪充实”，“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①]。就是说，由于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谷价下跌到每石9文钱。

其次，放免奴婢杂户，减轻人身依附关系。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中有许多相当于杂户身份的人参加，如府户、兵户、城民、牧子等等；也有奴婢参加。这些人在斗争中摆脱了身上的枷锁，取得了一定的自由。新王朝的统治者顺应这种阶级关系上的历史变动，多次发布诏令放免奴婢杂户。

天保二年(551)，高洋下诏免除伎作户、屯户、牧户等各种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人的杂户身份，成为“白户”，即平民。

天保三年（552）高洋把战争中俘虏来的库莫奚人奴隶放免为平民。

皇建元年（560）高洋下诏，60岁以上的官奴婢放免为“庶人”，即平民。

天统三年（567）高纬下诏各寺署管辖下的杂户尚未放免的，都放归郡县管辖，与平民一样对待。

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还表现在“以庸代役”的出现。就是可以出钱来代替服徭役。法令规定“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①]，说明富人可以用输钱来代替力役。

再次，整顿吏治、重视用人、加强法治。高欢虽然对于鲜卑勋贵们的贪纵不敢过分制裁，但他为了巩固统治，还是力图惩办贪污官吏、整顿吏治。其他如瀛州刺史韩轨，虽为高欢亲戚，终因贪污被削除官爵。南青州刺史郑伯猷，也因贪污聚敛被罢官。

吏治的败坏往往与机构臃肿有关。天保七年（556）高洋下诏省去3个州、153郡、589县、2镇、26戍。精简机构有利于齐国的稳定。

东魏北齐重视人才选拔。北魏后期实行“停年格”，即选才升官论资排辈，不问才能。高澄废除了这套办法，选拔人才“唯在得人”[②]。高欢选拔人才也“在于得才”[③]。只要有真才实学，出身低贱也不要紧，有名无实的，不能被任用。

东魏北齐还加强法制。兴和三年（541）九月，东魏帝命封隆之等在麟趾阁议定法律条文，称为《麟趾格》。天保元年（550）北齐建立后，文宣帝高洋命李浑对《麟趾格》加以删改。河清三年（564），由高叡等定律令，共有名例、禁卫、婚户等12篇，共

---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北齐书》卷3，《文襄》。

③ 《北齐书》卷2，《神武下》。

计定罪949条。它综合了汉、魏、晋及北魏诸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①]。后来隋唐的法律都参用了北齐律。

东魏北齐初年的改革和社会进步，既是新的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又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曲折反映。

三、宇文泰和苏绰

——西魏的建立与改革

当高欢在关东建立东魏政权时，大统元年（535），宇文泰在关陇地区也建立了西魏政权。

宇文泰（505或507—556），字黑獭，先世是鲜卑宇文部的酋长，北魏初被迁到武川镇。其父宇文肱是武川镇的下级军官。六镇起义失败后，宇文泰父子随六镇流民到河北地区“就食”，参加了鲜于修礼起义。葛荣杀鲜于修礼，18岁的宇文泰被任为将帅。葛荣失败，宇文泰投尔朱荣，为其将领贺拔岳的部下。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杀，其部众拥立宇文泰为首领。宇文泰攻杀了侯莫陈悦，成为关中地区的统治者。

宇文泰控制的关陇地区[②]，与东魏相比，地狭人少，经济落后。为了对抗东魏，巩固统治，不能不实行一系列改革，并争取关陇豪强地主的支持。帮助宇文泰实行改革的谋主是关中名门大族苏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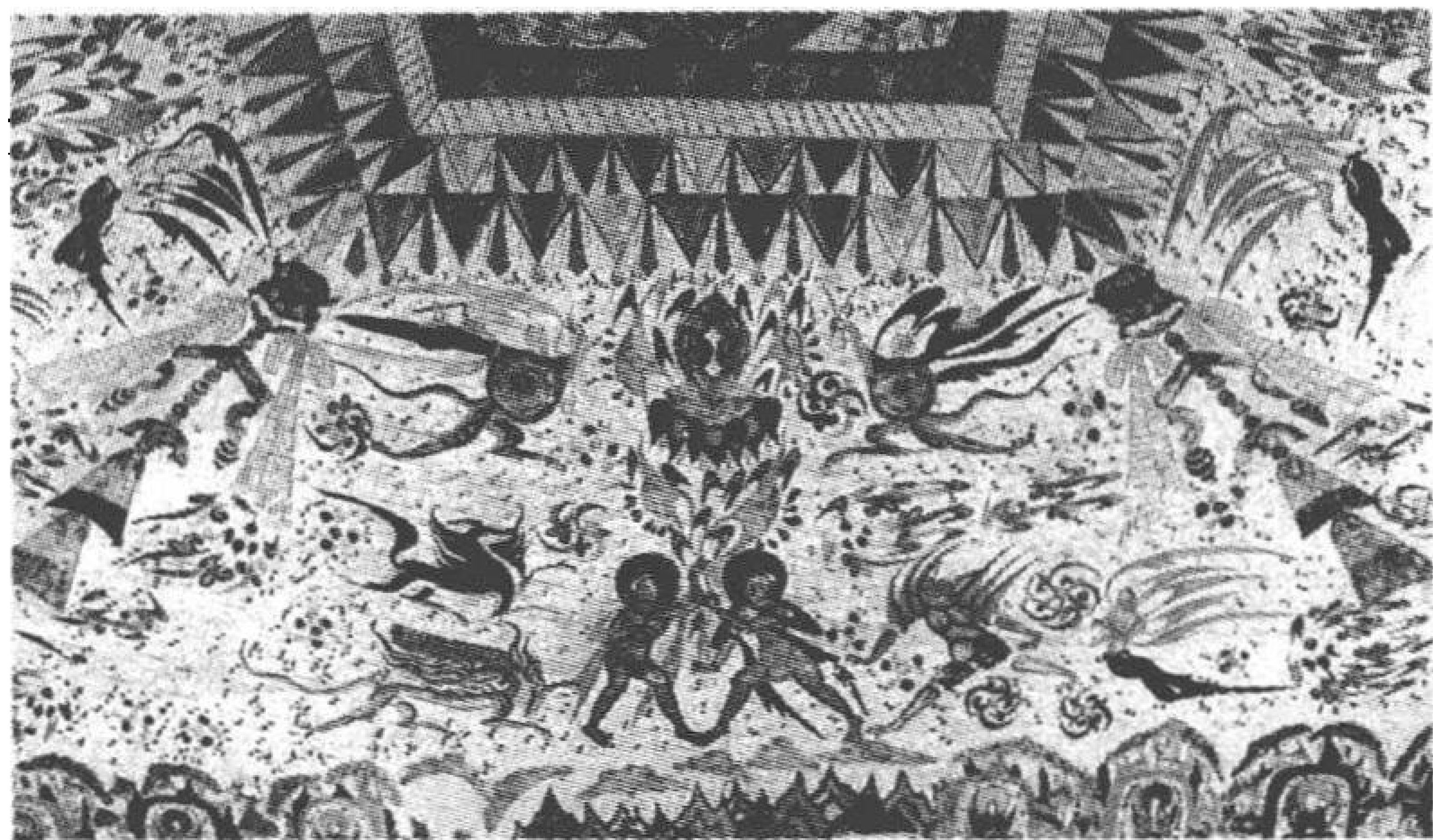
苏绰（498—546），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字令绰。上代都是二千石大官[③]。其父是武功郡守。苏绰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开始在西魏只担任一个行台郎中的小官。一次宇文泰与仆射周

① 《隋书》卷25，《刑法制》。

② 关即关中，潼关或函谷关以西，即长安附近一带，陇为甘肃简称。

③ 每年俸禄有二千石，相当于三公。

惠达讨论工作，周惠达回答不出，要求出去一次，回来后却回答得头头是道。宇文泰问："刚才你出去和谁商量？"周惠达答："我去与苏绰商量。这个人有王佐之才，台中的事都办得有条有理。"宇文泰立即召见苏绰，提升他为著作佐郎。



敦煌285窟 西魏 伏羲女娲和诸神

苏绰帮助宇文泰改革，提出了"六条诏书"：（1）治心身。当官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端正思想；（2）敦教化。教育人民慈爱、和睦、敬让，移风易俗；（3）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惩罚游手好闲的人；（4）擢贤良。选拔有才能的人当官，不能只重门第；（5）恤狱讼。断狱判刑要公正；（6）均赋役。赋役要平均，不能让豪强占便宜。这"六条诏书"是富国强兵的好办法，成为宇文泰的施政纲领；宇文泰十分重视，命地方官背诵，不通六条者不得居官。此外，苏绰又制定计帐、户籍等法，即预计次年赋役概数和清查户籍办法。他又提出设置屯田、减少官员等建议。

为了整顿吏治，宇文泰早在大统元年（535）就制定了24条新制，让百官遵循。主要内容为"益国、利民、便时、适治"。大统七年（541），又定了12条新制。大统十年（544）宇文泰总合以上新制36条，为"中兴永式"，命苏绰补充修改，共为5卷。公布后，各地皆按新制选拔牧守令长。结果是"数年之间，百姓便之"[1]。

---

① 《周书》卷2，《文帝下》。

宇文泰用人注重才能。西魏在官职上不再区分清浊。薛端主持吏部，“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赏升擢之”[①]。宇文泰对于贪污的官吏，即使是亲属，也不姑息。其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贪污，被依法处死。

宇文泰在苏绰、卢辨的帮助下，改革了官制。官名、朝仪、车服、器用一套都依照《周礼》。《周礼》一书记载了西周的官制。执政大臣分为六官，亦称六卿，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冢宰即为宰相。六官又相当于隋唐以后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当然，宇文泰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周礼》，还参用秦汉官制。自总管、刺史、郡守、县令，下至党正、里正那一套地方政府组织并未变动。军队方面六军禁卫和府兵制度也未打乱。宇文泰实行《周礼》一套，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类形式上的改组，能够获得华夏正统文化继承者的称号，并借此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宇文泰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规定已娶妻的男子受田 140 亩，未娶妻的丁男受田 100 亩。自 18 岁至 64 岁皆纳租赋。有家室的每年纳绢 1 匹、绵 8 两、粟 5 斛。丁男减半。力役，自 18 岁至 59 岁都要服役。丰年服役 30 天，中年 20 天，歉收之年 10 天。

关于西魏北周均田制，近代在敦煌发现了户籍残卷资料[②]。这些户籍残卷中的第 S0613 号，经学者研究，认为是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计帐户籍残卷。籍帐分两部分：一为户口、受田和租调的合计帐；二为按户登记的户口、受田和交租帐。从残卷记载来

---

① 《周书》卷 35，《薛端传》。

② 这一残卷共 17 断片，连贴在 S 613 号文书纸背，高 28.5 厘米，长 613 厘米。此文书被斯坦英取走，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日本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池田温书有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的中译本，但无图片。见该书 126 页。

看，农民实际受田很少而受剥削很重。如邓延天富和王皮乱户，都是夫妻二人和两个小孩，应受田各为46亩，已受田一为26亩，一为23亩，但都要缴租3石5斗，布1匹，麻2斤，还要服役。丁男女露田授得这样少，这可能是因为敦煌地少人众，土地不敷分配，故按狭乡受田准宽乡之半的原则行事。残卷的出土，有力地证明西魏北周确曾推行过均田制。

苏绰还帮助宇文泰改革文体。魏晋以来，文章讲究词藻华丽、对偶排比，重形式，束缚了内容。宇文泰命苏绰作《大诰》，模仿古代《尚书》文体，作为范文。并规定“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这开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声。

由于宇文泰和苏绰实行一系列改革，由于关陇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西魏一天天强盛起来。正在这时，大统十二年（546）苏绰因辛劳过度而去世，年仅49岁。宇文泰十分伤心，想到他生前夜以继日地工作，想到他辅佐自己出谋划策，不禁落下了眼泪。埋葬时，宇文泰尊重他生前崇尚俭朴的意愿，只用一辆布车送回故乡安葬。灵车启动时，宇文泰带着文武百官，用酒祭奠苏绰的亡灵，说：“尚书生平的事，只有我知道。当今正欲共定天下，你却过早地离我而去，奈何，奈何！”西魏北周的富国强兵，与宇文泰、苏绰的改革是分不开的。苏绰虽然去世，但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一直成为西魏的治国准则。

四、府兵制

——西魏北周的兵制

宇文泰在建立西魏所依靠的“关陇集团”，就是鲜卑族的武川军事贵族和关陇汉族大族的联合统治集团。在组织这个集团过程中，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府兵作为通称，早已存在。魏晋以来，地方长官带军号统兵[①]，开府置属官；属于军府的兵，即称府兵。这些兵又称府户、军户、营户、兵户、城民等。这时兵士地位是比较低的。但西魏北周的府兵与上述不同，它是西魏开始创立，直到唐中期才消失的一种兵制。它有特殊的组织系统，不是边防军而是禁军，兵士地位是比较高的。当然，府兵制在前后期也是有变化的。

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初建府兵制，其核心一是入关中的六镇鲜卑军人，即贺拔岳的武川军团；二是宇文泰攻杀侯莫陈悦后，原贺拔岳部下李弼拥众来归的李弼军团；三是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这三部分人合起来不过3万人左右，宇文泰命12个将军分别统领，称为十二军。大统三年（537）东西魏发生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之战。高欢发兵10万，号称20万，宇文泰迎战仅万余人。高欢部将主张坚壁勿战，高欢不从，结果东魏军中西魏埋伏失败，损失甲士8万，失掉河南诸州。胜利后，宇文泰不断补充军队。大统八年（542），宇文泰仿照周礼六军之制，把十二军改为六军。大统九年（543），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北部邙山会战，宇文泰失败，丧失军队6万多人，实力大伤。为补充军队，宇文泰广泛召募关陇豪族的地方武装力量，充实府兵；同时委任这些拥有“乡兵”、“部曲”的豪族为“都督”、“帅都督”，这样就大大扩充了府兵制。

府兵组织系统中最高统帅称八柱国。这是从形式上模仿北魏早期鲜卑族部落兵制中的八部之制。宇文泰自己任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实际最高统帅，位在其他柱国之上。

府兵属于中央禁卫军性质。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府兵不承担赋役，但军中许多需用物品，如弓刀等，甚至牛驴、粮食都要自备。重要武器如甲、槊、戈、弩等则由官家供给。府兵在每一个月中，上半月守卫宫廷，昼夜巡查，下半月由

① 如北魏定州刺史带镇北将军；边镇的镇都大将带都督数州诸军事。

军官教习作战，检阅队伍。他们的地位，比起北魏末年的府户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府兵的核心是入关的六镇鲜卑。但府兵制下的士兵已经补充了许多汉族和其他族农民。府兵中高级将领有鲜卑人也有汉人，中级军官则多是关陇豪强。宇文泰出身于鲜卑宇文部，而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很多是鲜卑拓跋部人。宇文泰为了抚慰这一部人，缓和宇文氏与拓跋氏的矛盾，在府兵中扩大鲜卑血缘关系，规定府兵的统军将领一律改成鲜卑姓。大统十五年（549）下令鲜卑人在孝文帝改革中改姓的，要复旧。如于氏，仍改为勿忸于氏。恭帝元年（554）又下诏，有功将领继承鲜卑初年36国和99姓之后，所统军人也改从其姓。有的汉族将帅就赐以36个大部落中一个姓氏。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等。直到杨坚做周相时，才又下令改姓的文武官都恢复原姓。

府兵制前后是有变化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① 这前后期的变化主要是在周武帝、隋文帝时代。

周武帝宇文邕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府兵制度改革上，他在建德三年（574）把府兵改称为"侍官"，招募许多汉人参加府兵；因而在府兵中汉人几乎占了一半。周武帝对府兵的改革主要有三点：

第一，加强了君主权力和中央集权。府兵的指挥权，过去实际上属于相府。宇文泰当时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元宝矩不过是傀儡。六柱国类似六个部落，权力也不小。周武帝称帝后，夺取了相府的统兵权，使府兵直辖于君主。他改军士为侍官，侍官即君主侍卫，从而府兵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以行使其至高无上权力的工具。

---

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

第二，改变了军队成分，扩大了兵源。府兵初建时，由于东西魏之间长期持续战争，府兵兵源往往缺乏。周武帝掌握府兵后，为了扩大兵源，不得不均田户中的六等户[①]以上，家有三丁，选一人充当府兵。其优待是入军籍后，不编入地方户籍，免除赋役。这样，均田户中不少人参加了府兵，扩大了军事力量。这是宇文泰时召募关陇豪强乡兵的继续和发展。北周灭北齐时，府兵已发展到近20万人。

第三，周武帝召募汉人平民为兵，在军队中进一步打破了鲜卑人和汉人的界限，这是有利于促进鲜卑人的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的。



敦煌285窟西魏得眼图

府兵制在西魏北周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宇文泰依靠府兵制等措施组成了关陇统治集团，对抗了比他强大的东魏。周武帝灭齐，府兵制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府兵制自西魏建立，到唐代天宝八年（749）折冲府无兵可交，府兵名存实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00年。它和均田制一样，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岂有卅岁天子可为人所控制”

——北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泰和苏绰的改革，府兵制的建立，为西魏北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武成二年（560），宇文护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543—578）

① 当时民户按资产多少分为九等户，六等户属于中等以上人家。

为帝，即周武帝。

周武帝即位时，年仅18岁。大权仍操纵在宇文护手中。宇文护为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既是宰相，又是最高军事统帅，各部门都听他指挥；重大事件，都由他决定。他府第的警卫，比宫廷还要壮观。北齐的段韶说："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①] 周武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宇文护的专横跋扈，自然不能容忍。但要除去这个权臣，时机还不成熟。于是他在表面上装作什么事情也不过问，也不多讲话，"人不测其浅深"。这样，经过13年的等待和准备，终于在建德元年（572）他和几个近臣一起策划，趁宇文护进宫谒见太后时，用玉珽把宇文护击倒，最后将他刺杀。从此，周武帝掌握大权，开始亲政。

周武帝亲政后，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这既是"富国强兵"的时代需要，也是他从即位到亲政的曲折政治道路中得出的一条经验教训。他说："自北周建立，晋公护一直执掌大权，习以为常，总以为这是合理的。岂有30岁天子可为人所控制？这是乱代的权宜，非经国的治术。"周武帝首先控制兵权。他废除都督中外诸军事衙门，又"改军士为侍官"，使府兵直接由皇帝控制。他任命弟弟大司马齐炀王宇文宪为大冢宰；但宰相不再管军事，失去军权。日常性的政务工作，仍可以由六官来处理，大事决策则权在皇帝。

周武帝亲政后第二年，关中大旱，数月不雨，又加蝗灾，庄稼枯死，百姓挖野菜充饥。周武帝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他下诏说："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②] 这是要安定民生，不多干扰。他劝课农桑，奖励生产。三次下诏减轻赋税，下令自正调以外不再征发。他又一再下诏释放奴婢、杂户。在平定北齐前，主要是放免奴婢为良民；在统一北方后，主要是释放杂户为平民。南朝梁末，宇文泰占江陵，驱江陵百官士

---

① 《北齐书》卷16，《段韶传》。

② 《周书》卷5，《武帝上》。

庶及人民10余万入关，赏赐各将领贵族，作为奴婢。建德元年(572)，周武帝下令把江陵人被俘作官奴婢的全部放免为民。灭齐后又先后下诏放免杂户。建德六年（577）下诏，凡北齐武平三年(572）以来，黄河以南诸州百姓被齐掠作官私奴婢的一律放免为平民。同年又下诏，永熙三年（534）以来，东魏北齐及江陵平民被掠为私家奴婢的，都放免为民，如果旧主人要求共居，听其留为部曲及客女。同年，他又下诏放免杂户："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意思是以后不再把人配为杂户。战俘奴婢和杂户的放免，使落后的奴隶制残余逐渐消失，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身份，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周武帝还制定对付盗贼和严惩官吏贪污的法律，叫《刑书要制》。规定："里正、三长隐瞒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处死。"虽然苛重，但有利于打击贪官、豪强，加强均田制的执行。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发动了一场废佛运动。佛教在北魏后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北齐、北周继续发展。北齐人口约2 000万，僧尼有200万，都城邺有寺院4 000。北周人口不到1 000万，僧尼有100万，境内有寺院1万多。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仅影响国家赋役收入，而且影响兵源。这是富国强兵的很大障碍。天和二年（567）益州野安寺僧卫元嵩上疏，认为"僧尼不事耕织，嬉游坐食，既免丁役，又免课输，这是不符合佛法平等精神的。"从此以后，周武帝曾四次组织讨论佛道优劣。建德二年（573），他又集百官、和尚、道士辩论三教优劣，确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建德三年（574），他正式下令废佛："断佛、道二教。"销毁经像，勒令僧侣道士还俗，把寺院财产分赐给臣下。灭齐后，又在北齐境内实行废佛政策。这次废佛的结果是，关西山东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300万僧尼还俗，4万寺庙赐给王公贵族为第宅。使北周政权获得了成百万的劳动力，扩大了赋役征收对象，充实了兵源，为统一战争作了人力和物力的准备。这就是所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周武帝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继苻坚、孝文帝之后又一位少数民族的杰出的君主。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府兵制，释放奴婢杂户，与民休息、废佛等一系列改革，使北周力量大大加强，为统一北方和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六、三百年分裂局面的结束

——北周灭北齐与隋的统一

周武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都是为了推进统一事业。经过较长时期的准备之后，他趁北齐“朝廷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1]，决心伐齐，统一北方。

建德四年（575），周武帝调集17万大军分路伐齐。他亲率六军攻拔了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进围洛阳，后因病退兵。这次战争，周军纪律严明，到北齐境内，禁止士兵践踏庄稼、砍伐树木。而北齐的军队“行师殆同儿戏”。这更增强了周武帝灭齐的决心和信心。

建德五年（576），周武帝再度伐齐。这次不再攻河南洛阳，而是直指高欢起家的晋州（治平阳，今山西临汾）。周武帝统率大军14.5万，先抵晋州，包围平阳，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开门出降。当周军包围平阳时，北齐后主高纬正带了他的冯淑妃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天池打猎。告急文书一日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说：“大家（皇帝）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到傍晚，使者报告平阳陷落，后主着急，要赶回晋阳，冯淑妃请再围一次猎，后主竟然依从。

齐后主回到晋阳，率领齐军主力10万南下救平阳。周武帝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守平阳城。齐军在平阳城下昼夜猛攻，梁士彦苦守，命妻妾、军民、妇女昼夜修城。齐军挖地道进攻，城

---

① 《资治通鉴》卷172。

陷十余步，将士欲乘势攻入城中。齐后主命令暂停，说是要让冯淑妃来观看。冯淑妃在内梳妆打扮，久久不出。这时周军已经用大木挡住城上破处，守住了平阳。齐军在平阳城下屯兵一个多月，士气衰颓。周武帝决定在平阳城下与齐军决战。北周集结了8万主力，向齐军进攻。开始两军相持不下，后齐军东翼稍微退却，在阵上观战的冯淑妃和录尚书事穆提婆认为已经打了败仗，怂恿后主退兵。后主一走，齐军军心涣散，大败，死万余人，军资器械都抛弃在战场上。齐后主逃回晋阳。斛律孝卿请后主亲自慰劳将士，以便再战。并草拟了一份对士兵的慰问词，嘱咐齐后主讲时要慷慨激昂，以鼓动人心。士兵列队完毕后，齐后主出来讲话，可是站了半天讲不出一句，原来他把慰问词的内容忘了。后来，齐后主索性大笑起来。左右也笑起来。士兵们看了这种情景，都气忿地说："他们尚且如此，我辈何必卖命!"在周军的进攻下，齐军很快失败。齐后主连夜逃回邺，安德王延宗在晋阳即位，改元德昌。不久，周军破晋阳、擒延宗，进兵邺城。齐后主禅位于8岁的太子恒。建德六年（577）周兵入邺，后主在逃亡途中被俘。至此，北齐灭亡。北方重新统一。

周武帝灭齐以后，本想乘胜平定南方，统一中国。但建德七年（578）他在北伐突厥的军中病死，年仅36岁。1995年位于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的周武帝陵墓孝陵得到了发掘。内有武帝孝陵志石，各类陶俑150余个及金、银、铜、玉等器物和装饰品。

宣帝即位第二年，就把皇位传给7岁的儿子宇文阐，即静帝。静帝年幼，大权落到天元大皇后杨氏之父杨坚手里。



顾恺之《列女传图》

杨坚的祖先原是弘农有名的大族。北魏时世代在武川镇做官，深受鲜卑的影响。其父杨忠，在西魏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宣帝时，由亳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总管内调为大司马和右司武，掌握军权。周宣帝死后，静帝只有8岁，汉族官僚郑译、刘昉假造遗诏，由杨坚辅政，为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后为大丞相，总揽军政大权。

杨坚掌握国家大权后，革除北周宣帝时苛政，又发还寺院一部分财产，下令准许传布佛、道两教，以争取人民的拥护和缓和统治者内部矛盾，然后发兵，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的"三方起兵"。大定元年（581），他代周称帝，建立了隋王朝，建都长安。杨坚即是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后，着手做灭陈的准备。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开皇七年（587），灭了江陵的傀儡政权后梁。开皇八年（588）下诏揭露陈后主罪恶20条，指出"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自古昏乱，罕或能比。"[①] 并抄发30万份，散布到江南，以作灭陈的舆论准备。十月，命次子杨广为统帅，率领51万大军，分八路向陈发起总攻。

陈朝边将飞书告急，但陈后主和大臣、贵妃们依然歌舞作乐。陈后主说："王气在此。齐兵来过三次，周兵来过二次，都被打败。隋军来又能怎么样呢?"媚臣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分隔南北，隋军难道能飞渡吗?"正在陈朝君臣醉生梦死的时候，开皇九年（589）正月，隋军引兵渡江，很快进抵建康城下，陈大将任忠投降，守卫军队要抵抗，任忠挥手说："老夫尚降，诸君何事!"于是陈军一哄而散。隋军入城，陈后主和张、孔二贵妃躲入景阳宫枯井内。隋军呼之不出，后扬言要投石，后主和二妃才出来，向隋军投降。至此，陈朝灭亡。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终于以隋文帝统一中国而告结束。

---

① 《隋书》卷2，《高祖下》。

第八章　思想和宗教

一、经学的中变时代

——儒家经学的变化

儒学以孔子为宗师，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经典有《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等，成为后来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阐述称为儒家经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目的，也十分重视儒学这个汉族传统思想文化。如建立汉国的匈奴族人刘渊，早年就读过《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幽、冀的一些儒生名士纷纷投靠他。建立前赵的刘曜在长安设立太学，并亲临太学主持考试。后赵统治者石勒虽文化低，但他让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又重用"博涉经史"的张宾为谋士。前燕慕容廆在辽东时虚心引纳中原儒士，慕容皝让大臣子弟到学校读书，自己也到学校亲自授课。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下令恢复太学和地方学校，让公卿子弟入学，规定年俸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经，就要罢遣。汉族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更是重视儒学，成为北方大乱时中原传统儒学的主要保存地。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出现，当时儒学家多兼通道家，这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

南北朝时，南北经学各有不同特点。清末刘师培说："六朝以

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隋书·儒林传》也说：“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西晋灭亡后，中原当权的世家大族和士人纷纷过江，这些人多崇尚儒学，又好老庄，两者结合，阐发经义不拘家法，随意发挥，这是魏晋学风的继续，是南朝经学的主要特点。当时除《诗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用郑玄笺注外，《周易》用魏玄学家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左传》用晋杜预注，都是魏晋人的注。南朝经学另一个特点是因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成讲疏、讲义，并写出比经注更详细的义疏。义疏是指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源委，或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述发挥，如梁武帝撰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内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等。梁皇侃撰有《论语义疏》等。南朝的这些讲疏、义疏成为唐代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的依据。南朝经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礼学发达。这是与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重视等级尊卑有关。如梁经学家崔灵恩对《三礼》尤精，他任国子博士，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他撰《三礼义宗》三十卷（一说四十七卷）杂采郑、王之说，在当时众多礼学著作中出类拔萃。南朝治礼学者中，又对《丧服》特别重视。如雷次宗撰有《礼服》、庾蔚之《丧服要记》、严植之《凶礼仪注》、顾越《丧服义疏》等。

北朝经学的特点是学风保守，撰述也少。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其经书中《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北学著名学者有徐遵明、刘献之、张吾贵、熊安生等。徐遵明讲学二十余年，传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等，他的学生多达上万人。刘献之与张吾贵齐名，都被称为“儒宗”。刘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另撰《三礼大义》、《三传略例》等。张吾贵讲《左传》，兼用杜预、服虔注，学生常有数千人。熊

安生通五经，精三礼，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在北周，任露门博士。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总之，北学基本上属东汉“郑学”系统。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写有《经学历史》，认为这一时期是“经学中衰时期”，周予同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应该说是“经学中变时期”。

二、“贵无”与“崇有”
——玄学和清谈

在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玄学和清谈。

玄学这个词出自《老子》一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就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的研究和解释。它是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结合。所讨论的是一些远离实际的抽象的问题，如有、无；才、性；本、末；言、意等等。

玄学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汉末经学不是烦琐荒诞，便是流于谶纬[①]迷信，不能再作为统治的思想武器。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在儒家以外找寻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使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墨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思想家突破儒家的限制，杂采各家，特别是推崇道家，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玄学。

玄学的产生也有社会的原因。魏晋时期，封建统治者内部演出了一幕幕互相残杀的丑剧，一些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崇尚玄虚的老庄学说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阮籍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

---

① 谶是诡秘的宗教预言，又叫图谶；纬是用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谶纬是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① 于是他们就转向讨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

魏晋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何晏（？—249）和王弼（226—249）。他们两人都处于曹魏正始（240—248）年间，被称为“正始名士”。何晏是曹爽集团中人物，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后被杀。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是一位早熟的哲学家，也是曹爽集团中人，死时年仅24岁，主要著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他们两人的思想基本上一致，都推崇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皆以无为本”。就是说，抽象的、超感觉的“无”是万物的本体，世界上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它生成的。这个学派就称为“贵无派”。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所谓名教，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所谓自然，就是玄学中所讲的“道”，是指天道和人类本性。王弼认为，政治教化是从最高的“道”、“无”派生出来的。这是用老庄思想补充改造儒家思想，以此论证封建统治秩序、伦理道德是合理的、合乎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企图建立新的统治思想，重新巩固封建秩序。

司马氏在与曹氏集团斗争中得胜，意味着被曹操抑制的门阀士族势力抬头。地主阶级中一些非当权派的庶族地主，对现实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嵇康（223—262）、阮籍（210—263）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是大文学家，在“竹林七贤”中最为有名；其他五人为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这些文人因为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嵇康出身寒微、与曹氏皇室是姻亲，娶曹操曾孙女。司马氏掌权后，要拉他做官，他坚决不做，逃到河东。山涛投靠了司马氏，为选曹郎，也拉嵇康任官。

---

① 《晋书》卷49，《阮籍传》。

嵇康写了一封有名的“与山巨源（山涛）绝交书”，表示坚决与司马氏政权对立，后来被司马氏扣以“不孝不仕，违反名教”的罪名杀死。太学生三千人曾为他请愿，但还是被杀了。阮籍的父亲阮瑀，也依附于曹操，他不像嵇康那样积极反司马氏，而是消极反抗。司马懿请他做官，他听说步兵校尉缺额，那里多美酒，又有人会酿好酒，就要求任此职。他上任后根本不管事，终日喝酒，昏昏沉沉，不谈时政，也不评论别人，才保全了性命。



竹林七贤（南朝画像砖）

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崇尚自然，就是主张不溺于名利，不为琐碎礼法所束缚，顺应自然，逍遥自在，而名教是违反人性的，礼教是破坏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因此他们“非汤武”（商周的开国君主，即成汤和周武王）、“薄周孔”（周公、孔子），以“六经”为糟粕。嵇康、阮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名教，实际上是对当权的司马氏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抨击当权的虚伪的名教政治。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礼教，而是主张“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

西晋时期玄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约227—272）和郭象（约252—312）。向秀有《庄子》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他们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如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上下之分等都是合理的；现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当权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圣人。他们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

异于山林之中。”[1] 他们认为每个事物都应各安其位，这样就是自足其性。这些都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为司马氏政权歌功颂德。他们的思想，代表了西晋门阀士族的利益。

西晋时期，与“贵无”学说相对立的，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裴颇（267—300）。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论》。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万有，指存在）是自生的；万有本身就是本体。这是企图从肯定“万有”的真实性，来否定“以无为本”的思想。裴颇反对那些崇尚玄虚的玄学家，认为贵无学派破坏了礼教和社会秩序，造成荒淫放荡的生活风气，给社会带来了危害。他企图再度用“礼教”挽救社会危机。《崇有论》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的攻击，贵无派大官僚王衍曾和他辩论，但裴颇始终不屈。后为赵王司马伦所杀，年仅32岁。

清谈发展到东晋，完全成为口头虚语，纸上空文执政的达官贵人终日口谈玄理，不屑管理具体事务，是导致东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东晋末宋初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编写了一部《世说新语》，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魏晋时清谈玄学的书。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轻诋、假谲等三十六门，语言生动、言简意赅，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三、君主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鲍敬言的《无君论》

在魏晋玄学流行时期，鲍敬言是一位激进思想家。他的著作《无君论》早已遗佚，现在只能从葛洪《抱朴子》中的“诘鲍篇”中以窥见其片断。鲍敬言的生平也只知道他是和葛洪同时代的人，即西晋末东晋初人。

① 《庄子》，《逍遥游》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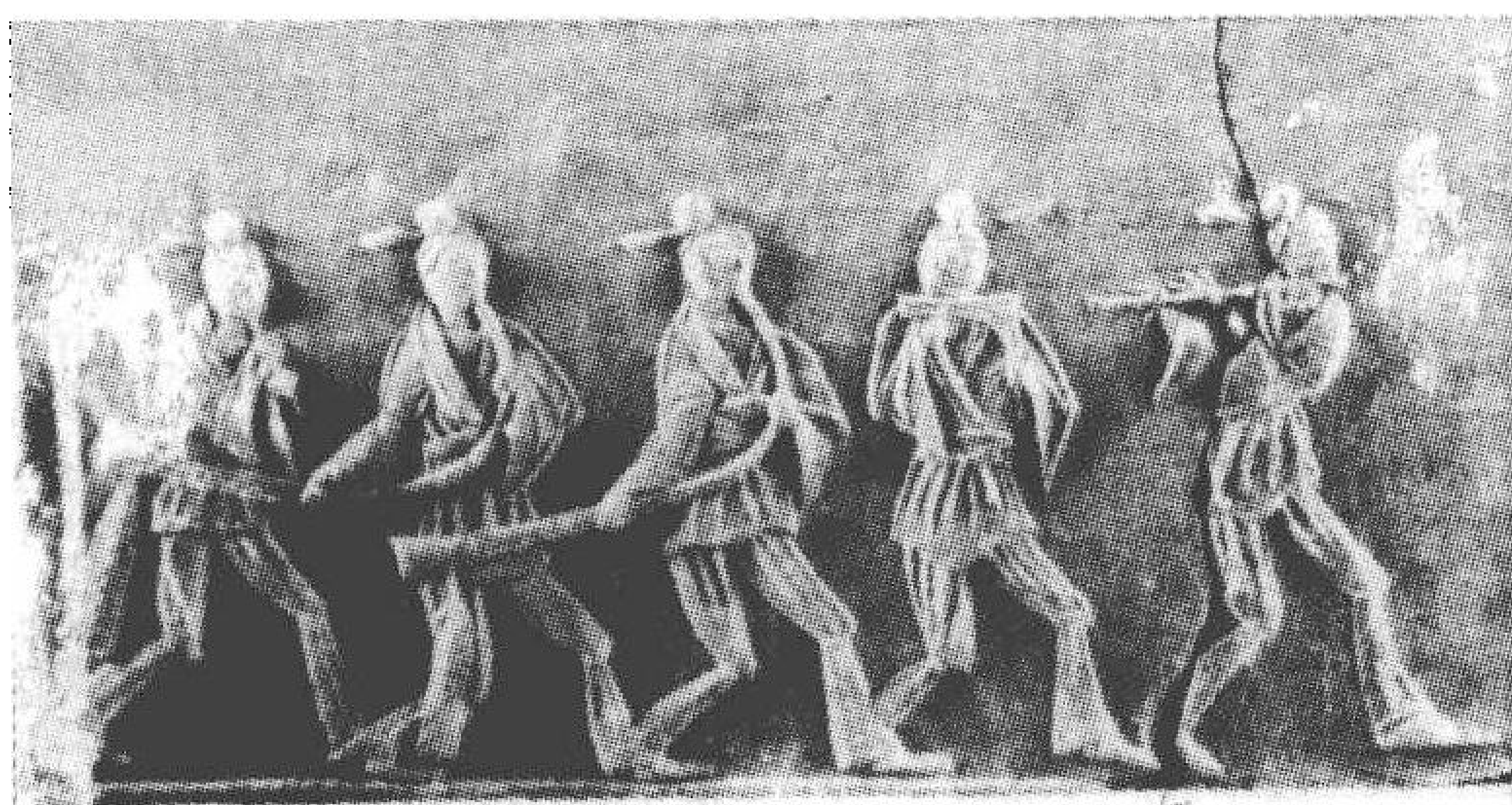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批批名士被送上刑场。何晏说："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百姓们更命如鸡犬，在军阀混战和天灾下，常死于非命。而一些当权者如贾充、何曾之流却还在大谈其君臣礼法。这就更使一些思想激烈的知识分子要去思索社会苦难的根源。他们得出了社会动乱和种种灾难归根到底是由君主制度造成的。

在鲍敬言以前，阮籍就已经提出了无君的思想。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远古开天辟地，万物并生。人们不为利益而争夺，也不会为灾害而逃避。聪明者不以智慧取胜，愚暗者也不因迟钝失败；弱者不必怕强者，强者也不欺负弱者。这是因为无君无臣，万事安定。后来有了君臣、贵贱，欺诈暴虐就产生了。制定礼法是为了束缚老百姓。官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贪污强暴，不顾廉耻。"这种否定君王礼法的思想，到了鲍敬言的《无君论》进一步发展了。

儒家学说宣扬君权神授，认为国君是上天之子；天子有无限权威，人民是不能反对的。鲍敬言认为，君主并不是天之子，而是人类中最强暴的人。他说，自然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而生，天尊地卑的观念是错误的。宣扬天子是上帝任命，这是想当皇帝的人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君主只是一些强暴者。社会上强暴者欺凌弱小者，聪明者欺诈愚昧者，于是产生了君臣。所以君主产生是"争强弱而较愚智"的结果，与天意天命没有什么相干！

鲍敬言认为，君主制度是人民饥饿贫困的根源。他说君主官吏和人民的关系好比獭和鱼、鹰和鸟。"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君主设立百官，老百姓就要穷困。君主官吏利用权力穷奢极欲、肆意享乐，住的是高大的宫殿，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门有车马，后宫有美女，搜罗奇珍异宝；而老百姓住的是茅草小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人穷得娶不起妻子。君主不是神，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依赖手中权力对人民加重夺取得来的。"奉上厚则下民贫"，君主官吏的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痛苦之上的。

鲍敬言认为，君主和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君主贵族穷奢极欲，人民必然饥寒交迫。当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要造反。“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荒仓虚，杼柚空乏，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无乱，其可得乎?”



河南邓县出土南朝墓砖

鲍敬言最高的政治理想是无君的社会。他热情地歌颂了上古时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无君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竞不营，无荣无辱”。“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自由自在，安居乐业，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君主制度和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罪恶。

鲍敬言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备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和一些贫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无君论》是一篇指向封建君主制度的战斗檄文。它表达了对君主制度的强烈憎恨，动摇了神圣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不是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君主，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制度；不是揭露封建社会个别方面的罪恶，而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言论。是封建时代民主性的精华。

《无君论》受到统治阶级的敌视和仇恨，葛洪对它进行了反驳。但鲍敬言没有退缩，与葛洪进行了反复的辩论。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坚持真理的可贵勇气和战斗精神。

《无君论》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认识到君主、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必然；而“无君”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这些缺点并

不掩盖《无君论》的进步性和战斗的理论光芒。

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的发展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的名句。它形象地描绘了南朝寺院佛塔林立、佛教兴旺的景象。实际上，整个两晋南北朝都是佛教大发展的时代。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到了中国。魏晋以后，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现实生活的苦难成为宗教滋长的土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都容易接受佛教。

佛教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灵魂不灭”等思想，所讲的是人死后能不能成佛的问题。它虚构的“天国”虽然是假的，但被压迫人民群众要求摆脱现实苦难的愿望却是真的。佛教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幸福讲得无足轻重，要人们甘心忍受苦难以便到天国得到充分补偿。这就是要劳动人民安贫守贱，放弃斗争。由于佛教能麻痹被压迫人民的意志，起着为人间谬误辩护的作用，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

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从京城及全国的寺院数、僧尼数的发展可以看出：

朝　　代	京城内寺数	全国寺数	全国僧尼人数
西晋	180		3 700
后赵		893	近 10 000
东晋		1 768	24 000
宋		1 913	36 000
齐		2 015	32 500
梁	都内 700	2 846	82 700
陈	300	1 232	32 000
北魏太和元年（477）	平城 100 余	6 478	77 258
北魏末（534）	洛阳 1 367	30 000	近 200 万
北齐	邺 4 000	30 000	近 200 万
北周		10 000	近 100 万

从上表可以看出，南朝僧尼最多时是梁朝，在建康一地达到近10万。北朝则更多。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全国僧尼7万多，过了60年，到北魏末年已激增到近200万。当时北方总人口约3 000万，僧尼占1/15。北齐北周僧尼总数300万左右，则已占当时总人口数的1/10，可见佛教发展之迅速。

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有两大系统：一是小乘（早期佛教），注重戒律和禅定；一是大乘（后期佛教），即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大乘空宗学说①。由于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是玄学，佛教的《般若经》的空宗学说也被玄学化。许多佛学家都籍老庄学说阐述佛教理论。玄学和佛教逐渐融合，出现了更加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般若学在它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家对《般若经》的解释不同，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各种宗派，即所谓“六家七宗”。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道安、慧远为代表的“本无宗”。

道安（312—385）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博学的佛教学者和最重要

① 《般若经》本是印度佛教中一个学派所收集的大丛书。

的佛教活动家。俗姓卫，常山扶柳（河北衡水县西南）人。12岁出家，由于形貌短陋，不为其师重视，驱至田舍劳动。后知其诵经能过目不忘，让其外出游学。24岁至邺，师事名僧佛图澄（232—348），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经卷，精通教义，深得后赵石勒敬重。佛图澄死后，道安开始独立的传教活动，先在河北、山西、河南立寺山居，后赵覆灭，他到了襄阳，在那里研讲般若学、整理经籍达15年。公元379年，前秦苻丕攻下襄阳，道安被俘到长安，为苻坚所尊信，在那里继续讲经和翻译活动。道安一生致力于整理佛经、传播佛教哲学，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对佛教所作的解释，和当时玄学中何晏、王弼一派的贵无学说十分接近。他宣扬一切皆空，认为本体是空无，现象世界也是不存在的，是假象，"象非真象"、"虽象而非象"。所以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即天地万物的"有"是从"无"产生的。这种理论与玄学的世界本源是"无"的唯心主义理论相似，所以很容易与玄学合流，为门阀士族所接受和传播。道安是从各方面谋求佛教在中国独立的第一人，从此佛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北壁说法图

慧远（334—416）是道安的弟子，年轻时即"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他常住在庐山，三十年聚徒讲经，撰著文章，结交达官贵人，对江南佛教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慧远对道安的本无学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发挥了佛教因果报应学说，认为"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而地狱斯罚"①。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作的"业"

① 《弘明集》卷5，《明报应论》。

（思想、言论、行动）的影响是有前后内在联系的；今世做了好事来世就得好报，做了恶事就得恶报。要人人检点自己言行，从而消除不满现实、反抗压迫的意志。他又以为只要念佛持禅，不出家也能成佛。这些理论都十分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佛教和政治进一步结合起来，有了更大的发展。慧远成了南方佛教界领袖。

佛教的发展也曾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即政教冲突。这种冲突在东晋南朝表现为思想上的矛盾，如僧侣该不该向皇帝拜礼等问题。在北朝则表现为两次灭佛斗争。一次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一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的灭佛。太武帝曾坑杀和尚、烧毁经像，周武帝则只是强迫数百万僧侣还俗，没收寺院财产。灭佛是由于寺院在土地和劳动力上与朝廷发生了矛盾。由于佛教毕竟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两次灭佛以后，佛教又很快恢复发展起来。

五、伟大的无神论者

——范缜和《神灭论》

当南朝佞佛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他的不朽名著《神灭论》，就像一声滚过长空的惊雷，震撼着南国大地。

范缜（约 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代。祖先曾做过大官，到父亲的时候，家道中落。他幼年家境贫苦，但学习刻苦。18 岁时离家，跟著名学者刘瓛学习。同学中多为“车马贵游”的纨袴子弟，范缜虽然穿着草鞋布衣，但从不自卑自愧。他学业优良，敢于藐视权贵、讽刺时政，勇于发表“危言高论”。可是，满腹经纶的范缜，也因此遭到门阀士族的排抑。怀才不遇的厄运，摧残着范缜的身心，使他未老先衰，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也锻炼出范

缜的倔强性格。

齐梁之际，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以宰相之尊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僧众献茶上果。梁武帝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京师建康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佛寺和僧众大增，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范缜指斥佛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他说：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所以使得人们抛弃了儒家的服装，披上僧人的袈裟；废掉传统的礼器，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孙绝灭，以至于士兵在战斗中挫败，官吏在府衙内走空，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畜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这都是佛教所造成的。不加遏止，它的祸害就没有边际。这段话表现了他对造成社会祸害佛教的痛恶。

范缜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萧子良展开了激烈论战。佛教理论认为，前世埋下了“因”，后世就要结“果”。人在前世、今世行善，来世便会富贵；反之，前世、今世作恶，来世就会贫贱。有一天，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召集宾客，范缜也在座。萧子良又重弹这套老调。范缜当面驳斥，“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道：“君不信因果，为何人间有富贵贫贱?”范缜认为世间万物皆自生自灭，“各安其理”，根本不存在因果报应，“人生如同树上的花，随风而飘，有些花吹进厅堂，留在茵席上，这就是你殿下；有些花吹落到厕所里，这就是下官范缜。贵贱虽然不同，有何因果可言?”范缜的比喻形象机智，有理有据，驳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经过这次斗争，范缜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又昼夜伏案，振笔疾书，开始了《神灭论》的写作。天监六年（507），发表了传世名篇《神灭论》。

《神灭论》一开头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是著名的“形神相即”观点。形是指人的形体，神是指灵魂，即精神、意识。佛教认为灵魂不死。灵魂附

在人体内，人死，身体可以消灭，灵魂就转移到其他生物的体内。范缜认为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有形体存在才有精神存在，形体消失了，精神也就无法存在了；不存在单独的脱离“形”的“神”。

接着，范缜进一步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这是形“质”神“用”的观点。就是说，形是神的物质实体，神是形的作用，二者虽不同，但是结合于一体的。为了通俗地说明这个观点，范缜用刀刃与锋利作比喻。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刀的锋利离不开刀刃，没有听说过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哪能说形体死亡而精神单独存在呢?

在论证“形质神用”的理论时，范缜强调指出，不同的“质”产生不同的“用”。他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这就是说，人的“质”与木的“质”不同，只有人的质有知，而木的质是无知的。他又进一步论述道，人从活到死，“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有活人的“质”才具有精神的作用，死人的“质”是没有精神作用的。正如活的树木会开花结果，枯死的树木不会开花结果一样。

《神灭论》初稿草成后，人们争相传抄，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朝野喧哗”。萧子良慌忙召集众僧名士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缜，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先生，既然你知道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快快死了去追随他们呢?”闹得王琰十分难堪。萧子良见王琰败下阵来，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去引诱。王融对范缜说：“凭你这样的才能，如果放弃此论，何愁不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要执意坚持异端邪说，自讨身败名裂呢?”范

缜大笑说："如果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中书令或仆射之类高官，何止小小的中书郎?"

萧子良的围攻虽然失败，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梁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继续对范缜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梁武帝下诏，由总管全国僧侣的大僧正法云动员王公权贵 64 人，先后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 75 篇，他自己也下了一道"敕旨"给范缜，即《敕答臣下神灭论》。其中说，孔丘、老聃、释迦牟尼都主张神不灭论，儒家提倡祭祀祖先，你的说法违经背亲，真是无法无天！面对这场泰山压顶般的围攻，范缜毫不畏惧，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又写了一篇《答曹舍人〈难神灭论〉》，其中驳斥上述观点说："祭天神祭祖先都是统治者用迷信说教来影响人民的一种手段。"

范缜的《神灭论》不愧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杰作，它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六、西行求法的先驱者

——法显和《佛国记》

> 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
> 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
> 独步铁门之外，瓦万岭而投身；
> 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

这是唐代名僧义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晋唐时期西行求法僧人旅程中艰难困苦的描述。这些僧人为了取经，在烈日当空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长途跋涉，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颠簸前进。书中把法显与玄奘并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意思是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西行求法者，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法显是开创者，并且基本上是一个寻常的行脚僧，靠自身

奋发，又是从陆路去，海路回，比较起玄奘来，法显的经历更为艰险。

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最初多为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传译经籍，往往篇章不备，或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产生西行求法运动，此后西晋有竺法护，东晋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等。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人到了印度，但只有法显一人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归来。

法显（约337—约422），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人。3岁出家当和尚，18岁受戒，成为佛门子弟。他为求真经，决心西去天竺（印度）。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后秦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同行的有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他们沿着西汉张骞通西域的道路往西走，出了玉门关，进入了沙漠地带，也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意是“进去出不来”。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有时狂风骤起，黄沙蔽天，日月无光。路上只能看太阳定方向，寻枯骨作路标。法显在《佛国记》中写道，“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但是法显怀着坚定的信念，终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越过了塔克拉玛干，来到了世界屋脊葱岭①。葱岭海拔六七千米，终年积雪，山路崎岖，狂风不停。法显一行在悬崖峭壁中攀行，备尝艰难。越过葱岭，到了亚洲西部苏来曼山北部的小雪山（约今阿富汗喀布尔城



法显著书图

① 即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

东南）。这时，突然寒流袭来，同行的慧景支持不住，病倒在路边，他对法显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一起死在这里。"说完就死了。法显扑在同伴身上失声痛哭，然后掩埋好尸体，抹去泪痕，又毅然前进了。

一路上，法显经历了罗夷、毗荼等30余国，终于在义熙元年（405），到达了印度中天竺笈多王朝。法显巡礼了各地佛教故蹟，在巴连弗邑留学3年，学梵文，抄写佛经，如《摩诃僧祇律》、《杂阿毗昙心》等。义熙三年（407）离开巴连弗邑，到达恒河口的多摩黎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抄写经文，然后在义熙六年（409）冬，搭商船航行14昼夜，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这时同行10余人，或中途停留，或死亡，只剩下法显一人。法显在那里又游学两年，找到一些佛经原本，如《弥沙塞律》等，均为中国所未有。

义熙七年（411），法显从狮子国搭一商船返国。船入印度洋，遇到大风暴，船破漏水。同船200余人，都惶恐万分，把行李纷纷抛入海中。法显把经卷看得比生命还重，抱在胸中，口念观世音，求佛保佑。船在海中漂泊90余天，被风吹到耶婆提国（今印尼爪哇）。

法显在耶婆提国又停留了五个多月，在义熙八年（412）五月搭一大商船回国。船在海上航行20余日，又遇到风暴。粮食淡水快要吃完，船上人惊惧万分，商人们认为是法显带来祸害，要把他推下水，幸亏得一施主劝阻相救，才得免难。这时，突然海边出现了一片陆地，绝望的人们重新唤起了希望。

船靠岸后，问二个猎人，方知这里已是中国土地。地属青州府长广郡，当地名叫崂山（今山东青岛市崂山）。法显在崂山停留了几天，带着经书回到东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合作，翻译取归的佛经，先后译出《摩诃僧祇众律》、《方等般泥洹经》（亦称《大般泥洹经》），对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请他写出游历天竺的详细经过，他就写成

《佛国记》一卷，共9 500多字，又名《法显传》、《西游天竺记传》等。

法显以六十左右的高龄，为了自己的信念，奋不顾身西行取经。他从长安出发，经艰难的大沙漠，逾葱岭之险，又从海上归国，一路上饱受风涛之苦，终于返回祖国，前后达14年之久。《法显传》后有一段跋文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充分表达了法显不畏艰险、坚毅伟大的精神。

《法显传》所记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包括南亚到中国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等，还记载了中国和亚洲许多邻族邻国间的密切友谊和文化交流。因而成为研究五世纪初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19世纪以来，除了我国学者以外，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也纷纷从事《法显传》的翻译、整理和研究，他们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

七、道教的演变

——统治者对民间道教的改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儒教、佛教合称“三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原始道教的经典为《太平清领书》，即后世所谓《太平经》，其中虽然有大量维护统治阶级的言论，但也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如主张平均主义、人人劳动等。这些思想曾为农民革命所利用。原始道教的活动，也常常和农民起义相结合。如黄巾起义、孙恩起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对民间道教进行了控制和改造，创立了为门阀士族地主服务的道教。其代表人

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

葛洪（283—363），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仕吴为吏部尚书，父亲在晋为邵陵太守。但到葛洪13岁时，父死，家道中落。葛洪以一个飘零没落的士族子弟，面对当时内外矛盾交织和社会动荡，精神上消极悲观，于是寻求神仙道教以自慰，幻想有个清静恬愉的神仙世界。他向郑隐学炼丹，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娶其女儿。东晋朝廷闻他有史才，选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他固辞不就。他听说交趾出丹砂，求为句漏（今广西北流）令，偕子侄同往，到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于是在罗浮山炼丹，同时著述，后死于山中。



葛洪像

葛洪著作很多，约有38种，数百卷。代表作《抱朴子》内外篇70卷。其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等，是道教的理论。外篇50卷，论君臣上下、人间得失、内有反对鲍敬言《无君论》的《诘鲍篇》，是阐述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政论性著作。总的说来，这部书攻击民间的原始道教，诬之为“妖道”、“鬼道”，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政治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修长，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释滞》）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使道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

葛洪《抱朴子》内篇有一篇《论仙篇》，集中讲了他的神仙可学思想。葛洪认为“有生必有死”是一般的规律，而长生不死的神仙是超乎一般的个别。例如，一般植物都夏天生长，但荠、菱却枯了；一般植物都冬天凋零，但竹柏却茂盛。在这里，葛洪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其实个别是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个别是一般的表现，超乎一般以外的个别是不存在的。葛洪认为成仙要靠内修

和外养两个方面的功夫。内修是内保精气，一是行气，即关于体内元气新陈代谢的理论，类似于后世的气功。二是房中术，主要是节制性欲。三是导引，即导气和引体，类似现在的体操和按摩。四是守一，即形神相合，神不外驰，集中和控制自己的意念，类似现在的心理健康。这些内修之功除去其宗教迷信内容，就其气功、养生、按摩等方术而言，对后世体育、卫生学发展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外养主要是炼丹服药，即服用仙丹。

葛洪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是“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① “玄”又叫“道”、“一”，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产生一切的东西。这种虚无飘渺的“玄”、“道”只能是虚构出来的精神性东西。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少时就爱读葛洪的《神仙传》，颇受其影响，喜好神仙养生之术。及长，读书万卷，对历算、地理、医药都有研究，善琴棋，工算隶。19岁时做了齐诸王侍读的官，很受统治者的赏识。36岁辞去官职，隐居于句容（今属江苏）的茅山，在山中立馆，传授上清经法，自号为华阳隐居，后人遂称他为陶隐居。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领袖。为道教上清派的创立者。他在南朝著名道士陆修静改革原始五斗米道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儒、佛两家的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使官方道教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更好地成为统治者御用工具。他们的道教称为南天师道。

陶弘景的主要著作有《真诰》和《真灵位业图》，是道教的重要经典。陶弘景也是一位炼丹家、医学家和药物学家。（陶弘景在医学和科学上有很大成就，参见《科学技术新成就》一章）。

寇谦之（365—448），是北魏著名道士。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昌平东南）人。南雍州刺史寇赞之弟。早年爱好仙

---

① 《抱朴子》内篇，《畅玄卷第一》。

道，修张鲁之术，18 岁从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后隐居嵩山。神瑞二年（415）伪托有神从天而降，自称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没有人能任天师之位。你的立身行为可为天师，故我来看望你，授天师之位给你，赐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你应宣扬新科，整顿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即租米钱税之类，专以'礼度'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老君还嘱咐他"佐国扶民"。可见寇谦之的新道教就是要排除原始道教中的某些农民革命思想，使之与封建社教紧密结合，成为加强对农民控制的工具。泰常八年（423），又托言老子玄孙李谱文授其《录图真经》。太武帝初，至平城奉献其书，扬言要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得司徒崔浩引荐，太武帝对寇谦之十分尊崇，拜其为天师，专为他在京城东南起天师道场，重坛五层。太武帝亲自到道坛受符箓，此后，北魏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箓。寇谦之的新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两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葛洪、陶弘景、寇谦之就是三位主要的道教领袖，他们都把民间的道教改造成为统治阶级的道教。

第九章　文学、史学和艺术

一、骈文的盛行

——具有时代特征的文风

两晋南北朝是骈（pián）文（即骈体文）盛行的时代。当时不仅文学作品用骈文写，就是一些应用文字，如诏书、表章及学术著作也用骈体文写。如著名的《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文写的。可以说，这时期几乎一切文体都骈偶化。

骈是对偶、并列的意思。所谓骈文，就是一种要求词句整齐对偶的文体；同时也重视声韵的和谐、词藻的华丽。对偶就是把字数相等的两个句子排在一起。一般都为四字句或六字句。对偶是汉语特有的句式，因为汉语为独音体文字，可以字数相等并讲究词义对称。不仅上下两句字数相等，而且句式相同，相对的词其词性也基本相同，使人读时音节和谐。骈文还讲究辞藻的敷设、典故的运用。

中国古代，为了使文章动人，在散文中插入个别整齐对偶的句子是有的。但是后来，文章中的骈偶化已不再是个别句，而是通篇如此。这种文章骈化的趋势，在东汉已经逐渐形成，到两晋南北朝达到了高峰。南朝宋时颜延之、谢庄作文讲究雕琢藻饰、用典故，世称“颜谢”。钟嵘《诗品》序说：“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齐梁之际，骈文达到最繁荣时期，以沈约、任昉、谢朓、王融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永明

（齐武帝年号）体”，修辞更加工整。沈约为当时文坛领袖，创四声八病之说，规定诗中要讲究“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要避免八种韵律上的毛病。这样，在文章中更要有意识地调节声律。每联句末两字声音，平仄互异；而上下相连的两联，音节又相对立；句法上力求匀称，有抑扬顿挫之美。南北朝末年的徐陵、庾信的作品被奉为骈文的典范，称为“徐庾体”。徐陵曾编《玉台新咏》，其序文是一篇辞藻华丽、对仗工稳的骈文。庾信是六朝集大成的作家，也是唐代诗歌的先驱。他初在梁做官，后西魏灭后梁，被留在西魏北周。其代表作《哀江南赋》的序云：

> 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这篇序文也是用骈文写成。叙述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感情。杜甫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晚年诗赋动江关。”[①] 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②] 指出了庾信后期生活遭遇与创作的关系，肯定了他的成就。

梁文学家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是骈文中的优秀之作。南朝梁天监四年（505），临川王萧宏领兵北伐，受到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的阻挡。陈伯之原为南朝齐江州刺史，萧衍代齐，他降梁，仍领原职。后因惧祸，于天监元年（502）投奔北魏。但在北魏他并未受到特别重用。对梁也没有深刻仇恨。丘迟在萧宏军中任咨议参军，领记室。他受命写信给陈伯之，劝他归降。

---

① 《戏为六绝句》。
② 《咏怀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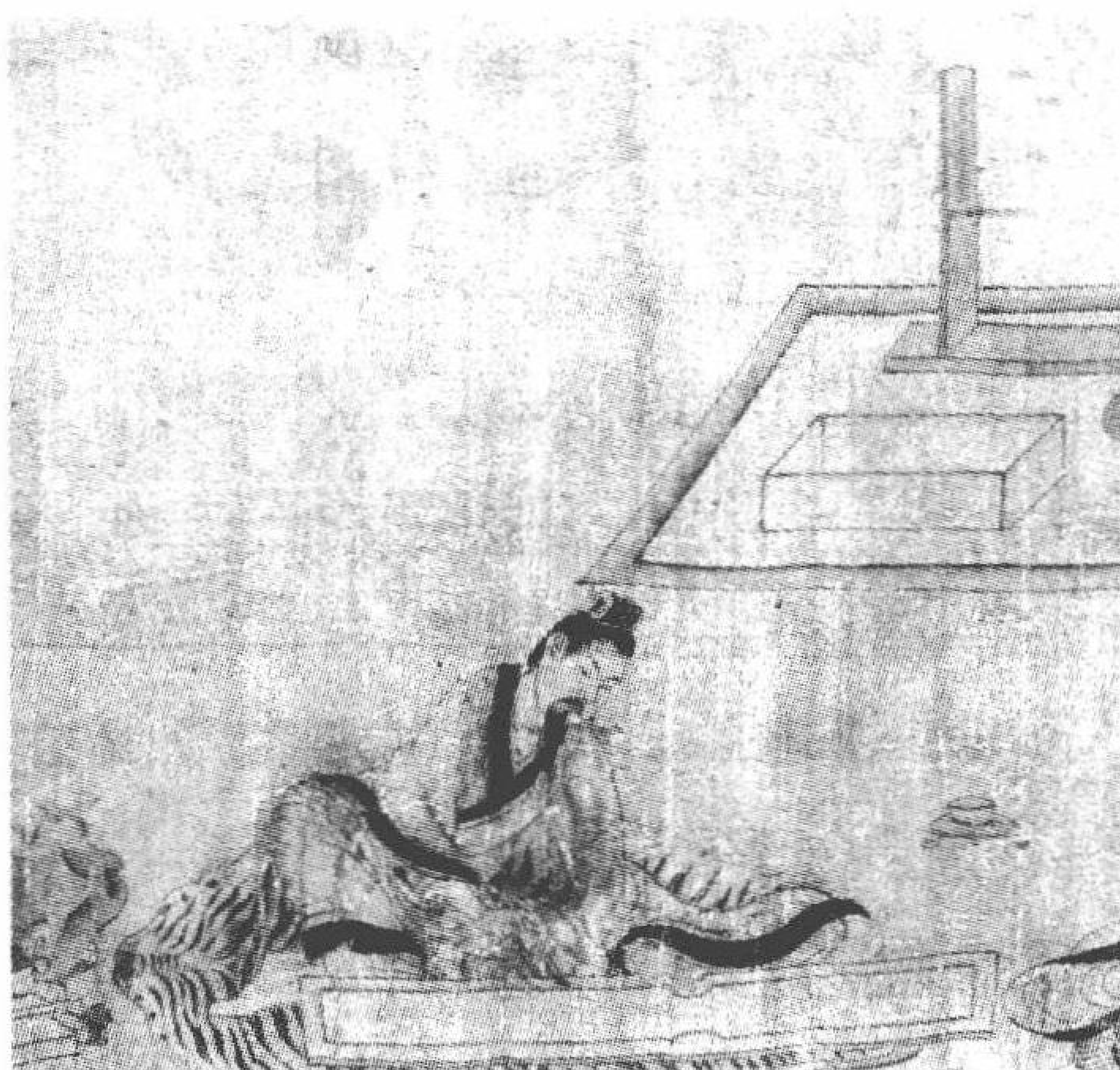
文章第一段云：

>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信的开头，着笔渲染陈伯之往日的才志和事功。大意是：陈将军的勇敢是全军第一，才能也是当今杰出的，不贪恋燕雀的安逸，胸怀鸿鹄般大志。过去你顺应时机，投奔了圣明的君主，建功立业，成为开国元勋，乘着涂着丹漆的华美的车子，持节统治着广大地区，气势是何等的雄壮啊！接着又把他投奔北魏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加以对比：怎么一旦成为逃跑投敌分子，听到箭响就大腿发抖，在北魏人的帐篷里卑躬屈膝，又是何等的卑劣啊！这样，一“壮”一“劣”的鲜明对立，就使陈伯之在心理上发生了动摇。丘迟在信中继续说明梁王朝对他是宽大为怀的。并告诉他家庭平安。又以利害关系开导他，举出历史事实告诫他。指出他投靠北朝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最后，写出下面一段话：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大意是：三月暮春天气，江南草木欣欣向荣，鲜花开在树上，黄莺飞来飞去。当你看到故国军队的旗鼓，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拿着弓箭，登上城楼，怎么能不悲伤！廉颇之所以很想再成为赵国的将军，吴起临走时望着西河而落泪，这就是因为人对故乡有感情啊，将军难道独独没有这种感情吗！希望你早日作出安排，自己去求得更大的福气。这里对江南风光的描写，从感情上唤起了陈伯之



顾恺之《斫琴图》

对故乡景物的回忆。后又举名将廉颇、吴起的范例，以反诘句从感情上打动他。文章文辞清丽、情意缠绵，用事精当，足令受者恻然心动。后来陈伯之果然带了八千兵士投降了。

在两晋南北朝，由于门阀士族生活贫乏，他们的文风只追求形式上的辞藻华丽和对偶工整，因而使一切文章都骈偶化。骈文大部分空虚贫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也有少数作品有一定内容；有一些文章写山水景色，清新优美，有一定成就。如梁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写从富阳到桐庐一段的山光水色，景物奇丽，富于诗情画意，是骈文中的佳品。此外，也应看到，沈约为首的“声病说”，也为我国诗歌讲求声律奠定了基础，对后来律诗、绝句等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一点积极作用。

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田园诗人陶渊明

晋宋之际，正当文坛上盛行雕琢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时，出现了一位现实主义诗人陶渊明。他留下的120多首诗中，大多是真实反映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没有华丽或艰涩的词句，语言自然平易近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许多歌唱农村景色和村居生活的诗，平淡、朴素，散发着泥土的清新芳香。由于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的悠闲生活，因此被人称为“田园诗人”。田园诗也就成为中国诗史中的一个流派。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侃作过大司马。祖父茂、父逸曾做过太守。但到陶渊明时，家道中落，生活艰难。陶渊明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地熏陶，少年时就怀着建立功业的壮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东晋太元十八年（293），他29岁时，出来做本州江州（治柴桑，辖境相当今江西福建）的祭酒，不久辞归。元兴三年（404），到了40岁，又出作刘裕的镇军参军。次年又作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在官场，他目睹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谄上骄下，污浊腐朽，感到这个黑暗的社会是和他志气和个性格格不入的。因而三次出仕，又三次归隐。在他41岁时，由于家贫，子女幼小，为生计所迫，他又出仕彭泽县（今九江市东彭泽西南）令。到任不久，他就感到内心十分矛盾。“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吃饭穿衣虽然重要，违反本性，则在精神上更大的痛苦。一天，郡里督邮到县。县吏劝他“应束带见之”，以示恭敬。陶渊明本性正直耿介，说：“我岂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离职还乡。这次出仕仅80天。从此不再出来做官。以后20年，在农村度过终生。颜延年《陶征士诔》说陶渊明“薄身厚志”，确从其一生概括出了他的个性。

陶渊明回家后，写了一篇《归去来辞》，描写他归家后的喜悦心情。同时，他认为过去出仕是“心为形役”，即心志为形体役使，为生活所迫违反了本愿。现在则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下决心与腐败的官场决裂。这是陶渊明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以后，他经常参加劳动，接近劳动人民，从生活中吸取了养料，使他的作品具有真实感情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他的许多杰出作品都是在归隐后写的。

他归隐后写的有名的《归园田居》，以兴奋的心情写出了田园景物的美好和他对生活的热爱。其中第一首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

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故事图

在诗人笔下，农村里的田园景物是多么美好。十多亩宅地，八九间草屋，堂前是桃李，屋后榆柳成荫。远处炊烟袅袅，近处几声鸡鸣狗吠。诗人不厌其烦地叙写住宅远近景物，正是为抒发刚从尘网中脱身回到自由境地的一种欢舒心情。更重要的是诗人流露出他不愿与现实的官场同流合污，不愿意违心地随俗浮沉。他把仕途称为“尘网”、“樊笼”，他感到离开他所憎恶的污浊世俗，就好像鸟飞归山林，鱼游回池塘。

陶渊明弃官归隐后，在44岁那年家中遭到一场火灾，旧居被烧毁，他的农田又不断受到灾害。这时他“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有时甚至不免于乞食。但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境地里，他仍然洁身自守。有一天，他卧病在床，已有几天断粮。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了米和肉，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天你何苦如此呢?”劝他出仕。陶渊明答道：“我哪敢与贤人相比呀!”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对他送来的米肉，亦“挥而去之”。表现了诗人不愿意与这些贵族官僚沆瀣一气的高尚气节。不久，陶渊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终年63岁。

陶渊明的代表作品中有一篇是《桃花源记》。那是《桃花源诗》的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故事大意是：东晋太元（373—396）年

间，有一个武陵捕鱼人，沿着溪流划船前行，走迷了路，忽然发现一片桃花林。渔人十分奇异，继续往前。林的尽头正是溪流的源头，有一座小山，山边有一小洞，洞口隐约有光。渔人下船入洞，开始很狭，走了一段，眼前突然开阔明亮。里面土地平坦，房屋整齐，风景秀丽，男女老少衣着与众不同，个个安适自乐。他们见了渔人，十分惊奇，问从何而来。渔人一一回答。于是便邀请渔人至家中，杀鸡温酒款待。渔人从谈话中知道他们的先人是避秦乱住到这里来的，久而久之，遂与外人隔绝。不知道世上已经历了秦汉魏晋等朝代。村人得知外界消息，个个叹惋不已。数日后，渔人告辞。在回家路上处处做了标记，到了武陵郡见了太守，说了如上情况。太守立即派人随渔人前往，寻找标记，结果迷了路，什么也没找到。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到过桃花源。

这是一篇美丽动人的寓言，描写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桃花源的社会是多么令人向往！那里没有官吏，没有捐税，“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一切都是淳朴安乐。这与现实社会中尔虞我诈，欺压剥削，动荡不安，对比多么鲜明！诗人对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曲折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诗人的思想与鲍敬言的《无君论》一脉相承，表达了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

陶渊明的诗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他的坚贞不屈的精神，是我国知识分子高尚品质的体现，对后世文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他的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三、《敕勒歌》与《木兰诗》

——南北朝民歌

民歌是从民间产生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是劳动人

民真挚感情的流露。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民歌又一个发展的高峰。当时的一些民间作品，因为主要是乐府[1]所搜集，后人就称为“乐府诗”。这些诗集在宋朝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分别隶属于“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杂歌谣辞”六类。

南朝的乐府民歌流传下来的有480余首，全在“清商曲”之部。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西曲歌”、“神弦歌”三部分。“吴声歌”产生于江南，以当时首都建康（今南京市）为中心。这里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产生时代大致在东晋至宋文帝时。“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宜昌）、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地为中心。这里是西部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也很发达，产生时代大致在宋初至梁时。这些诗由于地域不同，风土情调迥异。吴歌婉曲柔和，西曲急迫紧促，但都是描写爱情相思和离愁别恨的情歌，多出自女子之口，具有缠绵婉转、清新秀丽的特点。“神弦歌”为民间祭歌，数量极少，内容也较简单。

“吴声歌”中以《子夜歌》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材。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来表达少女的天真和痴情。如：

>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 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

写少女夜晚相思出神，不能入眠，仿佛听见情人断断续续的呼唤声，而空自答应。又如：

---

[1] 汉武帝时设乐府，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采诗”，目的是“观风俗”，也为了宫廷娱乐。魏晋时期，乐府仍然不废。

侬（我）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
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这首诗说一个少女把自己比作北极星，爱情专一，而所爱的男子却犹如白日，朝东暮西。

“西曲歌”中，大都是描写女子在水上船边与旅客的离别感情。如：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
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江津在湖北江陵附近。这里布帆丛集，远行船只很多。诗歌描写了女子送行时的深厚感情。

南方民歌由于主要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商业城市，因而多数反映城市生活，很少乡土气息，但其所抒写的感情仍极真纯、质朴、健康，与统治阶级的“宫体诗”截然不同。在形式上，它一般都是五言四句，对以后唐代五言绝句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收集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共约60多首。一部分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一部分是北人用汉语创作的。其中也有不少汉族的民歌。

北朝民歌题材宽广、内容丰富。除情歌外，还有战歌、牧歌，以及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歌谣。这些歌辞描绘了北方辽阔壮丽的景色，抒写了健康坦率的爱情，表现了北方各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具有豪放爽朗、慷慨激昂的风格，其价值较南方民歌为高。

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qióng）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诗的作者斛律金（488—567），本为敕勒族酋长，为东魏开国功臣，除大司马。孝静帝武定四年（546），他随高欢攻北周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高欢失败发病。军中讹传欢死，为安定士兵，高欢命斛律金唱此歌，自己和之。歌本为鲜卑语，后由汉人用汉语记录下来。敕勒川本为敕勒族所居地名，在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阴山之南土默川平原一带。这首诗仅27字，却写出了浑朴苍莽的草原气息。阴山下空阔无垠的大草原，景色如画，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最后一句见出水草畜牧之盛，形象真切。全诗一气贯注，音调浑壮，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北朝民歌中最突出的代表作是《木兰诗》。诗中塑造了一位女英雄的形象。她在父老、弟幼而又必须出征的情况下，毅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十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并未被同伴识破。胜利归来后，她不要封官受赏，情愿回到故乡做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木兰以一个年轻的女子做出了同男子一样英勇的事业，是对封建时代男尊女卑观念的大胆否定。她的淳朴、勇敢、坚毅、热爱劳动、机智等性格，是中华妇女各种优秀品质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成为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女英雄。木兰这一艺术形象一直在广大人民思想感情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木兰从军图

《木兰诗》在艺术上也有很大特点。它以质朴生动明快的语言、诙谐的情趣表达出丰富的思想感情。它连续运用复叠和排比，造成节奏和音乐性。它叙事有详有

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四句，以精练的笔墨，勾画出木兰长期军戎生活的一斑。“爷娘闻女来”六句，以三排同样的句式，极力铺陈她将抵家时家人欢腾的情景；接着又连用四个排句，叙述她到家时的急切、狂喜心情。最后四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用双兔的比喻作结束，把一件不平凡的事写得好像仅仅是乔装使人感到雌雄莫辨，让读者感到无穷的回味。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说法不一。大体上有汉魏说、南北朝说、隋唐说三种。近年来较多研究者肯定它是北朝诗。从诗中反映北朝游牧部族强悍尚武的社会风气，从诗中黑山（或作黑水）、燕山等地名来看，故事的背景可能是北魏和柔然的战争。不过在流传过程中经过隋唐文人的加工修饰。

在南北朝，正当统治阶级宣扬枯淡无味的玄言诗、奢侈腐朽的宫体诗时，民歌以其鲜丽活泼、雄健朴质的风格，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和传颂。这些民歌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的精神和品格，反映了人民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它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

四、《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

——三部总结性的文学著述

南朝，主要在梁朝，产生了三部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就是《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这些作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自曹魏建安年间以后，文学艺术由经学附庸转而独立发展，出现了文学史上空前繁荣的盛况；各种文学形式由发展而趋于成熟，于是文学批评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也需要选录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学总集。

《文心雕龙》，梁刘勰撰。50篇，3.7万多字。刘勰（约465—约

532)，字彦和，山东东莞莒（今属山东）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幼年丧父，笃志好学，因家贫，依附和尚僧佑，做过佛经整理工作，同时也深入钻研儒家经典。约在他三十三四岁时，写成了《文心雕龙》一书。这部书起初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刘勰就背着这部书装成一个卖货物的，等候当时大官僚、文坛领袖沈约出来，在他的车前送上去。沈约读了，大加赞赏。从此，这部书才被看重。刘勰在梁代官至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50 多岁时，出家当和尚，僧名慧地，不久死在佛寺里，著有《灭惑论》等。

《文心雕龙》是一部总结性的文学评论专著，也可以说是古代的一部文学概论。内容主要有：（1）文学总论，讲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有文采，但应该是由相应的内容所决定的自然文采；又认为应该以儒家经典为原则，以圣人为师，即所谓“师乎圣，体乎经”。这是全书的指导思想。（2）文体论。论述了文体的起源和发展概况；解释文体的名称、意义；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体进行评论；总结不同文体的特点及写作要领。（3）创作论。即创作应遵循的准则。诸如创作前素材的准备、创作过程中的想象和构思，文章结构、篇章、造句、遣词。大多是文学理论史上第一次所作专题论述。是本书的精华部分。（4）批评论。即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既要注意内容、思想、主题，又要注意形式，如布局、造句、用典、声律等。最后一篇《序志》，说明作者写此书的动机、意图、态度，以及全书内容的安排等。是总结全书的自序。

《文心雕龙》针对当时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风气，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内容。他认为文学应该经世致用；主张先内容后形式，内容对形式起主导作用。

《文心雕龙》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巨著，乃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结果。在这以前，讨论文学的有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等，但都偏而不全。刘勰对于每一个具体问题都以专篇阐发，加以系统、全面、深入地讨论。因而成为

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诗品》是专门评论五言诗的文学批评名著。作者钟嵘（？—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梁时官至晋安王记室。成书大概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以后。

《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诗的总结。它把两汉至梁122位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列入上品的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对每个作家都给以扼要的评语，直率褒贬，而在上、中品里，并指出每家诗体的本源。

钟嵘对评价诗歌的标准提出了正面主张："韩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①]"风力"是指内容，"丹彩"指词藻，就是必须兼有充实的内容及华美的文采，耐人玩味，受到感染，这才是诗歌的高峰。他在古诗中最推颂曹植，认为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诗品》反对当时贵族文坛的诗歌一味追求声律，滥用典故。他认为这样做"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文章殆同书钞"，违反了自然的真美与和谐。他主张诗歌必须有真实的感情，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特别可贵的是，他重视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矛盾，将它作为诗歌创作的动力。

《诗品》不足之处，是把作家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不能正确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如把潘岳、张协置于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是不公正的，但它毕竟开了结集评诗的先河。

《文选》，30卷，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撰。萧统是梁武帝长子，因死后谥昭明，所以又称昭明太子。他喜山水，爱好文学，其东宫藏书近3万卷，名士云集。这部《文选》是他召集当时著名学士编纂的，故《文选》又名《昭明文选》。

---

① 《诗品》序。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共收录了从周代至六朝一千七八百年间130位作者的作品500余篇。上起子夏、屈原，下至当时，按文体分为诗、骚、七、诏、册等38类，各类中以诗、赋两类所收作品为最多，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选录的范围，凡属经书、诸子、历史传记等一律不选，但历史传记中的赞、论、序、述却可选录。萧统对文章的选择标准，在序文中作了说明，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事"指题材，描写任何题材，必须有意义，经过深沉的艺术构思。"义"指文章思想内容，"翰藻"即有文采的辞藻。即在表现形式上必须有语言文采之美。所以在《文选》中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及六朝骈文占去了相当大的比重。

《文选》问世以后，1000多年，一直行世不废，成为一部有重大影响的选本。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除了儒家经典外，以一部书为学者们所研究而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并不多，如研究《红楼梦》，称为"红学"，而专门研究《文选》的，被称为"选学"。唐代以诗赋取士，注重文采，《文选》就成为读书人的案头必备书。唐士人说："《文选》烂，秀才半"。大诗人杜甫告诫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文选》最早注释本是唐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引用古书1 700种，被历来学者推崇为"淹贯古今"，大量亡佚的古籍赖此书得以保存。

《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三部书相辅而行，使后人可以大致了解齐梁以前文学的全貌。

五、《三国志》与《后汉书》

——史学的重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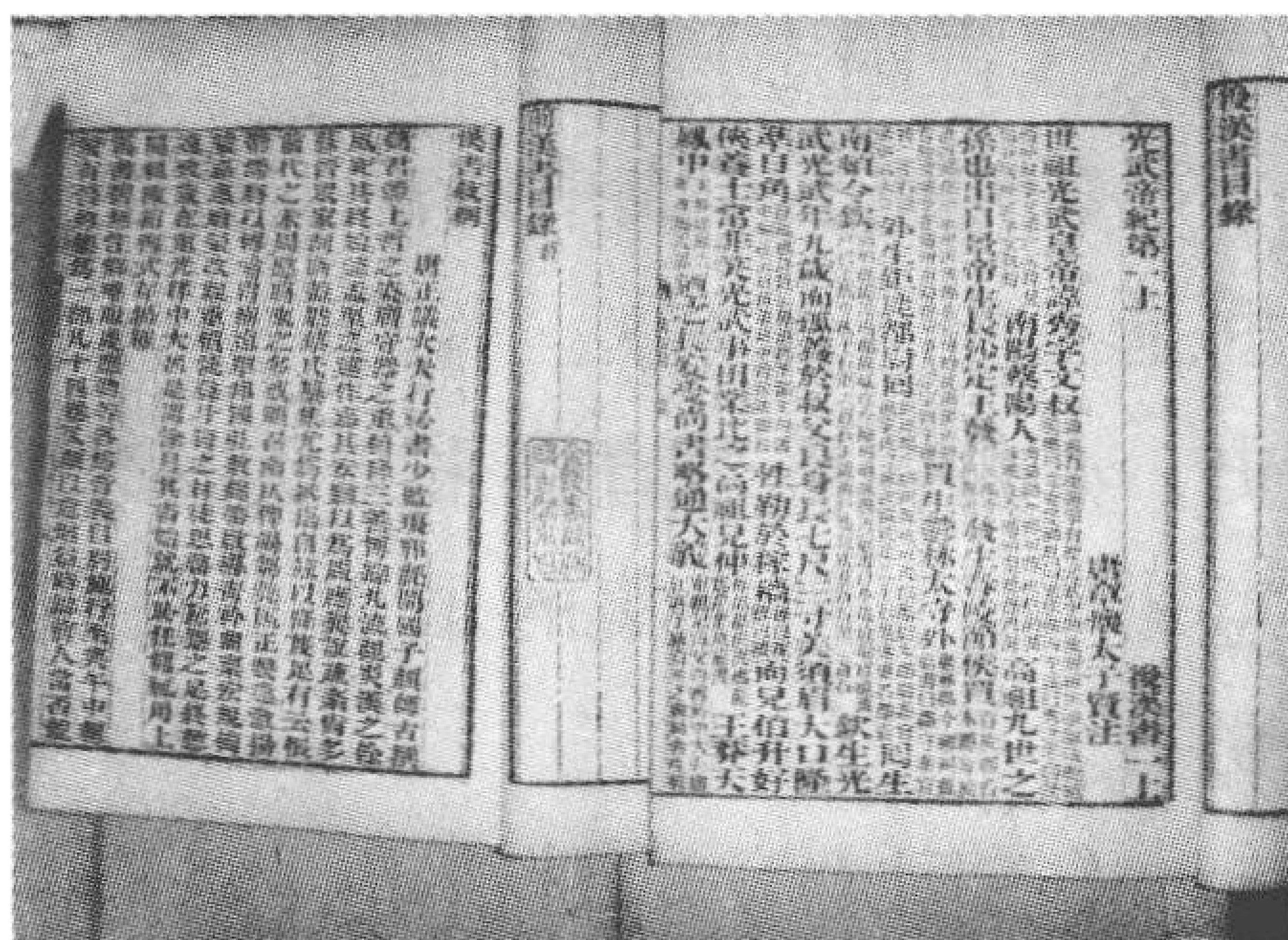
两晋南北朝是史学有重大发展的时代。这主要表现在：（1）史

学从过去经学的附庸，发展为一个独立部门。西晋荀勗把图书分为四个部类，甲：六艺、小学；乙：诸子、兵书、术数；丙：史书，杂事；丁：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把乙、丙两部对调，大体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到《隋书·经籍志》就真正奠定了四分法。（2）史著急剧增多。据《隋书·经籍志》，史籍数量多达874部，16 000多卷，约占当时图书种类卷帙的1/5和1/4。私家修史发达。《隋书·经籍志》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如记述东汉的史书有：吴谢承《后汉书》；西晋薛莹《后汉记》、华峤《汉后书》、司马彪《续汉书》；东晋谢沈《后汉书》、袁宏《后汉记》、袁山松《后汉书》；南朝刘义庆《后汉书》等。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正是在以上众多的著述基础上产生的。范晔以后，还有梁萧子显的《后汉书》、王韶的《后汉林》。三国、晋、南北朝的历史也是如此。（3）史学领域扩大，种类、体裁多样化。有通史、断代史，有编年体、纪传体。除"正史"外，还有讲典章制度的"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讲少数民族史的所谓"霸史"，讲舆地之学的"地理书"，讲姓氏之学的"氏姓之书"。有专门的传记史学"杂传"，有打破纪传体束缚的"杂史"，有地方性的史书，有谱牒之学，有佛教和道教的史书，等等。可见史学领域已打破了纪传体"正史"的框框，出现了许多新体制、新部门的著作。出现史学繁荣局面主要是由于社会动乱，官府控制史学的局面被打破了。史书除了官修的以外，又有不少私修，互相竞争，造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纸的普遍应用，也为史书的涌现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是《后汉书》和《三国志》，这是著名的前"四史"中的后两部（前两部为《史记》、《汉书》）。

《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80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本要继续编写十志，但未完成。梁刘昭为了弥补范书无志的缺憾，把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部分抽出，加以注解，分为30卷以补范书。

范晔（398—446），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出身世族地主家庭。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祖父范宁，东晋豫章太守，父范泰，宋侍中。范晔在宋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专掌禁旅，参与机要。后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迎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入狱被处死刑，时年48岁。



《后汉书》书影

范晔约在元嘉九年（432）被贬为宣城太守时开始修史。他的主要兰本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也参考了其他各家，“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他对自己的书自视甚高，特别是“论赞”和“序”，认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是吾文之杰思”。《后汉书》有些传刻划人物很成功。如臧洪意气慷慨，激动人心；大官僚胡广贪位惧祸。文字简洁，叙事明白，无愧于“四史”之一。范晔还独创了一些新的类传，如“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通过这些类型的人物，宣扬儒家的封建纲常伦理。《后汉书》问世后，众家所修后汉史书逐渐失传，这也证明他的这部史书确是修得成功的。

《三国志》，陈寿撰，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共65卷。《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

陈寿（233—297），蜀汉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字承祚，经学大师谯周的学生，为人好学、质直，有良史之才。任蜀历任卫将军，东观秘书郎。入晋以后，受中书令张华推荐，除佐著作郎。官至御史治书。太康元年（280）开始编写，完稿后，颇为人们赞赏。著作除《三国志》外，还有《诸葛亮集》、《益都耆旧

传》、《古国志》等。

《三国志》成书以前，魏、吴二国都曾修史，陈寿此书主要根据是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等书。惟蜀国无史，必须由陈寿直接采集资料来写。陈寿是蜀人，在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采集的虽然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但终于完成蜀书。

《三国志》取材精审，文笔简要。它把三国分为三书编写，在断代史中也别具一格。由于陈寿的史学、文学都很好，所以后人把这部史书也列为“四史”之一。

《三国志》的缺点是内容过于简略，仅有纪、传，没有表、志。在陈寿死后130多年，南朝宋裴松之（372—451）为它作注。裴松之引各家史著达210种。注文超过陈寿原书数倍，这些书后来大部佚失，赖有裴注，才得流传能见到概略。裴松之注书，兼容并包，广集诸说，求同存异，自己不加评判。这种注法，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裴注完成后，宋文帝赞美说：“此为不朽矣。”

此外，有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修撰的也不少。如晋书多至20余家，可惜唐初重修《晋书》后，这些书大多湮没无闻。此外，留存至今的有梁沈约撰的《宋书》，共100卷，记述南朝宋的历史。其八志，不限于宋一代，而是上继《汉书》、《后汉书》志，弥补了陈寿《三国志》以来史书的缺略。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记述南朝齐的历史。《魏书》130卷，北齐魏收撰，叙述北魏的历史。这三部史书都在二十四史中。

这时还有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即西晋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挖魏襄王的冢墓，得竹简古书数十车，共10多万字。比较重要的有《竹书记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史；《琐语》中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西王母的故事。汲冢竹简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先秦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有很大发展，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右军书法千秋业

——王羲之的书法

我国书法是一种特有的艺术。我国书体的演变大体上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秦以前有大篆，秦统一后作出标准文字称小篆，汉初通行隶书，汉末出现楷书，楷书的简化体为行书和草书。汉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盖由隶书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①] 魏晋以后，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以及世族名士注重交往，尺牍（书信）往来讲究书法优美，书法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东晋的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后世称为“书圣”。



王羲之《兰亭集序》

王羲之（303—361 或 321—379），字逸少，出身于世家大族，是东晋初年王导的侄子。生于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后因欣赏会稽（治今浙江绍兴）的山水，便定居于会稽。他历任中央和地方州郡的大官。任会稽内史时曾进谏朝廷，请减省赋役，开仓济贫。他做过右军将军，因而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王羲之少时沉默寡言，学书法不拘一格，十分认真。他走路、吃饭都在揣摩书体，

---

① 《揅经室三集》卷一。

心里想着，手指就在身边划，日子久了，衣服都被划破了。他每天练完字总要到门前池塘里洗毛笔、砚台，时间长了，池水尽黑，故称“墨池”。这些传说，可能有所夸张，但王羲之刻苦学习书法的精神却是真的。王羲之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见到我国不少大书法家的手迹，如李斯、蔡邕、钟繇、张芝、张昶等，他都一笔一笔仔细临摹过。相传他到53岁，不怕年老，还在临摹古人碑帖。一次上床睡觉，他用手临空划字，不知不觉划到他妻子身上，他妻子气道：“你怎么老在人家身上划呢？自家体没啦！”王羲之听到“自家体”，忽然悟及应该创造自家的书体。从此以后，他博采众长，吸取各家精华，得千变万化之神，再加勤练，果然自成一体。他的字笔势典雅流畅，结构严谨，人们形容他写的字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在王羲之作品中，以行书《兰亭集序》、楷书《黄庭经》、《乐毅论》最为著名。

《兰亭集序》写于东晋永和九年（353）。这一年三月初三，正是“禊（xì）节”[1]。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集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地方，按照“修禊”习俗，举行“曲水流觞（shāng，酒杯）”的雅集。各人分坐于曲水之旁，借着宛转的溪水，以觞盛酒，置于水上。彼此相约，觞至谁的面前，谁就饮酒吟诗。一觞一咏，42人中，王羲之等11人各自赋得四言、五言诗各一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另16人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各罚三大杯酒。王羲之十分高兴，决定为这几十首诗写篇序言。这篇序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

>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

---

[1] 周代巫术迷信流行，每年三月上旬的“已”日，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叫“祓（fú）除”，也叫“修禊”。祓指巫术仪式，禊有清洁之义，“修禊”取洗涤积秽、祛除不祥之意。后来把修禊与踏青游春结合起来，形成临水宴饮风俗。参见“社会生活”一节中“岁时节令”。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

《兰亭集序》字体潇洒流畅。原文28行，共324字，其中凡相同的字，写法都各自不同。20个“之”字，7个“不”字，还有“感”、“怀”等，笔法、结构都多方变化，但又不离奇古怪。这篇作品，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自唐以来，为历代书家所推崇，视为“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书法中最好的珍品，是他的代表作。

《兰亭集序》手迹传到唐初。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从辨才和尚[①]手中得到了《兰亭集序》真迹，视为国宝，不肯轻易示人。命名手赵模、冯承素等拓摹一些副本分别赐给近臣。他爱书及人，专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尽善尽美”。由于唐太宗的推崇，唐初王羲之书法盛极一时。当时书法名家欧阳询、褚遂良等都临摹过王羲之的真迹。由此，唐初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改变了过去南师王帖、北宗魏碑的局面。一般公文、碑铭也用楷书、行书、草书撰写，使王羲之的真书成为全国通行的书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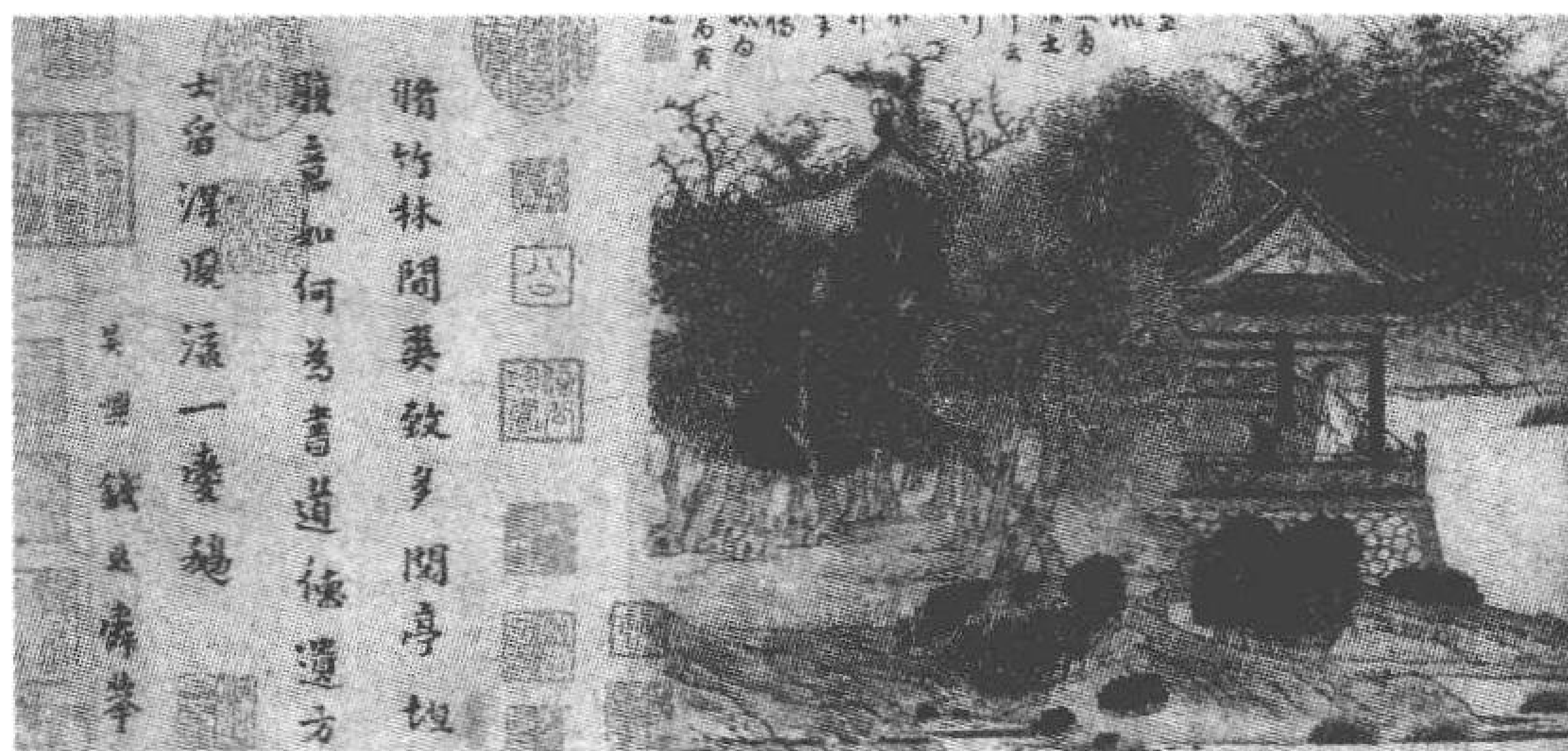
可惜的是唐太宗死后，将《兰亭集序》一起殉葬昭陵，后来墓又被盗，手迹从此失传。后世流传的只有摹本。清朝乾隆皇帝同样喜爱王羲之字，曾下诏令竭力搜寻《兰亭集序》序帖，经他与一些名家反复鉴定，选出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柳公权、董其昌等八个摹本，合称“兰亭八柱帖”，今天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算是今天能见到的有关兰亭书帖中较为名贵的珍品了。

《黄庭经》原是道教的经卷，以歌诀讲述修身养性原理。相传

---

① 王羲之死后，《兰亭集序》传到他七世孙智永和尚手中，智永死后，无后代继承，原书就落入他徒弟辨才和尚手里。

王羲之有一次，在山阴道上闲步，看到许多漂亮的白鹅十分喜欢。王羲之找到了鹅主人——一个道士，那道士正在如豆的灯光下埋头写字，王羲之一看抄的是



王羲之观鹅图

《黄庭经》。道士说：“年老了，眼睛不济事，写不好哩！”王羲之说：“我可以代劳一下吗?”道士连连说：“那太好了，太好了。”赶忙倒茶磨墨。王羲之就认真地书写起来，一口气写完，天都快亮了。道士就送一只大白鹅给王羲之。原来那个道士是个仙人，后来就升天了。李白有诗说：“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1]

王羲之的七个儿子都爱好书法，以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羲之为了培养他，写了一篇《乐毅论》[2]，叫他临摹。由于王献之发愤努力，认真磨炼，终于也成为有名的书法家。他与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世人称王羲之为“书圣”，王献之为“小圣”。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所以为后世所珍重，主要是由于他能够继承传统，博采众长，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因而达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

七、画像点睛

——顾恺之的绘画

东晋兴宁二年（364），江宁（今南京市）的和尚慧力主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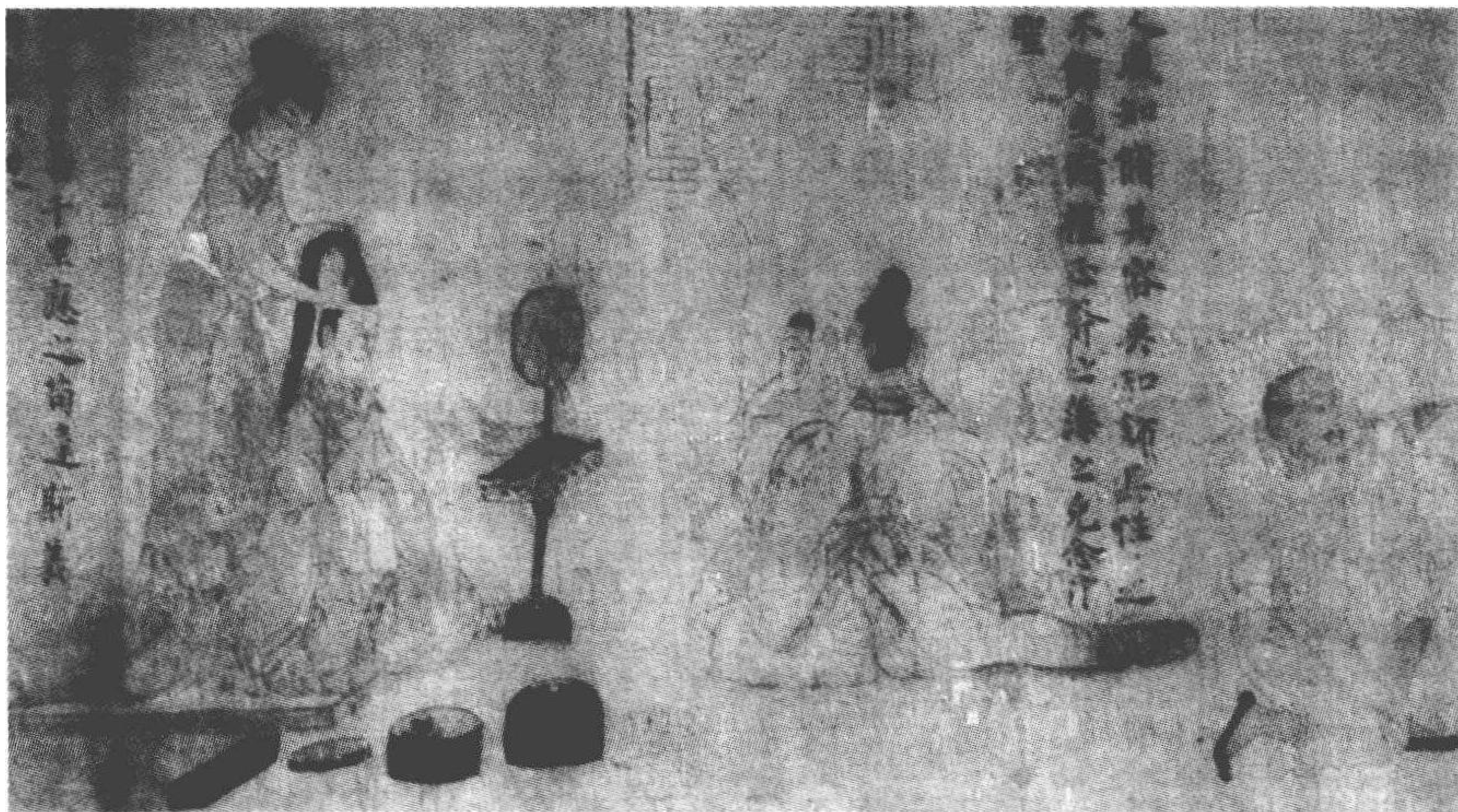
① 这是按南朝何法盛《晋中兴书》的记载。《晋书·王羲之传》说写的是《道德经》。

② 这是一篇评论战国时燕国大将乐毅的一篇文章。

兴建瓦官寺①，寺僧们为筹集资金，向士大夫名流募集布施。一般官绅认捐的都不超过10万钱，可是20岁左右的顾恺之，却在布施册上挥笔写下了100万钱。大家都知道他并不富裕，以为他是在说大话、开玩笑。事后，寺僧和尚请他交款。顾恺之说："请在新盖的寺庙内，准备好一堵白墙，我自有道理。"和尚一一照办了。顾恺之来到寺中住下，闭门一个多月，不与人往来，专心致志在白墙上画着一尊菩萨，叫维摩诘。维摩诘是印度梵文的译音，意思是清净无垢、声名远布，俗称舍粟如来，是很受佛教僧侣们尊敬的一座菩萨。像已画成，就是眼睛还未点上。顾恺之对和尚说："明天我要给维摩诘点眼睛，请大家来看。第一天来看画的要捐10万钱，第二天可以减半，第三天随意布施。"消息传出，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顾恺之站在像前，沉思片刻，然后轻轻两笔，给画像点上了眼睛。顿时，画像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围观者无不赞叹称绝。寺僧们很快就收足了百万钱。这就是顾恺之画像点睛的故事。

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小名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出身于江南名门世族。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不但会绘画，而且善书法，工诗赋。青年时在桓温手下任大司马参军，桓温死后，又为殷仲堪参军。在这期间，他到过四川、湖南、江苏、浙江，饱览了祖国壮丽山河，丰富了对大自然的感受。顾恺之为人诙谐，人们都很喜欢他。他吃甘蔗，总是从头吃到根，叫"渐入佳境"。他曾有一橱珍贵的画寄在桓玄处，后桓玄偷了画，把空橱还给他。他却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好像人之登仙。"毫不在意。顾恺之自己说："我是一半痴、一半黠。合在一起，刚好平衡。"意思是他既醉心迷恋自己的事业，又有点聪明而狡猾。

① 遗址位于南京市西南凤凰台，以掘地有瓦棺得名。唐时寺和画尚在，后寺毁不存。



顾恺之《女史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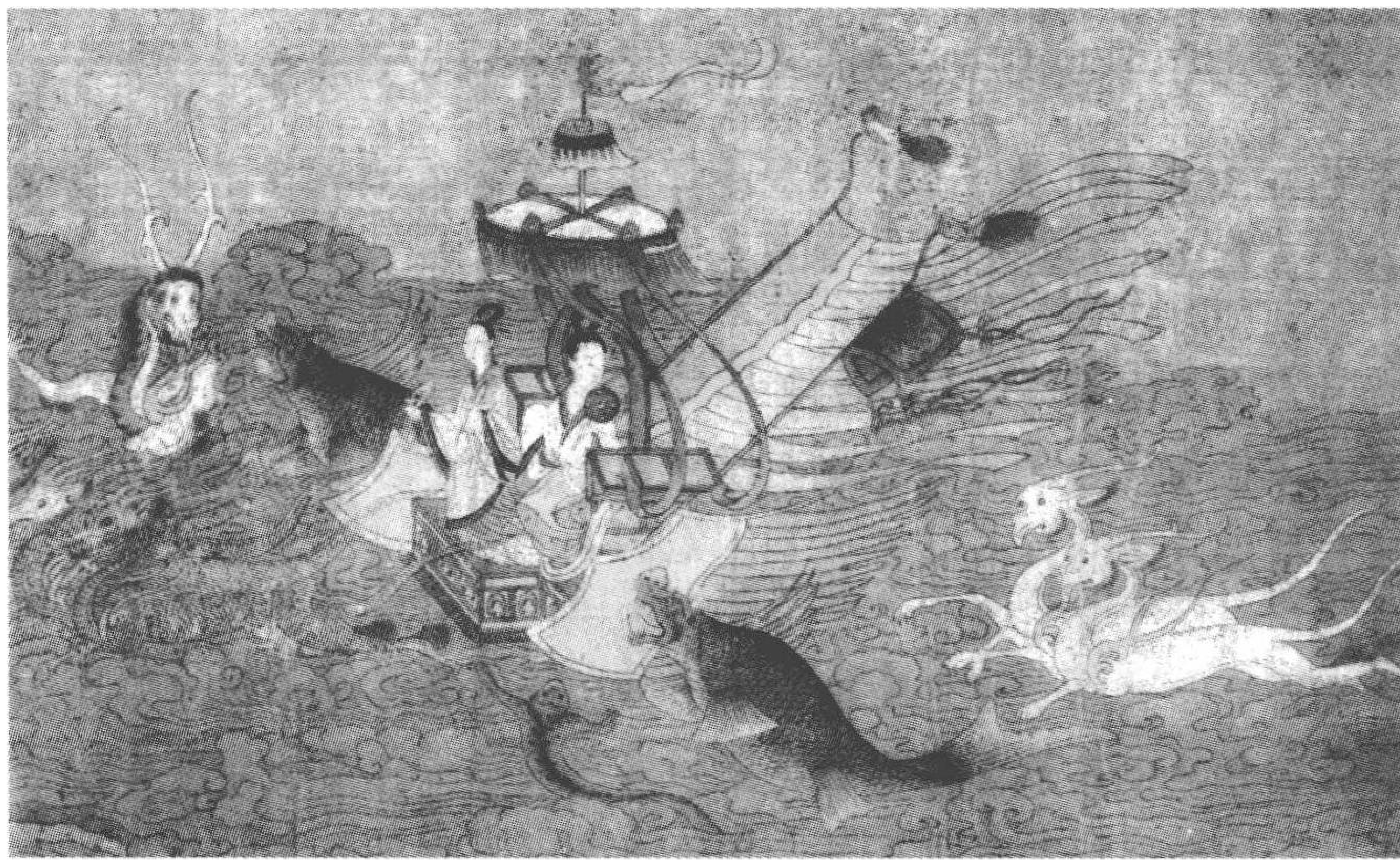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画家。三国吴的曹不兴，最早摹写天竺来的佛像，其弟子卫协、张墨两人，在晋时被称为“画圣”。顾恺之曾跟卫协学过绘画。东晋顾恺之、宋陆探微、梁张僧繇，是东晋南朝三个大画家。有人评论“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① 说明顾恺之绘画的特点是“传神”。他认为绘画不仅要“形似”，而主要应“神似”。要“以形写神”。即要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顾恺之替裴楷画像，颊上加了三根毛，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特征。又为谢鲲画像，让人站在石岩丛中。顾恺之说：“此人宜置在丘壑中。”这些都是为了刻划人物的性格。顾恺之认为人物的眼睛特别重要。他说“四体画得是否美丽，对画的美妙关系尚不大，传神写照，就在画眼睛上。”因此，他画好人物，常常几年不点眼睛。有一次，他给别人画扇，画好了人物都没有眼睛。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点上了眼睛，人物不是会说话了吗？”可见，他认为人物画的关键在于点睛传神。

---

① 唐张怀瓘《画断》。

顾恺之画作甚丰，总计不下70余幅。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

《女史箴图》是为西晋大官僚、诗人张华写的《女史箴》一文的几段插图。张华对贾后专权不满，为了讽谏她，写下了这篇文章，全文334个字，主要是宣扬封建道德，特别是妇德。顾恺之也深感东晋统治集团的腐朽，故为这篇名作插图。共作了12幅历史故事的插图。表现了中国古代贵族妇女生活的某些侧面。布局严密，线条有很强的运动感、节奏感，具有连绵不断、悠缓自然和非常匀和的特点。人物姿态闲雅、栩栩如生。这是现存最早的人物卷轴画。画前三段已缺，最接近原作的九段摹本，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于1900年被英军劫去，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宋摹本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时诗人曹植的《洛神赋》。据传，曹植爱上了曹丕的皇后甄氏。甄氏死后，曹植十分悲痛。有一次他从京都回到自己封地，经洛水时，梦见甄氏来和他相会，曹植深有所感，写下了这篇赋。洛神即洛水之神，是美化了的甄氏。顾恺之在

画中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描绘了原赋的意境。画中洛神多次出现。或在水面凌波回顾，或在云间遨游，或单独一人，或和曹植在一起。原赋中形容洛神美丽与风度的比喻，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日……皎若太阳升朝霞……”都得到了入神的描绘。人物风度和心理刻画逼真动人，达到了诗情画意相得益彰的境界。

顾恺之画的题材广泛，有历史、佛教、神仙、诗歌本事、禽兽、人物、仕女、山水等。他也是中国绘画理论的卓越建设者。著有画论三种，即《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这是他丰富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有系统的绘画理论著述，对后代的绘画和画评都有深刻的影响。

八、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北朝的佛窟和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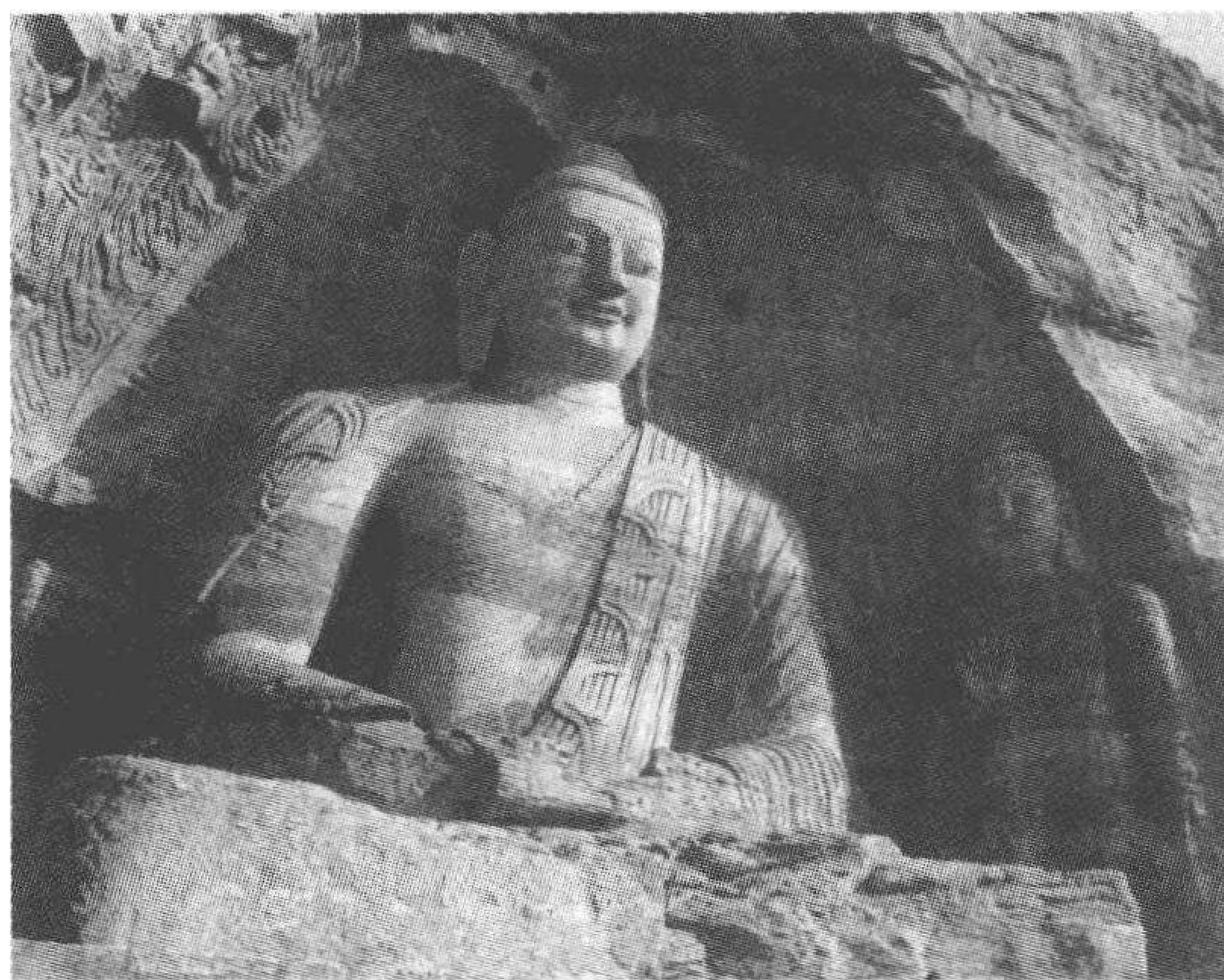
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布，一些帝王和贵族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了许多佛寺佛塔，开凿了不少石窟。这些璀璨的佛教艺术，为我国艺术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北朝开凿的石窟很多，其中以云冈、龙门、敦煌三大石窟最为著名。石窟寺院起源于印度，原是僧徒礼佛的祠堂和僧房，洞窟内开凿佛龛，并饰以图案雕刻和艳丽的壁画。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石窟寺的营造也在各地展开。

云冈石窟在今山西大同西 16 公里武周山北崖。大同原是北魏都城平城。石窟依山开凿，都是在石壁上雕琢出来的。东西连绵约一公里，现存洞窟 53 个，大小佛像 5.1 万余尊。佛像有各种姿态：有的容貌庄严，有的体态安详，有的高大魁伟，有的沉思默想。在现存洞窟中，较大的有 20 多个。石窟约从北魏和平元年（460）开始建造，主要洞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到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始具规模。以后唐朝及辽、金、明、清仍陆续开凿。

第16窟到第20窟开凿得最早。这是北魏文成帝即位不久，请名僧昙曜负责监造的，称为"昙曜五窟"。五窟中每一窟都有一尊大佛，象征北魏五个皇帝是如来佛化身。其中有一尊大佛脸上和足上都嵌有黑石，和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相同，这是把文成帝加以神化。在大佛周围还雕刻着大小不等的佛像，即飞天和侏儒。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在座础、梁下、柱顶、龛基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这些都象征着各级群臣，以及服役的民众和奴隶。



云冈20窟大佛

在第20窟中，雕刻着一个高达13.7米的大佛像，俗称大露佛（露天大佛），面部丰满，耳大垂肩，造型雄伟，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

孝文帝时开凿的第六窟最为壮观，保存最完好。窟平面近似方形，约60平方米。中间有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5米，四面有佛像，上层四角又各雕9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身上。余壁雕满佛、菩萨、罗汉和飞天等造像。窟顶刻有33天神像及各种骑乘。东、南、西壁中下部和塔柱四面，都刻有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33幅连环画。此窟规模宏伟、雕刻富丽，技法精练，是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

在第五窟中有一尊佛是云冈石窟中最大的，高约18米，脚长约4.6米，中指长约3.5米，气势雄浑。这也是孝文帝在迁都前开凿的。从佛教雕刻艺术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既受南亚的影响，又是继

承和发展了汉代石刻艺术的传统。[①]

龙门石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在洛阳城南 12 公里处。这里山河秀丽、风景宜人。龙门山、香山双峰对峙，中间伊水北流，犹如天然门阙，古称“伊阙”。又因伊水在两山下像条矫健的游龙，所以又称龙门。石窟主要分布在西岸的峭壁上，长达 1 公里。

龙门石窟现存佛洞 1 352 个，造像近 10 万尊。其中北魏所凿的佛洞石龛约占 1/3。



龙门石窟造像

龙门石窟中的代表作有古阳洞、宾阳洞等。古阳洞开凿于迁都前后，是开凿最早、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一个洞窟。也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洞窟。洞高 11.1 米，宽 6.9 米，深 13.5 米。洞内小龛琳琅满目，两壁井然有序地雕凿成三列佛龛。这些小龛都十分精美华丽。龛额装饰细致灵巧，图案花纹丰富多彩，在龙门石窟中堪称集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

宾阳洞共有三洞，在北魏时叫灵岩寺；明清以来才称为宾阳洞，传说是根据道教吕洞宾之字（洞宾）和号（纯阳）的末两字命名的。这是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太后修功德而营造的。开凿历时 23 年（500—523），用工 80 万多，真是“当时锤凿斫（zhuó）民脂，万金不惜穷妖奇”[②]。

---

① 1993 年对云冈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三窟未竣工的岩基地面保留着人工凿出的沟槽和圆形或矩形取石坑，可知石窟是从窟顶向下开凿的。

② 明彭纲《题龙门石像》。

宾阳中洞高 8.4 米，进深和宽各 11 米，正面是以释迦牟尼像为中心的五尊雕像。释迦牟尼两足交结坐着，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通高 8.4 米。双目垂视，大耳长鼻，相貌庄严。左右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二菩萨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南北二壁各有一佛二菩萨，面相清瘦略长，着褒衣博带袈裟，立于覆莲座上。窟顶作穹隆形，雕有莲花宝盖，周围是 8 个伎乐天和 2 个供养天人。供养天人也叫飞天，是能奏乐、善飞舞的美丽仙人。这些飞天挺健飘逸、迎风翱翔，姿态优美动人。洞口两面原有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表现孝文帝与文昭太后及君臣妃嫔们典雅华丽的礼佛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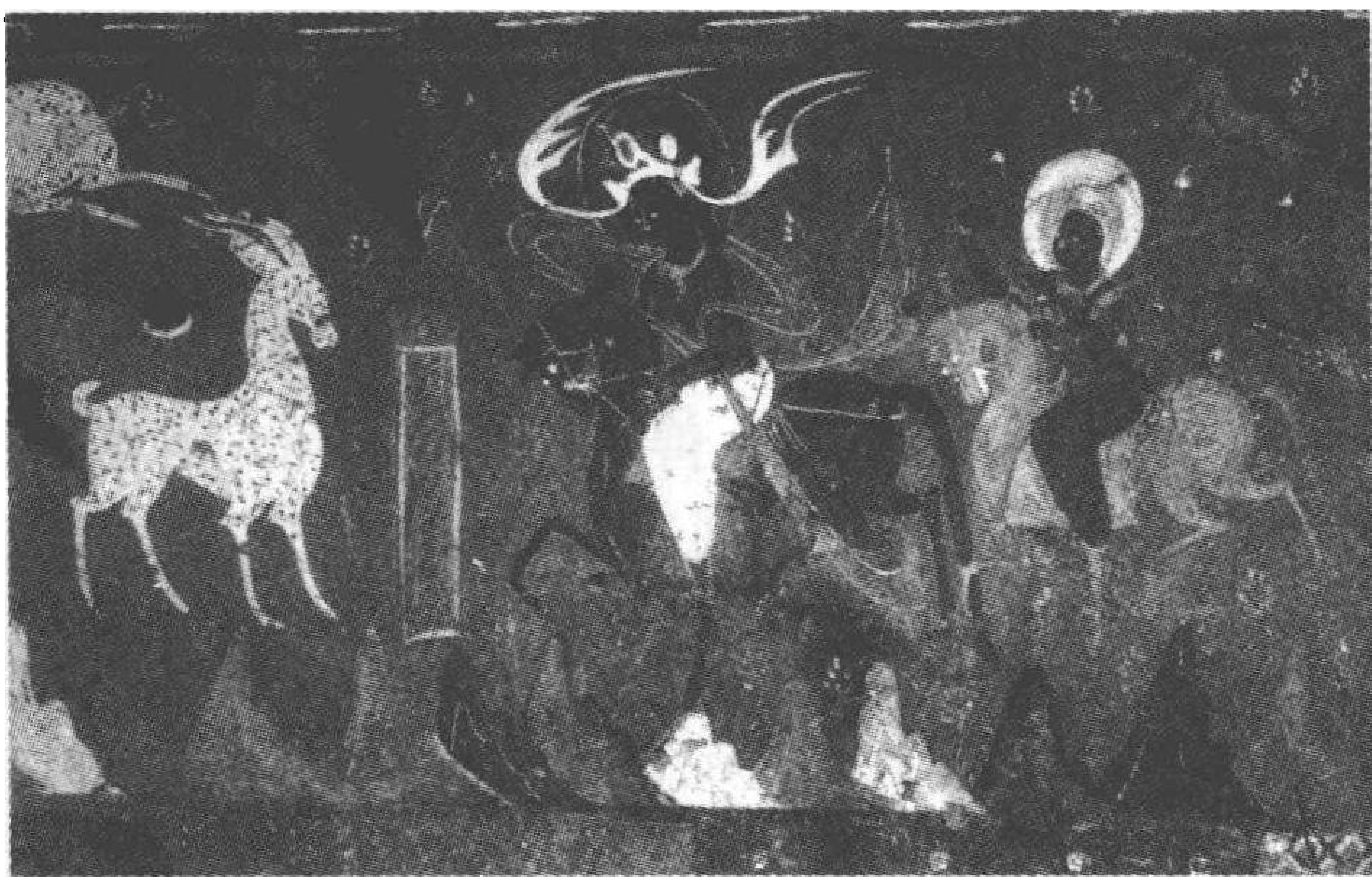


宾阳中洞佛像

龙门石窟还保存了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 3 600余件，是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珍品。流传已久的“龙门二十品”（19 品在古阳洞中），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独特字体，是魏碑体的代表作，是北魏书法艺术的精华。

敦煌莫高窟，也叫千佛洞，在离敦煌城东南 40 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交接处的崖壁上面。有 2 公里长，现存洞窟 492 个，壁画 4.5 万多平方米，彩塑 2 100 余尊。莫高窟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始开凿的。相传有个和尚名乐尊，西游到三危山下，一天黄昏时刻，忽见山峰放射出万道金光，好像千万个佛。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三危山对面的岩壁上开凿石窟。从此以后 1000 多年里，各朝陆续在此开凿洞窟，隋唐时达到高潮，现存洞窟中 7/10，是唐代开凿的。

由于这里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艺术表现为更细致、更精美的大型壁画和塑像。这一时期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以佛说法图和佛本生（前生）故事为主。说法图一般是一佛在中间，两菩萨侍立左右，其他还画了散花奏乐的飞天在空中飞翔。所谓佛本生故事，主要描写释迦牟尼一生的历史故事，和他在过去世道中舍身行善的故事画。故事内容不外是教人慈悲、忍辱、不抵抗。但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这些塑像、壁画，气魄雄伟、形象生动，不仅具有伟大的艺术价值，而且富有史料价值。



九色鹿本生壁画

北魏大兴佛教，除了大造佛窟外，还建立许多寺庙佛塔。著名的少林寺就是孝文帝时开始建造的。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县北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印度沙门跋陀经西域来中国，孝文帝很器重他，就建立此寺，让他落迹传教。北魏时佛塔都建造在寺院的中心。留存至今的在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塔也是北魏时建造的。这里起初是北魏宣武帝的离宫，孝明帝舍宅建寺，改名闲居寺。到隋代开皇年间改名嵩岳寺。塔就建立在寺院的中心。塔东有千佛殿，西有定光佛堂，南边是山门，北建大佛殿。塔高 41 米，平面呈十二角形，内部有八角形塔室，上下用木扶梯。外部作密檐十五层。第一层塔身特高，第二层以上，塔身逐层缩短，每面开一小窗。整个外形像一个炮弹形的圆锥体。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高层砖石建筑，是楼阁式塔中最早一个代表作。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仅用青砖黄泥结构建成这样高塔，经受了

1600多年风雨剥蚀而雄伟屹立，充分反映出我国当时高度的建筑技术水平。此外，在今山西浑源县南5公里恒山峭壁上，有建于北魏后期的悬空寺，现寺内有6座殿阁，两座三层“飞楼”，共有阁楼庙宇四十余间，庙宇飞梁横插于岩石之中，阁楼靠几十根依附于岩石的长柱托着，表现出高超的建筑技术。

佛窟、佛塔的兴建，固然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它成于千百名无名艺术家之手，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是我国的伟大艺术宝库和珍贵的历史遗产。

第十章 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一、裴秀和制图六体

——中国科学制图学的创始者

裴秀（224—271）是西晋时期的地图学家。他绘制成历史地图《禹贡地域图》、晋地图《地形方丈图》，又总结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绘制地图的理论“制图六体”，在地图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祖父和父亲在汉魏都官至尚书令。裴秀从小聪明好学，8岁能作文章，10多岁时，人们已称他为“后进领袖”。他先在曹爽手下做官，司马懿诛曹爽后，他投靠了司马氏集团，官至尚书仆射。西晋建立初，负责改定官制，被封为济川侯。不久，官至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司空。泰始七年（271）去世，年仅48岁。

我国地理学起源很早。相传夏禹铸造过九鼎，鼎上各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和禽兽图，这鼎直到秦代才被销毁。又据说周公东征胜利后营建成周洛邑时，把洛邑的地图献给成王。战国时，两国之间发生割地让城的事，首先得把地图交出来。荆轲刺秦王就是假装献图，“图穷而匕首见”。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是西汉初年的作品，已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地形图大体合乎十八万分之一的比例，水道大部分接近于今地图。在地理著作方面，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用自然分区方法，把全国

分为九州，记述了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由于内容丰富，受到历代重视。再加上秦汉以来数学、天文学、测量学的发展，这些都为裴秀在地图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西晋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都需要准确而详细的全国地图，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火，图籍损失惨重。到西晋时，秘书省既无古代地图，也没有汉初萧何接收的秦朝地图，只有汉朝《舆地》及《括地》各种杂图，简单粗陋，既不设比例尺，也没有准确方位，不记名山大川。而《禹贡》所记山川地名，由于历史变迁，已多变动，十分混乱。这就使裴秀决心绘制新的《禹贡地域图》。

裴秀官至司空，掌管国家的地图、户籍、工程等工作，这使他能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又加上他曾多次随军征讨，如往淮南讨诸葛诞等，这使他获得了大量实际的地理知识。他还仔细阅读了对蜀对吴战争的记事，从中了解军队所经地方的地理状况，这些都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裴秀利用他的地位，组织人力，对《禹贡》所记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沼泽以及古代九州的范围，作了详细考订。同时结合晋时的十六州下的郡国县邑、疆界变化，进行古今地名参照对比，弄清了古代各诸侯国间结盟定约的古迹及古今水陆交通的变迁等。对于一时弄不清的，则存疑暂缺。对于古代有名而今查不到的，都一一注明。经过这样深入研究和考证，在穷学者、门客京相璠等人的协助下，终于绘制成了《禹贡地域图》18 篇。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大型历史地图集。裴秀完成这本地图集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作重要文献“藏于秘府”。

裴秀为《禹贡地域图》作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制图之体有六焉”的“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按比例反映地区长宽大小的比例尺；准望是确定各地间彼此的方位；道里就是各地间的路线距

离；高下、方邪、迂直这三条是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形高低变化和中间物的阻隔，道路有高下、方斜、曲直的不同，制图时应取两地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这六条原则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没有比例尺，无法表现实际远近；没有方位的确定，某一地的方向从一方看是对的，从另一方向看就错了。没有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怎样通行了。没有地物的高下、山体的倾斜以及道路的迂回、转折的表示，并用它来校正，那么一定与实际距离不符，方向也不对。因此，这六个方面要综合运用，才能制定出比较科学的地图。

裴秀把数学中的比例运算方法，与测定远方地物间的水平直线距离的“重差术”应用于地图的绘制中，大大提高了地图的准确性。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传播以前，一直为我国地图绘制者所遵循。

裴秀还曾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这是简缩的晋地图。过去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用缣 80 匹，不便于阅读、携带、保存。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把它缩绘成《地形方丈图》，标上名山、大川、城镇、乡村，方便了阅览。这图流传了好几百年，南朝诗人谢庄制作的“木方丈图”，有人认为就是以裴秀的地图为蓝本。

裴秀不仅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制图六体理论在世界地图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有人把裴秀称之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应该说不为过誉的。

二、炼丹家葛洪对化学和医学的贡献

——炼丹术与科学

葛洪是晋朝的道教领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他为人性

纯口讷，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自己说："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①他的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是《抱朴子》内、外篇70卷、《金匮药方》即《玉函方》100卷、《肘后备急方》4卷。他一生论道、炼丹、行医，对化学和医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抱朴子》内篇中，反映炼丹内容的有"金丹"、"仙药"、"黄白"3卷。"金丹"篇主要讲利用无机物的化学变化炼制所谓长生药；"仙药"篇研究了一些植物性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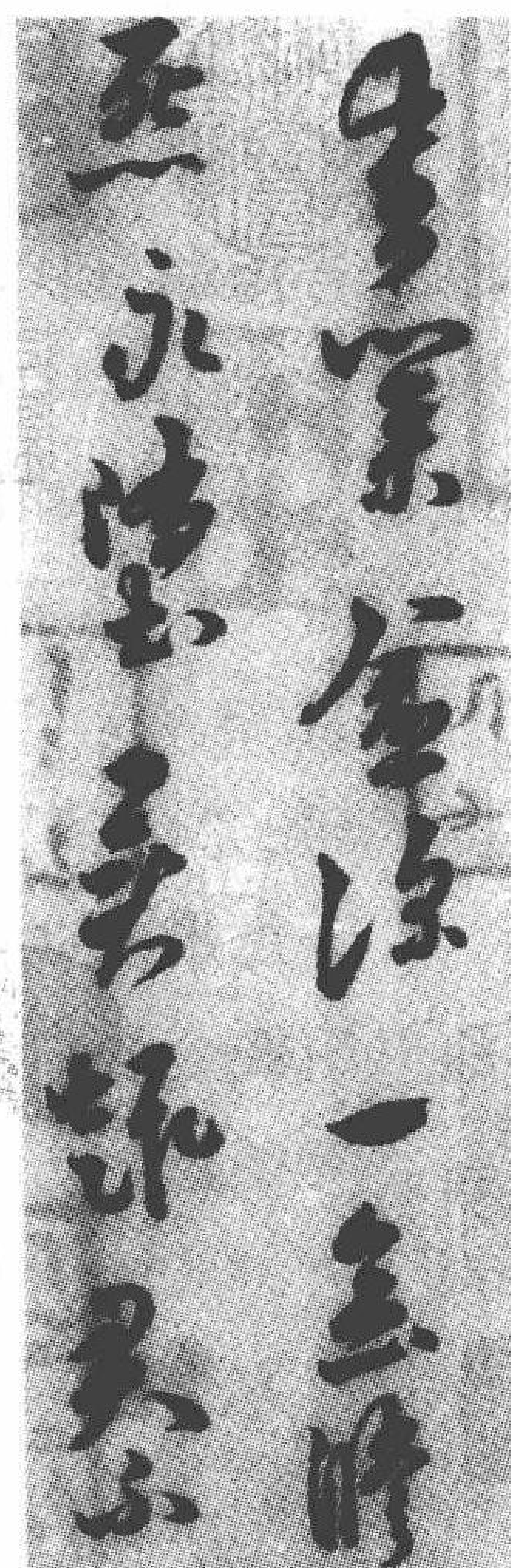
金丹术又叫炼金术、点金术、炼丹术。炼金术，又叫黄白术，是想用贱金属制造药金、药银等贵金属，炼丹术是用火法或水法制造金液还丹的方术，幻想制造长生不老的仙丹。我国炼丹术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就有关于方士和求"不死之药"的记载。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徐福与童男童女入海去寻求"仙人不死之药"。汉武帝热心神仙、长生之术。他听一个李少君说，祠灶可招致鬼物，鬼物到了可以使丹砂变成黄金，黄金做成饮食器，可以延长寿命，就可以见到蓬莱仙者，见了仙者，再到名山祭祀天地，就不死了，于是使人把丹砂和别种药剂来试做黄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士多为道士。由于社会动荡，门阀士族为了寻找精神寄托，纷纷崇信道教。他们妄想通过炼丹服食，解脱厄运，得道成仙，因此，社会上炼丹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炼丹的目的是寻求长生不死。炼丹家认为烧炼丹砂（硫化汞）的时候，它的颜色和形态都要发生变化，可以和人的生老衰死相联系，因此服食还丹可以使人白发变黑，脱落的牙齿重新长出，返老还童。这种理论虽然荒谬可笑，但炼丹家在长期炼丹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的经验知识，对其中某些物质变化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结出不少朴素的化学知识，认识到许多物质的化学特征，因此，炼丹术就成为最原始的化学。

---

① 《抱朴子·金丹篇》。

中国的金丹术著作保存到今天的，尚有一二百种，大部分收在《道藏》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汉末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或称《参同契》）和《抱朴子》。《周易参同契》共6 000多字，用韵文写成，其中首先记载了炼金炼丹的化学反应器“丹鼎”，魏伯阳成为中国炼丹术的始祖。葛洪在《抱朴子》中记录了更具体的炼丹方法，比前人前进了一步。



梁武帝萧衍《异趣帖》

早在西周时，人们已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按照五行说，物质是可以相生的，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金、银也应该可由别的物质制成。在这种信念下，葛洪开始炼金、炼丹。炼丹术最早的材料可能是丹砂，即红色硫化汞。《抱朴子》中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1] 丹砂经煅烧加热，硫被氧化而成二氧化硫，分离出水银（汞）。再使水银与硫磺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热使它升华，又恢复红色硫化汞的晶体（就是还丹）。所生成的水银，是金属物质却呈液体状态，圆转流动，容易挥发，使人感到神奇。炼丹家们把它看作“神丹”。葛洪说：“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故能令人不老不死。”从炼丹实践中，人们认识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这是化学上的一大成就。人造红色硫化汞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

① 《抱朴子·内篇》,《金丹篇》。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还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葛洪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曾青是天然的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经过化学反应，铁的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铁能取代硫酸铜里的铜，而铜粘着于铁器表面上了。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在他的化学实践中利用了很多物质，除丹砂、水银、铅丹、铅、铁外，还有雌黄、雄黄（两种不同的硫化砷）、石胆、消石（碳酸钾）、石膏、赤石脂、明矾、铜、戎盐（食盐）、慈石（赤铁矿）等等。他已认识到一些物质可发生取代反应，一些物质有升华作用。他也了解到配料之间要有严格的量的关系，操作手续必须准确，反应条件必须具备，为后人定量研究化学奠定了基础。

炼丹与医药也有关系。金丹家在炼丹中，发现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东西，这些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但却能治病，这就推动了医药的发展。

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不少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性能与作用。比如用麻黄治咳喘，用松节油治关节炎，用常山治疟病等。葛洪还搜集古代名医名方，参以自己的经验，写成《玉函方》100卷。后因太多，他又摘录其中实用部分，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经后人增补，传到现在，就是《肘后备急方》4卷。肘即胳膊，取此名意即经常挂在胳膊上，以备应急之用，是居家或外出都必须随身携带的医书，类似袖珍手册。《肘后备急方》篇幅虽少，但内容丰富，包括急性传染病、各腑脏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法，对各种病的病因、病状、治法和药方都作了说明。选方具有简、廉、验的特点。这是一部通俗药书，一直为后世所重。

葛洪对许多传染病的认识比前人进了一步。在《肘后备急方》中，天花叫"天行斑疮"，书中记载了症状、病因、病期历程等，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次详细记载天花的文献。又如肺痨病，《肘后备急方》中叫"尸注"、"鬼注"。书中指出此病要传染，"死后复

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应及早治疗。这是我国最早对结核病的观察和记载。

《肘后备急方》后经陶宏景增补，得 101 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后又有人把证类本草所载附方摘录增入，取名《广肘后备急方》，即流传至今的版本。

葛洪虽然是一个道教徒炼丹家，但他留给后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有益的内容，他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医药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三、大科学家祖冲之

——圆周率的计算

祖冲之（429—500）是中国古代的大科学家。字文远，祖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后徙居到南方。祖父昌，宋大匠卿，负责管理土木建筑工程。父朔之，官至奉朝请。祖冲之在家庭气氛熏陶下，从小勤奋好学。他广泛搜集、认真阅读前人关于天文、数学等著作，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又不盲目接受，坚持独立思考，用实际来考核验证，既发扬前人的成就，又纠正前人的错误。宋孝武帝时，他在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中工作，但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在科学上却有很高的成就。



祖冲之

祖冲之的主要贡献是计算出精密度很高的圆周率。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例，通常用希腊字母 π 来表示。这是一个常数，但却是一个只能用无限的不循环小数来表示的无理数。圆周率在实际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但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计算却十分困难。因此，圆周率的理论和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

数学水平。

中国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在两汉以前，一般是用“周三径一”，即圆周率为3。西汉刘歆得到3.1547，东汉张衡算到3.1466，三国吴的王蕃得到3.1566，曹魏的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推算到3.1416，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刘徽计算圆周率的方法是“割圆术”。就是在圆内作正6边形，然后边数逐步加倍，成正12边形、24边形……刘徽一直算到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得到了一个粗糙的数值，即$\frac{157}{50}$，或3.14。后来他又继续演算到3072边形，得到了$\pi=\frac{3927}{1250}$，即相当于3.1416。刘徽的科学方法为圆周率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

祖冲之不满足于前人的成就，他决心攀登新的高峰。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求得了精确度更高的圆周率。这就是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他把前者称为朒数，即不足的意思，后者称为盈数。这就明确指出了圆周率的上限和下限，实际上已确定了误差范围。他又求得约率为$\frac{22}{7}$，密率为$\frac{355}{113}$。这一密率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所以有人主张把它称为“祖率”。

祖冲之的圆周率远远地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人，这在国外直到一千年后，即15世纪时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在公元1427年著的《算术之钥》中，才打破了祖冲之的记录。至于密率，在国外，直到1573年德国的奥托才得到这一结果。

祖冲之是怎样得到上述结果的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不少人推测他采用了刘徽的“割圆术”。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要从圆内接正6边形算起，一直算到12288和24576边形，这需要对有九位有效数字的大数运用算筹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的运算，共130次以上。可以看出，这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需要有多大的毅力

和决心。

在祖冲之数学成就的基础上，他的儿子祖暅（gēng）还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即球体体积 = $\frac{\pi}{6}D^2$（D 为球体直径）这是我国数学史上第一次导出了正确的球体积公式。祖冲之父子的研究成果记载在《缀术》一书中。这部书在唐初被列入“十部算经”之中。可惜这部数学专著在宋朝中叶以后失传了。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南朝宋时使用的历法是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实测和研究，发现《元嘉历》有一些错误，不够精密。他根据自己长期天文实测所得到的资料，重新制定新的历法，以宋孝武帝的年号命名，叫《大明历》。《大明历》在我国历法发展史上第一次使用“岁差”。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地球的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使地球自转轴的方向不断发生微小的变化，这也就使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西移，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东晋天文学家虞喜按自己观察和天文记录，首先明确提出岁差，即 50 年冬至点在黄道上西移 1 度。但未引入历法。祖冲之首先把岁差的存在应用到编制的历法中去，即每 45 年 11 月差 1 度，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度，在我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大明历》的另一重要改革是修改闰法。我们知道，一回归年是 365.2422 日，一个朔望月（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是 29.5306 日。如果按照回归年编制历法，即阳历，一个月有 30 日或 31 日，如果按朔望月编制历法，即阴历，一年只有 354 日，比一回归年少 11 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自古以来，人们用设置闰月的办法来调节阳历和阴历，使历法能兼顾四季变化和月面圆缺。在春秋中叶已经有在 19 年中设 7 个闰月的安排方法。但这样，经过 200 多年还要多出一天。义熙八年（412），北凉的赵𢾺（fěi）提出在 600 年中加入 221 个闰月，但没有被人接受。祖冲之在《大明历》中提出在 391 年中设置 144 个闰月的闰周，得到了更为精密的结果。他还用比较精确的方法测定两年冬至之间的时间，即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为

365.24281481 日，与现代天文学测得的结果比较，只差 46 秒。

大明六年（462）祖冲之把历法呈交朝廷，请求批准使用。孝武帝让大臣们讨论。孝武帝宠臣戴法兴顽固守旧，竭力反对。他说“古人制章，万世不易”，改变历法是“诬天背经”。朝中百官害怕戴法兴权势，多随声附和，只有巢尚之一人支持祖冲之。祖冲之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写了一篇有名的驳议《辨戴法兴难新历》，说：“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充分表现了他为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在事实面前，戴法兴尽管理屈词穷，仍然蛮横地宣称，古历尽管有错，也不能改革。由于这些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在祖冲之生前，《大明历》始终没有能够施行，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510）才颁布使用。这已是《大明历》编成后 50 年的事了。

祖冲之不仅在数学、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他还有很多发明创造。他设计制造了利用水力推动的“水碓磨”，在大水轮的轴上安装了许多横木，随着湍急的流水冲动了大水轮，带动了好些石杵，一起一落地在石臼里舂米；还有一组安装在轴上的齿轮，带动石磨不停地转动，把粮食磨细。他又造过一种指南车。无论车子怎样行驶，车上的铜人始终指着南方。他又造有“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一天可航行 100 多里。他因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仿造一器，内置机械，不用多少人力能自己运行。祖冲之对音乐也有研究，还撰写过文学作品《述异记》10 卷。他在任齐长水校尉时，曾写了《安边论》，提出“开屯田、广农殖”的主张。

祖冲之在科学事业上的光辉成就不仅使我们感到自豪，而且他的科学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向前。

四、陶弘景与《本草经集注》

——一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

道教领袖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药物学

著作。

中国医学大致可以分为医学和药学（或药物学）。药学部分，即所谓“本草”，主要研讨药物和处方。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和《本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本草，也是世界上最古药物学书籍之一。它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冠以“神农”，则是尊古之风的假托。该书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它根据药物效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一般是无毒或毒性小，属补养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兼有攻治疾病和补养的药物；下品125种，是具有毒性而专用于除寒热邪气攻治疾病的药物，不能久服。该书成书后，经过辗转传抄，造成了不少错误和混乱；另一方面，从汉代到南北朝，新药品种不断增加，人们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对药物的性能又有了新的认识。这就需要及时的总结提高，因此，汉魏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本草著作。如汉末吴普和李当之，都曾以它为基础，写下了自己的著作（大致是《本草经》的注解或校正），到陶弘景时，他决心彻底整理补充这部著作。



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是南朝著名道士，他一生遍历名山，寻访仙药，经常出没于山谷溪涧之间，读书万余卷，对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医药都有深入研究。著作很多，如《帝代年历》、《古今州郡记》、《效验方》、《集药诀》、《养性延命录》、《肘后百一方》等。

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作了仔细的校订和整理，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这些药物新的用途和不同的记载，做了一一的鉴别和补充。同时，他又根据魏晋以来新发现的365种药物，写成《名医别录》一书，也作为《本草

经集注》的一部分。这样，《本草经集注》共有7卷，所收药物由原来365种扩大到730种，增加了一倍。为了区别原有药物和新增加的药物，陶弘景用朱红颜色书写原有的药，用黑色书写新加的药。他在序言中说：“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可见他的整理工作是十分严肃周密的。他又说：“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植物名）逐水近出野老”，说明他重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本草经集注》的主要特点是：（1）改进了药物的一般分类。从《神农本草经》中上中下三品分类，改为按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来分类，共分七大类，即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用。最后一类是一些未经实际验证的药物。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药物分类的一个进步，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新修本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鉴别诸方面的论述，有显著提高。《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五味：酸、咸、甘、苦、辛，这是勉强


所主治互有多少醫家不能備見則識
致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
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
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種精麤皆
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
注詺世用土地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
序録合為三卷雖未足追踵前良
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
方
本草經卷上
本草經卷中
本草經卷下
合三百七十四

敦煌残卷《本草集注·序录》

与阴阳五行理论相联系，陶弘景把药性分为八种，即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他提出了“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唯冷热须明”的说法，表明他对药物的寒热特别重视，而对所谓甘苦等“五味”认为关系不大。这种认识很有进步意义。（3）总结了诸病通用的药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诸病通用药”列记表，分别列举了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痛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芎穷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不仅给临床医生处方用药提供了方便，而且也首创了按药

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的方法，后世比较大型的本草著作，都把这种办法沿用下来。

《本草经集注》原书在唐朝以后就散失了。现存有敦煌残卷。其主要内容在宋的《证类本草》和明的《本草纲目》中被引用和保存下来。

陶弘景是一个道教徒，他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从事医药的研究，目的是为了长生和求仙，但是他的治学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梁书》本传说他“性好著述，……顾惜光景，老而弥笃。”他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奋发好学精神，因此，他在化学、医学、药物学、天文学等不少方面都有所研究和贡献。他的《本草经集注》更是一部有价值的药物学著作。

五、炼钢技术的新成就

——“灌钢”冶炼法

中国早期冶炼钢铁技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灌钢”冶炼法的创造。这种新的炼钢方法，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经普遍应用了。陶弘景是记述我国古代“灌钢”冶炼法的第一人，东魏、北齐的著名冶金家綦毋怀文，应用此法后才迅速地传播开来，因此世人就认为灌钢是他发明的[①]。实际上，这种灌钢冶炼法，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我国古代的炼钢技术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春秋以前，炼铁术已有发展，但由于炉体小，鼓风设备差，用木炭做燃料，炉温比较低，炼出来的铁是呈海绵状的固体块，等到炉子冷却后再取出铁块。这种冶炼方法叫“块炼法”。块炼铁含碳量低、质软，含磷、硅等杂质，必须经过锻打才能成为可以使用的熟铁。江苏六合程桥春秋吴墓出土的铁条，就是用块炼铁锻成的，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关

① 清代成瓘：《篛园日札》卷6，“琐语琐事之沿”，认为“此灌钢之始”。

于生铁冶铸器物的最早的实物见证。

熟铁和钢的主要区别是含碳量的不同。熟铁含碳量在 0.05% 以下，钢含碳量在 0.05%—2% 之间，生铁含碳量大于 2%。熟铁性韧，可耐锤击，但是太软。生铁质硬而脆。钢则脆、韧适宜，用途广泛。人们在锻打熟铁的过程中，由于反复在木炭中加热，使铁吸收了碳，提高了含碳量，减少了杂质，因而成为钢。这是最早的炼钢技术，这种钢叫渗碳钢。把这种钢反复折叠锻打，使碳分布均匀，组织更加致密，提高了质量，又叫百炼钢。出土文物表明，这种炼钢法在战国中晚期已经掌握了，西安半坡秦墓出土的铁凿即用这种钢制成。这种钢的产量很低。

到西汉中、晚期，炼钢技术有了新的进步，出现了“炒钢”新技术。就是把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半固体状态，再加入铁矿粉，不断搅拌，利用铁矿粉和空气中的氧，烧去生铁中一部分碳，降低了含碳量，除去渣滓，得到了钢和熟铁。这种把生铁当炼钢原料是炼钢技术的一个重大发展。1974 年山东苍山县出土东汉永初六年（112）“三十湅”环首钢刀，湅就是炼的意思。这把刀由含碳 0.6%—0.7% 的炒钢反复折叠锻打而成的。在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发现了西汉后期炒钢炉一座，炉内尚有未经炒炼的铁块。炒钢炼钢技术在欧洲直到 18 世纪中叶才出现，比我国要晚 1900 年。

用生铁直接炒炼成钢，工艺比较复杂，在古代缺乏化学分析的条件下，要在炒钢过程中控制所需要的一定含碳量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多数是把生铁先炒炼成低碳熟铁，再用固体表面渗碳方法重新增碳而炼制成钢的。这样，仍然要经过百炼才能得到纯钢，花费的人力和时间是很多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明了灌钢冶炼法。就是利用生铁的溶液灌入未经锻打的熟铁，使碳分较快地、均匀地渗入，只要配合好生铁和熟铁的比例，就能得到适合于钢的含碳量，然后反复锻打，挤出杂质，成为质量较好的钢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 4《玉石部》引用梁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

最早具体记载的灌钢冶炼法。“生”就是生铁，“鍒”是指熟铁，“杂炼生鍒”是把生铁和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生铁含碳量高而熔点低，先熔化后灌入熟铁，这样就得到了比较好的钢，可以用来制作刀镰。綦毋怀文也用这种方法冶炼质量很高、十分锋利的钢刀。綦毋怀文，匈奴人，是道教的炼丹师，曾作过东魏北齐的信州（今四川奉节县一带）刺史，在高欢与宇文泰作战时，建议高欢把全军红色旗改为黄色，取得了胜利。史书记载綦毋怀文的炼钢方法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①] 就是说，选用较好的铁矿石，冶炼出优质生铁，把液态的生铁浇注在“柔铤”即熟铁上，然后让生铁熟铁如同雄雌两性动物“宿”在一起交配，也就是《天工开物》中所说“生钢（铁）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经过几度交配后就成钢铁。这种钢也叫“宿铁”。綦毋怀文用这种钢制成的刀十分锋利，一刀可以砍断叠了30多层的铠甲。这种冶炼方法后来在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县西南）一带长期为冶炼家所采用。

灌钢冶炼法是我国早期炼钢技术上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与百炼法或炒钢法比较，有很多优点。它缩短了冶炼时间，提高了钢的产量，工艺简便，容易操作，成本低，比较能保证质量。因此，宋代以后一直到明代，这种炼钢方法不断发展，一直是炼钢的主要方法。中国封建社会唐宋以后所以能高度发展，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应该与此有关。

六、郦道元与《水经注》

——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经过长期的努力，撰写了地理学名著《水经注》，对我国古代地理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① 《北史》卷89，《艺术列传》，《北齐书》卷49，《方伎列传》略同。

郦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宦官世家。父郦范曾任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任冀州（今河北冀县）镇东府长史、鲁阳郡（今河南鲁山县）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等职，并在中央担任过御史中尉。他当官"素有严猛之称"，曾弹劾孝文帝子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并处死其亲信丘念，因此遭忌恨。孝昌三年（527），派去镇压关陇人民起义的雍州刺史肖宝夤起兵反叛，汝南王悦怂恿朝廷派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去平定乱事，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郦道元在赴关中的路上，被肖宝夤的军队包围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亭在冈上，缺水，凿井十几丈，仍不得水，最后力尽，和他弟弟及两个儿子一起被害。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父亲宦游山东，以后又在山西、河南等地任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每到一地，总要"访渎搜渠"，勘察水流，探溯源头，并在余暇，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际知识。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山海经》是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记载了各地的山脉、河流、矿产等。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把全国划为九州，是一篇用自然分区方法研究我国地理情况的著作。《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置为主，为地理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大约在三国时候，我国又出现了第一部以全国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水经》。关于《水经》的作者，有说是汉代桑钦，有说是晋代郭璞，清代学者多有考订，认为这书不是桑钦、郭璞所作，而是三国时候人写的。除了这些综合性的地理著作以外，魏晋以后又出现了许多地方性著述。这些研究成果都为郦道元写作《水经注》提供了条件。

郦道元十分珍惜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又感到前人的不足。他说《山海经》"周而不备"[①]，《汉书·地理

① 《水经注·序》。

志》“简而不周”，一些描写地方的都赋所述的水道，连表达一个大概都办不到，《水经》虽粗略地连缀水道源流，但缺乏“旁通”。《水经》记载水道137条，过于简略，每条水道的源委都未作详细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部新的地理学著作，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历史上河道的变迁、地名的更换、城市的兴亡等，使当时和后代都能清楚了解，便于应用，所以郦道元决心写作《水经注》。

郦道元虽然是替《水经》作注，实际上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水经》，是一部创造性的著作。《水经》原文1.5万字，《水经注》约30万字，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水经》记述水道137条，《水经注》记述水道1 252条，大至江河，小至溪流，比《水经》增加8倍多。《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岳、丘陵、陂泽位置、关塞亭障、城邑兴废沿革，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兼及历史事件、人物、风俗民情，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可称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水经注》书影

郦道元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吸收前人和当世人们的成就。他搜罗不少地图，汇集了大量文献和文物资料，引用书籍多至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这些书和碑刻大多已失传，赖《水经注》得以保存部分。郦道元也并不完全迷信古人，所引材料都经过自己周密分析，对错误之处就加以指出。如引用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的解说18条，就指出其4条有谬误。

郦道元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为了弄清水道情况，他总是不怕艰辛，追源溯流，探求脉络。他曾在离石（今属山西）

"历山寻河"，考察黄河。在长城下的白道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看到城北阴山山坡下往往露出泉水窟穴，清泉冽冽，证实古代以"饮马长城窟"为题材的歌颂反侵略战争诗篇的真实性。郦道元遇到疑难问题，就向当地父老请教。《水经注》中所记耆旧父老的话，都是来自各地的群众。《水经注序》说"备陈舆徙之说"，表达了他重视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营养。

《水经注》有关河流水道变迁的丰富记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水文地理的详细图景。在自然地理和地质地貌方面，《水经注》也有大量记载。《水经注》还记载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营田、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郦道元重视科学的现实作用。《水经注》对与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黄河和运河记载得特别详细。《水经注》全书 40 卷，黄河独居 5 卷，记载了当时的黄河，也记载了改道前的黄河；还记载了治理黄河有贡献的人物，如汉武帝、王尊、王景等。运河虽为人工水道，但它是重要的交通水道，《水经注》也详加记载。对于春秋末年的邗沟、战国时期的鸿沟系统、曹操时的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都作了叙述。这些运河后来都淤塞不通，遗迹也湮没无闻，由于郦道元的详细记载，才使后人了解。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严密的科学著作，而且在文学上也很有地位。它以生动细腻的笔墨，形象地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了作者饱满的爱国热情。如他写长江三峡风光：

>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即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
> ……
>
> 冬春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险峻的山峰）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
>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声音不断）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

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形象的图画。祖国的锦绣河山强烈地感染了郦道元，使他能写出这样有声有色的景色，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类似的精彩描写，书中还有很多。所以《水经注》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游记杰作。它对以后苏东坡、柳宗元、李白等人的游记诗文，都产生了影响。

《水经注》的重大成就，使后代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大量专门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郦学”。其中，清代学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等人的成绩最大。他们整理、校勘、订误，给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清代杨守敬曾根据《水经注》编绘了《水经注疏》和《水经注附图》。《水经注》原书宋朝已佚5卷，今本仍作40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

《水经注》所以成为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名著，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郦道元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实践的精神、长期勤奋著述的结果。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水经注》一书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如对南方水道的记述。经过后世的辗转传抄，也有一些经注混淆，错误疏漏之处。尽管如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成就，使他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而名垂后世。

七、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伟大的农业百科全书

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农学遗产的国家。早在《诗经》里，就有我们祖先关于农业经验和知识的记载，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一书也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科学论文。以后西汉有《氾胜之书》，东汉有《四民月令》等农书。但这

两部书都已散佚。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农书，是写于北魏末年东魏初年的《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南）人，曾做过高阳郡（治今山东淄博东北）太守。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许多书，又到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他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到东魏武定二年（544）间，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

贾思勰写这部书是从三方面入手的。首先，他注意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花了很大功夫，学习和消化吸收古书上的农学知识。《齐民要术》引用古书达180余种，引用《诗经》有30多条，其中许多古书已经失传。其次，他注重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访问有经验的老农，收集民谣民谚，其中不少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书中共引用农谚30多条。再次，他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种黍、养羊，使他的知识更加全面和科学。贾思勰把撰写《齐民要术》的指导思想概括为16个字："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意思是参考文献，收集谚语歌谣，访问老农，通过实践来验证。贾思勰善于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相结合，他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创作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齐民要术》书名的意思就是平民谋生的主要技术。贾思勰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富国以农"，因此他主张重视农耕的政策。他称赞晁错等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观点，批判腐朽的王公贵族对农事不闻不问，"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的态度。全书由序、杂说、正文三大部分组成，共92篇，分成10卷。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多字，共11万多字。《齐民要术》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不仅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如播种、耕作、土壤、施肥、轮作、种子等，而且有蔬菜作物的栽培、果树林木的培育、蚕桑事业、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和贮藏、酿造酒、酱、醋豉、制胶和制墨等方面内容。正如该书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xì）醢（hǎi），资生之业，靡不毕书。"意思是从耕种操作，到造醋

做酱，凡是生活资料的生产技术，都写在书里了。

《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积累的宝贵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体现了很高的技术成就。它针对北方干旱少雨的特点，强调精耕细作、防旱保墒。贾思勰认为耕地一定要耕得早、耕得深；耕得早一遍抵上三遍，耕得深使庄稼能吸收较多的养料和水分。耕后必须把地耙平，把土耱细，这样才能保墒防旱。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还必须中耕除草。这一整套耕——耙——耱的保墒防旱措施，使北方干旱地区的耕作技术基本定型了。

《齐民要术》十分注意选种。强调"选好穗纯色者"。留种田要耕得细，多加肥料；收割后要分开窖埋，防止混杂。收取瓜种方面，指出要从最早成熟的"本母子"瓜中留种。留种时，不是取全部瓜子，而是截取瓜中间一段的瓜子。因其贮藏的养料多。这种方法至今我国北方还在采用。书中还记述了水选、溲种（即拌种）、晒种等种子处理方法，并最早记录了我国水稻催芽技术。

《齐民要术》首次总结了轮种的方法。一共记述了20多种。它把豆科作物作为绿肥，纳入轮作，以提高地力。又提出在麻里套种芜青等。从休闲（长期抛荒以恢复地力）到轮作，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它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欧洲在公元6世纪，农业还处于"三田制"，绿肥轮作制到18世纪30年代才在英国实行，可见，我们祖先发明轮作要早得多。

《齐民要术》完整系统地记载了我国果树的品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果树品种的总汇，同时也是第一次为我国果树分类。书中对果树繁殖培育提出了三种方法，即培育实生苗、扦插和嫁接。培育实生苗强调无论桃、梨要"合肉"埋入加粪的土中，第二年春天出苗后再移栽。这样可以利用冬季自然低温来增加种子的出芽力。扦插可使果树提前结实，如李树本来五年才结果，用扦插只要三年。嫁接比扦插更快，而且果实好。嫁接梨最好用棠树（即杜树）做砧木，这样结的梨大而肉细密。

《齐民要术》总结了历代家畜饲养的经验，也吸收了北方各游

牧民族的畜牧经验。在书中介绍了饲养牲畜的各项方法。贾思勰认为首先要重视选种。如母鸡要形体小、毛色浅、脚细短、生蛋多、守窝的。羊要选腊月、正月生的羊羔留种。在饲养管理上，役使牛马，要根据其能力；喂料、饮水、天冷、天热，都要适合其本性。马饥饿时要先喂“恶刍”，吃饱后再喂“善刍”，以引诱其吃饱吃足。书中还论述了相马术、阉割术、兽医药方等知识经验。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当时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微生物发酵技术。书中记述了酿酒、造醋、做酱、制豆豉等方法。书中记载的酒有 40 多种，醋有 30 多种。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综合性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大农业”思想，即农业体系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各项目，为后世农业科学树立了典范。此后的农业多以它为蓝本。它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有深远的影响。它有多种版本在日本流传。英国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曾说过，他的人工选择思想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得到启发的。不少人认为这部书就是《齐民要术》。总之，《齐民要术》以其丰富的内容，闪烁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它不但是研究古代农业技术的珍贵文献，而且对现代农业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它在中国和世界农学史上都是具有不朽地位的。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一、品种多样，精细讲究
——饮食

我国传统饮食习俗，主食是五谷，副食是以蔬菜为主，外加少量的肉食。两晋南北朝时期，主食在南方主要是稻米制作的饭和粥，饭的做法是蒸和煮，与现代基本相同。

北方稻米少，主食以粟为主，此外有麦饭、麦饼等。北方人所食饼的品种较多：（1）蒸饼。即用面粉发酵后蒸熟，“曼头”也属于蒸饼，西晋何曾的蒸饼上开十字，说明类似今天的“开花馒头”。石虎吃的蒸饼，常用枣、胡桃为心。发面食品还有面起饼、白饼等。（2）汤饼。又称“煮饼”，是用汤煮的面食，似今日的面片。《齐民要术》记载的“水引”，即薄如韭叶，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之，这就是汤面条，可拌上肉汁和鸡汁。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爱吃水引饼，到大臣何戢家，戢家妇亲自制作给他吃。（3）油饼，把饼放在油里炸。本为少数民族的饮食，后传入北方。细环饼，形状类似现在的馓子，是用蜜调水和面粉制成的。（4）胡饼，类似烧饼，在炉中烤制，上着芝麻，又称麻饼，也叫炉饼。也有在发酵面中加蛋、牛奶、牛油等。《齐民要术》记有做烧饼法，一斗面粉，加二斤羊肉及葱、豉汁、盐，说明十分讲究。

南方的粥有米粥、麦粥、豆粥等。米粥即白粥，是南方常用食物。豆粥是以绿豆、红小豆等豆类为主熬成的粥。西晋石崇以即刻

做出豆粥向客人夸耀，原来他是事先将豆煮好。粥除了作为老人、幼儿的食物外，常作为饥荒时的救济食物。魏晋时代，端午节吃粽子相当盛行，粽子又称角黍，用菰芦叶包黏米、栗子、枣子等，煮令烂熟。南北朝时，粽子既可在端午时吃，也可在夏至这天吃。

副食中荤菜主要有鱼、肉、家畜等。北方人以家畜为主，南方人多食水产。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为珍味，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为珍味。西晋时吴人张翰到洛阳，秋风起时，思念吴地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就辞官回到了南方，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旅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张翰辞官固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但也与他爱美味的鲈鱼等菜有关。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记鱼的品种达十余种。当时在南方已有人工养鱼业，如襄阳地区就建了不少人工鱼池。鱼的制作和加工也有很大的进步，为了久贮，百姓常制作鱼干，或制腌鱼、糟鱼。还有脍的吃法，即把鱼肉切细后醮上调料如葱、芥等生吃，有鲈鱼脍、鲻鱼脍等。鲈鱼是淡水鱼、鲻鱼是海鱼。除鱼外，人们还捕取海蜇、采集海带来吃，海带称为石发。常吃的海鲜有蛤蜊（即海蚌)、车螯、螃蟹。螃蟹也有制成糖蟹来吃的。肉食有猪肉、牛肉、羊肉等。北魏孝文帝让南方来的王肃比较羊肉和鱼羹的优劣，王肃为表示对孝文帝的尊重，称羊肉为陆产之最，鱼为水族之长。猪已经围栏喂养；牛虽有禁令不准滥杀，但权贵之家仍有宰牛食肉。此外，养鸡、鸭也十分普遍 。陈霸先在与北齐军决战前，得侄陈蒨送来的3 000斛米和1 000只鸭，使战士得以饱餐，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肉食的烹饪除脍外，还有炙，即烧烤，烤全羊则叫“貊炙”。为了久贮，把肉类加工成干肉，称为脯。陆机在《洛阳记》中记载，在洛阳城北有干脯山，说明这里是个脯肉加工集中地。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业也有新的发展。蔬菜品种有：葵，即冬葵、冬寒菜，味甘甜、滑爽，是人们餐桌上的家常菜；蔓菁，即葑，又称大头菜，其根可当主食；菘，柄厚色青为青菜，柄薄色白

为白菜，淡黄的叫黄芽菜，也是南方常食蔬菜；韭，遍布全国各地，为人们常食之菜；茄子，汉时由印度传入，这时已在全国栽种；菰，即茭白，已为人们常吃。此外，还有芹菜、芦菔（萝卜）、芋头、胡瓜（黄瓜）、冬瓜、蘑菇、芥菜、胡荽（香菜）、苋菜、竹笋、藕等。为了久贮，人们用盐水泡腌蔬菜，称为咸菹。《齐民要术》中专门有《素食》一节，记载制作各种蔬菜的方法。

汤菜称为羹。《齐民要术》中对制羹从选料、切割、火候、调味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说明当时制羹技术已十分进步。羹的品种较多。肉羹在北方很流行。晋将毛修之曾为魏太武帝制羊羹，被提拔为太官令。鱼羹是南方人的家常菜。还有驼蹄羹、猴头羹、莼菜羹等，都是由各地土特产经特殊烹饪制成的。《世说新语》中说，王武子对陆机夸示中原美食，认为江东无物可比得羊酪。陆机答道，有千里莼羹。后来即成为江东名菜。除上述羹外，还有各种蔬菜、豆类制成的菜羹、豆羹，这是一般平民百姓家中的常菜。

在调味品方面，甜的主要是蜂蜜和麦芽糖，但已知从甘蔗中榨糖。酱油和豆酱在汉代已会制作，魏晋南北朝时其技术进一步发展，品种也增多。《齐民要术》对做酱方法作了专门介绍，制作的酱有肉酱、鱼酱、虾酱及麦、榆子、芥子等做的酱。上层社会还往往以酱为馈赠佳品。豆豉在汉代已发明，这时常用于菜肴的加工烹饪。《齐民要术》也有“作豉法”，对豉的规模化生产提出了一系列的工艺和质量要求。醋的做法也有很大发展，《齐民要术》记载其制作法有23



王羲之《初月帖》

种。其固态发酵制曲酿醋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此外，平时常用的作料还有葱、姜、蒜、花椒、茱萸、橘皮、枯叶、木兰、桂皮、白梅、胡荽、葱头、胡椒、胡芹、荜拨、安石榴等。还有一种叫"八和齑"的复合调料，是用蒜、姜、橘皮、白梅、熟栗黄、粳米饭、盐、酢等八种原料制成，这是一种香美适度的高级调味品。

茶叶作为药用饮料，早在先秦已经开始。汉代则作为日常解渴饮料在四川、湖南一带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习俗逐渐由南向北推广普及。南方已普遍种植茶树。孙皓宴饮群臣，总要把大家灌醉。韦曜不会喝酒，孙皓密赐茶给他。这一时期文人名士多爱饮茶，民间以茶作为饮料已很普遍。由于佛教的发展，茶又成为佛家修禅时提神醒脑的必备之物，时人称为"茶佛一味"。唐代开始征收茶税，又实行专卖，称为"国榷"，是税收的重要来源。

酒的制造约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到汉代酿酒规模已经很大。魏晋南北朝时期酿酒多用高粱、葡萄、米谷等。《齐民要术》记载了不少制酒曲的方法，用以配制不同的酒。南方山青水秀，民间酿造出不少好酒。北魏都城洛阳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的人多以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酿的桑落酒十分有名。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在两汉的基础上更加走向精细。由于门阀士族追求奢侈生活，故在饮食上必然竞出花样，做工考究。与此同时，饮食专著也大量出现。如《崔氏食经》（4卷）、《食经》（14卷）、《食撰次第法》（1卷）、《四时御食经》（1卷）、《马琬食经》（3卷）、《会稽郡造海味法》（1卷）等。何曾撰写的《食疏》记载了自己所食用的菜肴，成为后人仿效的楷模。而《齐民要术》更是一部关于食料、食品生产及烹调的综合性的实用科技书。其中介绍了多种烹调技艺，列举了近百款菜肴的名称及其做法。

这一时期在饮食方式上也有新的变化，即由席地而坐的分食制向用桌椅一起进食过渡。汉晋以前，进食是用案，人则席地而坐，各人案前放食品。从晋代开始，受阿拉伯人高脚桌椅进食的影响，

高脚饭桌逐渐取代了食案。到唐代，围桌而坐的合食制就成为中国人饮食的主要方式。

二、胡汉融合，互相吸收

——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互相杂居，在服饰文化方面也互相吸收、影响。其汉胡服饰文化的变化大致是：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上基本遵循秦汉旧制。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进入中原后，也往往醉心于汉族高冠博带式的服装，如北魏孝文帝就班赐百官冠服，更换胡服。在劳动人民方面，由于汉族高冠博带式的传统章服不如胡服便于劳动，所以上身紧身短小、下身穿连裆裤的胡服在汉族劳动人民中推广开来，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这类服装。这就使汉族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逐渐向“上衣下袴（裤子）”制转变。

魏晋以后汉人常用的服装有襦、袄、衫、袍、单衣、褠、半袖、假钟、裘、裙（裳）、裤等。襦是短外衣，多絮以绵，未絮绵则为单襦，通常用布制，为一般百姓所穿，上层人士则多用丝织品制作。袄与襦形制相近，是紧身小皮袄，袖较窄小，男女都穿用。衫是敞口的，各阶层皆通用。袍不仅作为朝服，也被一般百姓所穿用。有里子，内絮丝绵。制袍材料有绢、布、锦等。北朝后期改造成圆领、小袖。单衣只有一层衣料，没有里子。官吏、百姓平时多穿用。褠与单衣相似，只是其袖子是直着下来，不像单衣那样肘部有一个弧形的悬垂。半袖是穿在外面的短袖服装，是家居便服，见外客时很少穿着。假钟是一种斗篷（或称披风），北方用来抵御风沙。裘是北方人常用的御寒服装，自天子、群臣至庶民百姓皆穿着皮裘；在南方也相当流行，有时也为修饰仪表之用。高级的用鸟羽制成，有雉头裘、孔雀裘等。裙也称为

裳，是与襦相搭配的。由于袍、衫、裤褶的流行，裙作为男子的服装已不太普及。裤主要是为腿部保暖，两条裤腿分开，裆部并未缝合，贫寒人不穿裤是较普遍的。当时一般人的服装是上襦下裳，或着袍、衫等长衣服。

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是袴（即裤）褶。袴是下身所穿之装，褶为上身所穿之装。汉代以前，汉族人裤子的结构还很不完善，一种是并不缝出裤管，仅以一布缠于腰股之间，名“犊鼻裈（kūn）”；另一种是仅用来护住腿部的下装，亦称“裈袴”，实即两条裤管，上部并不合裆，两裤管在腰部系带。上穿外衣如深衣、袍等加以掩盖。游牧民族由于骑射需要而产生合裆裤，东汉末首先在军队中流行，到魏晋南北朝时就在汉族百姓中流传开来。这时袴流行大口裤管，上下直幅，同等宽窄，便于行动，在膝处系一带子将小腿处的裤管向上扎缚起来。上身则为齐膝大袖衣，即褶。到晋朝，袴褶在汉族上层社会自天子到百官都可以穿。南朝皇帝如宋后废帝、齐东昏侯也常穿此服。北魏的朝服都穿此服。服装的面料最初在游牧民族时是用较粗厚的毛布制作，后来汉族则用锦绣织成料、毛罽（jì）等来制作。



北方少数民族服饰

北方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服装还有裲裆，即背心或坎肩。这本是军队中的裲裆甲，只有前后两片，无袖。这种服装既可保暖身躯，又可使两手活动灵活方便，妇女穿的裲裆往往加彩绣装饰。

魏晋以后，妇女的服装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少数民族服式后有所发展。一般是上穿衫襦，下穿裙子。衫襦一般为右衽，在北朝也有左衽。衫襦紧身合体，袖筒肥大。裙长曳地，多褶裥裙，下摆宽松。再加丰盛首饰，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如南京石子岗出土的东晋女俑，穿长方领窄袖束腰连衣裙，发上加巾子。南京幕府山出

土的南朝女俑，穿窄袖长方领紧身短衫，长裙，梳十字大髻加巾子。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出土的女俑，穿交领窄袖衫，高腰长裙，戴笼冠。敦煌莫高窟西魏285窟女供养人，穿大袖衫，腰裙内衬长裙。高句丽双楹冢羡道东壁行列图及美人图中的妇女穿对襟镶宽缘上衣，百褶裙。

名士和文人的服饰多穿缓带宽衣。他们崇尚虚无，任情不羁，穿了宽松衣衫，敞开衫领，袒露胸怀。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中，嵇康和阮籍穿的衣服，便是当时文士的典型服饰。据鲁迅说，这是因为魏晋士人好服五石散，药力散发后，皮肉发烧，因而要穿宽大衣服。


魏晋笼冠大袖衫

军队的甲胄有筩袖铠，其胸背甲片连在一起，肩部有筩袖，护头的兜鍪两侧有护耳，前额眉心处稍有下突，顶部中心竖起长缨。此式东汉已有，在西晋仍采用。筩袖铠由金属和皮革制成，铠甲呈鱼鳞状的是金属制成，呈龟背状的由皮革制成。裲裆铠和明光铠流行于南北朝。裲裆铠与裲裆衫大致相似，肩部有两条带子连接胸前和背后两大片，腰部束带。其亦有金属和皮制两种，金属甲片多为方形，又称“牌子铁裲裆”。这种铠甲在南北朝时已成为主流。明光铠的胸前和背后各有两大块圆形金属护片，在战场上闪闪发光，故名。到隋唐成为社会上应用最多的铠甲。

当时的帽子，帝王将相叫冕、冠。冕是帝王及王公大臣在祭祀及元会（元旦日举行的朝会）上使用，与衮服搭配，称衮冕。冠原为男子20岁时加冠，表示成年，汉魏时成为官吏的专用物品。冠冕也成为地位较高官员的代称。冠有多种名称，如通天冠、高山冠、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法冠、笼冠等。通天冠是皇帝在朝会时用，远游冠是皇帝在祭祀、朝会等正式场合以外使用，不过主要是供皇太子及宗室诸王用。其他冠为各类官吏所使用。冠

不是把头顶完全套住，而是用冠圈套在发髻上，冠两旁有两根缨在下巴处打结。平民百姓的帽子叫帻、帽。帻本是卑贱执事者束发用布，此时，人们往往在帻上加巾又加冠。帻的品种有介帻、平上帻、童子帻、纳言帻等。介帻的顶部为屋顶状，与进贤冠配合，供文吏使用。平上帻又称平巾帻，顶部呈平坦状，与武冠相配合，供武吏使用。未成年的儿童所戴帻无顶，表示尚未成人。总之，帻为低级官吏所用；有些高级官吏在非正式场合作为便帽使用，也有与冠配合使用。

当时还有高顶帽、乌纱帽、鲜卑帽等。高顶帽又名白纱帽，有多种形式，有的带卷荷边，有的挂有下裙，有的带纱高屋，有的带有乌纱长耳。主要供皇帝在宴会起居时使用，并成为皇帝的标志之一。乌纱帽在南朝为士庶所通用，无贵贱之分，只是流行式样时有变化。在北方主要用鲜卑帽，又称突骑帽、长帽等，帽的两侧及脑后垂至肩部，称为垂裙。

妇女盛行假发。发式有灵蛇髻、飞天髻、盘桓髻、十字髻等。少女则梳双髻或以发覆额。贵族夫人则头戴绀色丝帛装饰的帽状假髻，插长长的簪珥。簪珥头部饰黄金龙首，口衔白珠，或以鱼形的擿（耳挖簪）为饰。

这一时期人们脚下所穿的有履、屐、屩、靴等，用丝、麻、草、木、皮等制成，供各种人在不同场合使用。履一般在正式场合使用，如上朝、到官署办公、谒见上司或长辈等。如遇祭祀、上殿，还要脱履表示敬意。只有皇帝特许，可以剑履上殿，即带剑不脱鞋。这一般都是权臣享有。履用丝、麻、皮等材料制成，讲究的上面刺绣，或缀有珍珠，装有木底的履称舄，南北朝后期曾将木底改为皮底。屐用木制成，上面系带与脚相连接，底上突出部分称为足或齿，走泥路时方便，共有前后二齿。最初妇女圆头、男子方头；西晋元康（291—299）中，妇女也改方头。屐一般在家中穿用。谢灵运登山时，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齿，这种便于登山的屐称谢公屐。屩用麻、草、藤等制成，走路轻便，价廉易得，为一般

劳动者穿用，也有士兵穿着。靴源于北方游牧族，用皮革、丝织品或两者镶嵌而成，与今天中、高统靴式样相近似，主要是北方骑马者使用，南方使用者少。袜是丝织品、麻布或皮革制成，剪裁缝制而成，上有带子，用时系紧。当时人们在室内一般著袜行走，这种习俗传入日本，一直保持到现在。在请罪或奔丧时要脱去袜子，称为“徒跣”。

这时期饰物品种较多。主要有步摇、珰、钿、簪、钗、跳脱、指环等。步摇本是后妃、公主的饰物，这时使用范围已扩大。珰是耳环，主要悬挂珍珠。在河北定州华塔废址北魏石函中发现一对金耳坠。钿是用金、银作花朵状的饰物，插在头上。簪男女通用，女用于固定头发，男用于将冠和头发固定。钗是妇女常用饰物，像树枝，因名。这一时期墓葬中多次出土各种质地的钗，有金、银、铜等。除一般双股钗外，还有金爵钗，亦称雀钗，上有雀样花饰，一般为三品以上官员眷属使用。跳脱又称条脱，戴在妇女小臂的金属饰物，垂手时则落到腕部，后世多称为臂钏或腕钏。南朝齐东昏侯潘妃的一只琥珀钏价值 170 万。指环即戒指，这一时期墓葬中多有出土，一般为金、银制作，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群中出土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辽宁北票出土的金指环，上镶嵌三颗宝石，一颗仍在托座上。

三、居室的差别与坐具的变化

——住房家具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住房，贵族与平民差别较大。士大夫大抵有数十间住房。如晋山涛有屋十间，王沈有 50 间，鲁芝也有 50 间。大多采用大型厅堂和庭院回廊样式。也有些贵族拥有庄园，建造园林和经营园圃，占地颇多。如宋孔灵符的永兴墅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记载了他的庄园，园中有杏坛、橘林、栗圃等。

东晋司马道子的花园筑山穿池，有许多名贵花树，花费巨万。宋竟陵王刘诞的住房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一些担任中书舍人掌握实权者如阮佃夫、吕文度、茹法亮、朱异等，都有豪华的住宅和园囿。有些还采用原只能用于宫殿的鸱尾，如北朝尚书令李崇之子李世哲"广兴屋宇，皆置鸱尾"。营造材料一般是用土木，也有用贵重材料，如琉璃、赤石脂涂壁等。城市居民大多住在里坊中，如洛阳 100 900 户居民住在 220 个里坊中，平均每里近 500 户居民。乡间则大多聚族而居。住房有用砖瓦，也有用茅草。屋顶两面坡式，正面中部为一双扇门，两边各有窗，前有天井，外有围墙。多者有两进、三进乃至多进的大宅院。贫困百姓住房则极为简陋，有些则多人住在一起。有种极简陋住房称为"团焦"，其形状已难知晓。有些人也住在洞穴中，如晋孙登，汲郡人，居住在郡北山土窟中。道教徒张忠在永嘉之乱时隐于泰山，凿地为窟室，其弟子也窟居。

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游牧，毡帐是他们日常的住房。毡帐又称"穹庐"、"毡房"、"百子帐"。大的毡帐甚至可容纳上千人。《颜氏家训·归心篇》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可见南方人不信北方有这么大的毡帐。

中国在秦汉以来一直保持着在室内席地坐卧的习俗。室内地面上先铺较大的席"筵"，在其上铺设供坐、卧的家具，主要是席和低矮的床榻。办公、宴客时，临时陈设几、案、屏风等。登堂入室，必须先脱去鞋子。坐的样式是跪坐即双膝跪地而将臀部坐压在脚后跟上。如果在人前坐时双足垂前蹲踞姿态，表示对客人不敬，也表明缺乏教养不懂礼貌。两晋以后，中原战乱频仍，人口大量流动，民族大迁徙，中原汉族传统的社会习俗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游牧民族中坐姿都是垂足坐，称箕坐或箕踞，即蹲踞姿势。如《南齐书·魏虏传》描写魏主及后妃坐车时"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现存敦煌莫高窟北凉所建 268、272、275 等窟中，其菩萨坐姿也是垂足高坐。此后北魏、西魏、北周及隋初的洞窟

中，主要塑像也多为垂足坐式。这说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起居习俗的传入和濡染，广大汉族地区席地而坐的习俗已逐渐转变，而成为垂足坐姿。

由于坐姿的变化，日常家具也发生了变化。新式的适于垂足的坐具开始使用和流行。在5—6世纪的敦煌壁画中出现了两类坐具，一类是传统的席、床和屏风等，床体宽大而足低矮；另一类是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束腰圆凳在敦煌壁画中出现最多，多是用植物枝条编制，此凳在北朝墓室中也有发现。据考证，这类坐具源于印度次大陆，随佛教传播流行于中国。方凳的高度约与人的小腿相近，除有足的外，还有无足的实体方凳。这在敦煌壁画中也有画像。胡床在隋代称“交床”，是一种轻便折叠凳，北京俗称“马扎”。它的四足不是直立，而是交叉斜置。正如梁庾肩吾《咏胡床应教》诗中所说：“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胡床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末，《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

四、牛车和肩舆

——交通

交通工具。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层人物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牛车和肩舆。汉时贵族不乘牛车，贫民则使用较多。东汉末，牛车逐渐成为上层人士普遍的交通工具。其原因是牛车颠簸较小，乘坐舒适，且上结幰幔，装饰华美，车内安置凭几，可随意坐卧。魏晋以后，王侯、士大夫多乘牛车，且成为世家大族、豪富子弟一种时髦。如晋石崇、王恺驾车出游，争入洛城。司徒王衍在牛车上揽镜自照。王导执麈尾驱牛往救小妾。牛车既然是高级车乘，其好牛也价格不菲。王济与王恺斗富，赌一条名牛价值千万钱。北朝朝廷往

往以牛车赏赐大臣。如孝文帝赐高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当时牛车也作为农田、运输工具。如北魏太武帝打猎获千头麋鹿，命古弼发牛车五百辆运载。高欢与尔朱氏在韩陵之战时，连接牛驴堵塞归路，将士皆死战。

肩舆也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肩舆又称平肩舆、步舆，也有加盖后称襻舆、轿舆，八人抬的称八扛舆。肩舆是用人力抬杠的类似车样的坐具。汉代开始出现，魏晋后普及。诸葛亮曾乘步舆，持白羽扇，戴葛巾，指挥军队与司马懿作战。晋王献之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名园，乘平肩舆径入。其兄王徽之也曾乘肩舆径入一家竹园。东晋初王导随司马睿到水边去参加禊节，司马睿也是乘肩舆，很有威仪。唐阎立本绘《步辇图》，步辇即皇帝平时宫中乘用的较轻便的步舆。后赵石虎曾做金华辇等豪华步辇，其猎辇要 20 人抬担。与豪华的乘舆相对照的，是简便的版舆，也称板舆。如晋傅祗因足病，乘版舆上殿。梁名将韦叡指挥作战时坐在板舆上。在河南邓州学庄南朝墓出土绘彩画像砖中，有平肩舆图像，舆面方形，舆板四面有低栏，舆下四角各有一足，与舆板平齐处左右有长杆，以供肩扛。1977 年洛阳发现的北魏石棺画像中，有二人以板舆抬一老人，这板舆极简便，类似今天的担架。

在水运方面，有扁舟、艇、舫、舰等各种船只。西晋灭吴时，王濬造大船连舫（并两船），每船可载二千人，船上可驰马来往。东晋孙恩卢循起义时，以水战为主，义军攻刘毅时，有战船千余艘，其中八艚舰九艘，皆四层，高十余丈。南朝梁时，陆纳造大舰名三王舰（邵陵王、河东王、桂阳嗣王），又造二舰名青龙舰、白虎舰，并高 15 丈。北方所造船也不少。后赵石虎攻前燕，令青州造船千艘，后凑满军队五十万、战船万艘。北魏太武帝时为进攻南朝，诏令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刁雍为了从西北薄骨律镇等地运谷到北方沃野镇，建议改陆运为水运，造三百艘船，二船为一舫，一船载谷二千斛，可大大节省劳力。颜

子推说，河北人不相信南方有二万斛（合今100吨）的大船，可见南朝已能造载重二万斛的大船。南朝时，大的战舰上一般都装有拍竿，以拍击敌船。隋灭陈时，杨素造五牙大舰，前后置六拍竿，并高50尺，可容800名士兵。由此可见，两晋南北朝时造船技术水平是很高的。

道路、桥梁和客舍。陆路在古代有驰道、官道、州县大道、乡道之分。驰道较平坦。宋孝武帝时立驰道，自阊阖门至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玄武湖。北魏为军事需要新建或修复了许多交通干线。道武帝拓跋珪攻占晋阳后，命大将于栗磾自晋阳暗暗修复汉初韩信开的井陉故道，进入冀州。夺取邺、中山后又征发一万人修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直通代地，全程250公里。这样就打通了穿越恒山联系中山与平城的道路。过去自雁北要沿桑乾河往东到达幽州，或经并州往洛阳或邺城，两条路均悬远曲折，直道的开通缩短了自雁北到中原的道路。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延二年（436）发12 000人修莎泉道。文成帝时修河西猎道，孝文帝时修灵丘道，宣武帝时修斜谷旧道，孝明帝时修黑山道。这些道路修成后，既可使各地物资顺利到达平城，又便于北魏向各地运兵。

桥梁建设较有名的有西晋杜预建造的河桥。河桥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渡口富平津，建成后使往来便利。北魏时在南北两岸及河中洲上加筑河阳三城，使这里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北魏明元帝和太武帝都曾在黄河上建浮桥，这是一座由船排列组成的桥。除浮桥外，北魏还建有木桥。拓跋焘时，雍州刺史崔亮因长安北渭水浅不通船，即用长木数百根为柱，造了座崔公桥。

驿站和旅店多设在交通干线上。驿站是为过路官员和递送信件的官兵设置的。旅店即“逆旅”，是私人开办的，是为长途奔波的商人和行人准备的。西晋潘岳认为“逆旅”作用很大，行路者可住店方便，开店者可以此为生，各得其所。北魏崔敬友在肃然山南的大路北，开设逆旅，并供应饮食，方便了路人。北魏后期因财政紧张，开始对旅店征税，共分五等，说明大小旅店不少。

五、门第婚和薄葬

——婚姻和丧葬

在门阀制度下，士族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和特权，在婚姻上有严格的限制，士族高门的通婚对象仅限于士族集团内部。例如侨姓中的陈郡谢氏，其通婚对象不过是太原王氏、陈郡袁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泰山羊氏、陈郡殷氏等几个家族。琅琊王氏是第一等高门大族，其婚姻范围也很小，不外乎陈郡谢氏，高平郗氏、陈郡殷氏等。这种狭窄的婚姻范围，使得辈分混乱，也有许多内表亲、中表亲、外表亲等近亲繁殖。如果士族与庶族通婚，就被认为是婚姻失类，要受到族中人的非难。弘农望族杨佺期，由于过江晚，"婚宦失类"，受到东晋其他士族的压抑和排挤。北魏时世家大族崔巨伦姐姐的女儿瞎了一只眼，想下嫁给庶族，崔巨伦的姑姑闻而悲感说："岂令此女屈事卑族!"决定让儿子李翼娶她，族中人都认为她有义气。可见在门阀制度下，士庶不婚和身份内婚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裂，专制主义的放松，儒家独尊地位的动摇，各少数民族内入等原因，在选择对象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例如西晋时期司州刺史徐邈让女儿在内观察，挑选夫君，最后选中了面貌俊美又有学问的王濬。又如贾充的女儿贾午见韩寿美貌大方，与之私下往来，事情暴露后，贾充就把女儿嫁给了韩寿。凡此，都说明男女在择偶上已不必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有了相对的自由。东晋时中下层婚姻关系也较自由。葛洪曾称中下层妇女，或宿于他地，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猎；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可见"男女之防"已不如过去之严。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曾下过一诏书，允许淮南所获俘虏都放散，男女自相配匹。

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社会风气的影响，女性在婚配上更有自由权。有些女方家庭主动提出为女择婿。如郭禹、李孝伯、元雍、杨侃、卢柔等。有些男女自由相爱，而后正式聘娶，如裴洵与太原长公主、高欢与娄昭君、薛瑕与元匡妾张氏等。结婚女子，如果感情不和，可以离婚。妇女改嫁、再嫁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北朝，由于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使汉族与鲜卑族通婚的现象也大为增加。

这一时期的婚聘程序仍基本按照古代的“六礼”：一纳彩，男方送彩礼，女方纳之；二问名，问得女方姓名、生辰；三纳吉，定下婚姻之事；四纳征，送上订婚之礼；五请期，确定迎亲日期；六亲迎，即迎娶。其中前五礼都是订婚阶段的程序。当然，时代的变迁，也使婚俗出现一些新形式，如反映北方婚俗的有催妆、新妇乘鞍、谑郎等（见《酉阳杂俎》及续集）；南方婚礼中有却扇等。



庄园图卷（东晋画像砖）

在丧葬方面，秦汉盛行厚葬之风，三国曹操、曹丕都提倡薄葬。西晋承续了曹魏薄葬思想。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死前就预作《顾命终制》，要求用时服入殓，不设明器，司马昭遵命执行。这对西晋的丧葬有很大影响，有不少人照此去做。如皇甫谧死后，其儿子就遵他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东晋也提倡薄葬，晋元帝、晋明帝都在遗命中要求殓以时服，务从简约。康帝在陵墓中用了宝剑等物，被认为“违先旨累世之法”。后来孝武帝的王皇后死，又再次下诏丧事从俭。十六国的统治者有些实行厚葬，如刘曜葬其父妻、慕容熙葬其妻，前凉张骏墓被盗时也发现许多奇珍宝物。但也有不少主张薄

葬。如冯跋下遗书说："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南朝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丧葬也归于俭朴。一些大族如张邵、王微也教育子孙要重生轻死，主张薄葬。梁陈在葬制上总的说来也是俭约的。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有《终制》一篇，讲了很多生前要求节葬的事例。陈武帝遗诏中要求葬礼"勿得奢而乖度"。北魏冯太后对自己陵墓大小及不设明器等也做了规定。北周韦敻要求子孙在他死后不换新衣，不设牲牢祭奠，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即可。总的来说，两晋南北朝的葬制比起秦汉和隋唐来是比较俭约的，这与当时儒家思想统治有所动摇有关。当然，这也只是一般的趋势，从考古发掘看，有些墓葬规模还是较大的。如阳羡西晋周氏墓葬群一号墓长达 13.12 米，随葬品也极丰富；北魏元邵墓陶俑有 1 000 多件；北齐娄叡墓陶俑达 610 件。

这一时期虽然流行薄葬，却普遍重丧，即注重感情的宣泄。如东晋顾荣死，家人因其生前好弹琴，就把琴供于灵前以寄哀思。张翰往吊，弹琴数曲，哭道："顾兄还能欣赏吗?"由于重丧，致使相墓术十分流行。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相墓者，如郭璞、孔子恭、高灵文等。南齐唐寓之的父祖也以图墓为业。会稽郭原平由于掌握了较好的相墓术，以致有不少人来求他相墓。相墓又称择吉地，求得宝地则累世隆盛。相墓术注重审察山川形势，即山脉、水流、林木的位置、走向、枯荣，因而考古发掘中，六朝的墓葬多依山而葬，十分注重选地势高的土山丘陵埋葬。

六、元旦、端午和重阳

——岁时节令

岁时节令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习俗，它既与季节变化有关，也与生产劳动有联系，因而有很大的历史传承性。两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以下节日。

元日（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春节，是我国古老而隆重的节日。元旦前一天为除夕，人们聚岁，吃团圆饭，放爆竹。到正月初一，这是岁时之首。人们换上新衣，贴春联，走亲访友，拜年祝福。据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记载，这天风俗还有庭前放爆竹，以避山臊恶鬼；饮椒柏酒、屠苏酒，食鸡，贴门画，挂桃符等。放爆竹是将竹筒放在火上，使发出劈啪响声，以增加节日气氛。这是以前没有而为两晋南北朝时新产生的。

在元旦前的十二月初八，为“腊八节”，这是人们最隆重的祭祖日子。由于佛教的传入，也有人扮作金刚力士以驱邪。

修禊节（上巳）。这一节俗约起源于周代。这一天人们到水边洗濯，以去灾祈福。原为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西晋时每逢禊节，洛阳的王公贵族都到南浮桥边参加节日活动，男女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东晋初，王导、王敦利用这个节日促使南方大族与司马氏政权的合作。王羲之曾约了许多朋友在兰亭修禊，饮酒赋诗，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少数民族君主也重视这一节日。后赵石虎在这一天来到水边，参加的还有许多公主、名家妇女等人，大家车服灿烂，也有骑马步射，饮宴终日。

端午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与夏至节有密切联系。晋周处《风土记》：“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因两者多处于仲夏，许多习俗相同。例如人们要用蒲剑、艾人等压邪、防瘟疫。后来民间对夏至的重视逐步转移到端午。端午时人们又用吃粽子、赛龙舟来纪念战国时投江而死的楚大夫屈原。粽子最早称角黍，因早收的黍，性黏，宜于包裹。在《风土记》中说角黍是顺应节气的做法。到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开始出现粽子的说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开始将角黍与屈原之死相联系。南北朝时有益智粽、黄甘粽等名称。竞渡的习俗也是在南北朝时广泛地传播起来。

七月七。又称七夕节、乞巧节、女儿节。相传七月七是汉武帝的生日，有一青鸟从西方飞来，青鸟即西王母。后演变为地上牛郎与天上织女相爱，被西王母拆散，并画一天河相隔。每年七夕，喜

鹊搭起桥让两人相会。魏晋南北朝乞巧习俗日益普及。《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又说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即向织女乞有一双巧手。按魏晋时习俗，这一天还要晒衣服、晒书。

重阳节（九月九）。又名登高节、“菊节”。“重阳”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汉末才称九月九为重阳节。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了重阳登高饮菊花酒、插带茱萸的风俗。梁吴均《续齐谐记》讲这一天世人多登高饮酒，妇女带茱萸囊。菊花在万木凋零时开放，人们把它看作长寿的象征；茱萸是落叶小乔木，开小黄花，有浓烈香气，有避除恶气、抵御初寒的功效。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喜欢在重阳赏酒，重阳登高也受帝王欣赏。刘裕曾在重阳节登彭城项羽马戏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重阳节已成为重要节日。

七、樗蒲、握槊和围棋

——娱乐生活

樗蒲。樗蒲在西汉时已出现，魏晋南北朝很流行。如西晋武帝、后赵石勒、东晋桓温、梁名将韦叡、北齐大臣祖珽等都爱玩此。中下层社会也进行此游戏，甚至十来岁小孩也玩此。樗蒲之具有五：一为枰，是棋盘，盘上有关、坑、堑等标志，为行棋之障碍；二为杯，是投掷五木的容具；三为木，是投掷物，类似骰子，投掷后的成绩决定马和矢的行动。木共有五块，称五木，为立方体，上为黑，下为白，侧面两块带黑色的为犊，带白色者为雉；四为马，是棋子，玩者用它在棋盘上过关跨堑；五为矢，也是棋子，代表步兵，用来围车或阻止马前进。五木投掷后，如全黑为卢，其采十六，可连掷打马；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这四者为贵采。此外，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为杂采。贵采得

连掷，得打马，过关，其余则不能打马，但可调动兵卒。玩时双方执马、矢两种棋子，投掷五木，根据所得齿数，或策马过关，或挥卒围截。这是一种技巧的比赛。但在上层社会中往往以此来赌博。如梁昌义之、曹景宗、韦叡曾设十二万钱以樗蒱相赌。

握槊。握槊之戏从西域传来，魏晋南北朝盛行于北方。北魏孝文帝时有李幼序、丘阿奴两人并工握槊；这是最早的记载。北齐大臣和士开精通此术，常陪武成帝高湛及皇后胡氏玩，因而受宠。北魏末尔朱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突然有声，一局之子尽皆倒立。可见握槊应是一种棋局。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握槊与南方的双陆结合，发展成隋唐时期的双陆。隋唐时双陆的玩法是，下设一小桌，棋盘四周有护栏，棋子呈棒槌状，双方黑白各15枚（一说16枚），两人相博。掷骰子的点数各占步数，先走到对方者为胜。握槊可能也类似。

弹棋。起源于西汉，本为宫中的游戏，汉末社会大乱，流入民间，魏晋南北朝时很盛行。曹丕因爱好此，曾写《弹棋赋》，魏丁廙、晋夏侯惇也写有《弹棋赋》，梁简文帝曾写有《弹棋论》。棋盘用石头制成，磨得光滑，方形，中间隆起，四外低平，棋盘双方各有一蛟龙盘成的圆洞。棋子用硬木或象牙等物制成，共12枚，每方6枚。玩时双方将棋子摆好，在盘上洒滑石粉。用手弹棋，使自己的棋子通过棋盘中间隆起部分射入对方的圆洞。弹棋时，一方根据对方所摆棋势，用拨、捶等技术，打开对方棋子，为进入对方圆洞扫清道路，另一方则调动自己的棋子，布下阵势，以阻止对方棋子攻入。凡是被击中的棋子，都暂时不能调动。最后，谁先将6枚棋子全部弹入对方洞中者为胜。

投壶。投壶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是宾主用以反映自己礼仪修养的活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向娱乐化发展。先秦时投壶，壶中装有一定数量的小豆，以防投入壶中的箭跃出；西汉武帝时，郭舍人改进投壶之戏，将柘木箭改成竹箭，以增加箭的弹性。魏晋南北朝时投壶盛行，有人技术很高，投而不中，箭激反弹，能捷而得

之，再投而中。这种技巧称为“骁”。南齐柳恽善于此技，梁陈时周璝、贺徽能一箭四十余骁。另有“剑骁”、“莲花骁”等技术，难度更大。如“剑骁”可能是投入的箭从壶中弹出，挂在壶边的耳上，呈一种挂宝剑的形状，难度极大，得分也最高。“莲花骁”为箭反弹出挂在壶耳上，组成莲花状，其难度更大。西晋时石崇有妓，善投壶，能隔屏风而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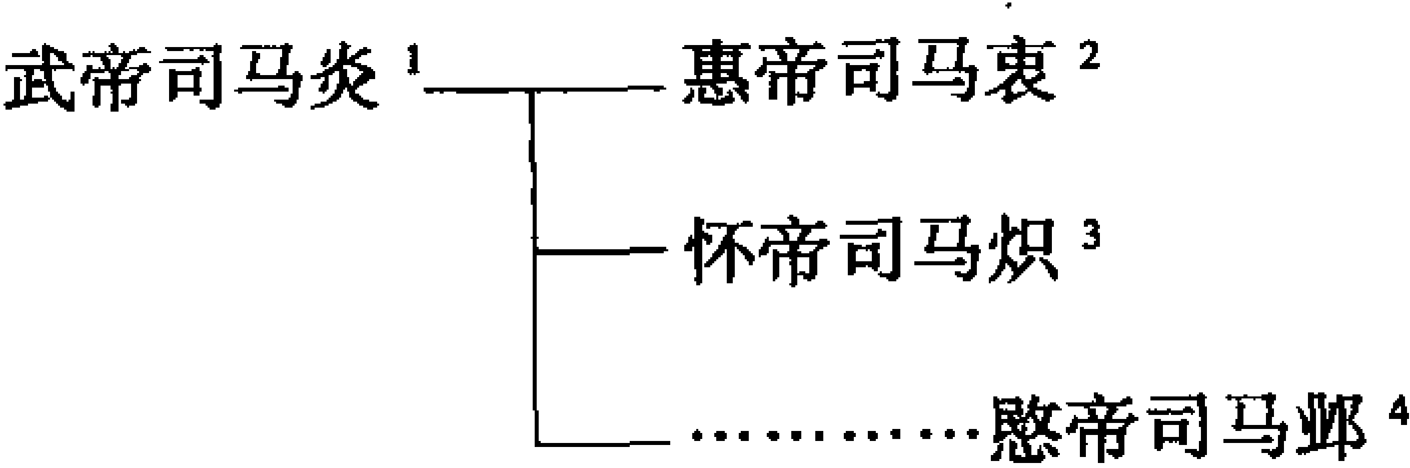
围棋。围棋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史籍已有明确记载围棋活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围棋活动十分普遍。魏晋之际，名士相聚常饮酒下围棋。东晋时祖纳好围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淝水之战时，谢玄破苻坚，捷报送到谢府，谢安正与客围棋，将捷报放在床上，了无喜色，照样下棋，被人引为将帅风度。齐高帝、梁武帝都好围棋；梁武帝水平很高，“棋登逸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下棋也十分爱好，一次他与刘树下棋，尚书令古弼在外等了很久，无法奏事，就闯进去，揪住刘树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北魏甄琛被举秀才后，进入京师，整日下棋，让仆人秉烛照明，仆人困了，打起了瞌睡，被琛责打。北齐高孝瑜、梁时年仅 8 岁的陆琼，都棋艺高超，能重摆覆局，陆琼被称为神童。

魏晋南北朝对棋手分级定品，仿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共定为九个等级，并设围棋的州郡大小中正，作为品评的权威人士。刘宋孝武帝时，评王抗为第一品，褚思庄、夏赤松为第二品；南齐时，齐高帝萧道成为第二品，江斅为第五品。梁武帝时，在柳恽主持下成《棋品》3 卷，这是优秀棋手的排名册，登格者共 278 人。由于新人不断出现，《棋品》在若干年后要重新校订。对棋手按九品分级，对后世影响很大，现今围棋界采用九段的做法，应与此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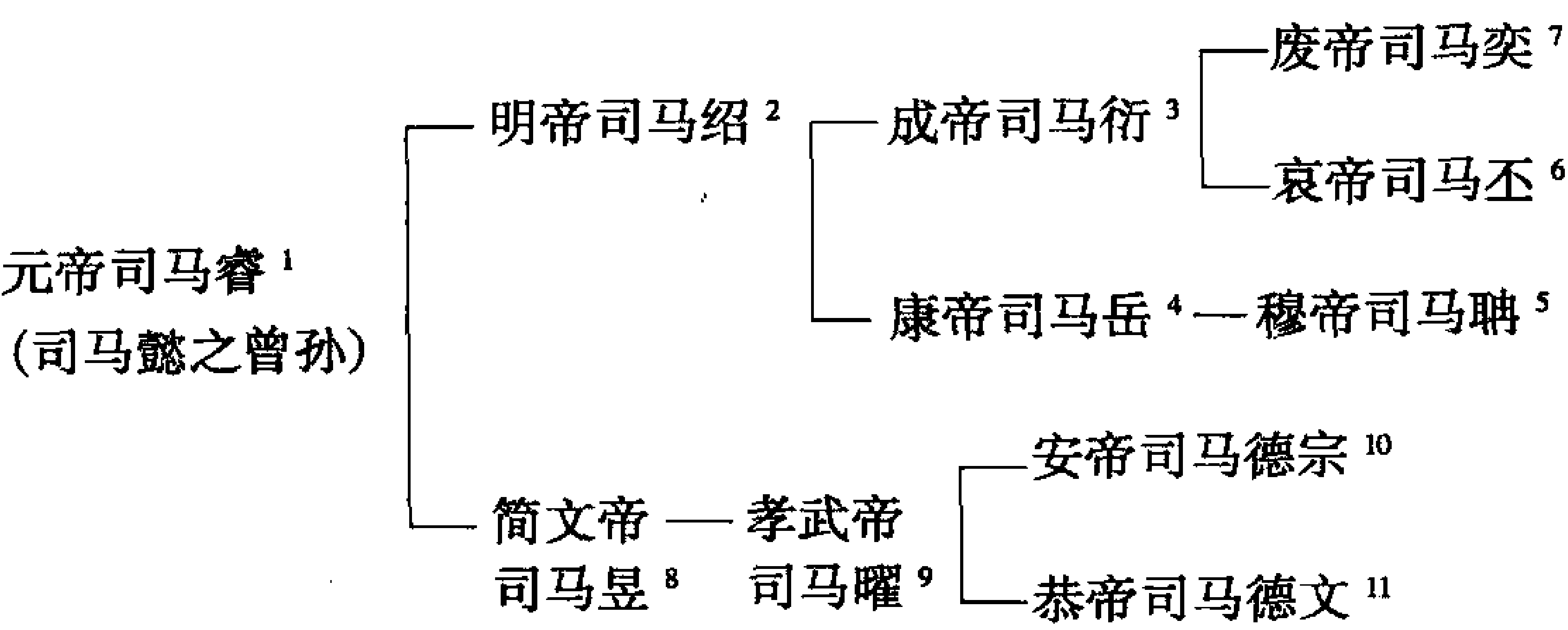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棋具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原来围棋纵横各 17 道，共 289 格，黑白棋各 150 枚。十六国北朝初，北方出现纵横各 19 条线的围棋盘，可多放 72 子，使棋路有了更大的变化。

附录一　两晋南北朝世系表①

西　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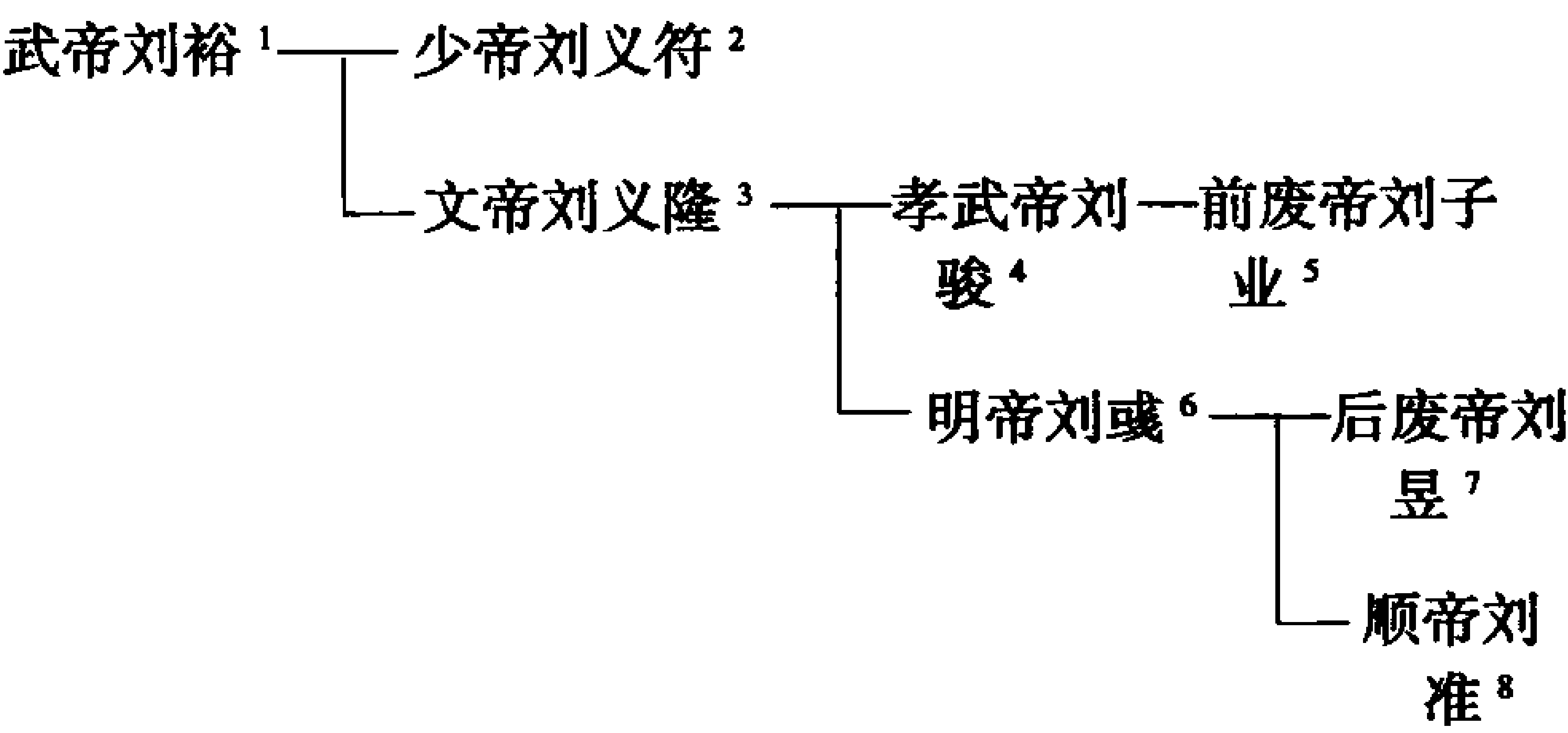


东　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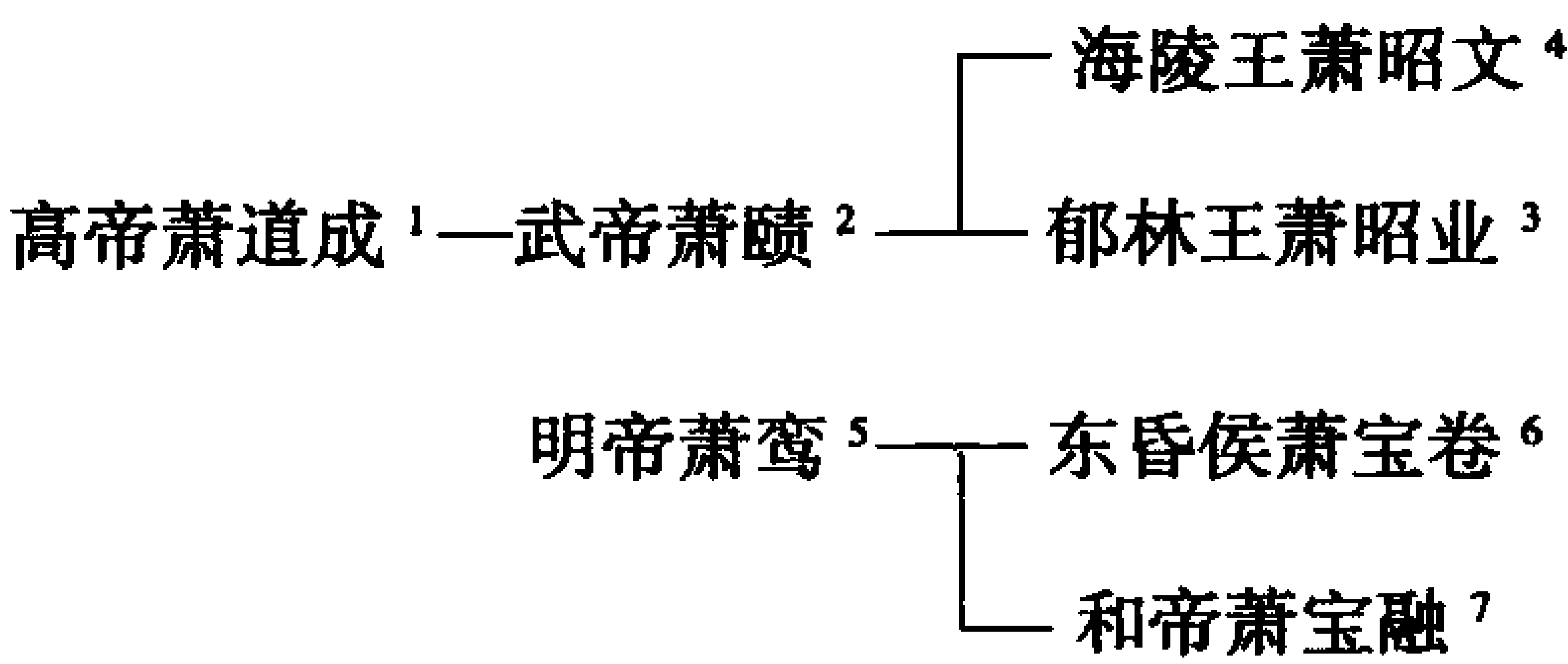
① 数码为顺序，直线表示父子相继，虚线表示非父子关系，并列表示兄弟关系。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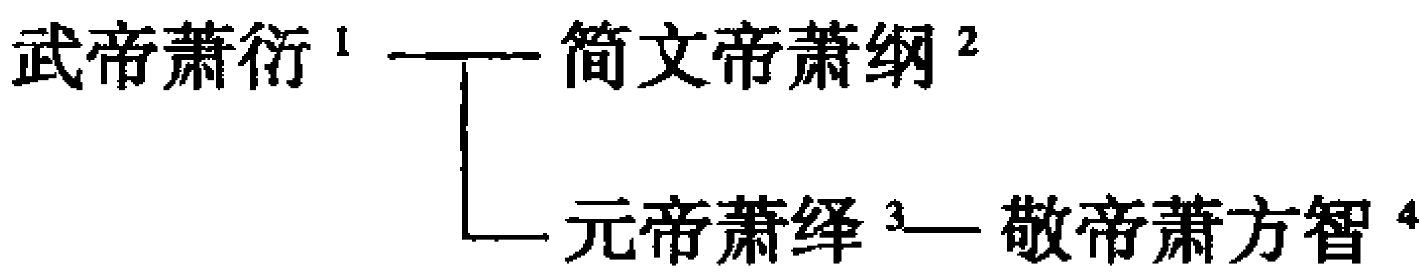
武帝刘裕1
少帝刘义符2
文帝刘义隆3
孝武帝刘骏4
前废帝刘子业5
明帝刘彧6
后废帝刘昱7
顺帝刘准8

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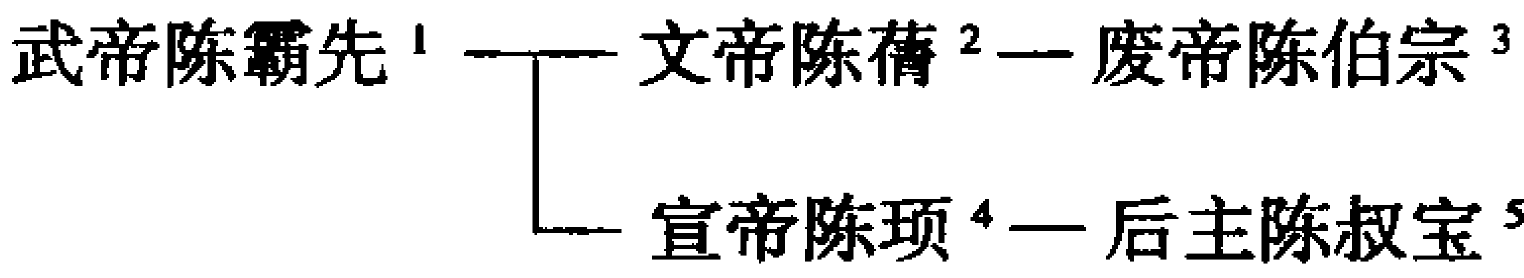
海陵王萧昭文4
高帝萧道成1
武帝萧赜2
郁林王萧昭业3
明帝萧鸾5
东昏侯萧宝卷6
和帝萧宝融7

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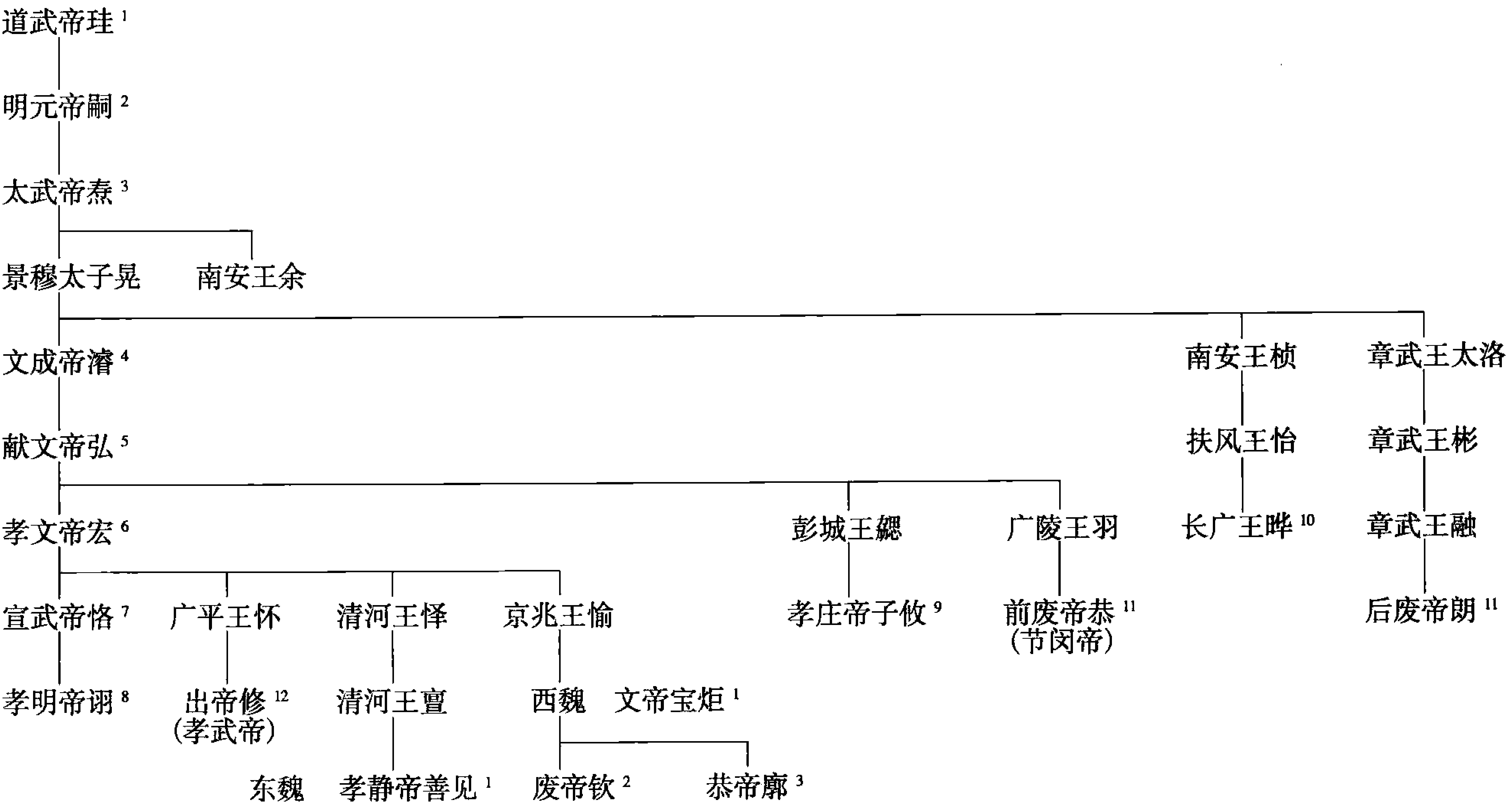
武帝萧衍1
简文帝萧纲2
元帝萧绎3
敬帝萧方智4

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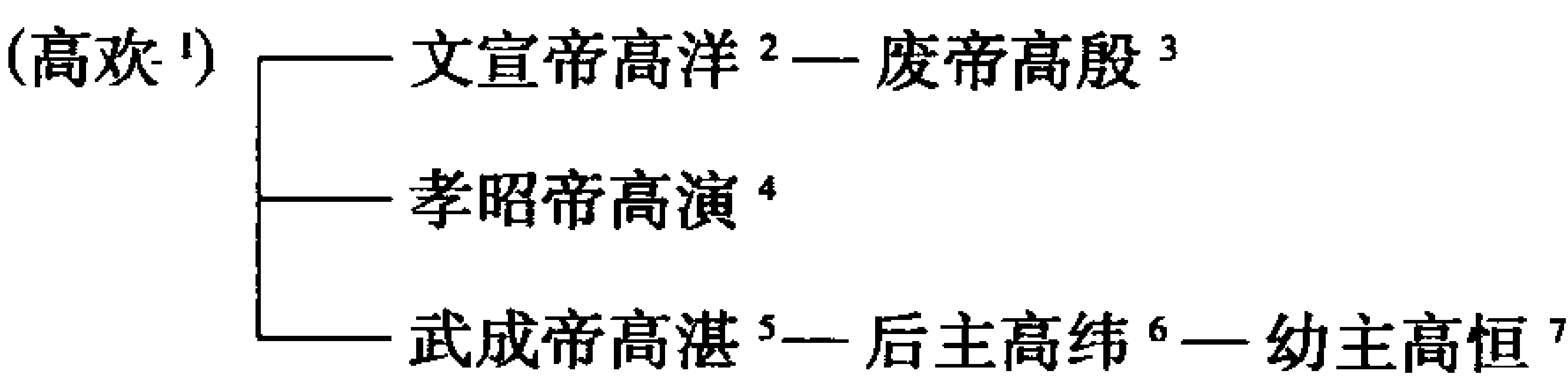
武帝陈霸先1
文帝陈蒨2
废帝陈伯宗3
宣帝陈顼4
后主陈叔宝5

北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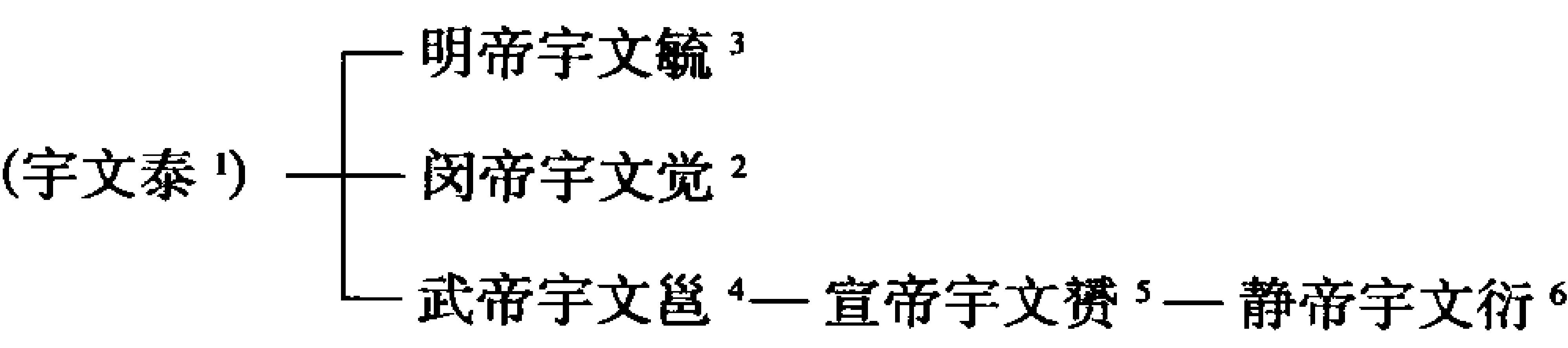
道武帝珪[1]
明元帝嗣[2]
太武帝焘[3]
景穆太子晃
南安王余
文成帝濬[4]
献文帝弘[5]
孝文帝宏[6]
宣武帝恪[7]
孝明帝诩[8]
广平王怀
出帝修[12]
(孝武帝)
清河王怿
清河王亶
东魏
孝静帝善见[1]
京兆王愉
西魏
文帝宝炬[1]
废帝钦[2]
恭帝廓[3]
彭城王勰
孝庄帝子攸[9]
广陵王羽
前废帝恭[11]
(节闵帝)
南安王桢
扶风王怡
长广王晔[10]
章武王太洛
章武王彬
章武王融
后废帝朗[11]

北　齐



(高欢[1])
文宣帝高洋[2]— 废帝高殷[3]
孝昭帝高演[4]
武成帝高湛[5]— 后主高纬[6]— 幼主高恒[7]

北　周



明帝宇文毓[3]
(宇文泰[1])
闵帝宇文觉[2]
武帝宇文邕[4]— 宣帝宇文赟[5]— 静帝宇文衍[6]

附录二　十六国兴亡表

	国　名	建立者	民族	起迄年代	为谁所灭	都　城	地区（最大区域）
	成汉	李雄	巴氐	304—347	东晋	成都（今属四川）	今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
淝水之战前	汉　前赵	刘渊 刘曜	匈奴	304—329	后赵	平阳（今山西临汾） 长安（今西安市）	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各一部分
	后赵	石勒	羯	319—351	冉魏	襄国 （今河北邢台西）	今黄河中下游
	前凉	张轨	汉	301—376	前秦	姑臧 （今甘肃武威）	今甘肃和新疆的一部分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370	前秦	邺 （今河北临漳西南）	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
	前秦	苻健	氐	351—394	西秦	长安 （今西安市）	今黄河流域、辽东、四川

（续表）

		国　名	建立者	民族	起迄年代	为谁所灭	都　　城	地区（最大区域）
淝水之战后	关东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409	北燕	中山（今河北定县）	今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和河南部分地区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398—410	东晋	广固（今山东益都）	今山东一带
		北燕	冯跋	汉	409—435	北魏	龙城（今辽宁朝阳）	今辽宁、河北东北部
	关中	后秦	姚苌	羌	384—417	东晋	长安（今西安市）	今陕西、河南、甘肃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407—431	吐谷浑	统万（今陕西横山）	今陕西和河套一带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385—431	夏	苑川（今甘肃榆中）	今甘肃东部
	河西走廊	后凉	吕光	氐	386—403	后秦	姑臧（今甘肃武威）	今甘肃和新疆一部分
		南凉	秃发乌孤	鲜卑	397—414	西秦	廉川堡（今青海乐都）	今甘肃西部一带
		西凉	李暠	汉	400—421	北凉	酒泉（今属甘肃）	今甘肃西部
		北凉	沮渠蒙逊	卢水胡	397—439	北魏	先张掖，后姑臧	今甘肃和新疆一部分

附说：① 前凉从张轨任凉州刺史算起。
② 冉魏、西燕、代未算在内。
③ 关东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

附录三　两晋南北朝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晋武帝泰始元年	265	司马炎逼魏主禅位，魏亡，西晋建立。炎即晋武帝。
晋泰始二年	266	罢农官，所统悉属郡县。晋取消屯田。
晋咸宁三年	277	制定王国置军制度。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共5 000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共3 000人；下国置一军，1 500人。
晋咸宁五年	279	晋武帝发兵20余万，分六路攻吴。
晋咸宁六年	280	晋军到达建邺，孙皓出降，吴亡。全国统一。颁布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
晋武帝太熙元年 惠帝永熙元年	290	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八王之乱开始。
晋惠帝永平元年 元康元年	291	贾后杀杨骏。又命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又以矫诏罪杀玮。“八王之乱”开始。
晋元康六年	296	氐帅齐万年率领关中氐、羌族人民起义。
晋元康八年	298	关中连年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汉族和巴氐族人民数万家10万余口，流入蜀地就食。
晋元康九年	299	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
晋永康二年	301	氐人李特率领流民在绵竹起义，进攻成都。
晋惠帝永安元年 建武元年 永兴元年	304	匈奴左贤王刘渊在离石起兵，建国号汉。
晋永兴三年 光熙元年	306	“八王之乱”结束，前后凡16年。 李特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

晋怀帝永嘉元年	307	命琅玡王司马睿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移镇建业。睿以王导为谋主，引用顾荣、贺循等。
晋永嘉二年	308	刘渊称汉帝。
晋永嘉三年	309	刘渊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均败，乃还。 石勒攻巨鹿、常山，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
晋永嘉五年	311	汉刘曜攻入洛阳，杀士民3万余人，俘晋怀帝。自洛阳陷落，中原士族大批南迁。
晋永嘉七年 愍帝建兴元年	313	汉主刘聪杀晋怀帝。司马业在长安即位，是为愍帝。 祖逖被司马睿任为豫州刺史，率部曲渡江北伐。
晋建兴四年	316	汉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亡。
晋元帝建武元年	317	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自此史称东晋。 汉刘聪杀晋愍帝。
晋建武二年 大兴元年	318	晋王司马睿称帝。 汉主刘聪死，刘曜即皇帝位，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
晋大兴二年	319	石勒在河北称赵王（后赵）。
晋元帝永昌元年	322	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在武昌起兵。
晋成帝咸和二年	327	庾亮征苏峻入朝，苏峻与祖约起兵反。
晋咸和四年	329	石勒攻入关中，前赵亡。
晋咸和五年	330	虞喜发现岁差。
晋咸康二年	336	发布“壬辰诏书”，禁止封山占水。实无效果。
晋穆帝永和元年	345	庾翼死，晋以桓温为荆州刺史。
晋永和三年	347	桓温入蜀，成汉亡。
晋永和五年	349	后赵石虎称帝，梁犊起义。 后赵冉闵夺得政权，杀胡、羯20余万人。
晋永和九年	353	殷浩北伐失败；王羲之写出《兰亭集序》。
晋永和十年	354	桓温上疏请废殷浩，掌内外大权；伐前秦，至灞上，因缺粮退兵。

晋永和十二年	356	桓温伐羌人姚襄，攻入洛阳。建议东晋迁都洛阳，朝廷不听。
晋升平元年	357	苻坚起兵杀苻生，即帝位。任用汉人王猛。
晋哀帝兴宁二年	364	桓温主持土断，称“庚戌制”（三月初一）。
晋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	369	桓温北伐前燕，以粮竭而退。
晋太和五年	370	前秦灭前燕。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	373	桓温死。东晋军政大权由谢安和桓冲掌握。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376	前秦灭前凉、代，统一北方。
晋太元四年	379	前秦占领襄阳、彭城。
晋太元八年	383	前秦与东晋发生淝水之战，前秦败。吕光出征西域。
晋太元十年	385	谢安死，琅玡王司马道子为扬州刺史，专权。
晋太元十一年	386	拓跋珪建立北魏。
晋太元二十年	395	拓跋珪在参合陂灭后燕主力，坑杀四五万人。
晋安帝隆安二年	398	王恭、殷仲堪和桓玄联合起兵声讨司马道子。
晋隆安三年 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	399	孙恩起义。
晋元兴元年 北魏天兴六年	403	桓玄称帝，国号楚。
晋元兴三年 北魏天兴七年 天赐元年	404	刘裕在京口起兵讨桓玄，桓玄死。
晋义熙三年 北魏天赐四年	407	刘裕入建康，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控制了东晋朝廷大权。
晋义熙六年 北魏明元帝永兴二年	410	刘裕灭南燕。
晋义熙九年 北魏永兴五年	413	刘裕主持土断。
晋义熙十二年 北魏神瑞三年 泰常元年	416	刘裕攻后秦。次年后秦亡。

晋恭帝元熙二年 宋武帝永初元年 北魏泰常五年	420	刘裕建立宋王朝，东晋亡。南朝开始。
宋少帝景平二年 文帝元嘉元年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424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他在位期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
宋元嘉十六年 北魏太延五年	439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
宋元嘉二十二年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445	北魏盖吴起义。
宋元嘉二十七年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	北魏太武帝侵宋，宋魏大战。 北魏太武帝杀司徒崔浩。
宋元嘉三十年 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	453	宋太子劭杀文帝，武陵王骏起兵，至新亭即位，是为孝武帝。
宋大明六年 北魏和平三年	462	祖冲之奏上新历，纠正何承天《元嘉历》的错误。
宋明帝泰始五年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	469	北魏攻陷宋东阳。至此，宋丧失青、冀、兖、徐和豫州的淮西。北魏迁青、齐民至平城。
宋后废帝元徽二年 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	474	北魏废门、房（大族的分支）之诛。
宋元徽四年 北魏延兴六年 承明元年	476	北魏冯太后毒死献文帝，再临朝称制。
宋顺帝升明三年 齐高帝建元元年 北魏太和三年	479	萧道成即帝位，建立南齐。
齐武帝永明三年 北魏太和九年	485	北魏孝文帝施行均田制。 南朝齐唐寓之起义。
齐永明八年 北魏太和十四年	490	北魏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
齐永明十一年 北魏太和十七年	493	齐武帝因故杀雍州刺史王奂，子肃奔魏，为孝文帝制定礼仪官制。
齐明帝建武元年 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
齐建武四年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	497	北魏镇压平城鲜卑贵族守旧派穆泰、陆睿等叛乱，赐废太子元恂死。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	499	北魏孝文帝死。
齐和帝中兴二年 梁武帝天监元年 北魏景明三年	502	萧衍即帝位，建立梁，是为梁武帝。
梁天监十四年 北魏延昌四年	515	北魏冀州僧法庆起义，自号大乘。
梁天监十八年 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	519	北魏羽林、虎贲近千人，到尚书省诟骂，反对排抑武人。 北魏吏部尚书崔亮为“停年格”。
梁普通四年 北魏正光四年	523	北魏六镇起义。以后发展为各族人民大起义。
梁大通二年 北魏武泰元年 孝庄帝建义元年 永安元年	528	北魏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葛荣围邺，号称百万。 为尔朱荣所破，魏杀葛荣。
梁中大通二年 北魏永安三年 长广王建明元年	530	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兆杀孝庄帝。
梁中大通六年 北魏永熙三年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	534	高欢立孝静帝，称东魏。从此魏分东西。
梁武帝大同元年 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东魏天平二年	535	宇文泰立魏文帝，称西魏。
梁大同三年 西魏大统三年 东魏天平四年	537	宇文泰在沙苑大破东魏军，高欢丧甲士七八万。
梁大同七年 西魏大统七年 东魏兴和三年	541	西魏苏绰为六条诏书。
梁中大同二年 太清元年 西魏大统十三年 东魏武定五年	547	高欢死。侯景之乱发生。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 西魏大统十六年 东魏武定八年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	550	高洋称帝，建立北齐。东魏亡。

梁元帝承圣元年 西魏废帝元年 北齐天保三年	552	梁将王僧辩、陈霸先克建康。侯景东逃，后为部下所杀。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
梁承圣三年 西魏恭帝元年 北齐天保五年	554	西魏攻陷江陵，杀梁元帝。
梁贞阳侯天成元年 敬帝绍泰元年 西魏恭帝二年 北齐天保六年	555	梁王萧詧在江陵称帝，为西魏附庸，是为后梁。
梁敬帝太平二年 陈武帝永定元年 北周孝闵帝 元年明帝元年 北齐天保八年	557	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梁亡。 西魏宇文觉称天王，北周建国，西魏亡。
陈文帝天嘉五年 北周武帝保定四年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	564	北齐颁布均田令。
陈宣帝太建四年 北周天和七年 建德元年 北齐武平三年	572	周武帝杀晋公宇文护。
陈太建六年 北周建德三年 北齐武平五年	574	周武帝废佛。
陈太建九年 北周建德六年 北齐幼主承光元年	577	北周灭北齐。 北周颁布《刑书要制》。
隋文帝开皇元年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581	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北周亡。
隋开皇九年 陈后主祯明三年	589	隋灭陈。全国统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两晋南北朝史话
作者＝刘精诚著
页数＝２５３
ＳＳ号＝１２４１５１１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